

白宫岁月

——基辛格回忆录

白宫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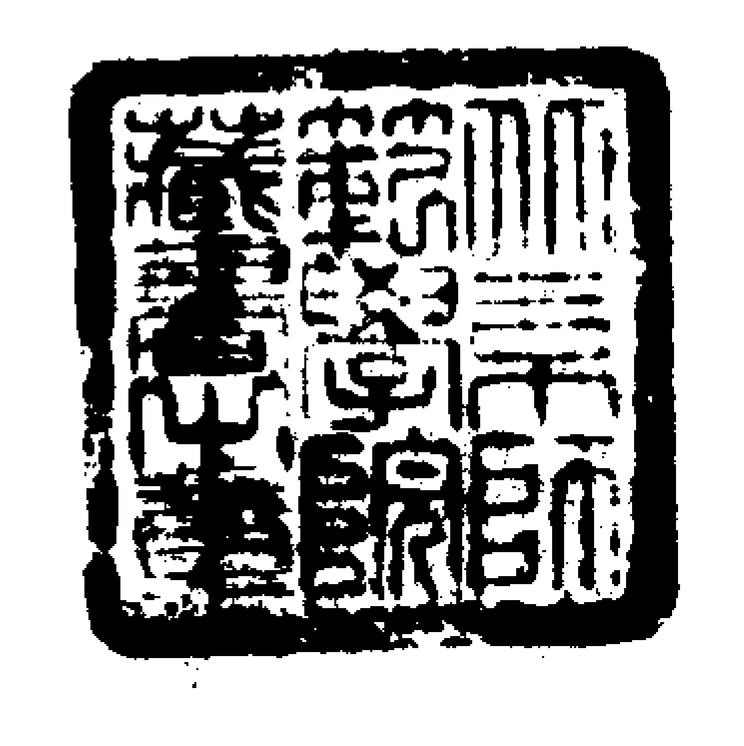
——基辛格回忆录

第 三 册

〔美〕亨利·基辛格 著

杨静予 吴继淦 刘觉俦 译





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Limited,1979
根据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一九七九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孙　政

白宫岁月

——基辛格回忆录

第三册

〔美〕亨利·基辛格 著
杨静予　吴继淦　刘觉俦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展览路24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3　插页：4　字数：308,000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书号：3003·1614　定价：1.40元

毛泽东主席会见基辛格。



周恩来总理会见基辛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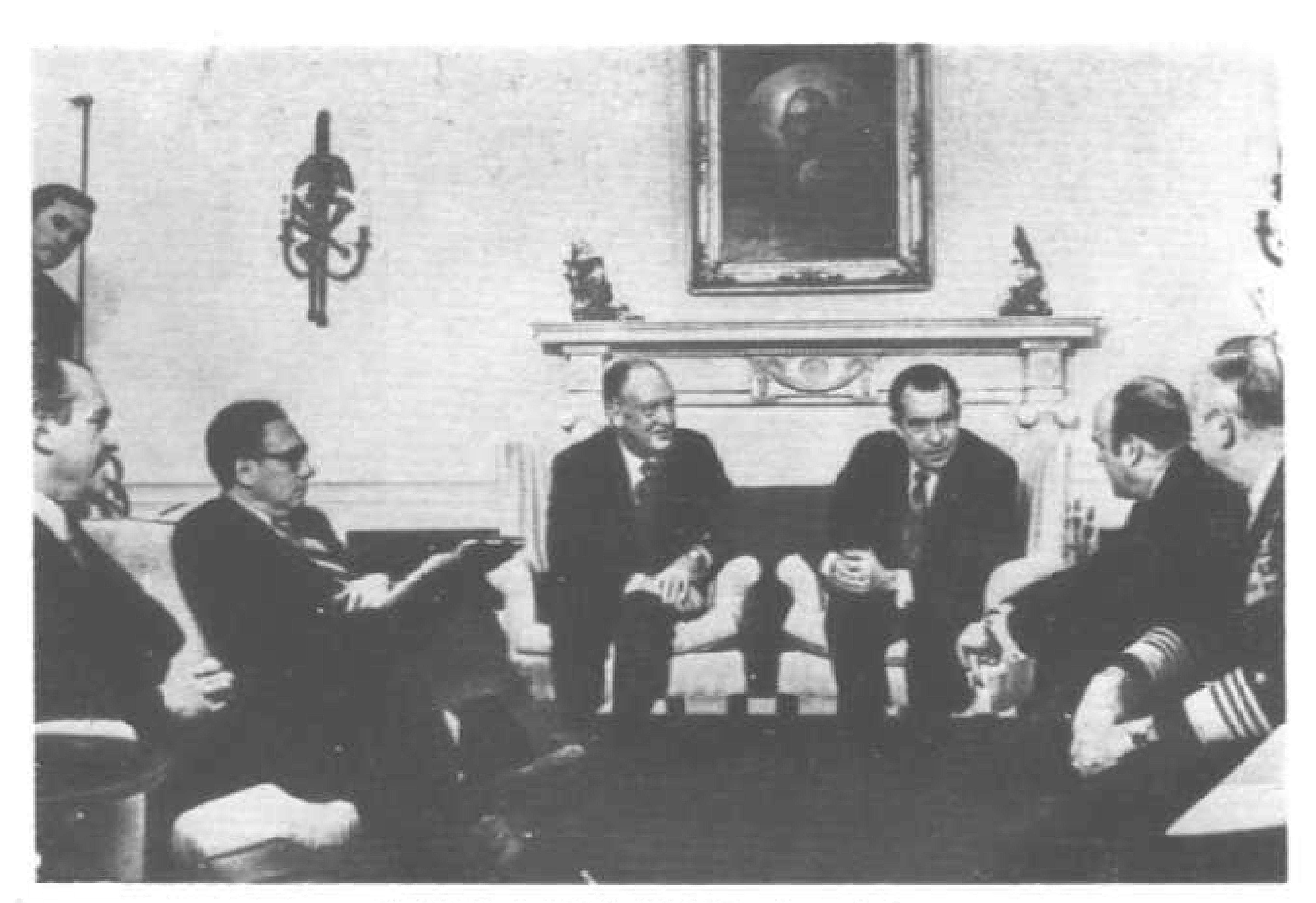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六日第二次访华前夕同记者在一起。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在行政大楼尼克松的秘密办公室里。

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印巴危机期间，基辛格访问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

一九七一年八月在圣克利门蒂。



策划在老挝的作战行动。左起：
赫尔姆斯，基辛格，罗杰斯，尼克松，莱尔德，穆勒。



老挝作战行动开始后的一次商谈。

目　　录

第十九章　北京之行……………………………………………………1

第二十章　美苏关系：在两条战线上突破……………………73

第二十一章　偏袒：一九七一年的印巴危机……………………145

第二十二章　联盟中的危机：曼斯菲尔德修正案和经济对抗……………………241

第二十三章　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的越南战争：逼河内就范……………………306

第十九章

北京之行

"孛罗一号"：序曲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我经历了平生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中华民国*大使詹姆斯·沈**来见我，商量在下届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如何保持台湾的席位。沈剑虹对于国务院企图让北京进入联合国同时又不驱逐台湾的"双重代表权"计划，提了很多反对意见。我很难聚精会神地跟他详细讨论这件事，因为就在七月一日这一天，我要启程去亚洲，秘密地如约赴北京。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比台湾当局更不应当得到这种即将来临的遭遇了。它是一个忠诚的盟友，对待我们的行为一直堪称楷模。它的代表，尤其突出的是它的大使，表现得老实可靠，而且具有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精明才干。我感到我和沈剑虹的交谈特别痛苦，因为我知道，不久之后更重大的事件就要来临，他私下里议论的这些联合国程序性的花招，就会全部化为泡影。然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对他讲，而且还得要尽可能装出一切如常、若无其事的样子，按照预定的问题跟他谈下去。

我的日记上记着，除沈剑虹外，我还会见了总统顾问唐·拉姆斯菲尔德、墨西哥外交部长埃米略·拉瓦萨和印度大使L·K·吉哈。我还同总统三次会晤，共用了两个多小时来重新审查我那些

* 这里指的是台湾。——译者

** 即沈剑虹。——译者

为出访准备的文件。这之后记的是夜间在林肯厅同深思熟虑的总统会晤，与认真思考问题的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会晤，共同策划战略问题。其内容多半是一些有关公共关系的无聊废话。此后一位记者要求会见，要我谈这些会议的内容。我请霍尔德曼代我接见，他同意了。"你撒谎也只能到此为止，"他承认说，这倒给道义上必须讲真话增加了一个新的尺度。实际上，虽然我在转达六月二日中国人的信息时曾在那里和尼克松谈过话，但我们却极少在林肯厅开会，而且罗杰斯从来没有在场。我们谈中国之行几乎都是在椭圆形办公室或者在总统办公大楼尼克松的私人休息室里。在七月一日这一天，我们讨论的主要是打开同中国的关系对于苏联的态度以及对越南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很多时间是花在讨论未来与中国以及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先后次序上；当时我们还没有从莫斯科得到是否在九月举行会谈的消息。我们决定，不管莫斯科怎样反应，同中国的最高级会谈现在将首先举行。

这次中国之行使尼克松在公共关系方面特别敏感起来了。他作出这些决定既没有同行政部门商量，也没有同国会商量，因此，一旦出了差错，他就完全处于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困境。他极其果敢地独自作了这些决定。可是，他是一个个性复杂的人，高尚的动机往往与一些不那么高尚的考虑相矛盾。他迫切希望自己成为访问北京的第一个美国领导人；因此他三番五次地要我改变我的访问地点，除北京之外改在什么地方都行。我不知道向巴基斯坦人或是中国人怎么讲才好。我们坚持保密已经引起了怀疑。我们不熟悉中国的保卫措施和他们内部商量的情况，如果再想指定谈判地点，那很可能会使他们更加怀疑。因此我拖着不办，因为尼克松在给北京的信中可以讲明这一点——每一次信在发出之前他都是看过的，没有一次信建议在别的地点会晤。然而在我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他还催我找另外一个地方。

尼克松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宣布我这次访问的公报不要提我的名字；他希望他和周恩来的名字首先出现在正式的中美文件上。他没有说明，宣布一位美国使者访问北京怎么能够不透露这位使者的姓名，除非这个人想在中国得到一个神出鬼没的名声。实际处理办法照顾到了这个问题。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他去中国访问之前，不邀请美国的任何政治人物去中国访问。我间接地向希拉利提了这个问题，但决定在我到达北京之前暂时不提这类请求，因为我们到北京之后情况怎么样谁都没有底，我们就更有理由这样作了。

在我出发之前大约一星期，我把我的工作人员和我编集的文件拿给总统看。那厚厚的一册黑皮书给它一个代号叫作“孛罗”，这是假借昔日访问中国的一个欧洲人的名字。尼克松仔细研究了开头的备忘录，并且亲笔在扉页上附注了意见。这本汇编开头是一个“意向篇”，它概述中国邀请我目的何在，而我们接受邀请又目的何在。

这个文件论断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是想提高他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和降低台湾的地位；这可能在我们的盟国和朋友中间造成某种混乱；苏联将会面临新的复杂情况。也许真的象许多专家所认为的那样，北京的基本目标是要美国退出亚洲；他们使我们出丑肯定会从那些强硬的革命派那里得到某些好处。但是权衡轻重，我认为不象是要采取这种做法，这样做也是同造成我去访问和邀请总统访问的那种局势不相符合的。我的备忘录写道：“我们曾经设想，他们现在这个行动部分原因是要对苏联对其边境的军事威胁作出反应。如果他们想利用我们对苏联人起某种抗衡作用，那么使我们丢脸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如像中国的宣传机构（还有美国国内的批评家们）多年来所要求的那样，美国从亚洲撤出，这也不真正符合中国人的目的，因为美国撤出亚洲就会留下真空，而

苏联人就会去填补。中国人一定会认识到，企图对我们施加压力就会引起极大的愤怒，从而加速美苏共谋主宰世界，而这一点正是他们所最害怕的。我的备忘录推断说，虽然日本在中国人的眼里越来越成为他们的对手和潜在的威胁，但总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到，美国继续同日本保持密切的关系，甚至对他们还有好处。

因此，我建议，既然是国际形势促成这次访问，我这次访问就要集中讨论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讨论双方似乎都愿意加以肯定的目标的共同点。在这个范围内，我将讨论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取得某种形式的谅解，在我们双方的关系中不诉诸武力；减少我们在台湾的驻军；以及中国人对苏联的认识。我将谋求对印度支那问题能起某种节制作用的影响，并估计到，单是会晤和此后的最高级会谈这个事实本身就必定会使河内的士气大为低落。我们将谋求建立某种不依靠第三方的联系。我们无疑会遇到那种“中央王国”的复杂的病态心理，认为我们是野蛮人，是来向这个文化和政治中心朝贡的，但是只要“我们对于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国家的力量具有充分的信心，”对于这类的虚荣心我们也是可以容忍的。

此外，这本情况汇编还包括很长的一篇首次发言草稿，即对各种问题的会谈要点，以及大量的背景材料。我不能断定尼克松是如何彻底审查这个材料的；他通常的做法是集中注意开头的备忘录而忽视那些辅助性材料的。

在七月一日这一天，尼克松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重新审查他在扉页上潦草地写下的那些意见上。在这些意见中，他总是用那套一成不变的强硬的词句，而我每次衔命出使，他都是用那套话打发我走的。他要我强调，如果迫不得已，他将“对越南转向强硬”。他认为我应当暗示“有可能与苏联接近”，表明我们十分懂得三角外交。他要我强调，美日继续保持同盟是减轻中国对日本的

恐惧的最好办法。尼克松所担心的事并非都属于重大政策问题。他还要我再次提出早已通过希拉利转达的那个问题，即在总统任何访问之前“严格限制政治访问者”。他要我在他去中国之前安排好粮食装运工作，这样就有助于缓和那些保守派对他的批评。他讨厌皮埃尔·特鲁多，为了发泄对他的不满，他谈到今后同中国人的接触或者联系渠道可以在任何地点进行，就是不能在渥太华。这些话大部分无非都是旧话重提，我知道，只要我把他所寄以希望的最高级会谈办好了，那些话尼克松是不会坚持的。尼克松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我们可以在纸面上写意见，但在我们见到中国人之前不可能决定任何事情。

大约在晚上八点钟我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我要先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然后飞抵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以此为跳板前往我真正的目的地。在每一站，无论我谈话的主题是什么，我都力图缓和消息公布之后即将造成的冲击。谈到乒乓外交和我们放宽贸易限制的时候，我说明为什么我们决定试图接近中国，主要强调这是全球均势的需要。我告诉英迪拉·甘地，我们仍将像尼克松主义所宣布的那样，继续反对任何核国家无缘无故的施加军事压力。我们必须等待跟我谈话的人的反应，了解这些话是否被认为是一个骗局，或者被理解为在情况许可下只能做这样的保证。

温斯顿·洛德是这次行程中的无名英雄。不仅要在他的监督下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他还要掌管在我们这伙人中散发文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因为按照了解情况的范围划分为三类。有些人了解我到什么地方去和我到那里说些什么。另外一些人知道我的目的地，但是不知道我的议程，只是帮助我到达其他各站。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知道。洛德必须保证每类人得到他们应该知道的文件和日程表，但不能得到别的。除开作这些以外，他还必须按照我的指示写好每一站的简报（我命令他作什么，总是特别

和气而有礼貌的)。他设法保持每个人对他的尊重，也保持自己头脑清醒，这确是这次旅程中不小的成就。

在整个行程中，我通过机密渠道收到华盛顿的信息，我的助手艾尔·黑格使我和白宫的焦灼情绪保持接触。霍尔德曼传达了总统的一项禁令，不许我们这伙人向国务院人员评论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的事情。我询问这个奇怪的要求是什么意思，原来，霍尔德曼只是表达总统长期以来对我的工作人员的忠诚感到不放心；总统认为国务院官员对那些泄露文件的人是同情的，他怕我的工作人员助长这种同情。在我离开华盛顿前几小时，罗杰斯曾表明他从官场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想利用我不在的机会，得到总统的授权，让乔·西斯科去中东一行，进行另一轮的谈判；其实当罗杰斯的备忘录到达白宫的时候，两位密使已经出发去开罗进行初步接触了。十分明显这是耍花招。我从西贡打电报说，这样去中东，现在只会加剧中东的紧张局势，应予推迟。我建议，在我回来之后立即安排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中东问题。总统同意了这个建议。

对于呆在华盛顿的那些人来说，等待显然是一件更加折磨人的事情，由于我们正在忙的不可开交反而不着急了。我三番五次地接到训令，还是我在出发前跟我讲过不知多少遍的那些话：公报中不要署名；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白宫了解到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在我刚到达的时候将去北京访问，这一场虚惊，就非同小可。根据这一“可疑的事态变化”，就嘱咐我在下一站(新德里)设法紧急通知我的“主人”(这是中国人的化名，是精心选定用来迷惑那些通讯人员的，因为在这一段中前面已经提到北京)，要他们推迟赖斯顿的访问，或者向我作出“必要的保证”。我不能想象，走进北京驻新德里的大使馆怎能不引起至少是某些印度人的注意。因此我回电说：“至于赖斯顿，主人的决定不会因我的抗

议而受到影响……我断定他们能保守秘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七月五日当我还在曼谷的时候，黑格告诉我伏龙索夫已经递交了我们等待已久的苏联人关于最高级会谈的复信。他们现在建议从原定的一九七一年九月推迟到这一年较后的日期；即使到那时候，也还是有条件的，这要看正在进行的一些谈判的情况而定，并且“假定”在这期间不发生任何事情使局势复杂化。苏联人再一次无意中为我们作了件大好事；他们机关算尽，反害了自己。克里姆林宫的复信使我们摆脱了那种复杂的局面，我们不必同时应付两个最高级会谈了。我们首先同中国举行最高级会谈，莫斯科不能责怪我们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摩擦减低到最低限度来完成我们的计划。

我给黑格打电报说：不要给伏龙索夫回信，驻波恩大使肯尼思·鲁斯在我回来之前应该寻找某种借口避免继续进行柏林谈判。我说，我认为苏联的复信“并非一件纯粹的坏事”，因为与苏联的最高级会谈可以晚些举行了，而且将是在好得多的心理状况下举行。苏联的复信使尼克松大怒，并且想办法要报复。我劝他不要有任何激怒的表示，甚至不作任何反应。如果我们采取“不动声色”这一着，其结果很可能对我们有利；我们再也不能“一味地赌气”了。我深信，未来十天将会给对方以有力的回击，比我们任何正式的答复更有效。

华盛顿忧心忡忡，超级大国勾心斗角，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飞往伊斯兰堡。我在巴基斯坦的停留是通过中央情报局的密电由法兰经过不懈的努力精心策划的。每次联系都是用化名，那些化名也许能愚弄五岁的孩子三分钟（我的化名是“首长”）。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我摆脱到处遇到的高级官员礼节性的拜访。我们原来的想法是，要叶海亚表面上邀请我到一个山间别墅进行秘密会谈。这样作的缺点是，我就不得不把停留的时间定为七十二小时。当

时，东巴基斯坦的内战正在激烈进行，大批孟加拉难民涌入印度，在巴基斯坦比在印度多呆一天就会被理解为偏袒巴基斯坦，从而引起新德里、我们的官僚机构、新闻机构、尤其是我们国会的反应。那样作叶海亚就得两天不露面，这就有从巴基斯坦方面泄露机密的风险。而且完全为了打掩护而利用一个国家元首，这无论如何也是不恰当的。

我建议，我们公布一张行程表，我在巴基斯坦只停留四十八小时，从七月八日到十日，大致相当于我在印度停留的时间。到达之后我就声称肚痛，请大使馆诊所给我治病。我要装得越痛越厉害，这样叶海亚总统就会在晚宴席上邀我到位于纳蒂亚加利山上的总统别墅去休养。以此为借口，我就能在巴基斯坦多停一天，而有两天的时间，可以暗中往北京一行。但这样作还是不象看起来那么容易。如果我“病”了，我们怎能阻止大使馆的医生赶来照料我呢？我们又怎能限制经过多年外交工作训练的大使馆人员不一天二十四小时听候我的指示呢？我们的聪明的大使想到一个解决办法，最好用他自己的密电概述如下：“大使馆的医生不再是什么问题。他于七月六日离开。在这种情况下，大使馆的护士很好对付，她不会自动的闯进来。使馆副馆长七月七日休假离开；美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七月二日回国休假。其他人都好办”。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长期卓越的外交史上，一位大使因总统代表来访而把他的全部要员赶出城去，居然引以自豪，而且他还因为很有办法而受到华盛顿表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我是个凡人，竟然如此放肆，天神决意要惩罚我一下；在新德里，我真的肚痛了起来，我只好暗暗忍受，否则的话，到了巴基斯坦，岂不信誉扫地。）

我们的计划甚至还规定了万一被人发现之后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就要由白宫发表一个简单的声明，声明如下：“基辛格博士应中国人的请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会晤。在基辛格回来

并向总统汇报以后将发表一个声明。”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声明能否平息一场轰动，我是不抱什么幻想的。

我在伊斯兰堡完全按照原定计划行事。在法兰大使的官邸与使馆留下来的人共进午餐，与叶海亚总统会晤，在大使馆简单介绍情况，然后又出席了叶海亚及其高级官员的便宴。叶海亚由于那年十二月的印巴战争而被推翻下台，这是他下台以前最后一个欢乐的日子，而我之到来是使他感到高兴的原因。叶海亚对这种警察追强盗般的复杂而冒险的计划安排很感兴趣。他亲自检查了我秘密离开的每一个细节；他向我们提供他的政府的所有便利条件，并把他所信任的自己专用的飞机驾驶员供我们使用。与当时许多报刊的说法相反，他并不要求任何报答。他对我们殷勤接待，但在东巴基斯坦的动乱中并没有得到我国政府同样宽厚的对待。叶海亚是一个粗率、直爽而缺乏谋虑的军人，他在东巴基斯坦的动乱之后受到牵累，他对于那些事件，是既无经验又少锻炼的。他铸成了大错。但他对我国帮了大忙；必须指出，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正直高尚的。

叶海亚总统在招待宴会中开始执行我们的计划。我的肚疼成了大家的话题。他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我复原；他一定要我到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去休养，这个别墅靠近总统的宾馆，位于穆里以北的群山中。当我迟疑表示不同意时，他坚持说，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里，要由主人的意志而不是由客人的意志来决定，其实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说得恳切异常，以致我手下一个特工人员听到之后，立即派了他一个同事前往该地，作为“先行”去了解情况。到半夜十二点钟左右，这位特工人员打电话来，显得很狼狈；他已勘察过该处的宾馆，认为不宜于居住。我们无法可施，只好要求巴基斯坦人把这位倒霉的特工人员扣留在那蒂亚加利，直到我从北京回来。

在我离开之前，我从圣克利门蒂收到的最后的电报之一告诉我，总统终于——七月八日——把我的中国之行告诉了国务卿，说这次访问是我到巴基斯坦的时候接到邀请临时决定的。在我起飞去北京之前几小时，还通过机密渠道告诉我，要我记住：公共关系专家们认为七月十五日华盛顿时间下午十点三十分是我发表公告的最合适的时机。最后，还提醒我注意：梅尔·莱尔德在东京一次日本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个有利的谈话，说他不反对日本单独拥有核能力，并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确认战略均势，这会鼓励日本搞核计划。

我出席叶海亚的宴会回来休息的时候，大约已经夜里十一点了，我心潮起伏，前途吉凶难卜，上述那些消息都不能使我平静下来。我辗转反侧不能成寐，这还是我任职以来的第一次。我极力想象将会遇到什么情况。到一个我从未去过的首都去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而且又与国内完全断绝了联系，我开始感到有些没把握了，这也是我任职以来的第一次。

七月九日凌晨三时半，我在伊斯兰堡的国家宾馆中起床，提早吃早餐。四点钟，我和随员们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由外交秘书苏勒坦·汗陪同驶往查克拉拉机场。我的助手温斯顿·洛德、约翰·霍尔德里奇和迪克·斯迈泽和我在一起，还有特工人员约翰·D·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按照法兰的建议，我戴上一顶大沿帽和一副墨镜，以免偶然过路的行人把我认出来，其实在伊斯兰堡那样早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而且在这里我的名字也决非家喻户晓。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所属的波音707飞机停在机场的军用区等候。这架飞机七月六日、七日两天曾飞往北京，作为试验飞行，回程带来了几名中国领航员，他们要在七月九日的飞行中共同操作；他们一直耽在机舱中，不让人见到，直到我们一行到来。飞机由叶海亚总统的私人驾驶员驾驶，这位驾驶员

早已得到指示，要他注意有窃听无线电联系的危险，因而要特别小心。我自己那架飞机则停在查克拉拉机场的民航区，刚好遮住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飞机，但如果有什么记者或外国大使馆人员偶而路过这里，一眼就可看到它。

离开之前，我亲手拟了一个简短电报打给黑格，告诉他我知道什么时候公布尼克松访华的消息最合适。我通知圣克利门蒂，中国人不仅派了三名领航员，而且还派了一个四人高级代表团陪同我飞北京。叶海亚总统告诉我，由于美国坚持保密，"很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他们很可能希望把全部情况公布出来。我的电报最后说："出发情况良好"。凌晨四点三十分我们起飞去北京，航程两千四百英里，飞行时间四小时四十五分。

七月九日上午八时，我离北京已经不远，开始执行掩护计划。一队没有我本人在内的伪装车队，花了三个小时，行驶五十英里开到纳蒂亚加利。这个车队的乘客有法兰大使，我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两个特工人员，还有一位巴基斯坦副官M·M·艾哈迈德。哈尔·桑德斯（他了解这个计划）留在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官员们讨论双边问题，并处理紧急事件。第二天上午九时（那时我在北京差不多已有二十四小时了），我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从纳蒂亚加利打电话到伊斯兰堡，说我要多休息一天，取消一切约会。霍尔珀林还打电话给我乘坐的那架飞机的驾驶员，要求他发电通知飞行计划作必要的改动。他还命令大使馆发电报到其余各站——德黑兰（短时间停留加油）、巴黎、圣克利门蒂，还有华盛顿——告诉他们我修改的日程表。

七月九日凌晨，我登上查克拉拉机场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飞机。我第一个看到的是章文晋，他是中国外交部西欧美大司*司长，周恩来派他来护送我到北京，表示他对这次访问的重视。

* 我国外交部设有美大司，没有设西欧美大司。——译者

(也许是因为所有的西方人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中国外交部把西欧、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合为一个司。)章文晋看起来象艾尔·格雷科*油画中的西班牙红衣主教——当然他穿的是毛式制服——他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他跟我们打招呼，对他来说，一个高级中国外交官陪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飞行两千五百英里到一个他们自称为世界革命发源地的政府所在地，这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

和他一起的有翻译唐闻生——那个难对付的南西·唐。她生于布鲁克林，因而讲一口十分漂亮的美国英语。我常跟她开玩笑说，因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她不会象我一样受到宪法的限制不能当总统。这个前途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她既聪明又活泼，很长一段时间掩盖了她的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她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翻译；有好几次她当着我们的面毫不犹豫地与周恩来争论。章文晋一行的第三位成员是王海蓉，她也是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据说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或侄孙女；她是一个腼腆文雅的人，看起来象一只很容易受惊的鹿一样(在我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会晤时，这两位妇女总是在场)。第四个人是礼宾司的唐龙彬。

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派来的特工人员也不曾见过；我去什么地方不曾告诉过他们，当他们看到这一切时几乎惊呆了。他们的指责不仅指的是我们乘坐了一架外国飞机——这是违反他们平日训练的所有原则的——而且指的是一伙中国共产党人把我们带到一个没有“先遣人员”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完全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危险。杰克·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严格执行任务，我们无论到哪里，都紧贴着我们身边，如临大敌。他们甚至在

---

* 艾尔·格雷科(El Greco，一五四一年生于希腊，一六一四年死于西班牙)，西班牙著名画家，其绘画富宗教色彩。——译者

我们和周恩来会谈的时候也要在场。(后来，中国人不许保卫人员进去了。)他们看管两个装满了机密材料的沉重的文件包，走到哪里提到哪里，包括吃饭的时候和游览紫禁城的时候都不释手。他们那副样子，好像八亿中国人无论怎样对待他们，他们都能应付一样。

中央王国：与周恩来第一次会晤

一个成年人很难得有机会回到童年时的那种情景，那时时间仿佛是静止不动的，每一件事情都那么神秘、新奇；每一件经历都很奇特，因而感到津津有味。后来长大了一些，对周围的事物熟悉起来了，也就感到平淡无奇了。再往后，对周围世界更加习以为常了，时间就过得特别快；生活像万花筒一样，各种经历交织在一起，似乎没有什么多大差别。只有某种真正异乎寻常的事情，既新奇又动人，既不平常又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在那时候，人们才回到童年时那种天真烂漫的情景，好像每一天都在经历一场宝贵的冒险，使人的生命富有意义。当我们的飞机飞越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的时候，我的心情正是如此。那时旭日东升，曙光初照，把天空映得一片通红，银白的雪峰巍然高耸，与那玫瑰色的天空相映，景色格外壮丽。我们贴近第二号大山——世界第二高山——飞行。我过去总以为中国是一个人口稠密、到处长满庄稼的国家，其实不然，我们有几小时是在荒芜不毛的沙漠上飞行，间或遇到几个绿洲。当飞机飞越国境的时候，温斯顿·洛德站在飞机的最前端，他颇以此自豪，因为严格地说，他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官员。

中国人和我们围着一张桌子闲谈，好像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一天断绝过联系一样。还只是在昨天，我们两国一公开谈到对方，就

是一顿痛骂，这已经是家常便饭；可是现在却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气氛。他们很客气地探问我们为什么一定坚持保密。是不是我们承认了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感到可耻呢？在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轻蔑地拒绝与周恩来握手，这件事中国人并没有忘怀；在这次飞行中以及以后几天的很多场合，以及以后的访问中，都曾谈到这件事。我告诉章文晋，我此行的目的是宣告我们两国关系的一个新时期，但最好我们首先就整个形势取得一致看法。他说周恩来总理将准备探讨所有的问题。

七月九日星期五，北京时间中午十二时十五分，我们在北京郊外的军用机场降落。前来欢迎我们的有叶剑英元帅，政治局中最年长的委员之一，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黄华，新近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后来是中国驻联合国首任大使，后任外交部长)；韩叙，礼宾司代司长(后来是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副主任)；此外还有一位译员冀朝铸，他曾在哈佛大学读化学，后来改了行。在检阅的时候，他曾经同毛泽东及埃德加·斯诺站在一起。

叶剑英元帅用一辆大型高级轿车把我们接进城去，车窗用帷布遮起来。我从窗帘后面向外探望，看到街道宽阔整洁，除自行车外车辆稀少。我们通过广阔的天安门广场。我们的目的地是迎接国宾的一个宾馆。这个宾馆位于城的西部，是一个用围墙圈起来的大花园，内有很多座宾馆。据说这个花园里过去曾有一个皇帝钓鱼的湖。每一座宾馆都位于一个小的半岛上，用一座精巧的小桥与相邻的宾馆连接。花园的全貌给人以异常开阔的感觉；不过，当你想要过桥的时候，也许会碰上躲在树丛后面的一个哨兵，使你猛然一惊，感到不快。(后来那些哨兵不那么冒失了，整个花园都向客人们开放了。)

这些宾馆是苏联影响时期的遗物。它们是一些雄伟、庄严的

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在接待室里，填料很厚的笨重的椅子和沙发摆成一个四边形，叶剑英元帅跟我们一起用茶，他使我们感到很自然，无拘无束。在驱车到宾馆的途中，他向我表示歉意，说未能给我以适当的公开接待；当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再补行这个仪式（实际上这个预言并没有完全兑现）。叶剑英元帅盛宴款待我们，菜式之繁富，数量之丰盛，都是惊人的，此后许多餐都是如此；因此我向主人开玩笑说，数千年前，大概中国人曾受到指责，说有位贵宾吃不饱，饿了肚子，自此之后，中国人就决心待客从丰，以免重蹈覆辙。

周恩来于四时半来到。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象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神情就显得已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周恩来同毛泽东不一样，他曾经到过外国。他一八九八年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学生时代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本世纪二十年代曾经在法国和德国学习和工作过。当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位领袖人物已经将近五十年了。他曾参加长征。他是人民中国的唯一的总理，担任总理已将近二十二年，其中九年还兼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四十年代曾经与马

歇尔将军进行谈判。他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目的的。他的言论和行动都反映出他内心的紧张状态，正如他所强调的，他关心的是八亿人民无穷无尽的日常问题；也表明他要努力保持下一代人的意识形态信仰。采取什么方式邀请尼克松才能适合上述一切考虑，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一个颇费思量和有些困难的问题。

因为很明显，我们的到来对中国人来说比对美国一方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有利的新转变的开端。但对中国人来说却不能不成为一个涉及个人声誉、理论思想和感情的危机。他们当年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分裂出来的看来没有希望取得胜利的小小派别，后来经过艰难困苦的长征，与日本作战，又经历了一场内战，在朝鲜反对我们，然后又与苏联较量，又强行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然而现在呢，正当我们在他们的边界上干预一场他们认为的“解放战争”时，却和他们二十五年来的头号敌人在一起商谈问题了，这就用他们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他们在哲学思想上遇到了矛盾。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是有所表现的，周恩来时而陷入沉思，间或神情恍惚，在起草我这次访问的公告时语调也不通畅；他偶尔还提到长征的英勇事迹和毛泽东的卓越的领导。然而周恩来毕竟是一个镇定自若、才能过人的谈判家。我很快就感到，我同其他共产党人谈判时经常耍的那类小花招不灵了。在这次访问以及以后的几次访问中，我们所有的会谈都持续几个小时（一次会谈长达五至七个小时并不稀奇）；然而没有一次他表现得有丝毫不耐烦，或者暗示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的会议从来没有电话干扰，也从来没有因为他要处理这样一个大国的必

要公务而中断。我不懂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曾经开玩笑说，华盛顿的高级官员过基督再临节也不可能腾出这么多时间。

周恩来在待人方面也特别体贴照顾。我的下级人员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前去探望。尽管我们的级别不同，他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一定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举行，这样他来拜访我的机会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同样多。在我们决定今后以巴黎作为联系地点之后，他还是提议，有时我们仍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因为据他说："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有一次，那是在一九七二年六月，我告诉他，那些哨兵站到连接各宾馆的桥头上来了，这使我感到像卡夫卡*写的《城堡》这部小说中的那个管子工人一样，他被叫来，却不准进去，只好徘徊在外面想办法进去，却完全忘了他原先是为什么被叫来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过那座小桥，但我的确想走过去。周恩来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但在这次访问期间他无所表示。我再次来访是在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最后一个晚上，我正在整理行装的时候，一个礼宾司的妇女敲门进来了，告诉我总理邀我去个人交谈。我们开车到湖那边的一个宾馆，在那里周恩来和我一直谈到凌晨三点。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忽然用英语对我说："我们去走走。"我们边走边聊，就走过了两座小桥；这时他坐上跟在我们后面的他那辆轿车，开车走了。这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姿态。

中国人对他似乎特别尊敬，认为他是他们的所有领导人中待人特别宽厚的一个人。一九七五年年底我去中国访问的时候，我问到一位年轻的翻译，周恩来的健康情况如何；她含着眼泪告诉我，总理病情严重。他逝世后，全中国那么沉痛地悼念他，这决不

---

* 佛朗兹·卡夫卡（Franz Käfka，一八八三——一九二四年）：奥地利小说家和散文作家。《城堡》是一部未完成的抽象小说，作者死后于一九二六年出版，英译本于一九三〇年出版。——译者

是偶然的；也难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出现的那种渴望得到更多自由的异乎寻常的表现都援引他的名字，并且备受群众颂扬。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我们两国的社会从意识形态到历史，差异是那么大，要把两国促合在一起，这确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一般人的想法，也许认为最好是先消除造成两国紧张关系的某些具体问题的根源。台湾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又不能很快得到解决；至于其他问题，又太微不足道，不能成为我们两国持久关系的基础。所以结论是讨论根本问题：我们对全球事务特别是亚洲事务的看法，以此来澄清我们的目标和前景，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由二十年来彼此隔绝无知而达到相互了解。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多少实际事务性问题要解决，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就必须从务虚开始。周恩来和我主要就是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上。

在我们相遇之初的半小时内，周恩来就已定了这次会谈的基调。我早已准备下一篇相当长的略带虚饰的开场白，从中美关系的历史谈起，一直讲到这次会晤。当开场白的前言部分快讲完的时候，我想露一露口才，我说："已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周恩来举起手来，说道："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我猛然一楞，但他讲的确是真话。我们关心的不是两国之间的双边问题，至少开始时是如此。我们必须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消除那种神秘感。这是他的基本想法，也是我的基本想法。

就这样，周恩来和我之间的会谈，较之在我担任公职时和其他任何领袖的会谈，时间都更长、更为深入，或许和埃及总统萨达特

的会谈是唯一例外。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我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的面前才会经历得到。在我第一次访问中，我和周恩来会谈用了十七个小时。在他任总理期间我以后的几次访问中，我们每天会谈时间六至十小时，除吃饭时间之外没有中断过。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谈话也是哲理性的，饶有趣味的，富有启发意义的。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经受了多次困难的考验，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之一。

伟大人物对重大事件的影响是很难加以确定的。诚然，中美两国的接近是由于客观的必要所使然；不是由于抽象的善良愿望而是由于双方有共同利益才使我到北京来的；不是由于我同周恩来的私人友谊而是由于共同认识到一种危险才促成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利益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却是领导人在起作用，是双方的领导人巧妙地利用了那种可供选择的余地。中国和美国在七十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的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当然，周恩来和我是互相利用；说穿了这就是外交的目的。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双方的目标一致起来；只有那些不懂行的人或不可靠的人才自作聪明，以为能够长久地愚弄对方。在外交政策上切不可忘记：你是在和同一些人循环往复地打交道，在不断地处理一些问题；骗人只能得逞于一时却损害整个关系。讲信用才能使国际秩序得以巩固，哪怕是在敌人之间也是如此；搞小动作决不能持久。周恩来是很了解这一点的，因此我们虽不能做到目标一致，却能作出类似的分析，那就是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利用国际上的均势使之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周恩来从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我不久就发觉，和他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拿给他看，使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达成这个结论。周恩来也采取这样的方式；企图在谈判中多占便宜，那是徒然自寻烦恼。有一次，我们在谈判上海公报，我反对公报中说明中国观点的那部分中的两句话，虽然我们对于中国人讲的话不负责任，但我认为那两句话在联合公报中出现，会引起争论。我提议删掉那两句话，作为交换，在阐明美国立场的那部分中也删掉两句话。周恩来有点不耐烦地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把你那两句话给你的总统，我不需要它们。你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须叫我同意，我们所用的词句中确有令人为难之处。"他言而有信：在中国方面所起草的公报中，果然把那几段最过分的文字删去了。（在中国，什么东西都不会浪费的，这几段话又出现于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所发表的演说之中。）

我对周恩来所代表的制度不抱幻想，也不怀疑这位在交谈中如此令人倾倒的人物，在维护其制度时也同样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以我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中国的新社会是付出了过分巨大的代价来实现的。他们在自由、自发精神、文化和家庭生活方面都作出了牺牲。在我看来，任何领导集团在道义上都没有权力强使他们的人民作出那么大的牺牲。中国人在权力斗争中是冷酷无情的，决不是像西方知识界所想象的那种带有浪漫色彩的人道主义者。

我对周恩来所代表的制度不抱幻想，然而，当周恩来逝世时，我深感悲痛。世界将不会那么富有生气了，前景将不会看得那么清楚了。我们两个人从未忘记：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飘摇不定的；我们也没有忽视：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两国所走的并行的道路也可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那以后，他们很可能与我们重新作对。今

天他们为了本身的利益很精明地决心与我们合作，但到了那一天，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决心和精明才干与我们对抗。但我认为，这是我的政治生活中最得意的事情之一。人类的目光是有限的，政治家们总想通过不断的努力，摆脱那种狭隘的见地而取得某种持久的成果，而我能和一位伟人一起努力在顷刻之间就跨过了意识形态的重重障碍，虽然从无情的历史角度衡量，这只是短暂的片刻。

七月九日下午，在我到达北京之后大约四个小时，周恩来和我就在我所住的宾馆开始了第一次会谈。我们面对面地在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旁坐下，坐在那种在旧式避暑山庄中见到的不太调和的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是叶剑英元帅、黄华和章文晋，我的班子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我们全都在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的虎视眈眈的监视之下，他们不想把我丢给这些不明底细的外国人不管，任其摆布。在我面前是那本厚厚的情况汇编，但自从我的开场白被周恩来打断之后，我就不再翻它了。周恩来面前只是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我想那是他要讨论的发言大纲。

周恩来和我一致同意，这第一次会谈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互相了解对方的根本目的。如果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末促使我们会晤的那些必要因素将决定我们未来关系的方向，如果双方都不要求对方去作那些违背其价值观念或利益的事情的话。这样，会谈就开始了，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简直像两位教授之间一场政治哲学对话一样，几乎掩盖了这场会谈的严重性质，那就是，如果会谈失败，一方将继续陷于孤立，而另一方将加剧其国际上的困难。如果这次使命流产，那会增加中国的危险。毫无疑问，苏联将受到鼓励。我们在国内将声誉扫地；我们从印度支那的撤退将很容易变成一场溃败。尽管周恩来和我都知道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尽管会晤的时间限制铁定为四十八小时——如果没有引起怀疑，我要按时在巴基斯坦重新出现——但我们第一次会谈都不接触我此行成

败之所系的这个关键问题：我们能否就总统的访问取得一致意见。双方的表现都好像若无其事，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附带问题。我们双方都把对方逼到墙角，企图表明我们都另有选择。我们彬彬有礼，讲些颇有含义的题外话，间或开开玩笑，企图表明我们还可能向后转，表明我们并没有越过鲁比肯河*。然而我们始终都心里明白，鲁比肯河就在我们背后，事实上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

在会谈开始时，我们两人都曾简略提到总统访问中国一事，此后直到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始终没再提到，那时大约再过十八小时我就要离开北京了。然而，在我们第一次会谈中（包括晚宴在内，历时约七个小时），周恩来却花了一些时间表明他大致上同意尼克松七月六日在堪萨斯城演说中所列举的观点。这使我的处境有些不利，因为这件事以及演说的内容我都一无所知；这证明，哪怕作了最周密的准备工作，碰上意外事件也会猝不及防。第二天早上，周恩来以他特有的作风，派人将他作了记号的那篇英文演讲稿连同我的早餐一起送来，不过请我看完之后还给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份。原来，美国中西部新闻宣传机构的高级人员们集会，请内阁阁员和白宫助理人员报告国内政策，总统在会上作了一篇事先未草拟讲稿的即席演说。尼克松在演说中谈到"广泛的背景"，谈到"这些（国内的）计划与美国在世界上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他的话使那些在场的高级人员不是感到吃惊，就是感到莫明其妙。他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赞扬中国人是"富有创造性的，勤劳的，是世界上最有才能的民族之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本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

---

* 鲁比肯河是意大利北部的一条河流；公元前四十九年凯撒越过这条河同罗马执政庞培决战。这里是指下定决心作出重大决定的意思。——译者

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周恩来拒绝“超级大国”这个称号；中国不参与这场比赛。这话一半是真的，一半也是出于审慎；中国之所以需要我们，正是因为它本身没有力量与苏联相抗衡。

周恩来和我有个默契，对于有争议的各种问题，双方不作彻底的讨论。台湾问题只在第一次会谈时简略提到。更多的时间花在由我解释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特别强调我和北越黎德寿的秘密谈判，这件事一度似乎大有可能得到突破。（再过几天，我们又要和黎德寿会谈。）苏联人常常夸耀他们对这些秘密谈判的内容所知甚多，周恩来却声称他于此全不知情。他只限于提出一些试探性的问题。这是避免被迫采取立场的好办法。我们第一天的会谈在晚上十一时二十分结束，并没有解决任何事情，甚至没有讨论到那个必须作出决定的问题。

七月十日即星期六上午，领我们去参观紫禁城。这是十五世纪兴建的一所皇帝的宫殿。紫禁城占地广阔，通常吸引了很多游客，但那天上午却封闭起来专供我们六个美国人游览。我们由黄华陪同，向导领我们穿过那些布局美丽的庭院、大殿和花园。那些朱红和金黄色的精美的建筑，那些大理石雕刻和青铜狮子，那些象瀑布一样向着方形庭院倾注的金黄色的琉璃瓦屋顶，总之那一片广阔动人的景色，正如过去许多外国使节所描述的一样，使我们惊叹不已。这就是过去中国皇帝的住所，他们认为这里就是宇宙的中心，而且长时期以来把这种自命不凡的虚荣变成了现实。全国文物局的局长带领我们参观了最近发掘出来的宝贵文物（后来许多文物曾运到美国来展览）。

中午我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继续会谈。这是一座宏伟的建筑物，说不清是莫索里尼新古典主义式的建筑还是共产党人独特的建筑风格。大会堂正对着紫禁城，是用了十三个月的时间在一

九五九年建成的，用来庆祝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十周年。大会堂内每一个大厅都用中国的一个省命名；有一所可容纳几千人的宴会大厅，至少有一个剧场，以及数不清的开会地点。我们在福建厅会谈，这个厅是以位于台湾对海的中国的一个省命名的；过去同斯诺会晤也是安排在这里，可惜我对这种安排完全不懂其中奥妙，因为当时我既不懂这个厅的名字，惭愧的很，自然不会明白其中的含义。（后来我再度来访时，我们在另一座厅中相会，周恩来才不得不将这一切向我解释清楚。）

这次会谈的气氛，和前一天晚上的气氛很不相同。周恩来略作寒暄之后，就声色俱厉地谈了一套中国的观点。周恩来不加掩饰地提出了他们经常提到的很多观点，后来我才知道那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人常念的一篇经文。这些观点是："天下大乱"；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支持北越人的"正义斗争"；大国勾结起来反对中国（不仅是美国和苏联，还有军国主义的日本）；印度是侵略性的；苏联人贪得无餍，正在威胁全世界；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也决不想作美国和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美国正处于困境，因为"我们的手伸得太长"。周恩来把这些强硬的观点复述一遍以后，最后提出了一个难题：既然我们的分歧如此巨大，总统访问是否还有什么意义。

我也同样坚定地回答他，指出是北京首先提出总统访问的；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条件。我将不再提出这个问题；由中国领导人决定是否发出邀请。然后我故意粗暴地逐点驳斥周恩来的观点。在我说完了第一点后，周恩来就阻止我再说下去，说道：我们如不先吃，烤鸭就要凉了。

在吃北京烤鸭的时候，气氛变了，周恩来又恢复了他那种亲切和蔼的态度。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到文化革命。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

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害怕官僚主义化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两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绘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境，它一旦遇到多种不同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使五十年来的斗争成果陷于危机。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困在办公室里。他曾经怀疑有无必要采取这样激烈的措施，但毛泽东是更为英明的，他对于前途是高瞻远瞩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不太明白，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除非他想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革命无关，或者想要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午饭之后，我继续发言，驳斥他的观点，说了大约一小时。周恩来突然一本正经地建议，总统可于一九七二年夏天来访问，倒似乎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剩下来的只不过需要讨论一下日程而已。他还补充说，他认为如果我们先与苏联领导人会晤那会更慎重些。我很了解苏联人对最高级会谈的那些花招，于是回答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很可能要举行，但两次访问应该按照已经排好的次序进行——先北京，后莫斯科。我并没有感到周恩来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有什么不愉快。我指出，如果在夏天举行最高级会谈，和我们的选举太接近，可能引起误会。周恩来改为一九七二年春天，我同意了。我们在下午六时暂停会谈，因为周恩来必须在一个宴会中做主人，招待另一位未宣布名字的客人（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北朝鲜的领袖金日成）。周恩来喜欢从午后到凌晨工作。他建议晚饭后十点钟再会晤，起草我这次访问的联合公告。

我同我的工作人员回到宾馆吃晚饭。所有的中国官员忽然全都不见了，只把我们留下来同宾馆的工作人员在一起。那是一个痛苦的夜晚，由于会议改了时间以后又推迟，我们象哨兵一样在夜间踱来踱去，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难以掩饰我们不安的心情。

(由于怕有人偷听，我们所有商量对策的谈话都是在散步中进行的。)据我们了解，中国人另有考虑。周恩来终于在晚上十一时十五分左右回来了，这是因为他的国宴很晚才结束。但我们并没有立即讨论公报，却花了一个小时去研究印度和德国的前途。他的基本观点是，印度在一九六二年侵略了中国；在一九七一年，正有将同样的政策施用于巴基斯坦的极大危险性。他指派黄华代表他来起草声明，随即离去。

但黄华并没有立即露面。这种令人费解的等待更加预兆不祥了，因为我们不是要讨论一个精心推敲的公报，而是要讨论一个宣布总统访问北京的只有一两段的声明。我们猜不透这是不是一种故意把我们挂起来的手法，是不是政治局在开会，是不是毛泽东坚持重新审查这次会谈，也十分可能，我们面临着所有这些情况。最后，黄华终于出现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解释，温文有礼，和蔼可亲，而且老练沉着。

黄华带来了一个公报的草稿，这个草稿立即引起争论。草稿以中央王国的惯用语言说话，认为是尼克松要求中国邀请他来访问的。草稿说，访问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台湾问题，以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奏，我对这两点都拒绝了。

我们不愿作为一个恳求者在北京出现。我们到北京来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讨论台湾问题，甚至不单纯是为了谋求“关系正常化。”必须提到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黄华作了一个明智、实际而又显示他个人风格的姿态，建议我们暂不讨论公报草稿，而互相坦率说明自己的目标。很明显，双方都不愿显得是屈居下风而不得不恳求对方；双方都盼望得到积极的结果；如果暗示会谈议程只对单方面有利，那对谁都是不利的。我们花了两小时摆自己的情况。我说明了我们所关心的原则和国内的要求；我们不愿表现得象是在恳求这次邀请；台湾不能作为唯一的议程。黄华指出，这个公告

对中国群众会引起极大的震动。象这样坦率的谈判是很少有的，与潜在的敌人这样谈判几乎是没有过的。约在凌晨一点四十分，黄华提议休息三十分钟，好让他去考虑适合我们双方的文字，于是离开了会议室。我们又在那院子里走了一会儿，回来等候他们到来；凌晨三时我们得知，他们已经离开，要到上午九时才能回来。

我们在星期天，七月十一日，九时四十分又重新会谈，在不可更改的、必须启程的最后时刻之前，谈了三个半小时。黄华还是中国的发言人，还是用我前面提到的中国的那种谈判风格。我以前曾经讲过，其他的谈判者急于想显示自己高明或者哗众取宠，有时采用一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他们象切香肠一样，把他们的让步切成小片，切得越薄越好，而每作一点点让步，拖得时间越长越好。这种办法给人以虚假的印象，好象是很强硬。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哪是最后的一片香肠，因而双方都想等着瞧，这样就进一步拖长了谈判的时间。由于双方消磨了过多的时间、精力，都志在必得，压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这样也就很容易使谈判者走火，超出了慎重的界限。我倒非常喜欢中国人对我们采用的那种做法，而那天上午黄华对我就是采用这种办法，那就是尽可能确定一项合理解决办法的性质，一步就跨到那里，然后坚持立场不变。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有人把这种办法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无可改变的立场；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这且不说，那天上午九时四十分黄华提出的草案和我们的要

求异常接近，因此我们只须改一个字就可全部接受。事实上，幸好我要求中国方面先提出草稿；这草稿比我们自己拟的草稿更为有利。（双方设身处地考虑了对方的观点。）这就是尼克松七月十五日宣读的那个联合公告。

起草工作完成之后，周恩来立即出现，他原来就在附近房间等候。我们讨论了建立今后联系地点的问题，结果选定巴黎——由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巴黎的大使黄镇接头。我们初步交换了总统来华的想法。这些事情都完了以后，周恩来花了点时间告诉我在我断绝联系的这两天内北京新收到的国际消息，这也是他特有的姿态。

我们向周恩来告别，我和我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中国人坐在一起共进最后一次愉快的午餐。紧张的气氛一点儿也没有了。叶剑英元帅通常是没有表情的，这时脸上也浮现出笑容。在去机场途中，他讲到他的生平。他听到人们谈起毛泽东在山里的小部队，那时，他还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军官；他所以参加那支队伍是因为他首先把毛泽东看作是一位导师。当我们的车子开向在那里等候的那架巴基斯坦飞机时，他议论说，在长征途中他们谁都没有梦想到这一生还能看到胜利。他们认为他们的斗争是为后代人的。这时我们刚好走到飞机的舷梯脚下，他以中国人的那种讲话艺术，把精心安排好的场面说成是很自然的事，说道："可是我们到这里了，你们也到了"。

叙述这次秘密旅行，我的"衬衫传奇"却也不可不提。我事先料到，这十二天的亚洲之行势必变化多端，忙碌不堪，所以吩咐我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在这次长途旅行中，一定要替我留两件干净衬衫，特别为在北京穿着。我无疑和往常一样地一再提醒霍尔珀林一定要照办。当巴基斯坦的飞机从查克拉拉机场起飞，飞向喜马拉雅山时，霍尔珀林正带同秘密工作人员乘车前往那蒂亚

加利山中别墅，他突然想起这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他把我这几件衬衫过于小心地放在一边，因此，我决不会放入旅行箱中。想到这里，他实在懊丧不已。当快要到达北京我想换一件衬衫时，不免大感惶急。其实平时我挺喜欢霍尔珀林，这时也不禁责骂了他几句。无可奈何，我只好向约翰·霍尔德里奇借几件白衬衫；他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仪容修洁，出身于西点军校，他的身材和我小得多的身型很不相称。我们一行在游览紫禁城时，大家都只穿衬衫，中共人员替我们摄影留念，照相中我的脸露神秘莫测的笑容，身上那件衬衫，显得我好象没有头颈似的。——衬衫尺寸不合还是小事；衬衫的主人是一位亚洲问题专家，衬衫上很显眼地印着“台湾造”字样。我对主人说，台湾和我贴得很近，这句话倒是说得分毫不差。

此外还有詹姆斯·赖斯顿的戏剧性事件。斯科蒂*·赖斯顿要去北京，这使白宫方面大为担心，但对于中国人，其实全然不成问题。他和他的妻子于七月八日到达华南，比我们到北京早了一天。在广州，他们的官方“陪同”通知他们，“计划有所更改”；他们要在广州地区停留两天，然后于十日晚上乘火车去北京，于十二日上午到达首都。赖斯顿表示抗议，要求立刻飞赴北京。但在中国《纽约时报》可就不象在华盛顿可以大显威风了。他被告知，这是办不到的。七月十日，周恩来笑咪咪地对我说，赖斯顿正在一列慢车上，那将会很容易地拖延他的行程，要等我们离开之后，他才会到达北京。

到七月十五日，赖斯顿才获悉我曾去北京，这使他身感剧痛。赖斯顿后来追述①：“就在那个时刻，现在看来大致就在那时候，我的小腹开始感到刀割般的剧烈疼痛。到了傍晚，我发高烧达到

---

* 斯科蒂原为苏格兰人之意，意指其人很吝啬。——译者

华氏一百零三度，神志昏迷；我仿佛看到基辛格先生坐在一辆有帘子的人力车中，飘过我卧室的天花板，他从车帘的一角探出头来，向我露齿而笑。”后来才知道，那不是新闻记者因未赶上报道大新闻而懊丧欲死，其实是急性盲肠炎。他于七月十七日开刀，割去了盲肠，那是在北京反帝医院动的手术（这是当时的名称，这医院是一九一六年用洛克菲勒基金建立的，后来在尼克松访问期间，又改名为首都医院）。他手术后，对他施行针刺疗法，银针扎进他的肘部和膝下部，以减轻术后的痛苦。他躺在病床上，银针露在外面，想到近在身边都错过时机，不能抢先报道这样重大的新闻，这种内心的痛苦是什么药都治不了的，就是中国人也没有办法。

七月十一日，我和我的同事们兴高采烈地飞回到巴基斯坦，把最后运到飞机上的中国菜，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英文版，以及前天夜间准备好的我们这次访问的照相集都搬下飞机来。

洛德和我草拟了一份给总统的报告；报告的结论也许概括了我们过度兴奋而不太谦虚的心情：

我们已为你和毛泽东打开历史的新篇章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对于未来不应抱有幻想。深刻的分歧和多年来的隔绝使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很大。在最高级会谈之前和会谈期间，他们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会是强硬的。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坏，他们将成为坚定不移的敌人。我对这些人的估计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其信仰之坚定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同时，他们又表现得很有信心，因此，在自己的原则范围之内与别人交往时，他们是精细的，可靠的。

此外，我们现在所开始的进程将在全世界引起巨大的震动……

然而，当我们踏上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就很了解这些风险。我们也很了解，另一条道路，即与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最有才能的民族，与一个过去有辉煌成就、未来有巨大潜力的国家继续隔绝的道路，是不可取的。

如果我们保持意志坚定并认真负责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即使是那些

风险也可以设法使之转变为对我们有利。对苏联，我们一定要讲清楚，我们继续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具体的谈判摆在优先地位。我们不会与他们共谋反对中国，同样，我们也无意与中国共谋反对他们。如果谨慎地加以处理，我们的新的对华政策就能够对莫斯科产生较长期的有利的影响。

对日本，我们的任务是要讲清楚，我们在亚洲并没有把我们对她的忠诚转移到中国。关于台湾，我们除了重申我们之间的外交关系，尽量减少损害之外，很难再希望得到别的了。

对亚洲和对全世界，我们需要表明，我们扩大外交范围这种做法，决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相反地还会证明对它们有利。

我们的交往，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别人，都需要讲求信用、准确和策略。如果我们能掌握这些，我们就是进行了一次革命。

震动全世界的公告

飞回巴基斯坦，旅程似乎比去北京时短得多。我们都洋洋得意；然而，那不过是一群野蛮人屈服于中国人的巧妙奉承和不着痕迹的殷勤款待之下。公告现在已确定于下星期四华盛顿时间晚上十时三十分发出，我们都同意周恩来的说法，那将“震动全世界”。

我们携带了那么多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制的相片簿，在巴基斯坦降落后，居然能保守秘密，其中原由，我此刻已无从想象。也许对于任何人都认为决不可能做到的事，保密工作却可以做得无懈可击。

我们于七月十一日下午大约三点钟，到达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的军用区。苏尔坦·汗仍象以前那样热情、谦逊地在那里欢迎我们。我们兜了一个圈子经过穆里路折回伊斯兰堡，看起来似乎是从那个山间别墅归来似的。我们对叶海亚·汗作了短时间的礼节性拜访；对这次秘密之行的成功，他象孩子似地高兴极了。我对他的帮助以及执行这次计划所表现的精神表示感谢。五个月以

后，他被赶下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然后，我当然要尽可能会见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包括那位护送我的军官，他违反国务院的全部规定，竟然与我失掉联系，并且一直没有弄清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到下午六时，我们又已坐上我们自己的飞机西行，经德黑兰去巴黎。抵达布尔歇机场时，已过了午夜很久，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而这一天是以十八小时以前我和周恩来的会晤开始的。

在巴黎，一切注意力都集中于越南问题。这时越共刚刚发表了他们的年度和平方案，实质上仍是要求推翻南越政府。而一年一度的国会例行会议以及新闻界正在对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表示灵活性。我在巴黎不论到哪里，都受到新闻记者的包围，他们要打听的，不是我在巴基斯坦为什么会肚子痛，而是想知道我是否会和黎德寿会晤，因为大家知道他也正在巴黎。事实上，我们的确会了面。美国在巴黎的代表团团长戴维·布鲁斯，从记者云集的前门进入美国大使馆，佯装要跟我商议越南策略。（关于我的中国之行，以及我秘密和越南谈判，布鲁斯都是知道的。）我则通过沃尔特斯将军极为巧妙的安排，从后门溜走。我和北越代表的秘密会谈历时三小时；这是到当时为止最有希望的一次会谈。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中，我们有些飘飘然，以为在越南和平与中国问题上，我们可以同时得到突破。我和温斯顿·洛德与黎德寿会晤后，在回来的路上颇为自负，我们在推测哪一件事会在历史上被认为是更重大的成就。我又从后门溜进大使馆，同布鲁斯告别，同时花了点时间会见记者。

那天晚上，我与女友玛格丽特·奥丝玛在一家餐厅中共餐，她是一位美丽而聪明的电视记者。一个在当地度假的美国女士，出于当时对越南战争的激动心情，情不自禁地对我大声斥责：此时此刻，你应当为和平而工作，却居然和一个年轻女子上餐厅，真不要脸。阿瑟·沃森大使在餐厅里找到我，送我去上飞机；离

开巴黎的时间是这样确定的，我可以在第二天一早到达圣克利门蒂。

七月十三日星期二晨七时我到达加利福尼亚州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我这次环球旅行共历时十二天。艾尔·黑格前来迎接我。他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主持日常事务，办事能干而有魄力。黑格和我搭直升飞机飞回圣克利门蒂。理查德·尼克松早已迫不及待地在机场等候。他已知道我此行获得成功，我在飞往德黑兰的途中就用约好的代号告诉了他。代号是"尤雷卡"*。他收到这个信号后异常激动，他一反原先的约定，要求立即用电报报告。我从飞机上向他发了电报。他回电再三向我表示感谢，并试图跟我开玩笑，告诉我回来之后我可以休假一天。他还要求我对他本人作一次全面的汇报，然后再向他的"客人"——黑格给国务卿起的别名——"有选择地"汇报，当时国务卿正呆在圣克利门蒂。尼克松还对我们的保密工作大加赞扬。回想那些电报联系，我得说那纯粹是由于好运气；再有，那就是掌管通讯联系的中央情报局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出色。

从上午七点二十分到九点三十分我跟总统在一起，我把事情的经过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还交给他一份长篇书面报告。我们两人都认识到，我们的外交已经展现了新的前景。当然，苏联一定会有反应；我们认为，过一段时间，这种反应会是有利的。对越南战争将有深刻的影响。在我离开的时候，周恩来曾祝愿我们的谈判能顺利进行。虽然我对中国领导人能够或愿意直接大力帮助抱怀疑态度，但我此行本身就是河内的一次重大失败。它将使越共骗人的"七点计划"不再成为头条新闻。他们的目的是要从心理上把我们拖垮，并且破坏群众对我们的支持，而我这次行动将从

* Eureka，希腊文，意思是："我想出来了！"——译者

根本上摧毁他们的宣传运动。美国人民将会看到，他们的政府是能够采取有胆略的和平行动的。这次行动也将使全世界那些把他们的安全和进步寄希望于美国的可靠和坚决的人们受到鼓舞。我们将无可避免地遇到日本和台湾的问题。当北京的外交攻势开展之后，我们迟早要处理这两个问题。此行使我们能控制事态的发展，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事件的来临。

我们在尼克松的小书房里纵论天下大事，那书房处在他圣克利门蒂别墅的最高层，从那里望出去可以看到浩瀚的太平洋。这使我们不禁联想起大洋彼岸那数千海里之外的中国。

大约上午九时三十分，霍尔德曼也来了，于是话题转到一些实际问题。他想知道随同总统访问的记者能派多少人。当他知道我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露出轻蔑的神情。我告诉他，我曾对周恩来说，估计全部随行人员约为五十人，他对此表示怀疑；随同的保安人员就不止此数，新闻记者的人数就更不用说了。霍尔德曼认为，如果没有电视广播，就没有什么历史意义。这一来，就引起了尼克松与霍尔德曼长时间的交谈，如何尽量扩大新闻报道、特别是电视广播的范围，同时又要适当控制参加的人数。尼克松颇为自负，他确信，这一次他总可以敲诈一下新闻界，使他们对他更温和一些，办法是，特别照顾那些他认为对他公正的记者。不用说，他的想法根本不能兑现；无论是他还是霍尔德曼都不能否决新闻机构选派的随同尼克松去北京的记者。

更严重的问题是，尼克松用什么方式来宣布那个联合公告。按照公共关系的所有常规来看，应该是发表某种引人注目的、富于感情色彩的演说，用以烘托尼克松的总统身分。但是我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我们的新关系还刚刚开始；我们越是加以渲染，就越会妨害这种尚待加以巩固的脆弱的外交关系。我们得要稳住心绪不宁的敌人；应该使那些惴惴不安的朋友们放心。那些事情将来总是

有机会做的，但在最初阶段，我们既不能许愿也不能肯定什么。尽管那个公告是简短而且干巴巴的，尼克松也要让公告本身去说明问题。尼克松同意这样做，但有些勉强；霍尔德曼则很不赞成这样做。尼克松一整天都在捉摸在那种情况下人们的情绪，但他越想越兴奋了，觉得这种简洁的、令人莫测高深的表现方式会产生一种潜在的影响。洛德和我准备了一篇同公告一起发表的简短的讲话(这样就打发掉答应我的那一天假期)。两年半的策划、工作和期待最后仅归结为四百个字。

如何宣布总统要出来讲话这个问题也使人有些不安。如果要求定一个电视广播时间，人们肯定会猜想是讲越南问题；霍尔德曼担心，由此而引起的失望情绪将会败坏公告的影响。因此，他主张含蓄地说明，总统想对全国讲一个与越南无关的问题。我反对他的论点。这样来宣布消息所引起的猜想反而会坏事。我深信总统讲完之后将不需要申辩。

最后，罗杰斯也到了。我照总统的建议向他“有选择地”报告了我此行的情况。我们讨论了在即将出现的事件中他应起的作用。通知外国政府将是国务院的任务。罗杰斯干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准备好了一份情况介绍；他将首先从日本开始，在总统讲话之前一小时通知日本。

此后的四十八小时是在能否保密的焦急不安的心情和高度紧张之后的疲劳之中度过的。在我整个的政治生活中，我自己的心情总是和周围的环境不太协调的。我高兴的时刻总是在事情看来已经相当有把握的时候，通常比公众、甚至比我的某些同事要早几天、有时是早几个星期。等到群众中引起轰动的时候，我已在考虑下一阶段的问题了。在外交政策中是没有坦途可走的；每一项成就都是通过新的艰苦努力去换来的，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作更多的努力去加以巩固。在圣克利门蒂，在总统讲话之前那紧张而又平

静的两天里，情况正是如此。我的同事们考虑的是四十八小时以后在广播电台播音室里的一场表演。我则稍事恢复高速飞行后的疲劳，并且越来越关心如何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了。

七月十五日下午尼克松作了一次惊险的表演，以缓和他紧张的心情，他喜欢玩弄这一手来显示他的高超的技巧，但同时却给他的下属增加了额外的痛苦。尼克松得知那天中午我同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亨利·布兰登和他的漂亮的夫人穆菲共进午餐，于是也把他们邀请到他的住所。他带他们到各房间和花园里走走转转，不断地向他们发出隐隐约约的暗示，而我则如坐针毡，唯恐在这最后一分钟泄露了机密。尼克松若有所思地谈起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谈到有必要建立一种新关系，还说他很想到亚洲去旅行。谢天谢地，他的话是转弯抹角地讲的，布兰登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只是后来回忆起来他才懂的；可是他真使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②

七月十五日，太平洋时间下午两点四十五分（东部时间是五点四十五分），西部白宫发出了一个闪烁其词的通知，说五个小时之后总统要对全国的电视广播网发表一项"重大声明"。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美联社就发了号外："尼克松总统将于今晚十时三十分对全国电视广播网发表一项'重大声明'，题目保密，西部白宫拒绝事先透露。"

太平洋时间下午五点四十五分，我和总统坐直升飞机飞往洛杉矶。尼克松进入设在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出现在全国的照相机和麦克风的前面，他发表了七分钟的一篇简短演说：

晚上好！我今晚要求这个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过去三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七

亿五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建立我们两国间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

我现在读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美国同时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预料公告发表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推测，我想尽可能讲明我们的政策背景。

我们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的这一行动，决不会损害我们的老朋友的利益。这一行动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我们谋求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同时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

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较好的关系，将对所有的国家有利。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将去中国一行——我深切希望这将成为争取和平的一次旅行，不仅是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而且也是为了我们共有的这个地球上的子孙后代的和平。谢谢大家，祝你们晚安。

尼克松离开伯班克播音室的时候，有一小批人对着尼克松连声高喊“撤出越南”。

在发表这份公告之前约四十五分钟，在华盛顿代我处理公务

的理查德·T·肯尼迪上校向那位倒霉的伏龙索夫递交了一份尼克松讲话的副本和一份照会，照会提醒苏联人"在七月十五日以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直言不讳地讲到苏联人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对我们玩弄的那套手法。照会重申，我们愿意在新的基础上处理与苏联的关系。照会还警告说，如果我们的希望破灭，那将产生"严重的后果"。那篇讲话和那份照会中提出的所有好听的保证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华盛顿和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地位已经改变了。

尼克松离开电视台之后，同他的高级官员来到洛杉矶的佩林诺餐厅，在这里尼克松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我们就餐的地方是在餐厅一个角落的小单间里，尼克松缓步走过餐厅，尽情地接受餐厅里一些客人对他的祝贺，同时也想招引那些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对他表示良好的祝愿。我们的庆祝晚宴吃的是蟹腿肉，喝了一瓶一九六一年酿的法国名牌葡萄酒。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还在前厅逗留了一会儿，拉住别的一些客人向他们介绍，说我就是到过北京的那个人，有几位没有看电视的人被他弄得莫明其妙。那确是一个动人的场面。尼克松并没有夸张；他那副神情就好像他简直不能相信他刚才宣布的消息是真的。这样就搞得双方都有些尴尬；尼克松在生人面前总是有些不自然，而别的客人接近总统时也有些拘束。尼克松在得意的时候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责难，他料想别人一定会来赏识他，而不善于去消除他和自己的同胞之间的隔阂。就这一点来说，佩林诺餐厅的这一幕戏正是象征着理查德·尼克松的胜利和悲剧。

此后几天是群情激动、也是颇为可笑的几天。世界各地纷纷打来贺电。新闻界几乎是一片赞扬声。也有一些尖酸刻薄的评论，这类评论不仅来自保守派人士，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也来自极少数美国自由派的批评家，他们担心我们是在毫无必要地跟苏联

对抗。但是这一抓住全世界心灵的大事件把那些声音淹没了。献计献策的人大有人在；有些人要总统在一次出访中既访问北京也访问莫斯科；每一类人都有自己最得意的方案要总统去执行，如结束越南战争，扩大贸易，等等。这个问题说明了一种好现象；志愿支持我们的政策的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踊跃，我们简直应接不暇。

以前，我们的内阁要员们很喜欢到台湾去旅游，但顷刻之间，他们说有重要公务，迫不及待地要去访问北京了。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的建议像洪水般地提了出来，要到大陆中国去，要求我利用新的联系去同周恩来商定时间。甚至还有一位夜总会的歌星，也请他的代理人想办法提出申请，要到中国各地的夜总会去巡回演出。当有人告诉那位代理人中国没有夜总会时，此人嘟囔了一番，不相信这是真的，竟然写信来把这说成是难以置信的借口，为白宫的盛气凌人打掩护。

霍尔德曼在他的上司的压力下要把这次事件作为一个绝好的机会大力"推销"尼克松，把这幕戏剧润色得像一篇英雄史诗一样。这样就出现了那个大部分出于伪造的传奇故事，说什么尼克松和我和罗杰斯曾经在林肯厅开会研究过云云。我接到详细指示，要我向报界简单介绍周恩来和尼克松相似之处。为了使白宫人员相信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捏造，霍尔德曼连吓带骗，作了艰苦的工作；要他们相信，不管怎样，这一回总统的谨慎持重，是最好的公共关系政策。

起初，尼克松所卑视的那些自由派人士对他备加赞赏，而感情上忠于他的保守派人士对他的赞扬却比较勉强，他对这一点很有些担忧。但是过了几天，经过一些解释以后，保守派也开始认识到其中深意了。不调和的调子主要是来自日本。日本总理大臣佐藤荣作是我们坚定的朋友，他做了很多工作来加强我们两国的友谊，

使这样一个人感到为难是特别令人痛心的。关于中国的这一公告在日本被称之为“尼克松冲击”，一个月后又来了第二次冲击，那就是在国内对工资物价加以管制、在国外对贸易和货币加以限制的紧急经济方案。

那时候我们能干的驻日大使阿明·迈耶是最感到难堪的一个。他是通过陆军广播电台听到这个公告的，当时他正在理发，开头他认为尼克松提到“中国”是说溜了嘴。根据迈耶的回忆录，③他最初的反应是对这次的感觉迟钝感到难过，这也是当时在东京的许多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反应。然而，“经过几天、几个星期的深思之后”，迈耶得到几点结论：“如果要保证取得成就，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不可能采取本质上不同的其它做法。”迈耶提出了几点理由：日本人不可能长期保守机密；其他盟国（台湾、朝鲜、东南亚盟国、北约组织）有更多的理由或同样有理由要求事先磋商（更不用说苏联了）；日本的政策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政策而遭到根本破坏，只不过是被剥夺了它想走在我们前面的机会——它在我们之前很久就走上了这条道路，早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佐藤就曾公开建议与北京扩大贸易和新闻界的往来，并开始政府级的谈判。

虽然迈耶认为事先不可能与日本人磋商，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我们还是有可能采取一种比较聪明的办法告诉日本人。例如，在正式的公告发表之前几小时，派遣一位和我同去北京的同事到东京去向佐藤简要介绍情况，这样做肯定更有礼貌一些，更周到一些。这样做既保守了秘密，又显示出对一位体面的好朋友的特殊照顾。那时事情紧迫，谁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这在礼貌上是一个大错误。许多批评家抓住这一点指责我们“对不起盟友”，而他们对我们的军事联盟和保守的盟国的忠诚以前却不曾很好地表现过。现在事情虽然过了将近十年，回想起来，除了基本上要保密之

外，我想不出还有其他办法。事情的微妙，机会之难得，使美国对所发表的内容非进行控制不可。

总统在讲话中已经巧妙地强调了我们的政策不是针对任何其他国家的，也不会损害我们的老朋友的利益。这虽然是一些陈词滥调，但人们可以想象，如果在发表公告的那一天任凭人们去猜测，那将造成多大的混乱。假如我们事先公布去中国的消息，那将引起几个星期的猜测，而使我们无法应付。反对者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对我们恶意中伤，我们无论再作什么保证都将毫无作用了——特别是当时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会谈的议程。即使那些公开支持我们的人也会使我们为难，他们会提出那老一套的议程，而那些议程正是我们决心要摆脱的。那些最有权利要求与之磋商的国家也会迫不及待地破坏这次行程。我们对这次事件的公开发表保持控制，也就是对我们的政策及其后果保持控制。正如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九日的外交政策报告所承认的，我们对保密付出了代价，但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其所以要保密的理由则是“压倒一切的”。

我此行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在我们知道结果之前我们并不想冒风险，先抱过大的希望，造成压力，致使双方不得不公开表明立场。鉴于乒乓外交的经验，我此行无论采取什么做法，这种立场的根本改变所引起的震动总是难以避免的。那份报告申辩说，在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们毕竟未同中国人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在这之前，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同我们的盟国进行磋商——这一诺言后来我们忠实地履行了。

我的同事比尔·萨菲尔为我们的立场找到了一个先例，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九日他给我的备忘录如下：

比尔·萨菲尔致亨利·基辛格的备忘录

这里引用有关保密的一句话，也许对你会有用处：

“在道义上最使人感到为难的是：为了促使某件事获得成功，我们不得不隐瞒那件事的真相。”

——达格·哈马舍尔德

“中　国　牌”

可以理解，我们当时正在进行的三角外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马上领会其含义的。这决不是一种想要挑拨中国去反对苏联的拙劣图谋。我们并不想玩弄“中国这张牌”。中苏敌对是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事实上近十年来，我们对这种敌对的激烈程度根本不了解。北京和莫斯科相互争吵都不是为了讨好于我们；是因为它们吵架才向我们讨好。我们不能“利用”那种敌对关系；是它们自相利用。如果我们企图加剧这种敌对关系，我们在其他方面就会造成损失。那样做反而会使北京感到不安。一谈起中国这张牌那就意味着，我们不打这张牌就要付出代价。中国人常表示一种恐惧，即我们与莫斯科打交道以实现我们的目标时是拿北京作为牺牲。毛泽东警告我们说，不要“站在中国的肩膀上去接近苏联。”任何想要操纵北京的企图都会驱使中国与我们疏远，也许会使它重新考虑，选择与苏联接近，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样，任何想要玩弄中国这张牌的动机都会促使苏联人决心结束那场腹背受敌的恶梦，在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从一个方向出击，很可能是对中国，因为中国比较弱，而且没有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加以保护。

这场游戏的名称就叫作均势。我们并不想与中国联合起来与苏联进行挑衅性的对抗。但我们同意有必要遏制莫斯科的地缘政治的野心。向埃及派遣战斗部队，促使叙利亚侵入约旦，在西恩富

戈斯建立海军基地，在中苏边界制造冲突，这一切都是对全球均势进行挑战的组成部分，是必须加以抵制的。此外，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想使自己在外交上多一些选择的余地：北京想要摆脱文化革命给自己造成的孤立状态；华盛顿则想加强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安全，使国际体系的稳定少依赖美国的经常干预。

中国和美国尽管由于有共同关心的问题而走到一起，但它们对待这个问题的做法却并不因此而完全一致；这样就埋下了未来困难的种子。北京以从前他们打内战时期那种坚持不渝和毫不妥协的热情来与莫斯科对抗。北京的挑战是论战性的，哲理性的；它不仅反对莫斯科的地缘政治的欲望，也反对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越感。我们同意有必要阻止它的地缘政治的野心，但我们没有理由卷入它们意识形态的争论。此外，我们拥有大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使我们不能不对几亿人的生命有一种受委托的责任感。我们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有责任尽可能去争取和平共处；我们在挑战面前不会退缩，但处在这个核时代，也必须相互克制。批评家们——有些是北京的批评家——对我们的这种追求也许报之以嘲笑，或者说毫无用处；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但只有采取这种做法，我们才能在需要对付军事压力的时候使我们的人民团结一致。

从一开始尼克松和我就深信——在高级决策人中只有我们两人有这种看法——美国不能同意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在与中国有任何联系之前我们就持这种看法。早在一九六九年夏天，我们就曾要求那些不太情愿的官僚机构制定应变计划。很明显，这说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并没有什么协议——那时候甚至华沙会谈也没有举行。这是根据清醒的地缘政治的估计才这样做的。如果莫斯科得逞，使北京屈服而陷于无能为力的地步，苏联的全部军事压力就要转向西方。在那种情况下，苏联冷酷无情，而美国软弱

无力(或者漠不关心——其结果都是一样)，那就会促使日本和西欧去迁就苏联的其他要求，至于苏联周围的许多小国那就更不用说了。很明显，三角外交要求灵活机动。我们不必用多大力气，而是象日本的柔道一样，利用对手的重量顺势把他推到我们希望的方向去。搞得好，我们就可以对双方都有大量选择的余地，而它们彼此之间的回旋余地则比较少；当然也总会有与双方对抗的风险。我在第二次去中国之前，即十月份，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总结这种战略如下：

我们要使我们的对华政策向莫斯科显示一下，它不能代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说话；同我们达成协议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必须考虑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可能性——这一切并没有过分触犯苏联的偏执狂。我们这次对中国采取主动行动得到的最大的好处也许就是对苏联的影响。

我们已经得到这些好处。中国人不需要作什么。在这方面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只需要在这条已经开始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对苏联的压力我们显然决不可明白表示。让事实本身去说明问题。

同时，我们和中国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利益天然是一致的，同那些学究式的或其他专家的意见相反，中国并不仅仅是为了重新获得台湾而显著地改变他们对我们的政策，尽管他们在许多场合作过重要的声明。中国想在国际事务中占有自己的地位，想显示它的威望和重要性。这将使他们在苏联的压力面前获得某种程度的安全，并且减少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危险性。我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写道：

中国人想要减少两面作战的威胁，想要使莫斯科重新考虑，是要进攻中国还是接近中国，而且也许还想使苏联对北京更圆通一些。他们特别想要我们作出美苏不要相互勾结的保证。

这种保证我们是可以做的。这是我们采取主动的本意，也符合我们本身的利益。我们好比在走钢丝；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切不可向一边摆动——尽管这样做很吃力——否则我们将坠入深渊。

我在第一次访问中就告诉周恩来，我们将与莫斯科继续打交道，但我们将把我们可能考虑与苏联人达成的任何涉及中国利益的谅解，都详细地告诉北京。七月十六日尼克松致周恩来的函件中确认了这些保证；我们还把我七月十六日向记者介绍北京之行情况的稿子全文随函附寄——这样做是一种礼貌，表明我们很关心促进这种新关系。

这封信是通过我们在北京商定的巴黎新渠道初次联系，是七月十九日由沃尔特斯将军向中国大使黄镇递交的。通过巴黎渠道的信件都由我的工作人员和我起草，经尼克松批准，由情况室的一位工作人员亲自送到巴黎，由那位心情迫切的沃尔特斯递交的。沃尔特斯很快发回信件，生动地描述他同热情好客的中国人会晤的情况，这样就促使我们与中国人作更多的通讯联系。沃尔特斯以他那种高超的夸张手法大事渲染会晤的气氛、当时的情景、人物品格及烹调技术等等。沃尔特斯本是一个吃喝的行家，他向我们津津有味地描述那些外国风味的山珍佳肴，据他说，其中有些东西是他出于爱国的责任感才吃下去的。他和黄镇都出身军人，很快就热烈地交谈起他们的战争经历来了，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曾经是同一场战争中的对手，却没有因此而感到别扭。

我们多次利用巴黎渠道，因为来自莫斯科的消息很快就大量涌到了。与苏联问题专家的担心相反，莫斯科的反应并没有敌意，至少一开始是如此。莫斯科电台几乎是完全按照公告的原文向国内听众播发了这个消息，只删掉了一句话："尼克松总统已欣然接受邀请。"九天之后才出现了苏联的第一次权威性评论。七月二十四日《真理报》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宣称："在苏联，没有人认

为中美的接触有任何理由值得大惊小怪。"评论继续说：

> 当然，未来事态的发展将会更好地揭露北京和华盛顿的真正意图。我们的党和国家将会考虑中美接触的一切可能的后果。不消说，想要利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接触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施加某种"压力"的图谋，其结果都不过是一场空想而已。

当然，宣布有压力并不等于真有压力，否认有压力也不说明就没有压力。

苏联真正的反应是外交上的反应，而不是宣传上的反应。苏联在两条战线上积极行动起来来对付新的国际现实。首先，它很快想跟华盛顿改善关系：它忽然急于要制造一种印象，那就是在莫斯科比在北京能完成更为重要的事情。

七月十九日多勃雷宁多少带些哀伤地询问，是不是七月五日苏联逃避最高级会谈的照会影响了我们的对华政策。我避免回答这个问题。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真相是，那个照会更方便了我们到北京去；我们总是要到北京去的，无非多走一些弯路就是了。转瞬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也不再躲避了。多勃雷宁探问：总统可否先去莫斯科访问，再到北京访问？我的答复是同给周恩来的答复一致的：最高级会谈将要按照已经宣布的次序举行。其他僵持了好几个月的谈判也开始象魔术一般地解冻了：例如柏林谈判和防止突发核战争的会谈就是这样。我在别的地方还要讲到，这两种谈判在北京公告发表之后几个星期就很快地完成了。

但是苏联的政策也有坏的一面。在日益激化的印巴冲突中，苏联找到了一个机会去羞辱中国和惩罚充当中间人的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想要镇压东巴基斯坦的分离企图之后，次大陆的紧张局势急剧恶化了。印度和苏联成了事实上的天然盟国。拿印度来说，它本来开始时是欢迎尼克松七月十五日的公告的，斯瓦兰·辛

格当时发表了一个很不错的声明，说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积极的发展。”但到了七月二十日，印度就开始表现出另有想法了，它开始编造中美对次大陆有阴谋的谣言，以此为借口，好让它自己与苏联搞交易。斯瓦兰·辛格在议会回答问题时说：“如果这（指中美和解）意味着这两个国家想要控制这一地区，那我们就不能等闲视之。……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而且）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考虑用某种办法来防止出现这种局面。”在谈到苏联的时候，辛格继续说：“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孤立的。还有些别的大国和小国也许比我们更为不安。”

辛格心里所想的到八月二十日就变为公开的事实了：印度和苏联在这一天签订了友好条约；条约的全部实际目的就是，苏联给印度以保证，如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战争，苏联将反对中国进行干预。苏联采取这一行动是蓄意在次大陆打开通向战争的大门；这是苏联在七十年代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第一步，通过这些行动，苏联人向那些急于想诉诸武力的国家提供武器和保证以煽起冲突。我同意哈尔·索南费尔特和比尔·海兰的敏锐的分析：

> 这件事情的可进可退的性质是很明显的：如果中国人在巴基斯坦方面的压力下去反击苏联的这一行动，他们将怎样办呢？如果他们无所作为，那么苏联人便大有所获——他们的目的之一肯定是要暴露中国，让人们看清它是一个软弱的盟友。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人增加赌注，那末苏联人也必然会作出反应来保持自己的信誉，要保持信誉起码也得提供更先进的苏联武器，如此等等。……
>
> 这样一来，印巴冲突就变成了由代理人进行的一种中苏冲突。

索南费尔特和海兰还预言，苏联人也许想使中国的朋友罗马尼亚丢丑。实际上，苏联人在当年夏末就已开始对那个国家发动一场神经战。我们极力反对那种做法，对于结束那场折磨也许是

起了作用的。

要保护我们对华政策的这株幼苗不致被苏联人这种拥抱和威胁相结合的做法所摧垮，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确使北京了解我们的行动。因此，我们通过巴黎渠道加强了与中国人的联系。从八月一日到九月底，我们交换的信件比过去二十年还要多。我利用到巴黎与黎德寿秘密谈判的机会，也与黄镇大使三次秘密会晤。黄镇是一位干练而和蔼可亲的长征老干部，他后来成了中国驻华盛顿办事处的第一任主任。我花了很大的力量让中国人了解我们对苏联的做法以及我们对苏联意图的估计。我们让北京了解苏联突然急于要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情况。我们在事前四星期就提请他们注意关于突发战争会谈和关于柏林谈判这两项协议的内容。双方对印巴次大陆日益恶化的局势交换了看法。我们知道中国不愿意参加由五个有核国家举行的会议，因而拒绝了勃列日涅夫关于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建议，理由是：只有五个国家都参加，这种会议才有意义。

北京对于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行动当然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想反对。我们的目的是做到使中国领导人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以及我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中国领导人对于提供的情报装作不感兴趣，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对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毫无疑问，北京宁愿我们对莫斯科摆出公开对抗的架势，但他们也知道，我们对外交政策的态度是冷静持重的，是从地缘政治的观点出发的。我们不想以牺牲均势为代价去争取和平共处。我们面对着国内外的反对仍然愿意争取缓和，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苏联人要放弃军事压力和在政治上实行克制。

我们还通过巴黎的新渠道对另外两个问题交换了意见：一个问题是已经明确的，另一个问题没有谈过。正式交换意见的一个问题是我第二次去中国筹备在北京举行的最高级会谈。这个问题

很快就被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盖过了；这个问题我们从未讨论过，却是我们已深刻地意识到了的问题，那就是林彪在中国的垮台。这场乱子很象是由于中国对我们的政策急剧转变而引起的；一九七二年二月毛泽东对尼克松就是这样讲的。这显然反映了中国政治中埋藏很深的紧张关系。但我们从未提出这个问题。我第二次去中国的问题早在我七月访华之前在双方交换的信件中就讨论过。七月份我在北京的时候，周恩来很急于要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是由于他想消除因第一次秘密访华可能造成的坏影响，也许是由于他经验丰富，很了解在第一次总统访问之前需要先把一些重要问题解决好，否则就会冒太大的风险。

第二次访华尼克松仍然很想亲自出马，但是需要战胜了虚荣。尼克松决不让最高级会谈去碰运气；所有的最高级会谈都是事前基本上准备好他才去参加的。在他还没有大体上了解会谈的结果之前他不会去参加会谈，直到他处于困境的那最后几个月都是如此。对于一个总统来说这也是唯一负责的做法。政府首脑作为主要的谈判者关系太重大了。他们通常太忙，无法照顾到各方面的细节，而那些细微的事情却往往决定谈判的成败。他们身系重任，不能从容不迫地去应付一次拖长的谈判所必然带来的压力。如果谈判出现僵局，就没有回旋余地。再说，最高级会谈时间都太仓促，不容许过分仔细地去分析问题，而过细才能保证协议持久。尼克松了解这些，因而批准我第二次去中国作准备工作。

关于我第二次访问同北京的联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一次总统的先遣人员，特别是这些先遣人员的技能是在美国中心地带热烈的竞选旅行中磨炼出来的，是由尼克松政府中狂热地醉心于公共关系方面的人员严格训练出来的。我曾经提醒周恩来，过去中国遭到夷狄的入侵能够生存下来，但它从未遇到先遣人员，那不过是一句半开

玩笑的话。现在则必须写信专门解释先遣人员去做什么，为什么先遣人员的人数一定要象我过去曾经坦率地向他讲过的那样几乎等于总统访问的全部人马。还有，美国的飞机从来没有在中国的土地上飞行过，这既涉及复杂的政治问题，也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最后，中国人拒绝了由戴维·布鲁斯陪同我前往的建议，虽然这是周恩来在七月份曾经同意了的。这次北京是以“可以理解的理由”为借口，考虑到河内的激怒和莫斯科电台不停地指责北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搞交易，这个借口也是很有道理的。

当所有这些联系正在进行的时候，发自北京的报道令人迷惑不解，看来情况有些不妙。九月间，我们突然发觉，有五天的时间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这几天所有的中国飞机都没有起飞。随着那个月时间的消逝，我们终于弄明白，有几位关键性的领导人被撤职了，其中包括军队的大部分高级领导人。在那些突然不见的人当中最重要的是林彪。他是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共产党政治局的副主席，军委会的主席，并已由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指定为毛泽东主席的继承人和接班人。九月十二日，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古坠毁，情况不明。九月二十日，一年一度的庆祝中国革命的“十·一”游行取消了。很明显，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我们没有第一手的情报。中国在其他问题上跟我们的联系照常进行，而且照样是那么爽快。安排我去北京的事也没有中断，除开我们的报刊有所反映外，也没有丝毫迹象说明总统的访问会成问题。来自北京的信件偶尔表现得刻薄，但总是进行充分的解释。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倒是忽然热乎起来了。非但柏林协议和突发战争的协议签了字，而且葛罗米柯访问了华盛顿，递交了正式邀请总统访问莫斯科的信件。既然前一年苏联人千方百计地避免引起报界关于最高级会谈的揣测，他们现在就不能过分紧迫地催我们公

布这个消息。我们尽可能拖延，以便我们有充分时间在十月五日发表我第二次去北京的消息。刚好是一星期之后我们才发表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消息，定为一九七二年五月的某个时间。不管中国人内心里是怎么想的，但他们忍气吞声没有说什么。

中国在联合国

当我在为十月的北京之行作准备的时候，联合国正在一年一度地辩论应由台北还是北京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的问题。我们打开同北京的关系，对于联合国辩论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我们没有很快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在一九七一年以前，基本上就已注定我们要进行一场后卫战。现在全部过程在加速进行。

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它是安全理事会最早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一九四九年革命之后，联合国大会几乎每年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决，即哪一个政府——台北的中华民国还是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的中国的代表。起初，大多数国家反对接纳北京。但由于非洲和亚洲几十个新国家加入联合国，赞成北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多了。美国退而从程序问题上保卫台湾的地位。从一九六一年起，我们和一些盟国每年都提出一项决议案，把任何要改变中国代表权的提案都作为一项“重要问题”，要求大会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只要我们能在初次表决中凑足简单多数票，我们在二次表决中就能以三分之一加一票阻止北京进入联合国。

一九六九年，这个“重要问题”决议案以七十一票赞成、四十八票反对和四票弃权获得通过，赞成与反对的票数差额较大。阿尔巴尼亚提出的接纳北京、驱逐台湾的决议案以四十八票赞成、五十六票反对、二十一票弃权被否决；与前一年反对票比赞成票

多十四票相比，这一年只多八票。虽然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仍因不能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而被击败，但亲北京的势力在精神上正朝向突破简单多数这个目标前进。不仅是每年都有更多的新国家进入联合国，而且时髦的第三世界主义也侵入一向支持我们的拉美集团了，就连我们北约组织的盟国也越来越难以驾驭了。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九日，国务卿罗杰斯鉴于联大的表决即将临近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分析大会中各集团的情况。罗杰斯推测说（这个推测是正确的），一九七〇年大概还能维持现状，但情况正在迅速恶化。他提醒总统，也许需要改变策略，提出某种"双重代表权"的方案。罗杰斯没有提出建议，但暗示他赞成在一九七〇年反对接纳北京这一点仍照旧不变；总统不想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然而最后失败的结局看来已经日益明显了。加拿大于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三日承认了北京。渥太华通知我们，加拿大将继续同我们一起投票赞成"重要问题"决议案，但很可能投票赞成阿尔巴尼亚的接纳北京的决议案。联大的表决日益迫近，压力也越来越大了。我国出席联大的代表团成员之一雅各布·贾维茨敦促政府"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方针，"不再强调把北京摒除在联合国之外，而是改为强调在联合国内保持台湾的席位。美国朝着这个方向作了重大的改变，十月二十五日龙·齐格勒在发言中暗示，我们反对驱逐台湾，不反对接纳北京："美国反对以牺牲中华民国来接纳北京政权进入联合国。"

十一月十九日，我要求部际机构研究中国代表权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第二天联大进行了表决。"重要问题"决议案以六十六票赞成、五十二票反对、七票弃权获得通过（差额是十四票，而前一年差额是二十三票）。阿尔巴尼亚提案是五十一票赞成，四十九票

反对，二十五票弃权。该决议案因不足三分之二的票数而遭到失败——但赞成北京的国家第一次赢得多数。

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阿尔巴尼亚提案的多数票证明是心理上的分水岭。一九七一年一月初，日本外务省通知我们大使馆，他们估计，双重代表权方案（我们正在拟定这种方案）和“重要问题”提案的前景是悲观的。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总理大臣佐藤在新的一届国会会议开幕词中谈到日本希望同北京改善双边关系，并建议开始政府级的接触。英国和比利时私下表示，它们预料美国的主张将在一九七一年被击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说北京将在一九七二年取得胜利；迹象表明，联合国秘书处正在为接纳北京作应变准备。英国希望同北京的关系升级，甚至暗示他们可能反对我们的双重代表权提案。

国务院真的制定了一个双重代表权方案，但是不久就清楚了，这个方案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我们仍然坚持“重要问题”那个策略，那末双重代表权提案尽管可能得到简单多数票的支持，但会由于缺少三分之二的票而失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放弃那个“重要问题”提案，那末阿尔巴尼亚提案很可能以简单多数票通过，台湾就会被驱逐。三月九日当高级研究小组开会讨论的时候，我曾经对双重代表权方案表示怀疑；如果某些国家想找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那末我们玩弄的双重代表权的种种戏法会有用处。但如果它们同我们一样决心要改善同北京的关系，它们就会不惜以驱逐台湾为代价来投票让北京进入联合国。我猜想这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在对华行动方面，中国代表权问题是唯一由国务院主管的事情，因而他们能够一意孤行坚持要这么干。也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促使他们有那么大的积极性。国务院从未忘记五十年代对它的指责，说他们在对华问题上“对共产主义太软”；有些外交人员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毁了前程。后来证明，国务院有很多人过

分夸大了“援华院外集团”*的势力。正如我已指出的，现在是正处于一种不同往常的情况下，由于提出了某种形式的双重代表权，就能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都感到高兴——自由派高兴是因为他们会把这一行动看作是使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一条途径，而保守派高兴则是由于这是以某种形式保持台湾席位的一种努力。双重代表权的唯一缺陷是北京和台北都加以拒绝，而且要为这个方案拉拢多数票越来越困难了。

所有这些因素终于形成一种压力，使国务卿宁愿在一次重要发言中公开提出双重代表权的主张——那时我们刚刚开始对北京采取一些试探性步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务院于四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我们收到周恩来对尼克松的邀请的第二天——说台湾地位“未定”；这种说法是国务院采取双重代表权这一立场的法律根据。

几个月过去了，我对国务院提出的政策越来越感到怀疑。这种政策对于我们同北京的关系肯定会起很大的破坏作用，甚至对台北也会起某种程度的破坏作用。这种立场决不能维持多久。那些急于讨好北京的国家不会接受这种极为明显的花招。这种立场既笨拙又是自我拆台。我们这种接纳北京的新主张增加了北京的支持者；但由于北京拒绝我们的双重代表权方案，这些新增加的支持者就会支持阿尔巴尼亚驱逐台北的提案，而不是支持我们所主张的保持台北在联大席位的提案。我们也许还能把北京进入联合国推迟一两年，但最后的结果是早已注定了。

我越来越赞成坚持我们原来的立场，即阻止北京进入联合国，即使这样做注定要失败。这至少是一种原则性的立场；这可以避免授人以法律上的借口。到最后，反正我们无论采取什么立场总

---

* 指亲台湾蒋介石集团。——译者

归是要失败的，除非我们坚持毫不妥协地同北京为敌的态度，并在我们同其他所有国家的关系上立下一个先例。我们当然不愿意这样做。在三月二十五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上，在听取了关于双重代表权方案的意见之后，副总统阿格纽和财政部长康纳利都主张，我们宁可由于采取这种鲜明的立场而失败，也比为了要再多拖一两年而实际上是在自己制造失败要好一些。尼克松后来告诉我，他赞成这个意见。

但他也像我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同罗杰斯激烈争论。我们可能被指责为顽固不化，说我们不愿去试一试有可能保住台北席位的办法，特别是由于国务院已经告诉我们北京有可能默认这种做法，我们就更容易受到责难。因此尼克松选择了拖的办法。他最后只好让国务院自己去干——但要在我们同北京的关系出现突破或者显然失败之后，他才表态。对于罗杰斯一月份、此后是四月份、最后是六月份关于双重代表权问题的发言，他都曾加以制止，并且是感到伤脑筋的。有人经常给他施加压力，要求他宣布我们的立场，正如我已说过的，他在六月一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七月中旬之前他不想作出决定。

在我秘密出访北京的时候，我曾告诉周恩来，我们打算采取什么立场。周恩来肯定地说，北京决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权方案；另一方面，中国不是联合国会员国时间也已很长，因此中国能够再等一些时间。我并没有感到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中心问题。

现在既已确知代价不会太大，总统在我归来之后，就授权罗杰斯继续提出双重代表权方案。罗杰斯照此办理，因而在八月二日的一次长篇发言中主张北京进入联合国，但反对驱逐台北。中国在安全理事会的席位问题，要由联合国大会作出决定。（到九月初我们被迫从这一立场退却，实际上建议安理会的中国席位属于北

京，希望大多数国家能为这种妥协所吸引。）周恩来在八月五日接见詹姆斯·赖斯顿时，很客气地把这个建议放到一边，说这个建议是自相矛盾的，这话倒也不错。八月六日，中国驻渥太华的大使、我的新朋友黄华告诉《纽约时报》说，中国不会照这个方案接受它的席位；这只是用一种非常婉转的和解的态度来拒绝我们的建议。但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黄华都坚持认为，总统访问中国的事不会由于我们在联合国的立场而受到影响。

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在一次关键性的程序性表决中遭到失败。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在议程上把阿尔巴尼亚提案摆在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前面。由于我们只是把驱逐台北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那就几乎可以肯定，在我们的双重代表权提案还来不及交付表决之前，北京就会被接纳加入联合国了。当我们正在进行这场程序性斗争的时候，北京要求我们推迟公布我十月之行的消息。（有趣的是，北京似乎觉得，正当我们玩弄这种花招的时候，公布我去北京的消息，这会意味着北京赞赏我们的提案。）我去北京的消息是十月五日发表的。

“孛 罗 二 号”

我第二次北京之行代号是“孛罗二号”。当我回想起此行之前双方交换信件的情况时，我简直难以想象三个月以前仅仅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我们是怎样与北京进行联系的。在交换信件期间，我们的新关系陷入了复杂的官僚主义的程序之中。中国人对于我们派遣那么多所谓总统访问的先遣人员，以及接着第三次还要派遣更多的技术人员，感到很惊讶。尽管这个国家早在两千年前就发明了官僚制度，但是看来还得了解这些前所未闻的官僚主义的做法。在我第一次秘密来华时，温斯顿·洛德必须把随行人员了解情况

的范围划分为几类，这次十月之行由于带了一大批技术人员，这种分类也就更加复杂化了。我这一行人了解情况的范围至少分为四个等级，洛德必须竭力做到有条不紊，不出差错。我、洛德和霍尔德里奇了解政策和总统之行的某些技术方面的细节（虽然不了解他想在国内怎样利用这次访问）。总统的助理帮办和先遣队负责人德怀特·查平了解一切技术问题（在公共关系的计划方面也许比我了解得还多）。安全保卫和通讯技术人员只了解与他们的工作有关的问题。最后还有一位国务院的代表，那位老练、聪明、机智的老中国通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他是一位双边关系问题即二十年来中美会谈的专家；我的任务是使他有一种参加的感觉，但又不让他参与关键性的地缘政治的讨论，特别是起草公报的工作。

我用最妥善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我通过巴黎渠道向中国人提出一项关于我此行的事务性的建议，建议的内容很复杂，一个不大聪明的人简直很难立即领会它的意思。建议包括几种级别的会议，每一种会议刚好适合某一类人"需要了解"的范围，希望这些会议在相同的时间内举行，这样周恩来和我以及少数几个人就可以解决一些最敏感的问题而不致受到干扰。

中国人对于野蛮人的奇特做法是有长期经验的，满有把握地接受了这些建议。他们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错综复杂的官僚主义问题，就好象是对待一个国家的很自然的礼遇一样，但这个国家在六个月以前还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头号敌人。的确，中国人把那些会议安排得如此自然，使人感到仿佛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主意。首先，必须由坚强的沃尔特斯将军同中国驻巴黎大使馆进行多次接触。沃尔特斯以他特有的风格报告了他同黄镇大使喝茅台酒的一次会晤，这种烈性酒的厉害我是早就领教过的：

后来端来了食品。先是精制糕点、精制圆饼、油爆河虾，最后是汤。每过

一会儿就向我的盘子里夹满了各种菜肴。一面大嚼，一面喝一种有香味的红色酒，还有一种很有些类似一一〇号辛烷气的无色液体。只有那种虾的味道使我恶心，因此我不得不泡在酱油里吃。他对于我能使用筷子大为赞赏。我每呷一口那种无色液体，就感到喉咙里象剥掉了一层皮一样，但不幸的是那种虾的腥味又证明喉咙没问题。我对这种烈性饮料很当心，频频举杯但每次只喝一丁点儿，怕喝醉了，也为了保护我的食道。我们边吃边聊，讲了很多我当时能谈的关于中国烹调术的事情。

在我出访之前同国务院发生了一场争论，那时这几乎已成为一种惯例。罗杰斯是在消息公布之前几天知道我要去访问的，他坚决反对这次访问，这一回他的理由是，这将对于我们在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战略起干扰作用。他在原则上是对的：总统不应该抛开国务卿派遣使节。我不认为联合国的表决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我们驻联合国的大使乔治·布什也不这样认为。我的十月之行无疑加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登上世界舞台现在已是活生生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表明反对从联合国驱逐台湾，仍然能够同北京保持事务性的关系。（我已指出，中国人似乎也担心这是两面三刀的手法。）我们试图向那些动摇的盟国表明这一点。问题并不在于任何一次访问，而是一种基本趋势：现在北京正在摆脱它自己造成的孤立状态，一些国家将不会根据法律条文来投票，而是根据它们同北京关系的政治重要性来投票。真正的分水岭是尼克松七月十五日的公告。九月二十二日的程序性表决预示了最后的结局。

访问的日期已经商定两个月了，如果改变日期，无论如何总会给我们同北京的新关系造成某种不利的影响，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总统的访问要在一九七二年初进行，——为避免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日期赶在一起这是必要的——我们就不能推迟。（还有一个理由我不能推迟访问，如果推迟一个月，那就是正当印

巴战争的时候我在北京。)

这样，我在十月十六日就出发了。这次是乘坐空军一号飞机，比上次舒适多了。飞机按照总统访问预定的路线试飞，中途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这样可使总统一行在到达中国时不致由于时间差和高速飞行的不适而过分疲劳。我于十月二十二日到达，这时中国的高级领导机关刚刚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中国人正在经历一场哲学上的危机，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和意识形态的严格要求使他们感到矛盾、痛苦。接待我们的气氛是令人扫兴的，至少可说是冷淡的，这部分地是由于有这种心理状态。我们的飞机在上海着陆的时候，就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种政治气候，只有少数几个官员到机场迎接——还是七月间到伊斯兰堡去迎接我们的那四个人，加上上海外事处的两位代表。他们的态度是适当的，但是拘谨的。在北京，接待我们的也还是我们上次秘密抵达时的那些人，虽然这次访问是公开宣布过的。象上次一样，也还是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率领官员来欢迎我们，这次有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参加。

我们坐车从机场到我们上次住过的宾馆，车队进城时沿途仍是断绝交通和布满警卫。我们进入房间，发现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份英文的宣传性的公报，封面上印着向全世界人民呼吁的一句话："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沿途也涂写了类似的口号，多数是中文的，也有一两处是英文的。我不能接受这种侮辱，尽管我非常重视美中关系。我指示我们一位工作人员把我那份小册子交给中国礼宾司的一位官员，并且评论说，这一定是以前的一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我把所有其余的公报都收集起来，不加评论交给中国人。他们一声不响地都收下了。

中国同美国新建立的这种脆弱的和解体制并不是为了现在就在意识形态的祭坛上毁掉的。那天下半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待我们全体人员的时候，气氛就开始缓和了。我们在会议室的门

口合影后，周恩来照例让我们坐下来喝绿茶，并且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几句欢迎的话。总理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他对我的随从人员的生平都很了解，提到他们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时夸奖他们，提到詹金斯时，说他在二十二年前曾在中国居住过。

我们的第一次会议只限于谈一般性问题和议程。会后周恩来设宴欢迎我们。他发表了一篇非常热情的祝酒词，丝毫不涉及意识形态的争论，也完全不谈印度支那战争。他把我的访问说成是致力于中美两国的友谊。他的讲话中也不乏巧妙的恭维之词，拿我的哲学上的爱好开玩笑，再次提起几个月前我讲过的那句话——我在开场白中曾把中国称作神秘的国土。这个祝酒词没有发表，由于它不是一个很正式的发言，它比正式的发言能更好地说明周恩来的风格。

基辛格博士和朋友们，我愿借此机会欢迎来中国临时访问的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和其他美国朋友们。基辛格博士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问的政治讨论和技术性安排做准备工作。

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二十二年之后，现在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一个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十六年了，但还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今年我们在接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还接待了其他一些美国朋友。我们希望将本着一种新的精神来迎接这一新纪元。

我提议，为伟大的美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基辛格博士和其他所有朋友们的健康干杯！

周恩来提到我们以前的一次谈话，这使我们感到好象我们在继续对话；这是周恩来一种特有的风格，一种非常巧妙的讨人喜欢的技能。在任何访问期间，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中国人对我讲的任何一件事，都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设计的一部分——虽然我这个西方人头脑迟钝，要过一会儿才能理解。两次会谈相隔数月，又把话题重新搬出来，这使人感到好象会谈从未中断过。

宴会结束时，周恩来在宴会厅内绕行一周，同每一个人握手碰杯，包括那些下级人员、秘书和飞机的机组人员。这就奠定了此行以后几天的热情的基调，这也是中国的舞台监督们预先设计好的一部分，是为了使中国人民对这种新关系习惯一些。

然而，中国人必须首先澄清在我们房间里摆小册子和在我们进城的路上遇到那些标语的问题。我们到达后的第二天，代理外交部长到宾馆来会见我，陪我一同去出席同周恩来的会谈。在车子开向人民大会堂的路上，他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办法去同人民群众联系；我们是利用报纸和电视，而中国人则利用墙上的标语。他指着我们正在路过的一个标语作为例子。在那里，昨天还有一条标语怒斥美帝国主义，而今天却新刷了一条英文标语："欢迎亚非乒乓球比赛"。几分钟后，周恩来在谈话中顺便提到，我们应该注意北京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言词；那些反美的宣传是"放空炮"。

我不知道那些刺眼的标语是不是周恩来的反对派搞的，然后

周恩来利用我的抗议让毛泽东去制服他们；也许是在周恩来的同意下搞的，是为了考验我们容忍的限度；也许是很早以前就摆在那里的，而由于官僚主义的麻木不仁仍然留在那里。无论是哪种情况，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这类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没有再看到含有敌意的标语，而且许多类似的标语被涂抹掉了。（五天后我们离开北京时，机场上类似的标语牌换掉了。）

这以后气氛很快就改变了。的确，在我访问的以后几天里对我们表现得特别殷勤有礼和友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了很大的努力，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造成一种印象，即美国人在那里是贵宾。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官方的党报刊登了欢迎委员会的名单，其级别之高足以说明对这次访问是重视的。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登了两幅周恩来和我的照片；一个美国官员和一位中国领导人合影，二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

十月二十二日晚上，带我们到人大会堂去看“革命”京剧——这真是一种索然无味的艺术形式，剧中的反面人物都是罪恶的化身，穿黑色衣服，好人穿红色衣服，根据我所能理解的，是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拖拉机手。我们由叶剑英元帅、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总理的秘书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陪同走进礼堂，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已经有将近五百个中国的中级官员坐在那里了。这些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这也是第一次扩大范围同中国高级领导人以外的人见面。我们大约迟到了两小时，因为同周恩来的一次会议意外地拖长了时间。我们一进入礼堂，叶剑英元帅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就带头大声鼓掌，观众也随之鼓掌。我必须十分坦率地承认，并不完全是我们这些美国客人博得了全场的喝采，部分原因是我们不了解共产党人报以掌声的习惯。无论如何，肯定使观众了解了一点：这些美国人是特别受欢迎的人。

第二天，十月二十三日，在公众面前露面又进了一步，这是一

个有意安排的场面。上午我们去参观长城和明陵，不象七月份那样，这次我们在那些好奇的游客当中完全没有人警卫。下午我们的主人安排我们去游颐和园，该地在北京西郊，乘车约半小时可以抵达。还是由著名的叶剑英元帅陪同，他一定要使我们两人在中国的所谓“群众”面前一起出现。代理外交部长和总理的秘书也在场。这个插曲的高潮是我们在小船上喝茶的时候，小船在众目睽睽之下撑向湖面，岸上旁观的中国人足有好几百，其中还有一位摄影的北越记者。周恩来后来提到这位记者的出现，并向我道歉。我没有表示反对；我不会由于河内知道这个消息而苦恼；我猜想周恩来也抱有同样的想法。我们的主人不会由于吹来一股强劲的冷风而被吓住。那只游船的出现显然是安排好了的，只有一场飓风才能阻止同中国人的这种“接触”。

逐步扩大与公众见面是符合中国的国内需要的，但我们这次访问的成败要看我们能否把总统的访问安排好，能否促进我们之间的政治和解，并对公报达成初步协议。尼克松总统访问的细节很快就决定了。我们提了两个日期：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月十六日；周恩来选定了前一个日期。由于我们提出的访问团的人数比我在七月份所讲的要多得多，我要我的工作人员预先准备了一份向周恩来介绍情况的材料，这份材料说明过去总统历次访问的规模，提出了一个总统访华的“压缩的合适方案”以及我们最后制订的一个“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方案”。我的希望是，如果我们提出一个合理的建议，周恩来就不会同我们争论了。中国人用了两天时间研究这份情况说明书，接受了那个总统访问团的最低方案，但人数仍有好几百人。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出于某种原因告诉我，他听说尼克松很欣赏《巴顿》这部电影和它的主题，他已经看了这部影片。

其他技术问题只要先遣人员采取真诚恳挚的态度也都顺利地解决了。通讯技术专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按照这个方

案，它发出的消息比北京任何一条电话线都要快一些。我告诉周恩来，到这项计划完成的时候，他一定能同华盛顿通电话；至于他是否能接通上海却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负责保卫工作的头头大出洋相，他竟然要求把总统所可能访问的地方，都开出一份捣乱分子名单。这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保守派的共和党人无疑会被列为捣乱分子的，而如果问到共产党的同情者有多少，我们会得到一个使人不安的答案：八亿人。我们的保卫专家还强烈反对总统坐中国飞机和中国轿车旅行的建议——在他的手册里外国人都不可靠，外国的机器也都不可靠。最后还是尼克松制止了他。

周恩来和我用了二十五个多小时一起研究世界形势，还用了十五个小时起草一个声明，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上海公报。研究世界形势还是照七月份那样子进行，但讨论更加深入了。周恩来和我都明白，我们决不能达成正式协议。我们只能力求了解对方的目的和策略。根据双方一致的程度，就可以在政策上做到相互补充。

我早已说过，我很欣赏周恩来的杰出的品格。除戴高乐以外，我不曾遇到一个领导人象他那样熟悉世界大事。他对事物了解之详细是惊人的。许多领导人利用细节来回避问题的复杂性，但周恩来有一种特别卓越的才能，他能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运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了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见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他不把领导工作同宣布个人的特殊爱好混为一谈。他懂得政治家不能造时势，很喜欢引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舵手必须顺水行舟，否则会有灭顶之灾。"政治家的风格要求懂得何者不能改变，同时也要懂得在哪种范围内可发挥创造性。正是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从未讨论共同行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全球和平与均势问题在继续不断地协调它们的做法。

最戏剧化的遭遇是在讨论尼克松访问公报的时候。外界的观察家往往认为，而那些政府首脑也促使他们认为，这些联合公告是从他们原来打算加以归纳的讨论中很自然地产生出来的。事实常常相反。通常是先拟好了公报，而政府首脑的讨论是在这个框框内进行的。如果等到真正访问的时候才起草公报，那是自找麻烦。礼节性的事务花费太多的时间；也有很大的危险碰上不可逾越的障碍。政府首脑应该抓紧时间进行最高级的外交活动，以深入观察对手的认识和想法，而不应该字斟句酌地去推敲文字。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对未来作出决定；那就可能在出现危机时起很大作用。

尼克松已经授权我来谈判他访问的公报。我可以用我飞机上的电传打字机同他联系，但尼克松身边没有工作人员来审查我的建议，因为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在我身边。他本人也不想审查；一九七一年以后的所有的谈判，他都赋予我以自行决定的权力。我和我的工作人员起草的一份公报初稿，是尼克松已经看过并且批准了的。这份公报初稿是按照老一套的格调起草的，它强调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掩盖分歧；它用这种办法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共同点，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十月二十二日晚我把这份公报初稿交给周恩来。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对我作了初步反应，说我们的公报初稿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很自然，中国人想在某些地方加上自己的观点；第二天上午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将同我一起开始重新起草这份公报。

出乎意料，在约定的时间总理本人来了。他与往常的样子大不相同，发言尖锐，长达一小时——据他说，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他宣布我们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公报必须摆出根本性的分歧，否则措词就“不是真实的反映”。我们的初稿含义是，和平本身就是目的；中国人认为斗争比和平更为重要，至少是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我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中国人并不怕

面对现实的分歧。此外，我们还必须同台湾断交。我们目前的初稿是陈词滥调，苏联人才会签订这样的公报，但他们既不会认真对待也不会遵守它。

通常我进行谈判是采取一种谈笑的口气，使对方感到很自然，避免把每一个问题都搞成意志的考验，但当需要决定一项方针时，我的口气就转趋坚定。因此，我用一种异常强硬的态度作了回答。我说，我尊重周恩来的信念，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而背弃我们的老朋友，那末中国人就不会尊重我们。我们不会同台湾断交。我们之间的问题必须由历史去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到这里来不是单纯为了记下哲学上的不同观点，而是为了规划一条道路。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到总统访问的时候再草率地拟定一项公报；但这要由周恩来来决定。

稍事休息之后，周恩来说他将在下半天提出一个公报初稿。晚上，给我们饱吃了一顿烤鸭之后，周恩来提出了他的公报初稿。这份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毫不妥协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而留下一些空白页由我们来阐述料定是相反的立场。在台湾问题上是寸步不让的。乍一看这个初稿，我大吃一惊。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列举不同的观点，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事情；我想，这在国际上和国内也是无法接受的。但是，我进一步思考，就开始看出，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也许能解决我们的难题。阐明分歧会使盟国和朋友们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如果我们能形成某些共同的立场，那么就显得很突出，表明这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人真正可靠的信念。我们就可以避免那老一套的解释，而这往往是那种典型的公报的祸根。而且在公报发表之后，我们不致于冒出现矛盾和恶意的风险，每一方也不会把那些模棱两

可的词句解释得对自己有利。

休会片刻之后，我告诉周恩来，我愿接受他的基本做法。公报可以用很大篇幅阐述分歧；在这些方面我们随后提出美国的立场。但是表达不同观点的文字必须同这个场合相适应。中国的某些提法表达方式过于僵硬而难以接受；这是在重复报纸上天天发表的典型的宣传立场，总统是不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我们不会接受那种好像是在审判我们或者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即使是明白无误地标明为中国观点。此外，还必须有某些共同立场，否则此行将被认为是一种徒劳无益的表演。我答应第二天早上提出我们的草案。

这变成了一场体力的竞赛。我去睡了三个小时，由洛德重新起草公报。然后他去睡觉，下半夜由我修改他起草的公报。我们尽量使表达中国立场的那部分文字温和一些，也写出表达美国立场的那一部分，并且拟出某些双方同意的共同点。我们特别选择温和的措词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向中国公众提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目的。我们企图用一种坚定的而不是好战的语调。

十月二十五日，我方提出公报草稿之后随即开会；会议持续了一整天，偶尔有几小时中断，中国人要把草案译成中文，进行研究，无疑地，他们的立场要经毛泽东批准。前面我已讲过，周恩来同意从阐明中国立场的那一部分中删掉最尖刻的几句话。我们概述了主要的共同立场，特别是关于两国都反对霸权的那一段。（虽然霸权一词后来成为中国人非常重视的一个字眼，但实际上是由我们首先提出的。）

不出所料，台湾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方案，承认台北和北京都同意的一点，即中国的统一，但又不支持它们各自的说法。最后我提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如下："美国认识到，在台湾

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表示异议。”我认为我所做过和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使周恩来印象更深刻的了，按照这个提法，我们双方在将近十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说句公道话，这个提法我是摘自国务院为谈判所准备的一个文件，那次谈判在五十年代流产了。）中国人在晚上十一时三十五分要求休会。次日凌晨四时四十五分中国人交来新的草案，五时三十分周恩来回到会场。他和我又花了几个小时修饰文字，至八时十分截止，会议连着开了几乎二十四小时。我们对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文件。公报鲜明的、有些地方甚至是严峻的分歧更加突出了共同的立场——双方对霸权的关切（“霸权”是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双方承诺使关系正常化。关于美国与台湾有防御关系的那一段未作决定，但双方的立场已经接近了，而双方同意的部分则需要加强。我相信，到二月份我同尼克松再来的时候，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已决定在上午九时离开。周恩来把我送到宾馆的门口，第一次用英语对我说：“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联　合　国

我的飞机刚刚起飞，电传打字机就传来消息：我们在联合国保持台湾席位的那场战斗打输了。周恩来后来告诉我，在我刚要离开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联大表决的结果，但他不愿意第一个告诉我，使我难为情。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访问期间，我并没有感到中国人期望在那届会议取胜。周恩来只有一次提到这个问题，而且没有多说；他指出，对北京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会员资格更重要；北京不会按照我们“双重代表权”的方案接受它的席

位。

表决比预计的日期提早了一星期，这主要是因为想要发言的国家比预料的要少。阿尔巴尼亚提案的倡导者们决定在十月二十五日即星期一的夜里迫使联大进行表决。我们驻联合国的大使乔治·布什作了很大的努力，未能把它阻挡住。晚上九点四十七分，联大表决牌上的计票灯光亮出了投票结果：我们仍然指望取胜的那个“重要问题”提案以五十九票反对、五十五票赞成、十五票弃权输掉了。除卢森堡、葡萄牙和希腊外，我们所有的北约盟国都投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纽约时报》报道了表决后的情况如下：

坦桑尼亚人，北京的场内监督之一，从座位上跳起来，来到前排，跳了一会胜利舞。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是共同提案国发起人之一，相互拥抱。阿尔巴尼亚人严肃地握手。其他人都站起来，鼓掌，欢呼。有节奏的鼓掌声震动四壁。九十分钟后表决阿尔巴尼亚提案的时候，又是一个高潮。表决结果是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没有一个北约盟国站在美国一边）。④

这样，阿尔巴尼亚提案就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的双重代表权和把安理会席位给北京的提案，我国政府曾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提倡，却根本没有表决。问题的实质在于，友好国家改变了立场。它们当中很多国家长期以来感到苦恼，一方面它们不愿同我们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它们有利。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我们的某种惩罚。现在我们戏剧化地要跟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这种惩罚了。因此，国务院要制订一项“合理妥协”方案的全部努力都毫无用处。其他国家投票接纳北京不仅符合它们地缘政治的利益，而且支持北京还是讨好国内左派的一个办法，如果看起来像是在蔑视美国，那就更加有效了。

国会的反应激烈而且异常普遍。有一种强烈的情绪要对联合国、对投票驱逐台湾的国家进行报复。国务卿罗杰斯在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欢迎北京进入联合国，但他说美国对驱逐台湾“深表遗憾”；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先例，“这会对未来产生很多不利的影响。”他说政府不会支持用削减联合国经费的办法来进行报复，但他不等国会发动攻击就预先暗示：“会员国必须认真想一想”，联合国是不是“花钱太多了”。第二天，十月二十七日，即星期三，龙·齐格勒发表了一个更尖锐的声明。他根据那天早上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宣称，总统对表决后那种“欢呼、鼓掌和舞蹈”的“场面”极为愤慨；尼克松认为这是一种“毫不掩饰的高兴”和“个人仇恨”的“惊人的表演”。齐格勒注意不谴责表决本身，而是警告说，那种挑衅性的不庄重的行为“可能极其严重地损害这个国家和国会对联合国的支持”，“甚至影响外援拨款”，因为有些表现得如此狂热的代表是来自那些美国对之“十分宽厚”的国家。齐格勒的声明煽起了国会的歇斯底里。令人十分惊奇的是，最激烈的反对者却是那些一向主张接纳北京进入联合国的自由派人士。保守派削减美国对联合国所分担的款额的修正案在参议院遭到阻止而未能通过。然而一批自由派的参议员在十月二十九日即星期五夜晚的一次突然表决中，却大发越南战争时期的那种歇斯底里狂，提出了一系列反战的修正案以及以多边援助代替双边援助的条款，从而把政府整个三十三亿美元的援外授权法案给否决掉了。尼克松正当地谴责这种“极不负责的行动，它破坏了已执行二十五年的建设性的两党对外政策，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难以接受的危险。”

就在这个当口上，我于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回到了早已激荡不安的白宫。政府中有些人看准这是一个机会，要拆我的台，私下里议论，把中国问题表决的结果归罪于我去北京访问。总统对于我

的声望日高也开始不安起来了。他原先选我去担负七月的秘密使命，一部分原因是我跟别人相比，不那么抛头露面，而且更容易控制。但尼克松也像任何别的总统一样，决不想让他自己的助理串演他的主角戏。我从一件事上看出了华盛顿这股潮流的微波细浪：我回国途中要我在阿拉斯加停留，以免在联合国表决的那一天回到华盛顿（这是罗杰斯的要求）——实际上是说我的北京之行要对表决的结果负责。我是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下的飞机，那是一个新闻记者和摄影师都不去的地方。

这不是英雄的载誉归来，特别是经过几天的艰苦奋斗之后。不过，这也没有多大关系。不能把一个外交人员的挫折看成是政治问题，这种挫折是早已认识到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比预料要来得早一些。尽管尼克松可能脾气乖戾、气量狭小，他也不致于拿即将到手的胜利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来冒风险的。

他去北京访问的计划安排工作加快了步调，而且很快就把其他一些考虑压下去了。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在周恩来和我之间开了一个玩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表明，中国人什么东西都不会浪费掉的；我在公报草稿中删掉的那些有争论的话，几乎全部写进他在联合国的初次发言中了。为此，我指示乔治·布什表示遗憾，说北京决定以“华而不实地放空炮”来做为加入这个世界性组织的起步。对这些话，周恩来心照不宣，但某些社论作家却认为这话讲得很刺激，其他人对这个奇特的比喻则感到莫明其妙。

十一月十五日，我通过巴黎渠道提出，中国驻联合国的新使团应被授权同美国一方紧急会晤。中国于十一月二十日表示同意。在印巴战争期间，这种联系很快就成为必要的了。事实上在此后的一年半中，我同迅速调离渥太华担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的黄华在纽约有十多次秘密会晤。在一九七三年中，华盛顿和北京建立联络处之前，这些会晤以及我每年都去中国就成了我们联系的主要渠道。

过感恩节的时候，我和我九岁的儿子戴维乘空军一号飞机去圣克利门蒂，白宫的新闻记者逗弄这孩子，问他是否知道尼克松访华的秘密日期。戴维以前从收音机里听到是三月，就说是三月访华。这位新闻记者得意洋洋地把这句话作为内幕新闻发表了；此后几天新闻记者纠缠不休，想知道我是否打算"封住"我儿子的嘴，不让他泄露国家机密。可是，关于戴维"泄密"的报道和他先前听到的广播报道都是假的。十一月二十九日，白宫宣布了早已商定的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日期——我的儿子很运气，却原来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第三方拐弯抹角地、试探性地与北京联系，而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是面对面地会谈和通过几条直接的渠道进行联系了。在同中国领导人断绝联系二十年之后，我们对国际关系进行了在我的外交经历中最全面的一次考察。一位美国总统即将访问中国人的首都；公报基本上已经商定。我们猛跨一步就改变了我国外交的面貌。我们给我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了新的机动性。我们掌握了主动，也抓住了我国人民的想象力。当然，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已走上一条新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走了一段距离了。

①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纽约时报》，第六页。

② 亨利·布兰登在其所著《美国力量的收缩》（纽约州加登城达布代公司，一九七三年版）一书第二章中优雅而有风趣地谈到这件事。

③ 阿明·H·迈耶著：《出使东京》（印第安纳波利斯：鲍伯斯—梅里尔公司，一九七四年版），第一三三——一三七页。

④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纽约时报》。

第二十章

美苏关系：在两条战线上突破

一九七〇年十月葛罗米柯来到华盛顿，尼克松作为总统，第一次与一个苏联领导人会见。这时正处于一个短暂的平静时期。西恩富戈斯危机和约旦危机刚刚过去，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订于十一月二日恢复，柏林谈判重新开始。尽管苏联人在古巴问题和中东问题上玩弄了欺诈手段，尼克松要举行最高级会谈的近乎着迷的狂热却并未减退。我们会谈的对手葛罗米柯是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家、外交部长，他必须为缺乏外事经验的政治局设计外交政策，并且要在官僚机构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掌管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际事务；在这种斗争中，他全凭个人的才干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基础。葛罗米柯是个幸存者。从斯大林时期，莫洛托夫掌管外交部的时期，到赫鲁晓夫的莽撞外交时期，他都活过来了。一九四三年，他出任驻美国的大使时只有三十四岁。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他任苏联驻联合国的大使。一九五七年，他接替迪米特里·谢皮洛夫任外交部长至今。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他曾经会见过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此后的每一任美国总统。

作为幸存者，他付出的代价包括充当任何一个苏联最高领导人粗暴嘲弄的对象。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曾嘲笑他。有一次，赫鲁晓夫当着外国来访者的面夸口说，如果让葛罗米柯脱了裤子坐在冰块上，他会毫不犹豫地照办，直到命令他站起来为止。勃列日涅夫的幽默虽然没有那么粗野，却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毫无疑问，在他们看来葛罗米柯最可贵的地方莫过于作为独裁政权

的驯服工具刻板地服从命令。

当葛罗米柯受到这种不留情面的嘲弄时，他的脸上会堆起一副笑容。只是眼睛里含有诚惶诚恐和带点伤感的神情；如同一只小猎狗眼巴巴地忍受着主人莫名其妙的怪脾气，却乖乖地听从他的使唤。在整个过程中，葛罗米柯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尊严；他是忠实而顺从的，但决不谄媚。凡是他主持的讨论会，必然会作出某种决定。他是一位干练的苏联外交家，熟悉情况，有自信心，而且很顽强，已经成为苏联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掌舵人了。在未把握住主题之前，他从来不进行谈判。起初他对战略武器几乎一无所知，但他学习得很出色，到后来哪怕在最细微的问题上也能打一场顽强的后卫战了。事实上，对葛罗米柯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抓住不放，斤斤计较，逐渐侵越划分的界线，拿本来决不应提出的问题来换取某些最重要的东西。有一次在怎样计算苏联导弹的数量的问题上，他硬要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与任何已知的苏联导弹或计划毫无关系，而且事实上，虽然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在技术上则是荒唐的。那是一个极其玄妙的理论性问题，基本上与本题无关，但是对方一旦提出来，你就不得不仔细研究，以防设下圈套。（事实证明，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圈套，在下次会议的谈判中就不再提了。）另一次他要求把美国新设计的每一架战略轰炸机，即B-1，要在需要限制的武器的总数中算三件。当问他为什么时，他停了一下然后争辩说，B-1的速度更快，会在B-52之前飞达苏联。引入速度作为战略武器的标准，这倒是一种很别致的思想，当指出B-1比起导弹的速度慢得多而每枚导弹只算一件武器时，葛罗米柯瞠目不知所对。最后他以一种堂皇的姿态放弃了这个问题的争论，但仍然力图声称，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为此他应该得到某种补偿。

在正常情况下，葛罗米柯知晓问题的每一个侧面；同他谈判如

果不掌握过去的记录和问题的症结，那就无异于自杀。他不知疲倦而且冷静沉着。当他发脾气时，人们知道那是精心计划好的。奇怪得很，这一来倒显得不那么凶狠了；显然这绝不是个人的感情。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可以记住他认为我们作出的——或者甚至是暗示过的——每一个极微小的让步。于是这就成为下一轮谈判的出发点了。葛罗米柯不相信一鸣惊人或戏剧性的策略，内禀的谨慎和莫斯科的国内政治不容许他这样作。一九七三年，他被提升到政治局。在此之前，他不过是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在此之后，他明显地变得更有影响而且更加自信。到我任职的后期，如果他觉得勃列日涅夫偏离了既定的路线，就会毫不犹豫地去纠正他的上司。

葛罗米柯的谈判方法近乎刻板，这大概是民族的特性和俄国历史的一种反映。正象俄国在整整几个世纪内，通过逐渐侵吞原莫斯科大公国周围的平原土地以扩张领土一样，葛罗米柯宁愿稳步逼进而不卤莽行动。他耐心地积累点滴的成果以酿成重大的突变；他依靠对手的急躁来榨取用其他方法难以获得的利益。他总是尽可能地不让步，直到最后时刻，几乎总是到谈判的最后一次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他似乎抱定一种看法，只要存在对方首先让步的最微小的可能性，要他让步就是毫无道理的。对缺乏经验的谈判者来说——同葛罗米柯相比多数的谈判者都是缺乏经验的——这种技巧极其有效。然而，一旦人们懂得了这一套，这种战术就往往是自作自受了。最后真相大白，如果人们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保持冷静，葛罗米柯就要露底，原来装在他口袋里的东西比他已经准备应允的东西要多。

只要可能，葛罗米柯对开始一项谈判也要讲价钱；那就是说，他要求对方作出让步，作为他坐到谈判桌前的代价。尔后他用无休止的有关“一般原则”的争论来折磨谈判对手；一般原则一经商

定，他就会节外生枝，就如何贯彻这些原则展开争论，暂时达成的协议往往由于对其意义作出的解释而告吹。无论葛罗米柯口头上对相互联系的做法怎样表示不赞成，可是他对这种做法却笃信不疑，把一项谈判的每个细节与其他谈判的细节联系起来。他作的每一让步都是有条件的，这要看在某一其他问题上取得某些进展才让步的。仅当这种费劲的过程对他——或许更重要的是对他的上司——显示出柠檬已经被绝对挤干了的时候，他才开始解决问题，往往很快就会解决。

然后，他就被那种天生的怀疑所控制，而这种怀疑又由于那种制度固有的不安全感和他生活于其中的官僚机构而更加严重。只是到了谈判后期，在协议基本达成之后，这位谈判大师的感情才有所暴露。这时葛罗米柯似乎被一种难以解释的恐惧所支配，他怕他的谈判对手在最后一分钟对他玩弄什么诡计。他会谋求急急忙忙地签字——这表明，经过几个月、几年的顽强努力，他终于不再那么沉着镇定了。也许他是害怕他的同事们会因为他们复杂的决策工作到头来毫无结果而谴责他。先前那种盛气凌人的派头这时却颇带讽刺意味地显得极度缺乏自信了，总怕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最后还是上当。

毫无疑问，是苏联的制度塑造了葛罗米柯的风格。过多的经历使他懂得，他所提出的某些主张即使他顽强地坚持也不能实现。但是十之八九他能使他的上级，此后再使他在政治局的同事们相信这些主张是能实现的，只是要在接连不断地出现僵局以后才能办到。较大的灵活性看来就有意识形态不纯之嫌，或仅仅是软弱。

每个谈判者都必须作出决断，到了什么程度小利就不值得再争下去了，那种不择手段的争执会失掉对方的信任。在外行眼里大外交家是狡诈的；而明智的外交家懂得，他不能愚弄对手；从长远的观点看，可靠和公正这种声誉是一笔重要资产。一次再次地

见面的就是那么几个谈判代表，如果一个外交官得到了躲躲闪闪或者口是心非的恶名，就会削弱与对手打交道的能力。但是在苏联的制度中，对于有远见的克制是没有奖励的。因此葛罗米柯往往一上来就先把微小的分歧点分得更细，拿立场的每一点细微更改作交易，尽量索价。他是个零售商而不是批发商。对他来说每次谈判都象是一张白纸，似乎谈判并未举行过，只是刚刚从头开始，既没有对将来提出要求，也没有承担责任。如果说信任感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得建筑在利益的均衡上，而每次谈判都得重新确定这种利益的均衡。

一九七三年以后，我之所以想把莫斯科摒弃于中东谈判之外，一部分原因是地缘政治的，一部分原因是苏联人的谈判作风。我相信，中东外交若想取得进展，取决于较为变通的立场，取决于有关各方在彻底搞清对方谈话内容的法律意义以及心理上的意义之前，不坚持固定的立场。我知道，一旦葛罗米柯牵扯进来，他就会提出某种文件，满篇都是法律条文，然后学究式地逐条讨论。即使苏联人怀着好的愿望（我不能肯定是这样），这条道路也会导致僵局，使最激进分子有了否决权，最终导致爆炸性的局面。

有时葛罗米柯的战术令人嫌恶。他——或者那些作政治决定的人们——偶尔因手伸得太长而失策。我已经提到过，绝对不肯冒任何风险，想要从谈判中榨取一切可能的利益，这使得苏联领导人错过了最高级会谈的机会，一次是在一九七〇年，那时我们的谈判地位较弱，另一次是一九七一年，在我们发布北京最高级会谈的公告之前。一九七〇年假使苏联人作答，他们至少可以使我们对中国采取的主动行动复杂化起来，并能限制我们在中东的行动自由。一九七一年春天，假使克里姆林宫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终止他们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并且公布会谈的日期，它的谈判地位本会大大加强。那样的话，我们国内的长年批评家们和某些克里姆

林宫问题专家们，就会把我们与莫斯科谈判的每一次僵局都归咎于我们与北京接近的政策。由于继续向我们施加压力，克里姆林宫无意中却为我们对北京和莫斯科的外交都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机会。

同时，我逐渐地对葛罗米柯产生了好感并且尊重他了。在他所代表的制度规定的格局内，他是个可尊敬的人。他言而有信，使他赞同一件事固然不容易，但他遵守自己开出的价码，或者，如果不得不改变做法的话，他会显出尴尬的样子。葛罗米柯富有幽默感，尽管他的面目表情冷峻，在起初也不了解美国式的俏皮话。一九六九年九月，总统为联合国大会的各国代表团的团长举行招待会，我和葛罗米柯第一次见面。葛罗米柯走到我跟前说，"你看起来真象亨利·基辛格。"我回答说，"你看起来真象理查德·尼克松。"这使他过了好几秒钟才说出话来，尤其是直到他作了表示，他的随行人员才作出勉强的笑容。到第二年他已经学会了这种风格。在我们商量他从哪个门进入白宫会见尼克松时，葛罗米柯说，从哪个门进去都一样，卫兵都向他敬礼，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畅行无阻，谁能够阻拦总统呢？为了使每个人——尤其是他的同伴——都懂得这是一个轻松的时刻，他发出憨畅的笑声，使人联想起街头的圣诞老人。

一九七二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期间，我们的一部复印机坏了，我深知克格勃是以奥韦尔所说的那种无孔不入的本领著称的，在克里姆林宫内雅致的圣凯瑟琳厅举行一次会谈时，我问葛罗米柯，如果我们把一些文件举到枝形吊灯下面，他能否为我们复印几份。葛罗米柯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不幸的是，摄影机是沙皇安装的，只能拍摄人像，不能拍摄文件。

葛罗米柯最喜欢的口头用语具有双重的以至四重的否定结构，对他来说，"不是不可能的"，是一种强烈的肯定的表示。当事

情变得糟起来时，他的脸上现出一种伤感沮丧的神情，使人不由得生出同情之心而作出让步。但最重要的是，在任何事情上他都坚持他的既定方针，而且利用他所有的一切论据来坚持。一次我们争论一个文件中的不太重要的两段文字，葛罗米柯大声坚持说，各段——所有的段落——的结构应当用逐渐加强的语气，而最后一句语气最强。让他在这一点上取胜之后，我紧接着就下一段文字向他提出了同样的论据。葛罗米柯冷冷地回答说，某些段落应该安排得逐渐减弱语气。我让他选择，他不能两者都要，他选择在这两段中用逐渐加强的语气。

葛罗米柯无疑是跟我打过交道的最有能力的外交家之一。在一个时期，他同时进行几个谈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防止突发战争的谈判，柏林谈判，贸易谈判，还有一些较次要的协议由他主持签订。他表现得很干练，有耐心，有素养，熟练地掌握着所有这些谈判。他没有表现出有伟大的理想，或者提出某种有关世界秩序的令人信服的样板，但他所代表的制度也做不到这一点。他的职务或者他对自己的作用的观念都没有要求他提出最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他有这类份外之举，他也不可能幸存到今天。周恩来，具有一种古代文明的文化优越感，以其含蓄的安详自若态度消融了意识形态敌对的冰障，并且具有一种轻松自如地把握事物核心的能力。但是葛罗米柯缺乏这种自信心。身为一个除了借助于强硬力量之外从未获胜过的国家的代言人，他不得不在每一次冲突中考验自己的勇气。人们很容易轻视他。持续不断地威吓是他操纵谈判的一种精心计划好的手段，而不是他本人性格狡诈的一个标志。在动荡混乱的时刻他保护了自己的国家，他遮掩它的弱点并为它的目标服务。总之，葛罗米柯不是伟人，但是他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而且几乎没有出过什么可以避免的差错。能够得到如此评价的外交部长是很少的。

我最初与葛罗米柯打交道是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在当时那个带有希望的短暂时期，他来到华盛顿。西恩富戈斯事件正式了结之后，美苏关系似乎会改善。柏林谈判和军备控制谈判已经排上日程，中东也凉了下来。最高级会谈从时间到议程似乎已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尽管苏联人九月二十五日的复信把最高级会谈的日期推迟到一九七一年，但据心情急迫的尼克松看来，这未必就排除在十一月份选举之前早日宣布这个消息所带来的好处。尼克松还想确保最高级会谈的计划限在白宫这条渠道之内进行。在他与葛罗米柯会晤之前，他要先与多勃雷宁探讨这些可能性，尤其要保证葛罗米柯在罗杰斯面前不要暴露。从四月份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最高级会谈的事情，国务卿只是在消息公布之前几周才知道此事。

情况很快就明白了，夏秋之际的猜疑和紧张状态对双方都造成了损害。十月十七日与多勃雷宁的初步会谈，彼此的言词都有些尖刻。除了照例列举美国的过失之外，他说葛罗米柯到这里来是为了弄清楚我们是否已决定采取一条强硬路线。我告诉他，葛罗米柯会发现总统准备探求一个更幸福未来的前景。几天以后总统打算在联合国发表一个语气和解的演说。多勃雷宁表示，葛罗米柯准备跟总统商讨最高级会谈的事情。

在跟葛罗米柯会晤之前，就一些基本问题我为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我指出，这次会晤是在美苏关系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敏感时刻进行的。我们必须问问自己，苏联在中东的所作所为、对古巴的军事侵袭、持续不断的加强战略力量以及旨在分裂我们与欧洲人的关系的有选择的缓和政策，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关于苏联领导人的态度，在党代表大会准备期间他们必然要进行的尔虞我诈的斗争，以及苏联领导阶层内部的权力分配，我们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我建议，我们切不可挑拨克里姆林宫内部各派别之间的斗争，我们知道的情况太少，不要促使鸽派和鹰派进行争斗。我们同苏

联搞好关系的最好办法是，我们照料好我们自己的利益，并让苏联确定他们自己的利益。总统上任不久，还不可能取得根本性进展，然而我们应当向对方讲清楚，为了单方面的利益而不断施加压力，并以频繁的努力利用多事地区谋取私利，是不可能取得进展的，而这正是近来苏联政策的特征。

参加葛罗米柯和尼克松十月二十二日会谈的有罗杰斯、我和多勃雷宁（还有双方的翻译人员）。葛罗米柯的抱怨与多勃雷宁在十月十七日所概括提出的相同。尼克松——部分是由于他希望最高级会谈仍有可能举行，部分是由于他本人的作风——以更一般的方式给予了反驳，强调了寻求共同点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贸易方面。这次会谈对中东、柏林、欧洲安全和越南诸问题作了一番回顾。葛罗米柯没有提出新的东西，尼克松也只是重申了美国的立场。会谈的气氛相当诚挚，但在实质性问题上并无转机。

在会谈快要结束时，葛罗米柯提出了尼克松热切盼望的问题：有关最高级会谈的想法。葛罗米柯以他惯用的双重否定方式承认，总统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跟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没有不一致之处。他建议把会谈安排在一九七一年四月某个时候，地点在莫斯科。尼克松为了国务院作记录起见，假意把它看作一项新的意义重大的提议。尼克松同意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这件事的确极易受到误解，因此，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决定不应当泄露出去，让不留意的公众和国会感到突然。因此尼克松建议早日公布这个消息。葛罗米柯之所以当了近十五年的外交部长，决不是因为他无条件地白送别人东西。他想利用最高级会谈的前景，在苏联关心的问题上——例如柏林问题——进一步对我们施加压力。葛罗米柯表示反对。他根本没有暗示过，应在一两天内就宣布最高级会谈的消息。他将于十月二十九日返回莫

斯科。此后不久，他们就可以商定发表公告的时间。尼克松不想在很多人面前继续谈这个问题，提出要葛罗米柯到总统办公大楼他的休息室去坐。在那里可以避开椭圆形办公室的那群人，他对葛罗米柯说明，有关最高级会谈的一切准备工作都由多勃雷宁和我去商谈。

第二天，尼克松在联合国发表了以美苏关系为核心的重要演说。正象我已告诉多勃雷宁的，尼克松虽未缩小彼此间的分歧，但演说的基调是和解的，抱有希望的。尼克松强调了我们经常谈论的一些主题思想：在核时代，利用紧张状态以谋取单方面利益的传统作法是极为危险的；美国希望从对抗的时代转向谈判的时代，我们准备在互惠的基础上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莫斯科可以在对抗和谈判之间作出选择；而尼克松的强烈愿望是选择后者。

那天尼克松派我去见多勃雷宁，——他正在纽约陪同葛罗米柯出席联合国会议——就最高级会谈的公告再作一次试探。我告诉多勃雷宁，我们想在十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从圣克利门蒂发布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消息。人们不必十分精通美国政治就能懂得，这个相当明显的策略跟我们的国会选举关系密切。多勃雷宁立刻预先讲明，通讯联系工作很差（对一个超级大国来说，这种说法是令人惊讶的），而且作出决定也是缓慢的。但是最后他的态度缓和了，他答应向葛罗米柯和莫斯科报告，以便尽快作出答复。

与此同时，尼克松在联合国要求和解的演说很受欢迎。十月二十四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把担子加到苏联人身上："总统对当前美国外交的基本思想作了阐述，我们为他可信赖的、高水平的呼吁喝彩叫好。我们敦促莫斯科的领导人作出同样的反应"。十月二十五日的《纽约时报》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说莫斯科对尼克松提出的新问题的反应，"不仅对于缓和而且对于未来的世界和平都是关系重大的。"

然而关系并不是注定会如此戏剧性地得到改善的。小的争端好象会自发地出现，而把事情弄得不愉快起来。先是在十月二十一日，两个美国将军驾驶的一架小型山毛榉号飞机在土耳其苏联边境上空迷失方向，在苏联领土上降落。这两个倒霉的美国军官是无意中犯了一个过错，这一点没有争议，然而苏联领导人不仅对送上门的礼物横加挑剔，而且还在考虑只有立即付出代价才能释放他们。多勃雷宁奉命提出释放犯罪的苏联间谍伊葛尔·伊万诺夫的问题。用两名与间谍活动毫无关系的美国将军来换一名犯罪的间谍，这个主意是令人愤慨的，特别是多勃雷宁知道美国正在考虑释放伊万诺夫。然后在十一月份，一个立陶宛海员西玛斯·库德尔卡企图从苏联拖网渔船上逃到美国的海岸巡逻艇上，其时美苏渔业谈判正在距马萨诸塞州海岸不远的某处进行。那个呆头呆脑的海岸巡逻指挥官允许库德尔卡上了巡逻艇并把他带了回来。这件事使我和尼克松怒不可遏。但是在任何高级官员知晓此事或者能够干预之前，事情就早已结束了。（后来证明库德尔卡有资格申请加入美国籍。在福特总统私下为他向勃列日涅夫说项之后，他被允许移居到美国。）

然而苏联回避问题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此。尼克松寻求早点发布公告的动机太露骨了，也太富于政治色彩了；苏联人没有看错，从外交的观点来说，尼克松的做法是不合时宜的。在柏林问题解决之前，政治局是不想举行最高级会谈的。而且它还担心，一旦商定进行最高级会谈，我们就会由于没有足够的刺激力而不再前进了。苏联人踌躇不前的另一个原因、而且可能是决定性的原因，是苏联领导集团内部关系尚未定局。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联是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三驾马车掌权，直到一九七一年相当长时间内，所有我们同苏联的最高级的信件往还都还是同柯西金进行。在党的代表大会临近之时，勃列日涅夫

明显地占了优势，但我们仍推测总理柯西金将以主人身份接待尼克松。当尼克松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提到柯西金的名字时，葛罗米柯并未表示异议。在莫斯科就它内部的人事排出一个先后次序之前，政治局将会小心行事，不会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拿内部的团结来冒险的。

最后对于在欧洲的有选择的缓和，苏联人还继续充分利用一切可乘之机。通过缓和与西欧盟国的紧张状态，同时对我们继续执行强硬路线，莫斯科希望促成西方联盟的分裂。由于指责我们造成紧张局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可能被弄得象是在欧洲谋求和平的一个障碍，从而把对美国的友谊变成一种危险的根源，而不是安全的保障。有选择的缓和政策是促使欧洲中立的一招。

葛罗米柯—尼克松会谈后五天，多勃雷宁就早日发表公告的提议给了我一个答复。它重申苏联对最高级会谈的愿望，赞同总统关于最高级会谈必须认真准备的主张。多勃雷宁和我应该立即就这个问题着手工作。作为这些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访问的日期和一个适当的公告当然可以讨论。但是十月三十日发表公告显然太早了。苏联领导人对尼克松害怕消息泄露出去的担心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有关最高级会谈的讨论，不可能出现这种危险。苏联人用这种略带轻蔑的方式回避了尼克松的提议。

然而，如果苏联领导人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的话，那他们就估计错了。没有我们的合作，他们不可能完全实施他们对德国的政策。因为柏林问题不解决，德国议会就会拖延东方条约的批准，而我们使柏林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关系的改善。几个星期以后，克里姆林宫开始认识到它的有选择的缓和的战略也不起作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中旬，苏联突然面临它自己后院的一场骚乱的危险。

波 兰 暴 乱

一般人总认为产生革命的条件是由于绝望而不惜冒险。而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的激变是在境况似乎要改善时发生的。关于这一点，自托克维尔*以来就为人们所理解了。被彻底践踏的人们往往过于懊丧而不能起来反抗。当政府变得过分自信，当民众感到有某种活动的余地以及某些发展证实了这种期望的时候，发生剧烈变革的可能更大。

在波兰，情况正是这样。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勃兰特承认了波兰的新边界，并且放弃了收复奥得—尼斯线以东领土的要求。为了签署条约他到华沙去，跪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纪念碑的前面，并对奥斯威辛进行了令人感动的和历史性的访问。波兰党魁W·哥穆尔卡正确地估计到，与波恩签订的这个条约将会缓和波兰人民长期以来对德国收复土地的恐惧。但他错误地认为，他能够利用这种新树立的声望医治波兰长期的经济弊病。波兰极无效能的工业增加了产量，但是大量积压了不需要的产品。到一九七〇年，他们库存产品总数竟达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这样的惊人数字。连续两年歉收后，除了出现食品危机外，还加重了消费品的短缺。失业加剧了紧张状态：一九七〇年初，二十万"过剩的"工人被解雇。这些因素合起来，使波兰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〇年在东欧各国中实际工资的增长率最慢。

十二月十三日，波德条约签定之后才一个星期，波兰政府就把肉食品的价格提高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三。骚乱的最初信号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格但斯克。工人们的抗议活动引起了暴

---

*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一八〇五——一八五九年)：法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以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和法国大革命著称。——译者

动，蔓延到邻近的两个城市：索波特和格丁尼亚。到了十二月十五日，格但斯克的船坞工人向共产党的总部进军。两天之后，不得不使用坦克来镇压什切青港口的暴动。十二月十八日，示威活动蔓延到卡托维兹这个矿业城。十二月二十日，爱德华·盖莱克接替哥穆尔卡任党的总书记，他告诉人民说，骚乱起因于“经济政策方面的轻率观念”，“我们将清除这种观念。”十二月二十三日，波兰议会任命彼得·雅罗谢维奇为总理，接替约瑟夫·西伦凯维兹。新总理立即下令食品价格冻结两年。

这些戏剧性的事件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难题。最紧迫同时也是成为美国政府讨论焦点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苏联对波兰骚乱实行军事镇压，我们能作何种反应。不幸的是，战后近三十年的历史使人确信无疑，我们进行军事干涉的能力有限；应变研究确认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预先阻止苏联的镇压，那么我们就没有多少办法解除镇压。

跟我对一九六八年捷克危机的看法相反，我深信苏联会很不愿意对波兰这样一个幅员广大和重要的国家实行军事占领。波兰暴动的最为重要的一个侧面是，苏联将从中吸取一些教训。苏联的政策一直是寻求促使西欧脱离美国。然而当其鼓励一种更为民族化的德国政策时，苏联也在东欧引起了类似的民族化倾向。波兰跟波恩在双边基础上的协议，解决了波兰民族外交政策的一个问题，这样就促使波兰政府在民族的基础上缓和其国内矛盾，从而使苏联面临着它的东欧帝国的离心倾向。我认为波兰暴动将驱使莫斯科接近美国。十二月二十日，我给总统写了这么两段话：

苏联领导人还可能倾向于相信，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在东欧产生了不安定的效果。例如，他们可能认为是波德条约使哥穆尔卡得出结论认为可以把不得人心的价格强加在民众身上。因此，莫斯科有可能使它跟波恩的关系暂时

停顿下来……

同时，由于与波恩至少是暂时放慢缓和的进程，苏联领导人要想保持缓和的某种前景的话，就可能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同我们改善关系。

因此，到了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中旬，在我看来，我们与莫斯科之间的谈判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事实上我们处于尼克松就任总统以来最强有力的地位。西恩富戈斯和约旦危机已经过去，我们表现了顶住压力的决心；莫斯科已经体验到它的东欧领地的脆弱性。而且我们还握有克里姆林宫尚不知道的一张王牌：大约十天之前，我们第一次直接收到中国领导人的来信，提议举行高级会谈。

在提出我的备忘录以后，我跟总统就形势问题作了几次广泛的交谈。我对他说，检验多勃雷宁和我这条渠道的时刻已经到来。我推测苏联人可能愿意在一些谈判上打开僵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柏林谈判，因为前者影响我们的国防预算，而后者将考验西方联盟的内部团结。

我说，我们又将照例面临着国会对国防预算的一年一度的攻击，攻击的主要对象是反弹道导弹，而反弹道导弹正是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主要筹码。因为在以前的历次战斗中那些同样的势力正在动员起来；正在安排同样的人物据守营垒，进行对抗，而对抗本身就成了他们的目的。每年委派的科学与学术界的代表团在国会听证会上出现，他们全都反对反弹道导弹，理由是它既没有用，并且危及战略上的稳定。一再的重复仍未能澄清，这两种批评意见怎能同时有效。为首的参议员们将会接受这种号召，提出决议案来支配我们的部署或谈判姿态——这是越南问题的综合症扩及一切政策领域的表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每两周一次的社论随声附和。我们的防御计划将首先被政府削减，以防止国会的攻击；然后又被国会削减，以维护它的特权，并实行各种和平

团体一再卖力鼓吹的神话，即只有国会把我们的军事机构弄得软弱无力，我国的政府才会负起责任来结束越南战争。同意苏联人的意见或者接受国会施加的压力，无论是哪一条，我们都将趋向于单方面放弃反弹道导弹。

但是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不可能再促使苏联停止增加进攻性武器。这就是总统和我坚持试图以我们限制反弹道导弹来冻结苏联进攻性的军事部署的原因*。国防部不仅支持这个提议而且敦促实现这个提议。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我极力请求总统就这一问题开始谈判；如果我们不谈判，国会的压力就可能使我们对苏联不断加强战略力量无能为力。

关于柏林问题，我对总统说，我认为，德国议会将要求达成一项协议以作为批准勃兰特总理同莫斯科的条约的代价。而达成协议需要我们认可，因为我们是四个占领国之一（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而且很可能需要我们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才能成功。我们的举足轻重的作用遏止了德国东方政策的民族主义暗流，并且迫使苏联人寻求我们的支持。在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我描述了苏联面对的问题：

苏联人可能相当担心，当其西方政策毫无眉目之际——柏林问题没有进展，德国条约的批准尚无动静，从西德得到经济援助的前景暗淡——他们不能如期在三月份召开党代表大会，而对这些日趋复杂的问题，我们却掌握着解开死结的钥匙。

同时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改善柏林的生活：使柏林居民振作精神，尤其是要消除苏联人在这个问题上长期进行讹诈的借口。不幸的是，柏林谈判陷入官僚政治和死抠法律条文的错综复杂的迷

---

* 冻结攻击性武器制造的正式提议当然是适用于双方的。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新的部署，我们能够承诺在五年之内予以冻结，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在谈苏联冻结的问题。

宫。每个提议都得通过那个麻烦的四国机构——顺便说一下，这个机构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排除在外，而谈判的结果却对它影响最大；西德的官员只参加盟国协商小组的会议。每一项建议都要经过每个国家的政府内部磋商，已经很困难了，然后还要经过西方几个国家之间的商讨，最后再同苏联人谈判，进展就象冰河运动似地缓慢。每一点改动要经过几个星期的争论，能够理解的只有几个律师，他们奇异的专业竟是研究一个神秘的主题，即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协定及其后的法律上的演变史。

这个谈判对于我们来说尤其复杂。一方面，我们只有准备长期僵持下去，才能做到改善抵达柏林的通路，并且把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纳入多边关系的结构之中；这就会使苏联人明白，他们比我们更需要一项柏林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除非能够巧妙地处理这个问题，长期僵持下去，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又会严重地危害美国与西德的关系。我们会变成代人受罪的孩子，勃兰特会责难我们阻碍了他的政策；而他的反对派又会指责我们使他离开前线走得太远了。如果发生另一次柏林危机，责任就会落在我们头上。苏联外交官经常对我们说，法国和联邦共和国对柏林问题进展缓慢责备我们。尽管苏联人的意图很明显，是要在我们之间散播不和的种子，然而这个说法却的确含有合理的内核；我们的盟国不是不可能把苏联人的愤怒转到我们头上，特别是法国，似乎很愿意接受苏联人的追求。

勃兰特的心理状态在十二月十二日写给尼克松的一封信中表露了出来。他催促加速柏林谈判，同时也含有批评的意思。勃兰特建议，会谈应“不断地举行会议”。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只有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防止柏林谈判失去控制；任何其他的立场或者可能造成危险的让步，或者就可能造成柏林危机。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这一点比巧妙地掌握具体的谈判更为重要，那就是想要检验

互相克制的政策是否行得通。在所有动乱和危机的过程中，尽管我坚决地防止苏联人得到地缘政治上的好处，但我仍感到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有责任探索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无论前景是多么不妙。每个政治领导人都应对他的人民负责，表里如一地尽最大的努力使人类避免一场大规模的核屠杀。怀疑论者担心，这样一种政策是蒙蔽自由的人民，使他们看不到危险，从而削弱他们防卫自己的决心。反对越南战争的人促使我走向相反的方向。某些极端分子利用"和平问题"来破坏政府的信誉，甚或破坏我们这个社会内部的团结。不能任凭他们胡作非为。假使我们要抵抗苏联的扩张主义，我们反而必须表明，我们是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之后才这样做的。而我过去坚持、今天仍然坚持这种信念，自由的人民能够做到两点：依靠强大的防务以求得安全，与此同时又要探索模糊的和平前景。的确，如果他们不能追求这两个目标，那就一个目标也达不到。

长期以来我就感到，国际上一个平静的时期定会使苏联面临的问题比我们要多，因为苏联内部的团结部分是靠经常宣传外来的危险来维持的。我深信，长期的和平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比在工业化民主国家里会引起更多的离心倾向。经济的停滞、民族的纠纷和持不同政见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地消耗苏联的力量。当中国变得更为强大以及日本完全愈合了战败的创伤时，苏联的地缘政治的前景将会变得更加成问题。时间不一定是对苏联有利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给尼克松写了关于波兰起义的备忘录之后两天，我与多勃雷宁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开始试探苏联领导人是否可能准备进行严肃的谈判。我重申了我们的看法，莫斯科近来的政策是跟改善关系不相容的：西恩富戈斯的骗局以及随后试图考验我们对这一事件忍耐的限度；苏联人在中东问题上的步步进逼；对柏林走廊的骚扰和推迟释放两个迷航的美国将军，需要作

出一个根本性的决定。如果这种讨小便宜的政策继续下去，小伤痕就要变成大创伤；怀疑将使联系中断而发展成一场危机。但有可能建立一种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我建议，利用我们这条渠道在严格的互利基础上解决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的会谈应该能够产生不是互相对骂的某种效果。

由于多勃雷宁没有接到指示，他只能以和解的姿态把苏联的既定立场概述一下。但他同意，有必要打破坚冰。他要我确信，他的政府是赞同与美国达成一项谅解的。他同意我们双方应审查谈判的纪录，以便找出可以灵活处理的一些方面。

一月六日，多勃雷宁在我的白宫办公室里留下一份关于柏林问题的照会，当时我和总统一起在圣克利门蒂。照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在表示不满中包含着作出让步；跟私下交谈时一样，葛罗米柯也擅长于把双重否定结构用于外交信件中。这一回他抱怨说，美国没有履行据说是尼克松跟葛罗米柯会谈时所许下的诺言。尼克松曾说过，在柏林问题上，美国不能够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了，除非苏联人承认柏林与联邦共和国之间的脐带关系。与此同时，莫斯科的照会中有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你可以解释为承认脐带联系，但又不说明这种联系的性质，或者苏联人负有什么责任保证这种联系受到尊重。葛罗米柯的照会暗示那种说法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让步，开辟了同时谈判“作为一揽子解决的……一切问题”的可能性。苏联人心里明白，尼克松的那句话是一种打比喻的漂亮话，政府首脑往往用这种办法来避免在执行问题上纠缠。但无论尼克松的意图是什么，——尼克松的基本动机是，在谈话中掠过柏林问题而不作任何许诺——多勃雷宁的照会却转弯抹角地表明，他们正准备改变他们的立场。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坚持，柏林谈判的焦点是减少西德在那个城市里的活动，以此来换取几乎只是确认现有的地位。现在他们暗示，愿意改变立场，谈苏联对柏林通路的保

证和改进柏林生活状况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就有可能进行认真的谈判了。

我向尼克松建议，我们要作出积极的答复，坚持要苏联人作出关于柏林通路的保证并明确规定西柏林的法律地位。我还建议，把柏林谈判跟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展联系起来；我们还要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决于苏联人愿意冻结它的进攻性武器。尼克松赞成我的意见。多勃雷宁被召回莫斯科进行紧急磋商。这可能意味着由于一场危机迫在眉睫，苏联领导人想要脱离接触，或者是他们希望对某种询问避免作出答复，也或者是他们的确是在对政策作认真的回顾。这一次，最后这个假设更加合理。多勃雷宁推迟二十四小时离开华盛顿，以便能够得到我们对其关于柏林问题的试探所作的反应。

我从圣克利门蒂回到华盛顿。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上午，多勃雷宁和我在苏联大使馆里会面。两个小时的会谈是关键性的。我就那两个已经尼克松原则上同意了的主题提出了新建议。首先是我们关于柏林问题的回答。我告诉多勃雷宁，为葛罗米柯同尼克松之间的谈话作抽象的注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想要苏联作两件事：第一，改进往西柏林的通行情况；第二，苏联对新的通行办法作出保证。我们不想使柏林的自由全靠东德政权发善心，而对东德我们很难施加影响。如果苏联人明确了这两点，我们将更直接地参加柏林谈判。我们将通过总统这条渠道进行探索性的会谈，如果会谈顺利，就将会谈的结果提供给已经建立的四国机构。这样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与西德官员磋商；没有波恩的预先认可，我们将不同苏联人达成任何谅解。我在以后的谈话中说明，我的提议是为了提供一个机会，使谈判加快速度，而不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让步。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我提议打破把反弹道导弹和限制

进攻性武器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上形成的僵局*。我告诉多勃雷宁，我们将接受苏联方面关于谈判一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建议，条件是苏联人要同意立即开始限制进攻性武器的谈判；这两个谈判将同时结束。限制进攻性武器将包括承担一项义务，即任何一方不得在谈判进行期间构筑以地面为基地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新设施。以后我们还将提出关于潜艇发射导弹的新建议。这些建议的结果可以在总统与柯西金交换的信件中表达（我们还以为柯西金是尼克松的对话者）。

我所提出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柏林谈判的建议，是摆脱那个臃肿的四国机构的一个简便的办法，因为这个机构很可能造成僵持局面，并且肯定会引起公众的尖锐批评。任何成功的谈判都必须建立在一种相互均衡让步的基础之上，但如何达到这种均衡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作出让步的先后顺序是关系重大的；如果在对方相应的让步明朗化之前，自己一方坚持一步不让，而不是把每一让步作为全局的一部分来看，那么谈判就可能失败。因此，当谈判还处于酝酿阶段的时候，保密是很重要的。卡特政府已经懂得了这一点，他曾努力搞公开的外交，结果却使几个大有成功希望的倡议都告吹了。速度往往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每个谈判都会达到一个关键时刻，这时谈判或者急转直下而成定局，或者就停滞不前陷入僵局。正是在这种时刻最高当局必须亲自过问，以克服官僚机构的麻木不仁。我向多勃雷宁提出了办法，也提出一定要保守秘密和加快速度。

多勃雷宁问了几个深入的问题。在他提问的同时，他还试图使中东问题来一个突破，但是我阻止了他；我认为条件还不成熟。

---

* 不象某些报道说的那样，一月九日总统不曾给勃列日涅夫写信，也没有跟多勃雷宁会面①，而是由我提议在总统的批准下，通过总统渠道和多勃雷宁联系的。（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的首次通信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

这时多勃雷宁不再有错觉了，他已充分理解了我的意图，柏林谈判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要一先一后进行。我也对苏联的制度有了足够的了解，可以确信，当苏联的领导人想要去做的时候，他们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多勃雷宁答应尽早答复；我确信他会信守这个诺言。

不到两个星期，多勃雷宁就回到华盛顿。一月二十三日，他来到白宫的筹划室，兴致勃勃地畅谈起来。他说政治局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我们的提议。他见到了所有的最高领导人，而且他可以告诉我，现在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条件好极了。（事实上，我在一月九日并未提到最高级会谈。多勃雷宁无疑是想利用尼克松想要一鸣惊人猎取声誉的渴望来捞到某些好处。）苏联人愿意在七月份或八月份举行最高级会谈，而九月份也是适宜的。当然必须首先取得某些进展。但现在每个人都很乐观。多勃雷宁表达了苏联人关于相互联系的想法以后，把话题转到我们一方的想法。苏联领导人对我愿意参加柏林谈判感到高兴，勃兰特和巴尔曾经对他们讲过，在所有的美国领导人中，我对德国的情况了解得最清楚（这倒可能是真的；同时莫斯科一定作出了决定，利用我的虚荣心不会有什么坏处）。虽然正式的看法要到会谈实际开始时才能提出，但多勃雷宁现在就告诉我，关于苏联对柏林通路提供某种保证的建议正在莫斯科认真地研究。如他所述，事情已很清楚，要求迅速达成柏林协议的压力是在苏联一边。莫斯科已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柏林协议，它将决不会得到它所珍视的东方条约；它将要为此付出代价。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多勃雷宁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答复。然而，莫斯科很有可能接受那个想法，即把一项防御性条约和冻结进攻性武器结合起来进行谈判。他提出了一些实际问题。一个既困难又麻烦的问题是：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提出或向国会提出的关于反弹道导弹计划的许多方案，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哪一

个。我只能含混其词的说，我们还没有作出决定；这是属于这样一种情况，即真象如何，不一定多讲。苏联人想从以下三者之间弄清我们的立场是不容易的：我们国会的立场（建立三个发射场以保护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正式提议（对全国指挥机关即在华盛顿和莫斯科部署这种导弹），我们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者的私人信念（要求全部禁止这种导弹）。我对他讲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与柏林谈判步调一致。

苏联外交官总是没完没了地提出一大串建议。那种理论似乎是，让你弄不清什么时候那位对话者才会由于心不在焉或者疏忽大意而作出一个让步；莫斯科领导人似乎最低限度也要获得具体证据，证明它的代表并不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我把多勃雷宁所有老一套的提议——其中欧洲安全会议和中东问题在他的目录单上居于首位——都反驳掉以后，我们商定，一旦我把适当的谈判程序安排就绪就举行定期的和系统化的会晤。

这样，我就参与了这两个像神学一般复杂的谈判。柏林谈判涉及其他三个盟国的重大利益，也涉及苏联和两个早已建立的论坛。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正式开始，轮流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举行，下设许多复杂玄奥的技术性和实质性的委员会，其中有些委员会由我任主席。若不兢兢业业、谨慎从事，其结果可能是闯一场大祸。

渠道已经沟通

到一九七〇年底，我与尼克松共事差不多两年了；我们几乎每天都长时间交谈，并以最密切的合作度过了所有的危机。他越来越倾向于把对外政策的策略问题委托给我。在我们共事的第一年中，在每次会谈之前，比如说与多勃雷宁或北越人的会谈，我总是事先拟好谈话要点，呈交尼克松批准，然后再去会谈。我提出的谈

话要点他很少改动，但也很少不加几句强硬的话作为告诫。到一九七〇年底，尼克松不再需要这样的备忘录了。他总是同意我的策略，经常是口头表示同意；他几乎从不去干涉这些策略的日常执行工作。每次谈判会开过之后，我都提出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和分析，这样尼克松就有机会判断他的意图是否得到贯彻。但据我回忆，在一九七一年以后，谈判方针一经拟定，尼克松从未作过改动。我知道尼克松想要做什么，因为策略是我们共同制定的。他认为，一个乐队指挥没有必要去演奏每一样乐器。

但是，如果说我能肯定尼克松在支持我，那末对于政府中其他成员我就如履薄冰了。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中，进行任何谈判都是冒险，那些局外人总是断言他们能做的更好；而参加谈判的人越少，讲这类风凉话的人也就越多。他们没有参加谈判中彼此迁就的过程，尽可以大唱其高调；他们不了解谈判中出现的障碍，把每一个让步都指责为不够强硬，或者说是谈判手腕不高明。我制定的谈判程序加强了果断性，但因此也更难于取得大家的一致同意来支持谈判的结果了。

然后就是熟悉谈判主题的问题。我的工作人员太少，无法帮助我同时进行两方面复杂的谈判。我采取的代替的办法是抓部际机构。这样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官僚机构而不泄露我们的意图。我对它们说，那是计划中要谈的问题，而实际上却是正在秘密进行谈判的问题。我用这种方式可以了解到这些机构的看法（同时也了解必要的背景），而无需向它们正式“说明”我的立场。我对多勃雷宁的提议通常反映官僚机构的一致意见，很可能比正式谈判要采取的立场更强硬一些。这是因为，在各机构参加的讨论计划的会议上，通常总是提出更为强硬的路线，这样做可能得到警惕性高的声誉而不冒风险；为谈判作准备工作，调子就不可能那样高，因为总有某些机构为了既得利益而希望谈判成功。

采取这些异乎寻常的做法之所以必要，主要是因为总统既不相信他的内阁也不愿对他们直接下达命令。尼克松怕泄露机密，也不敢强制实行纪律。但他决心要实现他的目的；因此他鼓励那种政治教科书上不会赞成的做法：像螃蟹似地不声不响地绕着现存的机构走。这使官僚机构感到懊丧，它们由于被抛在一边而大闹独立性并自作主张，而正是由于官僚机构的这种作风才使尼克松绕过它们。但这个办法成功了；它居然难以想象地把大量艰苦的准备工作与干脆明确地阐明观点结合起来了，而这正是一项成功的政策所必须做到的。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用这种办法实现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突破，打开了对华关系，达成了柏林协议，举行了北京和莫斯科的最高级会谈，都没有遇到任何挫折。结果应以其功绩来衡量，虽然我也承认取得这些成绩的方式是付出了代价的，而且我也不认为这些办法应该重复使用。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行正式的谈判需要有定期的正式的总统指示。因此，我能了解到各机构在务虚阶段以及关于实际谈判的看法。很明显，在政府内部要求单独达成反弹道导弹协议的压力越来越大了。出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代表团中的几个成员明确表示赞成这样做。国防部的代表似乎赞成把单独达成反弹道导弹协议与冻结重型导弹联系起来，任由其他一切类型的导弹自由发展。杰勒德·史密斯赞成禁止反弹道导弹或者只对两国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而以对方限制某种类型的进攻性武器为交换条件；但这种把它当作谈判筹码的做法很难说服国会接受任何反弹道导弹计划，因为这样我们就可能必须拆除某些设施，而国会不急于在这方面花钱。国务院倾向于单独达成反弹道导弹协议，但又不愿积极要求达成协议。简而言之，如果我把反弹道导弹条约与冻结一切战略导弹联系起来搞成了的话，我就保险不会遭到官僚机构的反对，因为我所争取到的东西比任何机构要求做到的东西要多。

柏林谈判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柏林危机，其法律地位已经固定下来了，再加上受到传统和来之不易的协商一致意见的限制，单凭总统的决定是无法加以改变的。我们的政策必须与三个盟国共同制定，任何一方都不会由于先前指责我们采取拖延立场而不责难我们现在过于灵活。

没有勃兰特的充分支持柏林谈判是无法进行的，因此我必须会见勃兰特的私人顾问埃贡·巴尔。但到了某个时候，与苏联人的会谈结果最终还得由四国开会来讨论。因此我也需要我们驻波恩的大使肯尼思·拉什的合作，按照职权他应代表我方参加正式的柏林谈判。

拉什是凭个人的勤奋擢升为大使的；他最后一个重要职务是任碳化物联合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尼克松对他有所了解是因为他曾在杜克法律学校任教，虽然他那时不曾见到尼克松。他是约翰·米切尔的密友，其时米切尔任司法部长。事实证明，他是尼克松任命的最得力的人之一。拉什头脑冷静、有分析能力、思想深刻，他机智巧妙地完成了他在波恩的复杂任务。

巴尔的问题跟我完全相同。他也要在不让外交部知道的情况下掌握谈判。德国有长期的官僚主义传统，他要在波恩完成这项任务比在华盛顿更为困难。看来没有任何正常的联系渠道是十分可靠的。巴尔也找不到借口来华盛顿，任何借口都会重新引起前些年那种司法上的争论。国务院会坚持要求参加任何谈话，德国外交部也会要求他提出报告。为了避开这些问题，一月二十七日我派了一个信使去波恩，带去我个人给巴尔和拉什的信件。我告诉巴尔，我们已准备接受总理的建议，加速柏林谈判的进程，因此迫切需要他和我会见。我期望他能作为总理的全权代表到华盛顿来。至于他此行的公开目的，我已指示信使转达副总统（作为航天委员会的负责人）的邀请，请他来参加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一日阿波罗

14号登月飞行的发射典礼。如果巴尔接受邀请，我也出席典礼，然后我将安排他飞往纽约，我们就可以在飞机上商谈了。巴尔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启程来华盛顿。我在华盛顿避免和他见面，而是在一月三十日飞往肯尼迪角的途中和他会面。

给肯尼思·拉什的信也是由那位信使递交的。为了给拉什来华盛顿找到一个理由，我安排他的朋友约翰·米切尔给他打了个电话。米切尔找了个借口说要与这位大使讨论行政任命问题。于是国务院批准他前来"商谈"。我就于二月三日晚在华盛顿水门米切尔的公寓见到了拉什，那时这所综合公寓还很少为人所知。

我通知多勃雷宁，我已在进行工作（他的政府通过巴尔肯定也会知道的）；我还说，莫斯科也许想要讲些什么，使所有参加的人都有一种信任感。出我意料，多勃雷宁在二十四小时内就露面了，提出了一个苏联以前不肯提的建议。苏联曾经坚持，有关柏林通道的程序问题仅仅与两个德国有关；而每当出现麻烦的时候，我们总是依靠国际法的正常手续与东德打交道，由于我们甚至还没有承认东德，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实现我们的要求。在这之前，苏联人一直企图利用柏林的不稳定的局面来提高东德的国际地位，同时否认自己对柏林通道的骚扰负任何责任。现在他们提议，对任何有关柏林的新安排，四国中的每一国对于违反规定的事件都有权提请其他三国注意——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暗示，虽不能令人满意，但意思是说要由四国共同负责。这只是一个试探性的步骤，是朝着主要由苏联提出保证前进的。但任何熟悉葛罗米柯的策略的人都会知道，他是决不会一开始就采取一种十分慷慨的立场的。

我和巴尔玩的这个花招很有效，一月三十日我们按时到达肯尼迪角参观登月火箭发射。以前我总以为观看宇宙火箭发射主要是孩子们的事情，但这次在月光下我们一小群人参观"土星五号"火箭，使我很有感触。火箭起飞过程中，我们从数英里外望去，那火

箭孤悬空中，周围全无支持，却也并非巍然壮观。但那时已近深夜，它的庞大却使我们感到极为渺小，它本身的意义也使我们感到羞愧。

我知道曾经有过一场关于空间计划是否有用的辩论。早先那种探险的想法逐渐淹没在为国家争名次、比先后的吵闹中。但我考虑，我们是需要一个空间计划的；抛开科学上的理由不说，这是因为，一个社会如不能开阔视野，那就很快会变得心地狭隘。那种认为先解决地球上的一切问题然后再去其它星球探险的论点会限制我们永无止境的追求。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没有问题；除非人类不断地扩大眼界，这些问题就会变成烦恼而不是挑战。如果十五世纪的欧洲奉行那种首先必须解决本身问题的肤浅口号，哥伦布就不会发现美洲。那些问题就会反而变得无法解决，而欧洲将会窒息在其本身的混乱之中。信仰使人们有勇气去经历人间的千辛万苦。在这个技术专家治国的时代，人们应该怀有怎样的梦想呢？信仰曾经使小农社会建造尖顶直指云天的大教堂，建造经历几世纪才能完成的雄伟大厦，体现了人类坚韧不拔、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怎样使一个民族重新获得这种信仰呢？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宇宙空间能发现什么；月球只是我们迈出的微小的第一步。我记得一个宇航员曾告诉我，当他最后进入太空舱等待起飞的时候，是他最感到神秘恐怖的时刻。没有工作人员伴随这还是头一次。万籁俱寂，他知道他就要被发射到空间去进行一次宇宙航行了，能否回来不能凭自己的意志。这时他几乎恐慌了。

那时我和我十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和八岁的儿子戴维站在肯尼迪角，周围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沉寂，我觉得我们的心境是不会一样的。从主观上说，他们将要生活的世界与我所生活过的世界不同。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也不同。我在儿童时期只知道有国界，宇宙空间超出了我的想象能力，电视也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更无拘

无束，但也更讲求实际。我小时候地平线就是最远的地方，他们则不然。看来似乎很矛盾，他们了解实际的东西多了，想象力却贫乏了。我们这一代人是书本教育出来的，书本强使读者进入自己想象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天天展现在电视屏幕上，他们认识事物是一个被动的过程。然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亿万英里的航程决定于一瞬间的推动力，此后航程基本不变——这种概念超出了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时的想象能力。

不管怎样，我认为我现在是那种有权提供原动力的人，把未来几代人送上并非由他们选择的旅程。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错误的，哪怕再熟练的驾驶员也无法纠正。我们的责任是找出一条轨道通向谁也没有到过的世界，但也有飞向太虚幻境的危险。我们最重要的决定是航程是否开始，我们最需要的品质是确信通过负责的行动能够局部地创造未来。

正当发人深思的宇航员飞向月球的时候，巴尔和我掉头飞回纽约，在星式喷气机的密室里一路上畅谈柏林问题。巴尔赞成加速谈判，并对我愿参与其事表示很高兴。但作为各自政府首脑的代表，我们怎能在自己的外交部长不觉察的情况下进行重大的谈判呢？我们又怎能防止苏联人在西方四国之间挑拨离间呢？我知道巴尔与苏联外交官有密切的接触，因而坚持双方在有关柏林问题上与苏联人或东德的每一次接触都要互通消息。关于其他问题，我们商定了一个复杂的协商过程。巴尔和拉什就三方面的问题拟出建议——柏林通道的程序、提出保证以及联邦共和国在柏林的活动——并试探盟国的反应，然后我拿这些建议与多勃雷宁仔细研究，再后来是由拉什或巴尔纳入正常的渠道。在种种不利条件下，这盘三人象棋居然下成了。我们在七个月内完成一项协议，而且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同肯尼思·拉什的工作安排是在二月三日晚我们在约翰·米

切尔的公寓会见时决定的。拉什同意，由于具体时间限制，也许没有别的办法行得通。如果僵持局面拖得太久，勃兰特也许要想办法自行其是，而把德国未能实现民族愿望归罪于我们，也许还会制定一条新的更加独立的民族方针。拉什怀疑，当越南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我们能否应付一场柏林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内部的骚乱。

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建立一条联系渠道。当然中央情报局是可以利用的。可是拉什认为，情报站的站长不可避免地要把他某些部下吸收进来；除此之外，他还与使馆的人员来往密切。最重要的是，情报站的站长不可能经常访问巴尔以接收或传递消息而不引起怀疑。我的副手艾尔·黑格想出一个解决办法。他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联络官、海军上校伦布兰特·鲁宾逊一起制定了一套复杂的特殊联络方法，这是通过海军渠道与法兰克福的一位海军军官联系。这条渠道是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埃尔莫·朱姆沃尔特建立的——他后来强烈反对秘密外交。黑格的备忘录中描述那位军官"完全可靠"，不对"我们的使馆负任何责任，也与其他情报部门或行政部门无任何瓜葛"。我想象不出他在法兰克福究竟干什么，也不想去问，这样也许反而更好些。总之，那位海军军官知道巴尔和拉什的专用电话号码，他自己也有一个专用电话号码，这样就成了关键性的联络点。国务院关于柏林问题的电报经常失密；电报分发的范围太广了。通过海军渠道传递消息从不泄密。我们很感激省掉了那些麻烦，因为到二月初，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柏林问题的秘密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五月二十日协议

当我与多勃雷宁开始探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能否取得突破

时，正式会谈已于十一月初在赫尔辛基恢复，那时会谈正象国内的辩论一样，陷入了僵局。我国政府正式的一致意见是，美国应该坚持它上次于一九七〇年八月四日提出的建议，即双方把导弹和轰炸机都限制在一个“商定的数目”上，并把苏方的重型导弹限制为二百五十枚（到一九七〇年底苏联人已经超过了这个数目）。正如我已指出的，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代表团的许多成员正在私下里不再坚持这些建议。

关于反弹道导弹，我们的谈判立场也陷入混乱。苏联人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即反弹道导弹只限于全国指挥部门，对此，我们既没有要求也没有得到国会的拨款。我们曾要求国会对三个发射场拨款，但不包括国家的首都。我们的谈判立场同实际计划距离越来越大。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在十月份对杰勒德·史密斯说，反弹道导弹这个问题“搅坏”了整个一场国防拨款的辩论。

为了弄清官僚们的正式看法，我通过秘密渠道问史密斯，他是否仍然同意把限制防御性武器和限制进攻性武器联系起来。史密斯的回答含糊其词，实际上是说完全可能赞成在谈判中禁止反弹道导弹，因而也就是由国会砍掉关于反弹道导弹的拨款。他个人仍然坚持反对单独搞一项反弹道导弹协议，而苏联人在十二月再次提出了单独搞这项协议的建议。然而，他认为“立即”拒绝这一建议也未免失于粗暴。总统也许想要“重新审查”他本人关于反对单独搞反弹道导弹协议的政策。结果是，整个反弹道导弹问题在政府内部重新展开了争论。

实际上，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应采取什么立场的辩论已经同一年一度反对反弹道导弹变成一码事了，这种反对几乎达到了宗教狂热的程度。舆论界再次加大压力。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七日，《纽约时报》接受了苏联向我们提出的关于反弹道导弹的建议，谴责总统坚持把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联系起来。一月二十六

日，在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中领先的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宣布他赞成鼓励苏联的灵活性。这位参议员在最近访问莫斯科时对柯西金总理说，他断定，“在美国有很多人主张削减武器费用”。这位参议员并不认为一个总统候选人告诉苏联总理美国国会内有影响的议员企图削减国防费用是有害于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他说：“既然我可以在参议院这里讲这些话，我看不出有哪一点理由不可以对柯西金这样讲。”②

这场反对反弹道导弹的运动由于国防部长莱尔德无意中透露了一个消息而得到了推动，莱尔德说苏联人似乎已放慢了建造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许多人把这个消息看作是苏联人的一个普遍性的“信号”，是克里姆林宫那些胆怯的家伙们在暗示他们的意图。这种想法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同是那些苏联领导人却在所有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上对我们一再发动猛烈的攻击。这个所谓的苏联人的“信号”促使杰勒德·史密斯给总统写了一封信，建议我们宣布停止进一步部署反弹道导弹，以表示我们的诚意。假使苏联人重新建造导弹，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全力进行我们的导弹防御计划。这种论调在国会和新闻评论中一再加以重复，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二月一日，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在参议院力陈冻结美国的反弹道导弹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计划。“既然我们不付任何代价，”汉弗莱宣称，“我们的安全又有绝对保证，我们这方面就可以停止核军备竞赛，以响应苏联已采取的行动。”③到三月份，苏联的“信号”无影无踪了。情况已经弄清楚，原来苏联人只是停止建造SS-9型导弹，为的是开始建造新一代的洲际弹道导弹，即SS-18型导弹，与此同时建造SS-11型导弹发射井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实际上苏联人在一九七一年开始搞的导弹比过去十年中除一年外哪一年都要多。这一事实并没有丝毫减轻要求削减国防费用的压力。那些要求我们对苏联人克制的“信号”作出

反应的人，没有一个建议我们对苏联人增加导弹作出反应。

要求停止反弹道导弹和放慢其他计划的呼声甚嚣尘上，闹了整整一个春天。二月三日，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秘密听证会上，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要求总统接受“一项单独的反弹道导弹协议，作为第一步”。二月二十六日，约翰逊总统任内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的负责人威廉·福斯特要求“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的部署、生产和试验。”④ 到三月底，参议员汉弗莱、哈罗德·休斯和乔治·麦戈文联名要求单独搞一项反弹道导弹协议。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则建议相互冻结反弹道导弹，并声称，这样就使多弹头分导导弹没有必要再搞了。参议员马斯基答应在四月份再进行秘密听证会。

四月五日，《纽约时报》赞同参议员马斯基先前提出的建议，即美国放弃海神式导弹和民兵Ⅲ式导弹，并同意双方停止反弹道导弹的部署——这是一下子搞掉我们全部的战略计划。四月六日，马斯基纠合其同僚鼓吹搞一项限制或禁止反弹道导弹的协议作为开端。到五月初，来自这些方面的批评更为激烈了，竟指责政府存心拖延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便继续搞军备竞赛。参议员赛明顿甚至指控政府“有意策划根本不去搞什么军备控制协议。”⑤

政府把反弹道导弹作为一个有用的“谈判筹码”的论点遭到了严厉的抨击。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富布赖特声称，“谈判筹码的论点”是荒谬的，只能有助于军备竞赛的升级。五月十二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指责政府双倍地增加核打击力量，而苏联人却没有部署什么——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结论，因为明摆着的事实是，将近十年来苏联人每年以增加二百枚导弹的速度在增加导弹。《华盛顿明星报》四月十三日报道，一个反对军事支出的新联盟正在形成，目标是削减国防预算六十亿到八十亿美元。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他的做法是反对

B-1战略轰炸机、航空母舰和潜艇，也反对F-14和F-15战斗机以及"谢延"直升飞机。

简言之，没有一样美国的新式武器系统不遭到新闻界和国会的猛烈攻击。与此同时，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还提出了他的年度决议案，要求撤退一半美国驻欧洲的部队。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这项决议案才以微弱的多数被击败(参看第二十二章)。

国会最后还是把政府要求的数字砍掉了三十亿美元。从纸面上看，我们所要求的军备拨款略高于去年，去年是六百八十七亿美元，今年是七百三十五亿美元。但花在武器上的钱实际上比去年大为减少，因为四十六亿多美元是专门用于改志愿兵制而必须增加的支出，其余增加的钱都被通货膨胀抵销了。一九七一年也象往年一样，幸运的是政府保住了逐渐增加B-1轰炸机、载导弹的三叉戟潜艇和新式战术飞机的计划，可以作为以后要求增加经费的基础。这样一来我们总算可以勉强维持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地位。但危险是确实存在的，这些计划中的某一项迟早会遭到国会的无情的攻击。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去年那种国内的辩论又重演了一遍。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以国务院和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为代表的一派人争辩说，延缓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计划将会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起推动作用。其他人(包括我)则持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要想使苏联人接受进攻性武器的限制，美国的反弹道导弹计划是绝对必要的。梅尔·莱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搞一项"保证安全"的有四个发射场的反弹道导弹计划，但实际上只有两个发射场在构筑中，第三个发射场即在密苏里州的惠特曼空军基地的那个虽已批准但尚未开始建造。讨论又继续进行了一个月，关于我们是否应该使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立场符合我们反弹道导弹计划的实际这个问题仍然没

有结论。

最后还是尼克松在三月份制止了这场讨论。尼克松是对的，他深信，国会会否决在两国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的主张，作为全部禁止反弹道导弹的一种手段。结果是总统于三月十一日作出决定，继续进行关于四个发射场的“保证安全”系统，并使我们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立场与这种计划相一致。那些赞成禁止反弹道导弹或者只在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的人对这一决定进行了极为强烈的反抗，致使我们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代表团未能向苏联人提出这一主张，后来经过我的办公室的不断督促，又于四月二十二日发出了正式的指示，代表团才提出了我们的主张。

我跟多勃雷宁的谈判必须从这种背景去看。苏联人必定是很想等待我们辩论结束，以便从我们国内辩论的结果中捞到好处，这样也许他们就完全没有必要讲什么互利了。二月四日多勃雷宁肯定说，政治局原则上同意反弹道导弹协议与冻结进攻性导弹的部署同时讨论。但这个表面上的让步却原来不过是诱使我们进入谈判的一张入场券，以便莫斯科玩弄其典型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戏弄人的策略，把极为吝啬的一点让步一遍又一遍地标价出售。谈判又由于葛罗米柯的策略与我的策略刚好相反而更趋复杂化。我的策略是在柏林问题上坚持下去以加速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展，而葛罗米柯的策略是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个问题上慢慢来，以加速柏林问题的讨论。

二月十日，多勃雷宁肯定了把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联系起来的谅解。如果这两项协议不能同时进行谈判，苏联人将考虑在完成这些谈判之前就冻结进攻性武器的部署。至于反弹道导弹，多勃雷宁表示愿采取对两国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的方案。

在正常谈判情况下，事情就算到此结束了。原则上既已达成协议，就会开始较为简单的文件起草工作，表明限制进攻性和防御

性武器的谈判同时进行。这以后，技术人员将开始工作，除非出现某种僵局要求从政治角度加以解决。可是与克里姆林宫打交道却没有那么简单。现在我们不得不应付苏联人的那种策略，即先推销原则，然后再以具体的方式推销原来的货色。也许是要显示力量，——也很可能是要执行几个月前官僚机构定下的某种计划——苏联人明知道我们会作出反应，却又派了一只潜艇供应船到西恩富戈斯。二月二十二日，我召见多勃雷宁，要求把这只船立即撤走。如果这只供应船继续呆在古巴，我们决不进行任何谈判（此后不久这只船就撤走了）。同时，我还把尼克松与柯西金交换信件的一个副本交给多勃雷宁，这封信的内容是关于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同时进行谈判的谅解的。这些信件都是我的工作人员吸收各部际机构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讨论会准备的意见而拟定的。可是事情又搁浅了。在二月二十六日和三月五日两次会晤时，多勃雷宁很客气地声称，他的所有领导人都离开莫斯科去筹备苏联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了，因此他们很难集中研究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样复杂的问题。我忍不住要讲几句，我说：柏林问题比这个问题还要复杂、艰巨，他们倒似乎没有什么困难来集中研究，那时不出一个星期莫斯科就会发来详细的信件。

时间成了一个关键性因素，尤因我们内部的程序而复杂化了。限制战略武器的正式会谈即将于三月十五日在维也纳恢复。我们必须制订新的指示，这些指示最低限度也不能与特殊渠道进行的情况相互矛盾。与此同时，尼克松倒怕起来了，因为把限制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联系起来这个问题看来即将取得突破，尼克松担心杰勒德·史密斯而不是他会得到这个荣誉。他在越南和柬埔寨问题上受到的打击太大了，想在这类实际上等于谋求和平的倡议上落一个好名声，却也是人之常情。我请尼克松放心，除非莫斯科有意避开总统这条渠道，维也纳的会谈是不会出现那种突破的，

不仅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在其他所有问题上都是如此。如果莫斯科那样做，那将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决定，是对苏联不利的，至少在勃兰特的东方条约还挂在那里的时候它不会这样干。果然，莫斯科在继续打一场游击战，多勃雷宁于三月十二日交给我的方案背弃了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同时进行的原则。这个方案要求在“今年”达成一项反弹道导弹协议，只限于在两国首都部署这种导弹；只有在这样一项协议达成之后而且只是“在原则上”达成之后，限制进攻性武器才可能进行讨论。苏联人正式改变他们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立场，这不可能是当真的；多勃雷宁手上一定还保留着什么东西。苏联领导人提出这项建议本身就最后证明他们根本不想取得任何进展；如果通过这条特殊渠道只不过是重演较低一级的谈判所遇到的僵局，那么这条渠道也就没有意思了。我当即驳斥了多勃雷宁的建议，多勃雷宁也就马上亮底了。他不再要求给他时间与莫斯科商量了，——假如他的第一方案是当真的话，照理他是会这样做的——而是建议把苏联和美国的方案合并起来，试图消除分歧。很明显，多勃雷宁已有处理这个问题的某些自由，否则他是不会自己作主建议修改他的方案的。

三月十五日我们开会交换新方案。多勃雷宁提出的方案只不过是三月十二日方案压缩后的翻版。该方案依然坚持应先搞反弹道导弹协议，再谈限制进攻性武器，但没有提反弹道导弹仅限于首都的原则。我们的方案仍然是把限制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联系起来，这是我的主要目的。

多勃雷宁和我次日会晤企图搞一个混合方案。结果这个方案很接近我们的主要要求。双方将对各自的谈判代表团发出指示，“立即”就反弹道导弹问题达成协议。在达成协议的同时冻结“战略进攻性武器”，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允许加以改进和掉换，但只能是同类型的武器。换言之，我们认为对我们

的陆地发射的民兵式导弹力量威胁很大的苏联重型导弹（SS-9型）将被冻结在现有水平上。

三月二十五日，我向多勃雷宁发出一个照会，用外交术语来说叫作“口头照会”——这是一种书面的但未经签署的文件，其作用等于口头讲话，因而可以更容易不承担责任。这个照会提出了我们认为应当采取的程序。关于反弹道导弹协议和冻结进攻性武器的条款必须同时谈判，同时完成。（我把如何限制反弹道导弹的问题交给谈判代表去谈。）所允许的武器数量是冻结开始生效之日那些现役的和正在建造中的武器的数量。

第二天，三月二十六日，多勃雷宁带来了苏联方面的答复，对我们的三月十六日方案不置可否。他们接受对战略进攻性武器实行冻结的原则，但对其细节要等到对防御性武器的协议达成之后才能讨论。在苏联外交的神秘世界里，任何一点让步都是极为勉强的，这个答复的含义其实是一种妥协：两个协议要连续进行讨论，但同时签定。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一旦人们得知反弹道导弹条约搞成了，我们就会遭到难以抗拒的压力要我们签署，而在我们签字的同时，对进攻性武器的冻结也就告吹了。（即使我们不签署这个协议，国会也决不会投票赞成为反弹道导弹计划拨款，因此，照苏联人看来，理想的结果是反弹道导弹协议无法执行，美国单方面放弃它的计划。）

我们在取得进展，但进展速度之慢却令人难以忍受。我毫不怀疑，我们会坚持前一天照会中的那些原则。多勃雷宁认为，他的领导人不会有机会研究这个照会。幸好，他很快就要回莫斯科亲自向他们汇报了，因为他刚刚接到命令，再次召他回国述职。我对莫斯科的谈判作风早就司空见惯了，它是想用这种简单的调走谈判人员的办法来进一步拖延谈判。

当进行所有这些活动的时候，限制战略武器的正式谈判也在

维也纳继续进行，这就又增加了一个复杂因素，因为我们的谈判人员还不知道有这样一条特殊渠道。三月底，杰勒德·史密斯通过秘密渠道同我联系，据他判断，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除非他被授权也把前进基地系统包括在谈判中。代表国防部的保罗·尼采建议，我们接受禁止反弹道导弹，以换取苏联冻结以至最后减少其重型洲际导弹(SS-9型导弹)。在美国国内，压力继续加大，要我们接受苏联的单独达成反弹道导弹协议的建议。《时代》杂志、《华盛顿邮报》和参议员马斯基就是其中的鼓吹者。参议员赛明顿把“保证安全”的反弹道导弹比作一家制造降落伞的公司，该公司的广告说：“如降落伞失灵，可退还，包换新的。”⑥ 说实在的，我们的秘密谈判方式使我们很容易受到这些压力；我们的批评家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另一方面，假使他们知道谈判的底细，他们就会迫使我们接受当前的苏联提案，而这些提案是我们仍在设法改进的。

部署多弹头导弹是我们发展新型进攻性武器的唯一计划，而关于进攻性武器的公开辩论的焦点却是要我们停止这个计划，因此美国的确几乎经常要被迫放弃——在达成任何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之前——我们正在建立的两种战略武器系统。

幸好，多勃雷宁于四月二十三日从莫斯科回来了，使我们摆脱了困境。他交给我一份照会，照会以苏联谈判人员那种特有的刻板、审慎的语调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同意限制进攻性武器可以在反弹道导弹协议完成之前进行讨论。这是对两种协议同时谈判下的一个很好的定义，虽然是以葛罗米柯那种双重否定的措词来表达的。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苏联人抓住了我们以前作出的一个让步：达成协议要取决于我们接受只限于在两国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然而这一次政治局又是白费心机，毫无所得。多勃雷宁必定知道——即使葛罗米柯不愿意承

认——那个只在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的方案是他们去年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另一方面，假如苏联人不愿意继续谈下去，他们也不会走这么远了。四月二十六日，我在另一个口头照会中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我建议，关于在反弹道导弹协议中规定容许建立的发射场的性质的问题，推迟到以后的谈判中再作决定。但照会提请苏联人注意，美国的立场将根据我们实际正在建立的体系（也就是说，保卫我们的导弹发射场），而不是根据以首都为中心的某种假设的体系。多勃雷宁当然不会放弃在辩论中取胜的机会，他说苏联人所接受的毕竟只是去年我们所提的反弹道导弹的建议。我感到有些难为情，也承认这是事实，但对他明确表示，我们现在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

当我们将要达成协议的时候，出现了一件怪事打断了我们的工作。五月二日，苏联参加维也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代表弗拉季米尔·西门诺夫，在一次私人宴会上突然向史密斯提出了那同一个建议，即反弹道导弹协议只限于首都，在反弹道导弹协议签订之后再讨论冻结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而这个建议正是我在六个星期以前予以拒绝的。换句话说，在多勃雷宁已经同意两个协议同时谈判以后，西门诺夫又提出了苏联原来的立场。由于这个建议比苏联人在维也纳以前所作的任何让步都要大，而且史密斯不可能知道向他提出的建议正是我们已经拒绝并且取得进展的建议，他还以为自己就要取得突破哩。他催促接受这个建议——这说明假如谈判继续通过正式渠道进行，我们会遇到多大的压力。直到今天我也搞不清楚葛罗米柯玩这一手是想达到什么目的。也许他是看到我们的双重渠道有机可乘，忍不住想加以利用，因而授权他的谈判人员摸清我们的正式谈判人员手上的底牌。也许他是想试一试总统能不能坚持我提出的方案。可以想象，他想授予西门诺夫某种行动权力，而西门诺夫又想证明自己能比多勃雷宁干

得更出色。（不要以为在苏联那种制度下比我们要好一些，官僚之间不会勾心斗角，那种斗争很可能是更恶毒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西门诺夫的提议除引起对苏联诚意的怀疑之外，实际上对总统渠道的对话造成了困难。这个提议还在我们政府机构内部引起了正式的考虑，不久新闻界和国会就形成了一种压力，要求接受这个“妥协”方案。当时我正在棕榈泉，表面上是休假，实际上在准备中国之行。因此我要艾尔·黑格向多勃雷宁提出质问。多勃雷宁实际上没有作出解释。他指出西门诺夫提出了“过去”的立场，好象这样就可以多少为这种花招辩解。多勃雷宁答应控制事态的发展。

几天之后，五月九日，西门诺夫重新发动了攻势，这一次是选中了奥地利政府主办的一次乘船旅游的机会，说明他对于绕开总统这条渠道多么热中。西门诺夫把史密斯拉到一边，提议他们在“今年”集中力量达成一项反弹道导弹协议，此后再积极谈判一项关于进攻性武器的协议。在这些谈判进行期间，将在“某段时间”内停止部署洲际弹道导弹。（现在他从六个星期之前的立场变成了上上个星期的立场。他仍然坚持两种谈判先后举行，并继续把潜艇发射的导弹排除在外。）史密斯对于这个表面看来的新“突破”大为高兴。我感到很为难。我很难告诉史密斯，说人家向他兜售的是陈货，西门诺夫的建议已通过一条他所不知道的渠道被另一个更好的建议代替了。我只好建议史密斯在一周内回国复命。

与此同时，我决定与多勃雷宁摊牌。与苏联人打交道，必定会达到一个时刻，那时必须严厉地向对方讲清楚，灵活的极限已经达到，谈判成败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是一个比单纯地表示“强硬”更为复杂的问题。如果时机过早，苏联人就会真的使谈判破裂了；如果时机过迟，他们就不再相信对他们提出的挑战是当真的。谈判要取得成功是一个掌握时机的问题，跟莫斯科谈判尤其是如

此。

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们所采用的策略是由于必要——或者说是由于苏联的笨拙——而被迫采用的，它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使用它。当时所以必要，是因为一旦史密斯回到华盛顿，西门诺夫的建议就将成为各机构间正式讨论的题目，那么总统这条渠道就将无法加以控制。五月十一日，我与多勃雷宁进行了一次相当率直的谈话。我说，苏联人也许认为他们能在我们两条渠道之间制造不和，而且我们确实也有某些困难，无法使各机构相信事实上我们已经争取到多勃雷宁所让步的东西。但他无需怀疑，以总统的坚定和我对官僚机器的控制能力，迟早总会使事情照我们的意思去办。我告诉他，他付出的代价将是丧失对一条秘密直接渠道的严肃性的信任。他们的做法，总统只能理解为有意使他声誉扫地，总统对此是极为愤慨的。我要求他在四十八小时内对我们四月二十六日的建议作出答复。否则我们就把全部问题移交给公开渠道去处理。对于柏林谈判我们也要这样做。五月十二日多勃雷宁作了答复。苏联不再坚持在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的主张了。它同意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同时进行谈判。到五月十五日，我们已就要在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公告和尼克松与柯西金私人交换信件的文本取得了一致意见。

这个成功却使尼克松大为苦恼，因为他现在不能不告诉他的国务卿，谈判已经背着他进行了好几个月，而且就要正式发表公告宣告谈判成功了。他的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说由于忽然接到苏联的一封信就出乎意料地造成了这次突破。（七个星期之后他对于我的北京之行就是这样说的。）我劝他不要这样说，因为事实俱在，不允许这样编造，而且爱捣乱的苏联谈判人员也会利用这种说法。尼克松的第二个想法是，说他在一月份曾经给勃列日涅夫写过一封信，现在刚接到回信。这种说法我也说使不得，理由基本上如上

述。尼克松最后把这个难题交给了霍尔德曼，让他去告诉他的老朋友这个消息。后来强烈的责骂都倾注在霍尔德曼头上，但这决抹煞不了他那种任劳任怨的精神，他干了许多工作都是费力不讨好的，忍辱负重的。罗杰斯以值得称道的沉着冷静接受了向他提出的解释——伪称接到勃列日涅夫一封信的那个说法。

向格里·史密斯说明情况的工作交给我来做。这是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尽管我不同意史密斯的政策观点，但我对他的工作作风和忠诚是尊重的。几年的工作即将告成，而他却被排除在外，这对他来说肯定是很痛苦的。若希望我们的首席谈判代表同意，正式渠道的谈判本来还会再拖下去，那就太过分了；面对着公众要我们屈服的压力，我怀疑我们能否坚持我们最后的立场。我给史密斯看了我们与苏联之间所有的交换信件及我的谈话摘要。他表现得礼貌而克制。尽管后来他私下里颇有怨言，这是可以理解的；当这样的行为有损于尼克松政府在东西方关系上的第一个重大成就时，他以举国一致这一大局为重，克制了自己的感情。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日中午，尼克松缓步走向白宫新闻记者团，向他们宣布了当年第一个引起轰动的新闻。他宣读了公告。公告寥寥数语（而且有点绕圈子），根本没有正确表达过去六个月的艰苦努力及其内在的含义。

美国和苏联政府在回顾了它们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经过之后，一致同意在今年集中精力制定出限制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它们还一致同意，与缔结一项反弹道导弹协议一起，它们将对有关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取得一致意见。

但是与苏联人的这场谈判，没有一样事情是注定能顺利进行的。这个一致同意的声明刚刚发表，就有人告诉我苏联塔斯社发

表了一个不同的文本，其含义是限制进攻性武器的讨论将在反弹道导弹协议“之后”而不是“一起”进行。换句话说，这是企图越过我们把苏联原来的立场塞进一份新闻公报。我把这一点提请多勃雷宁注意，他不能自圆其说，争辩道，塔斯社必定是根据俄文本自己转译的（这倒是一个离奇的解释，因为声明的原文是按英文议定的）。多勃雷宁说，很遗憾，由于时差的关系，现在通知莫斯科已经来不及了。我对他说，我要在两小时内向新闻界介绍有关这一公告的情况。我或者是谈苏联背信弃义，或者是把议定的文本说成是两国改善关系的第一个重要步骤，这要由他来选择。这位大使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把正确的英文本打印在苏联大使馆的信笺上。这样就可以向那些持怀疑态度、早已作好准备发射重型炮弹的专栏作家们及时地提供。白宫新闻厅用苏联的信笺发布新闻，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

五月二十日的突破从表面上看是程序性的。它肯定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的协议将同时签订*。但协议所包含的内容比字面上讲的要多。例如，我们已把我们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立场的实质向苏联政治局提出来了。一九七二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确认了上年五月达成的默契：苏联实际上已同意冻结新型的战略导弹，同意也对重型导弹加以某种限制；他们实际上不再要求把我们国外基地的飞机计算在内；我们已提请他们注意潜艇发射的导弹必须加以限制或提出说明。此外，我们还设法避开了前一年那个不明智的只在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的提议。总之，一年后所达成的最后协议的基本方面反映了五月二十日公告之前双方交换意见的内容。

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是一九七二年五月签订的，这以后很久，批

* 有些学究气的军备控制专家仍然认为总统已经接受了苏联的提议；他们称赞尼克松同意单独搞一项反弹道导弹协议，事实上他所做的恰恰相反。

评这些协议却变成时髦的事情了，他们硬说这些协议是“不平等”的协议。诚然，协议规定的冻结使过去十年中形成的美苏导弹数量的差距保持了五年。但由于我们的前任所作的决定，美国并不存在什么制造新式导弹的计划，至少在五年内不可能生产新导弹。梅尔·莱尔德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美国计划建造的新潜艇最早要到一九七七年才能下水；他的估计也还太乐观了，至少提前了两年。在这五年期间，美国政府面对国会的激烈反对，积极进行新的计划——制造三叉戟潜艇，B-1战略轰炸机，民兵III式导弹，反弹道导弹和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因此，数量上的冻结并没有阻止美国的计划，而是阻止苏联每年继续部署二百多枚洲际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导弹的计划。作为交换条件，我们接受了对反弹道导弹的限制，而我们这个谈判本钱却差一点被国会全部搞掉了。

尽管很明显我们的谈判地位较弱，——因为我们总不能巧辩说，如果达不成协议，我们能很快制造导弹——我们还是取得了上述成就，这是由于几种因素造成的。苏联领导集团不想利用我们国内由于越南战争造成的压力；它之所以这样决定倒不是由于发了善心，而是由于认识到这条特殊渠道可能是尼克松第一任总统期间达成一项基本协议的唯一的机会。苏联领导人还认为尼克松这个人是“捉摸不定的”，——他在执意要干某件事情时确是如此——因而不敢拿我们国内表面上的混乱来下赌注；在美国，这种混乱的根基是薄弱的，拿多勃雷宁来说，他就比我们的许多批评家要懂得的多。

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苏联人若想缔结柏林协议或是批准德国条约，就不能冒险跟我们闹翻。我们没有明确地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但谈判的步调明确地反映了这种联系。（例如，当西门诺夫举动轻率的那个星期，我要拉什借故推迟与苏联驻波恩大使的会

谈两个星期。）而且在冷战的条件下德国议会根本不可能批准勃兰特的东方条约。我们不愿加剧东西方的紧张状态自有本身的理由，但为了坚持达成一项适合我们的安全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我们是准备冒这种风险的。

就国内来说，五月二十日的协议使我们得到了一个喘息机会。它暂时平息了那种硬说政府不愿努力争取和平的批评；它平息了尼克松任期内关于国防预算的辩论。当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已经很明显有可能成功的时候，各种要求暂停发展计划的压力就减轻了。反弹道导弹仍处于胚胎阶段，但在一年内这本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反弹道导弹使我们赢得了一个好价钱，假使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投票赞成只限于在两个发射场部署反弹道导弹，即使没有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价码也不会这样高的。

另外，就政府内部来说，五月二十日的协议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它确定了白宫对于外交事务的支配权。在前两年，白宫管外交只限于制定政策，现在扩大到执行政策了。有三件大事在正常官僚机构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时进行谈判：五月二十日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柏林谈判和打开对华关系。我已说明，我不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成为一种制度。但也必须同样强调，政府各部的作为很难取得总统的信任。尼克松不愿与它们正面对抗，而它们则想利用这一点，这使尼克松不得不经常打游击战，想办法对付他的下属，他是从来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下属的。是尼克松一辈子好怀疑，还是十年来由反对派充斥的政府对他不信任，谁先谁后，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尼克松——在我的帮助下——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自己的一套办法。这种办法当然对各部起了瓦解士气的作用。对于像史密斯这样的个人来说，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有辱人格的。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来说，这种做法也太粗暴，使人受不了，因为他们的唯一责任是在老挝的作战行动进

行期间同时筹划三个重要的谈判。而且由于渠道重叠也浪费了大量人力。但尼克松断定，由于他的信念、他的个性和他的部下的状况，要想取得成就只能采取这种办法。

至于五月二十日达成的谅解，尼克松有各种理由担心，如果通过正规渠道，那会拖延数月也没有结果，因为那时各部门正在对反弹道导弹的三种选择和关于冻结的各种方案进行辩论，它们会把自己喜欢的方案在他作出决定之前就透露出去。苏联人就会始终坚持只达成反弹道导弹协议，并成功地动员新闻界、学术界和国会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我们接受。而柏林谈判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之间那种重要的相互关系，由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官僚体系不可能仔细调整它们的意图，几乎肯定就会丧失，每一方都深信自己的责任特别艰巨，理由特别充分，而主张谈判单独进行。

五月二十日的协议对于我们的对华行动也不无作用。它向北京表明我们对莫斯科也有选择的余地，同时我们也有机会表明我们了解中国的主要忧虑。我们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告诉中国领导人我们的决定及其理由，并明确表示我们绝无共管世界的野心。最后，五月二十日协议也是美苏间第一个被认可的总统级的谈判——未来几年其他谈判的先驱。两个核巨人已开始探索共处的某些基本规则，尽管这是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

柏林谈判

我们和苏联就柏林问题的谈判也是通过秘密和官方两条渠道进行的，但柏林谈判比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更为复杂、所使用的行话也更加深奥费解。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我们对自己这一方面负全责，但在柏林问题上我们却不仅要与苏联打交道，而且还要与占领国英国和法国、与这个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

及西柏林政府保持合作关系，因为代表西柏林人民的毕竟是西柏林政府，事关重大的是西柏林人民的自由生存的机会。此外，柏林谈判多年来一直限于在法律问题上争论不休。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从通行证印鉴的确切样式到整个城市的法律地位，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没有跟苏联人争吵过。任何一项倡议都必须对过去长期积累下来的司法程序进行一场争论；而且还得绕过苏联驻东德大使、首席谈判代表派奥特尔·A·阿布拉希莫夫这块绊脚石，他不是一个外交官，而是一个党务工作者，他的全部经历是与东欧人打交道。因此，即使按苏联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也是过份专横独断、盛气凌人的。只要他不能对西方谈判人员发号施令，他就觉得难以忍受。

从根本上说，西方的谈判地位是不利的。通往西柏林的公路、铁路和空中联系很容易受到苏联人和东德人的侵扰而中断，这些从表面上来看微不足道，很难提出异议，但积累起来就对柏林的自由造成很大的威胁。西柏林人被禁止到东柏林去。东西柏林之间不通电话。为平民服务的铁路和公路都在东德的控制之下，而那时我们甚至还没有承认东德。在技术上，军事运输要通过一个由苏联控制的检查站，但即使这一点也不过是表面文章，因为实际上由东德的卫兵把守大门，一位苏联军官懒洋洋地呆在附近的一个哨所里，在发生争执时才出面。

“西方占领区”——盟国一直使用这个名词来强调柏林仍然是四国占领之下的一个单一的城市——在经济上是由西德支助的。的确，联邦共和国无论是在基督教民主党执政时期还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都曾作过一番努力，不仅想在经济上而且也在政治上在柏林呆下去。西方三国对于这种努力是支持和鼓励的。然而，为了保持占领的地位，——这是使苏联人在柏林问题上承担责任的唯一法律基础——西方三国从未承认，联邦共和国也从未声言

西柏林是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因此美国所最关心的是确定苏联的法律义务，使其容许更正常地进入西柏林，容许被柏林墙相隔十年之久的东西柏林之间能更正常地来往。

十年来，柏林的脆弱性一直被苏联人看作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而不是促进问题解决的因素。在一九七一年，对我们变得有利的一点是，莫斯科很关心使勃兰特的东方条约获得批准。由于东方政策固有的特点是，似乎仅对一方有明显的好处，——波恩接受国家的分裂除了改善政治气氛之外，毕竟一无所得——一项有利的柏林协议就要求提供对等的补偿。因此，莫斯科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要作出不符合当地力量对比的让步才能取得其他重要问题上它所希望取得的成果。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典型事例。然而这种联系的实际后果是，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变成我们要对勃兰特政策的最后成功负有责任。

两个主要问题必须解决：

⊙西方国家想要得到苏联的（不是东德的）保证，它们进入柏林要得到优待和不受阻挠；

⊙联邦共和国想要苏联承认联邦共和国与柏林之间的重大的政治联系，以消除共产党对西柏林施加压力的传统借口。

苏联在四国谈判一开始就以一贯的狡诈手段攻击这两点要求；它以一种猛烈进攻的姿态提出了自己的最高方案。关于通道问题，苏联人否认有任何权力；他们坚持说，通过东德的交通，他们无法控制或者施加影响；这是两个德国之间要讨论的问题。如果作为占领国之一的苏联没有责任，那么按照苏联的这个说法西方盟国也就没有责任了。这样，老百姓进入柏林的问题就成了一个纯德国的问题。任何危机都得作为德国内部的事务来解决。

至于“联邦的存在”这个问题，苏联的立场是直截了当的。苏联人仍然是要求彻底消除波恩在这个城市进行“非法”活动的痕迹，关于这方面的活动，他们开列了一张包罗万象的清单。阿布拉希莫夫以其特有的方式要求联邦存在问题首先解决；只有这样才能讨论通道问题。苏联人似乎想利用谈判把西柏林变成一个“自由城市”，在这个问题上施加压力曾经造成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的严重危机和一九六一年的另一次危机。这是他们在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策略的重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他们也是想先解决莫斯科最关心的问题，——反弹道导弹——然后再讨论我们想解决的问题。苏联人提出一个如果勃兰特接受了就非垮台不可的方案是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也许永远是个谜。

正当我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亲自过问时，苏联人想要采取的另一个方针是企图把四个占领国统统抛开。一个名叫迈克尔·科尔的东德官员出现在波恩，谈判东德和联邦共和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我已经建立了秘密的海军方面的渠道，以保持联邦共和国的巴尔、我们的大使肯·拉什和我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我第一次使用这条渠道来警告巴尔，不要受到苏联人的诱惑，利用他参加全德谈判来为苏联圆场。

我的下一步是在二月十日与多勃雷宁讨论二月五日四国会谈中西方国家提出的建议草案。这一草案坚持由苏联提出保证，无阻碍地进入柏林。至于联邦共和国在柏林的存在问题，草案提出，宪法规定的机构，诸如选举总统的议会，将不再在柏林集会，而且所有西德各部将由联邦共和国在柏林的一个代表来执行任务。这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让步，因为这些机构将保留下去，但这个建议给苏联人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顾全面子的体制。凡是未加禁止的事情都许可办。

肯·拉什是联系的枢纽。他为我和多勃雷宁的谈判不断地提

供情报；他与其他西方盟国保持密切的接触，以确保各盟国的立场协调一致；他还要制止巴尔那种喜欢单干、想把苏联人的一切让步都归功于己的倾向。而且拉什必须在自己的国务院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切。这真是一种古怪的管理政府的办法。可是它居然能行得通，这一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拉什从容镇定的办事才干。

开始时，多勃雷宁坚持，进入柏林的程序问题应由两个德国来处理，然后他又突然提出一个妥协方案：苏联人将基于他们对东德的看法的理解，以单方面发表声明的形式来表明他们对柏林通道问题应承担的义务。然后这一声明将并入整个协议的总的保证之中。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方案只是听起来像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因为实际上它恰恰是在正式渠道中早已讨论过的西方的那个后退的立场。（事实上，二月十日会谈所发生的事甚至使我想到，不是我接受苏联的一个妥协方案，而是苏联接受了我们的后退立场，是莫斯科从某一消息来源了解我们的这一立场后提出来的。）

当我把我和多勃雷宁的谈话内容通知巴尔和拉什时，他们二人都断言，这样一个保证是能为西方盟国所接受的，条件是予以保证的这个进入柏林的程序要详细拟定，足以改善柏林的生存能力。多勃雷宁在二月二十二日作出了反应，建议由我提出有关这一程序的详细文件。这样，巴尔和拉什就投入了紧张的起草工作，而由于经过秘密渠道传递那些冗长的文本经常发生脱漏和歪曲，起草工作也就更加复杂化了。他们起草的文件是各盟国不同立场的混合物，因而在盟国的讨论中可能被接受。二月二十六日我把这个文件交给了多勃雷宁。

三月十五日，多勃雷宁重新提出要求，要西方在联邦共和国在西柏林存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进一步的让步。我说我们不能超过二月份提出的盟国的立场。多勃雷宁立即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作

为苏联对柏林通道问题提出保证的交换条件，苏联在西柏林也要有某种程度的存在，例如，建立一个领事馆。反应这样快，这表明苏联人想取得进展的心情何等迫切。这个方案看来是承认了二月五日盟国提出的联邦在西柏林存在的提法。

当然，在苏联的制度下，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么简单。到三月十八日，或是由于莫斯科有了新的考虑，或是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某位要人要求证明能否争取到更多的东西，多勃雷宁交给了我一份完整、详细的柏林协议的草案，这个草案实际上收回了上个月所做的大部分让步。他请我在莫斯科将此件提交给三月二十六日的四国会谈之前加以评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来处理这样一个长篇文件中的所有玄奥难懂的法律问题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正式提交给四国审议也无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它的主要意义就在于使四国会谈能够继续进行。

与巴尔和拉什磋商之后，我在三月二十二日回答多勃雷宁。我无法提出一个反提案；我也不想被拖进一场讨论苏联文件的详细谈判，这样一个文件肯定会使谈判成为讨论我们的让步的谈判。为了迫使苏联人转向我们的观点，——我相信他们是会这样做的——我在与拉什磋商之后，提出几个总的原则：第一，任何协议都必须肯定柏林与联邦共和国的联系，以及苏联承认西方国家在西柏林的权威。第二，在进入柏林通道问题上的许诺，必须由苏联作出切实的保证，即保证平民和军人进入柏林不受阻碍。第三，苏联必须对柏林城两部分之间的相互来往承担予以改进的义务。第四，协议必须表明西柏林的外事代表体制由三国负责——这是允许西德代表柏林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因为西方国家会授权给波恩。第五，任何关于苏联在西柏林的官方机构的谅解都必须在四国柏林协议之外加以处理。这是为了防止苏联借口它在西柏林的领事权的行使受到干扰而取消关于柏林通行的规定。我交给多勃

雷宁一份备忘录，它相当详细地说明了这些观点的实际含义。

我和多勃雷宁想出了一个主意，让阿布拉希莫夫和拉什秘密会谈。其实这个主意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则比较困难。阿布拉希莫夫在东柏林，拉什在波恩。他们两个只在四国开会时碰面。由于要通过柏林墙的检查站，他们俩谁和谁接触都会引起新闻界的注意。即使在四国开会期间私自会晤，也会引起其他大使们的怀疑，当然也会通过正式渠道报告给国务院，这样华盛顿就会要求全面汇报。

我们以为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于是安排他们在三月二十五日会见。阿布拉希莫夫或者是由于不了解双方对两条渠道的约定及其意义，或者是由于象西门诺夫所干过的那样想要堵死多勃雷宁这条渠道（或两条渠道都堵死），把要他与拉什秘密会晤的事捅到公开渠道里去了，这一来就引起了华盛顿的纷纷揣测。然后他又莫明其妙地取消了这次会晤。他与拉什的会晤重新安排在四月十六日下次四国会议时进行。阿布拉希莫夫这次又把未能会晤归罪于拉什早离开了会场。这显然是一个借口，因为拉什已预先告诉每一个人，那天晚上他要为访问波恩的波士顿民间乐团举行招待宴会。显然发生了更重要的事情，也许是苏联外交部（由多勃雷宁代表）与党的系统（由阿布拉希莫夫代表）在扯皮。要不然就是葛罗米柯断定他三月的方案是一个失着，不能再作为谈判的基础了，因而决定用这个办法收回成命。也很可能是苏联人不信任由阿布拉希莫夫和拉什单独会谈，而想找一个方式让巴尔也参加进来，他们对巴尔很明显是信任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当四月二十三日我向多勃雷宁建议由苏联驻波恩大使瓦伦丁·费林代替阿布拉希莫夫时，他很痛快地接受了。费林、拉什和巴尔在波恩会晤不会引起注意。在葛罗米柯看来，这样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一切事情都由外交部这条渠道控制起来。

显然我有必要再次与埃贡·巴尔会晤。我们再次需要找一个有正当理由会晤的地点。我们选中了比尔德堡会议这个机会，这是欧洲和美国的政界与商界的领导人每年举行的非正式集会，定于四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的周末在弗蒙特州举行。会议是在森林中举行的，左翼和右翼团体都布置了纠察线，左翼认为这个会议是资本主义的阴谋，右翼怀疑象戴维·洛克菲勒和贾克·海因茨这样的激进的主办人会把美国出卖给隐蔽的国际主义。巴尔和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回顾了谈判进行的情况。他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建议：双方都不要再坚持那些法律上的理由，而要具体地说明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我同意这个建议，但表示要与拉什讨论，而且关于柏林通道的程序要相当详细地加以说明，以免将来发生误解。

我于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向多勃雷宁说明了巴尔的建议，征求他的意见。多勃雷宁欣然表示同意，这说明他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建议。据我所知，没有哪一个苏联外交官——包括葛罗米柯在内——会不请示莫斯科就接受一项新的重要建议。究竟有多少渠道在起作用，谁是主要的谈判者，并不都是绝对清楚的。我坚持要由拉什就程序和实质问题征求勃兰特本人的同意，以此来确定巴尔的权力。拉什于四月三十日得到了勃兰特的同意。

五月三日，显然是在苏联的压力下，东德的党魁、顽固的斯大林分子瓦尔特·乌布利希由于所谓健康的原因被撤换了，而由埃里希·昂纳克充任。昂纳克据说比较灵活——要知道这在共产党东德完全是相对而言的。

费林、巴尔和拉什于五月十日第一次会晤。此后，秘密谈判的中心问题就交给他们去讨论，而由多勃雷宁和我打开僵局。这三位主要谈判代表都把单独谈话的内容互相通报（至少是在理论上如此），作为避免混乱的唯一手段。大量的电报往来充斥于这条特别联系渠道。海军承担的任务比原先答应负责联系时所承担的任

务要多，而且完成得很好。

五月十日，费林、拉什和巴尔再次会晤。拉什根据我的指示和他本人的信念，顶住了巴尔的压力，后者要不经其他盟国批准就提出有关进入柏林的程序和联邦在西柏林存在问题的详细建议。拉什坚持要预先召开西方占领国工作组会议。我们预计盟国会原则上同意这些新的解决办法。我们预见到，关于进入柏林的程序，得到它们的同意是不会有困难的，特别是由波恩提出的话。巴尔当着费林的面反对这样做，坚持要立即提出临时性的建议。拉什又机智地挡了回去。最后，工作组还是赞同这些新解决办法，但作为计划文件而不是谈判文件提出。

由于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期间，西门诺夫的行为是要绕过总统这条渠道，我指示拉什推迟了原定于五月十九日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样柏林谈判就又延搁了一个星期。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于五月二十日取得突破之后，我让柏林谈判继续进行下去。费林沿用苏联人谈判的故技，于六月四日收回了他在五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所作的让步，到六月六日又大部分恢复。六月份其余的时间拉什、巴尔和费林都用来起草那些错综复杂的文件，后来形成最后的柏林协议。他们的每次会议都产生一些协议，我代表总统审查这些协议；也产生一些争论点，由我和多勃雷宁分别加以处理。在这一阶段，苏联人的基本做法是力图缩小他们对柏林通路问题所提保证的意义，所用的手法是插进一些限制性的词句，如“在他们的权限范围之内”，或者含糊地提到“国际法的准则”等等；这样，他们以后就可以争辩说，哪些才是他们的职权范围，或者那些通过一个主权国家领土的程序应该适用哪些国际法的规定。

僵局突然打开了，这是因为柏林谈判进入了这样一个时刻：葛罗米柯似乎达到了惊慌失措的程度，他怕功亏一篑谈判宣告流产。他决定对我们进行讹诈，以最后同意最高级会谈为条件要我们迅

迭签订柏林协议。也许他是真的担心谈判破裂，也许他是想表现一下自己解决难题的才干，好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额外嘉奖，总之其结果却与他的企图恰好相反。一旦我弄清九月不可能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后，我就设法推迟缔结柏林协议，直到我访问北京的消息公布之后再来缔结协议。这样就使苏联人不致于急于利用我们打开对华关系为借口来挑起一场新的危机。我的做法成功了，但也不是没有一定的困难。即便是拉什，也由于签订协议大有希望而飘飘然了，要他拖一下，他十分勉强（当然，其中原因他是不知道的）。西方盟国注意到苏联在正式的四国会议上立场软下来时，它们也催促赶快签订协议。

七月七日，费林大使在莫斯科经过磋商后返回波恩，他板着面孔告诉巴尔和拉什，他想不到，葛罗米柯对于六月份所作的让步竟然全部同意了。这样，他（费林）也就没有必要越过葛罗米柯向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请示了。葛罗米柯竟然知道他的下属将首次向他报告一个月来所作的重大让步，而且打算必要时越过他，我对葛罗米柯的这种眼光感到吃惊。然而，即使像我这样持怀疑态度的人，这时也不再怀疑苏联人是想急于要缔结柏林协议了。

拉什接到我另一个必定使他难以理解的指示：避开最后一轮谈判，到七月十五日以后再谈。我访问北京的消息公布之后，巴尔通知我，在波恩的俄国人反应强烈，但他们仍将继续进行柏林谈判。这倒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干，因为他们比我们更需要柏林协议。但这是一个有用的情报，这表明我们的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们的担心是错误的，他们曾认为打开同北京的关系会损害我们同莫斯科的关系。事态的发展证实了那些初步反应是可靠的，在我指示拉什继续进行谈判之后九天，他和巴尔就解决了最后有争议的问题。

苏联人默认了联邦共和国对西柏林公民的领事保护权以及西

柏林人持西德护照旅行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同意那个主要是顾全面子的方案，即允许苏联在西柏林设领事馆。这对于苏联把西柏林与联邦共和国分开的理论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苏联在西德一些城市也有领事馆。(柏林协议生效已将近十年了，苏联的那个领事馆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

在谈判结束的那一天，拉什通过秘密渠道以无可非议的骄傲心情电告："临时协议草案作为附件奉上，可是我仍然很难相信协议竟然这样有利。它还需要由你、葛罗米柯和勃兰特分别批准……昨天我们从费林那里得到了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东西。"他说得对。在以前，关于平民进入柏林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法律根据，而现在这方面的程序都有细致的条文加以说明，甚至对制造品的密封运输这样的细节也作了规定。以前苏联对于进入柏林这个问题推得一干二净，声称这是东德人主权范围的事情，而现在它却作出了保证。联邦在西柏林的存在略有削弱——特别是盟国从未承认的那些活动，如四年一次的联邦总统的选举。但苏联已经接受了这样一条原则，即联邦共和国和柏林的联系可以"保持和发展"，这样就为波恩与柏林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提供了一个法律根据。协议授权西德在国际协定和团体中代表柏林，并使柏林人能用西德护照旅行。总之，这个协议意味着可使柏林居民的生活和安全得到很大的改善。协议文本基本上实现了二月五日提出的四国草案中所规定的目标，实际上在主要方面都与那个草案相似。

可是这个协议是由我们、联邦共和国和苏联人三方秘密缔结的，由于存在着两条渠道，官僚机构问题也就成为突出的问题了。我们总得想办法不要使我们自己的国务院把事情弄得复杂化了。另外，协议还得拿到四国会议上去批准，而参加会议的外交官们很懂得他们作为占领国的代表所拥有的特权。除此之外，谈判突然进行得这么快，也使那些十年来习惯于那种僵持局面的人感到迷

惑不解。这个问题倒不难解决，因为协议草案中有很多要点是根据工作组的计划文件拟定的，但这也不是小问题。拉什和阿布拉希莫夫想办法介绍那些不存在争议的项目，而由巴尔在我们的支持下提出那些较困难的条款。这时事情还算顺利。但到了八月十日，四国会谈正式开始，当然就得在正规官僚机构的指导下进行了，而官僚机构又决心要表现一下自己的气派。拉什突然从国务院这条渠道接到指示，要他重新修改秘密谈判中早已定下来的一些段落的词句。那些改动倒不太重要，可是巴尔却怕起来了，他怕这样一改会使我们受到指责，说我们没有诚意。我再次对多勃雷宁表示不满，指责阿布拉希莫夫态度粗暴，特别是对待英国大使，这位大使也是容易激动的。到八月十八日至十九日，问题似乎最后解决了。四国全部赞同协议。拉什兴高采烈地拍了一个密电给我，他说官僚们"已遭到挫败。"*

事情的真相是他们刚刚醒悟过来。三个月来，一项谈判即将完成而正常的官僚机构没有参加、甚至根本不知道，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任何一项协议，没有参加谈判的专业人员都能够横加挑剔，把它批评得体无完肤。国务院的德国科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协议的文本毕竟是英国和法国的大使接受了的。罗杰斯只是把拉什召回国内两周，进行商讨，以便国务院能够进行"深入研究"。

我们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我们必须使那些近乎妄想狂的苏联人相信，拖延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又很难告诉国务院，它没有权力重新审查这样重要的协议。我们不能保证哪一位爱挑剔的官僚

---

* 我意识到我也许是从不适当的个人角度来描述一个复杂的谈判过程。我不知道其他参加的人有些什么双边接触，他们所作的贡献也许跟我这里所说的同样大甚至有过之。例如参加谈判的法国代表琼·萨瓦那格斯，当他后来作为外交部长成为我的同事和朋友的时候，曾经几次提到他所作的一个重要贡献，而萨瓦那格斯是不喜欢自吹的；但他的评论使我无法理解。我没有急于要求解释，因为我不想急于回答他。很可能还有别人与苏联人进行过双边接触。我们将等待其他参加者的回忆录问世。

不会迫使我们重新讨论早已两次决定了的问题，首先是在拉什、巴尔和费林三人的会议上，其次又在四国大使级会谈中与阿布拉希莫夫决定的。以后的情况是，总统、罗杰斯、霍尔德曼和米切尔（因是拉什的老朋友）他们四个人之间电话来往不断，紧密磋商。像往常一样，还是由霍尔德曼去处理这件事。勃兰特在我的建议下也插进来了，他给尼克松写了一封信，极力赞扬协议是一个“重大成就”；这对罗杰斯是有用的。尼克松有一种想办法解释既成事实的才能。他呼吁他的国务卿给以支持，理由是尼克松八月二十五日的经济措施要求增加百分之十的进口附加税，使欧洲人十分恼火，因而我们需要作为交换条件让他们自己去干（意思是说缔结这个协议跟他毫无关系）。八月二十五日罗杰斯与拉什会晤后，态度也开始转变了。这出戏的最后一幕是总统于八月二十七日邀请拉什到圣克利门蒂。其结果是由拉什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他已与总统最后审查了这个协议，并说协议是“尼克松总统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样也就了结了我们内部的不和。

还有一个更稀奇古怪的变故，共产党在翻译上又玩了一个小花招。东德人拿出了一个大不相同的文本，非但与英文本和俄文本不同，而且也与西德的文本不同。然而法国人却拒绝联合起来对俄国人施加压力，迫使东德人就范——法国大使琼·萨瓦那格斯一怒之下离开了会场。法国的立场是基于他们根本不承认德文是正式语文。虽然这对于法国人来说感到很痛快，但对于一个主要是解决德国问题的协议来说，这种态度却是怪有趣的。但外交界也常有这样的事发生，这次就是用一个根本荒谬的方案结束了这场争论。只有法文、俄文和英文本被认为是“正式”文本。这场谈判的结局竟出现了这么一种怪现象：用来确定德国前首都的地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德国人去执行的协议，却没有一个权威性的德文文本。

四国柏林协议于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正式签订。肯尼思·拉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是艰苦的工作使他付出了代价，他的身体垮了，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康复。如果说柏林谈判有一位英雄的话，那就是拉什。他对我们的盟国言而有信；他制止了巴尔的急躁情绪；他以卓越的才能和准确的判断力与两位苏联大使（驻柏林和驻波恩的）进行谈判。没有他，我们的努力决不会取得这样激动人心的成功。

对苏关系采取冷静持重的态度显然已开始取得成果。我们已开始证明，考虑民族的利益比采取感化的办法能更有效地打开东西方的僵局。相互联系的做法尽管为理论家所摈斥，但依然行之有效；我们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柏林谈判两者联系起来，终于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当然，苏联人有理由为勃兰特的让步而感到满意，但只有外行才相信交易只能对一方有利。

最高级会谈终于确定

不论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还是柏林谈判，都有其附带的目的，那就是企图安排一次最高级会谈。我们在一九七〇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所取得的进展却不过是一个一般性的建议：将在一九七一年夏末某个适当的日期举行。这个建议是多勃雷宁于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五日首次提出的，此后葛罗米柯又对尼克松确认了这一点。但是葛罗米柯又停了下来，迟迟不发出正式邀请，多勃雷宁也继续回避，不确定日期。很明显，苏联人是把会见他们的领导人看作是对我们的一种了不起的恩赐，大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索取高价。

直到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我通过多勃雷宁这条渠道同意讨论柏林问题的时候，最高级会谈的安排才加快了步调。多勃雷

宁更多地谈到时间了，但也总是避而不谈最后的确定日期。很明显，如果说我把柏林谈判与战略武器会谈联系起来，那末苏联人则是把柏林谈判与最高级会谈联系起来。莫斯科的战略成问题的是，这期间，我们也在悄悄地安排与北京的另一个最高级会谈，这使我们的谈判地位比表面看起来要强多了。

一九七一年二月，关于最高级会谈的问题，多勃雷宁又谈过几次，重新确定秋天某个日期，但他不想讨论任何具体安排。后来，最高级会谈的问题就从我们的日程上消失了，据说是因为苏联的领导机关正忙于召开第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到三月底，多勃雷宁又一次回莫斯科述职（他回国述职的次数很多）；这样一来，秋天那个日期又变得渺茫了；一定有一位把关的天使在监视着我们，因为我们对最高级会谈还远没有准备好。

这次党代表大会确立了勃列日涅夫显赫的地位。四月中旬我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据我看，勃列日涅夫已成为支配一切的人物。我是根据多方面的情况得出这个看法的：

……在我们之间的重大实质问题上，几乎可以肯定，勃列日涅夫认为他拥有很大的力量。因此，他倾向于让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他希望能以等待的办法取胜，当大选临近之际，让"和平问题"本身在我们这里起作用。

虽然如此，合理的基本判断是：（一）勃列日涅夫要进行真正的谈判还有某些回旋余地；（二）他想跟我们保持某种程度的稳定，帮助他完成国内的目标，并控制他的帝国中那些离心离德的趋向。

尼克松在文件旁边批注了一句："我们将在三十天内见分晓。"

然而所揭晓的是，新领导班子也和旧领导班子一样，并不打算作出明确的决定。他们希望举行最高级会谈，但同时也想抓住机会在柏林谈判期间确能利用这个问题对我们施加压力。他们需要建立新关系，但对我们又不够信任，不相信我们能完成这样一个对

双方都有利而且双方都已投入大量精力、时间和威望的谈判。因此，多勃雷宁在四月二十三日建议最高级会谈在九月举行，但明确地把最高级会谈与柏林协议联系起来。我作了针锋相对的反应，坚持说我们决不接受任何条件（这话出自联系论的一位主要倡导人之口，是很不老实的）。多勃雷宁利用我自己的相互联系的论据来反对我，坚持说，莫斯科讲的是实际情况，不是提条件。多勃雷宁这样乖巧地向我学习，我却并不感到高兴。四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北京的邀请最后肯定的前一天，我警告多勃雷宁，不要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耍花招；下次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应该准备发表一项公告。

下次的讨论是六月八日在戴维营进行的，由我邀请多勃雷宁对美苏关系作一次全面的考察。多勃雷宁有意讨好，断言据他估计尼克松会重新当选，因而根据这一理由建议，最高级会谈不必急于举行。柏林谈判完成之后，最高级会谈自然就会来临。这是玩弄一个不必要的小花招，因为葛罗米柯必定知道——尽管费林大谈其史诗般的神话，说他不知道——我们正准备早日缔结协议。

那时，我去北京的计划差不多已订好。六月八日在戴维营，我更加担心的是苏联人过早地把最高级会谈的日期定下来，倒还不是想找到一个彼此满意的日期。我最不希望的一件事就是在我赴北京的途中公开宣布美苏关于最高级会谈的协议。因此，我要求多勃雷宁在六月底给我以肯定的答复（我在七月一日将作十二天的亚洲旅行）；否则的话，九月举行最高级会谈就办不到了。多勃雷宁无疑认为我确定这个最后日期表明我已等得着急了，若不加以利用实在可惜。其实，这是一种慎重的反应，我们是想确保在这场赌赛中赢得胜利，而苏联人对这场把戏的性质却还莫明其妙哩。

七月五日，当时我在曼谷，也就是离到达北京还有四天，莫斯科又拒绝了它原先提议的九月那个日期。多勃雷宁的助手伏龙索

夫向黑格递交了一封复照，黑格于凌晨三时用双关语（那是无知的孩子也会懂得的）打电话通知洛德。苏联的照会不仅推迟了最高级会谈，而且还提出了更多的条件。照会承认最近某些问题的讨论已有进展（指柏林问题）。“同时，还不能完全确定能否如所期望的那样尽快达成协议。”苏联人提出的双方可以接受的时间是将近一九七一年年底。宣布日期还要另行谈判“确定”——换句话说，即再次拖延。文件的最后一段暗示，苏联人不仅以柏林谈判作为最高级会谈的条件，而且还要求美国在各方面都要克制（也许指的是越南问题）：“双方决不可让自己的行动使局势不利于会谈的准备和举行，并减少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机会。”

我电告黑格，伏龙索夫的照会对我们有利。我们现在可以按照我们希望的先后次序来完成两次最高级会谈了。苏联想要因为我们打开了对华关系而责备我们没有诚意就更加困难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而是一个有利因素）。如果苏联人还想继续进行最高级会谈，——我想很可能是这样——那末会谈将在对谁有利的情况下举行，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前面我已讲到，我还指示驻波恩的肯·拉什，在两周之内暂缓进行柏林会谈。

我们不能完全忽视政府中所有那些一流的苏联问题专家们的意见，他们认为打开对华关系可能促使苏联的政策转趋强硬。我虽然不同意这种判断，但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做到万无一失。七月十五日，在发表我去北京的公告之前约四十五分钟，我们通过伏龙索夫向苏联领导人递交一封信，委婉地提醒苏联政府注意“在这一公告之前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重申，我们愿意继续改善关系。我们着重指出，七月十五日的公告不是针对任何国家的；但对于一切后果，我们也作好了准备。

正如前面我们对苏联动机的分析讲到的，没有必要担心。苏联领导人决不会向客观因素挑战，而是去适应客观因素。他们不

打算无可挽回地把我们赶到中国一边去；而是在考虑他们必须拿出更多的东西来。总而言之，克里姆林宫在三角关系中很不高兴扮演它的角色，它无疑是在等待一个机会，以便扳成平局，但事件的逻辑不给它选择的机会。

七月十九日，也就是全世界都知道尼克松即将访问北京之后四天，我去见多勃雷宁，这一回他是满脸堆笑，一味讨好。现在他完全赞成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了。他的问题是：莫斯科最高级会谈能否在北京的最高级会谈之前举行？我作为个人的意见对他说，两次最高级会谈应该按照决定的先后次序举行——完全象我在北京所说定的那样。多勃雷宁无疑为无法向莫斯科交代而十分苦恼，因为他不曾预见到我们的行动；他表示遗憾，说我们事先一点儿也没有向他提过。他回想过去，也承认这样要求太过分了。他不断地追问，是不是苏联拒绝尼克松在九月间访问产生了什么影响（也许他是想把一部分责任推给他的上级）。自从公布了我去北京访问的消息之后，他的腔调和举动都变了样。既然很明显我们有其他的选择，那种胡萝卜和大棒轮番使用的恼人做法也就无影无踪了。他断言，我们完全误解了他们七月五日的那封信。那封信仅仅是因安排有困难才发出的，并不说明对高级会谈不感兴趣。由于苏联领导要在十月份访问法国，才建议十一月或十二月举行最高级会谈，那主要是表示一个程序性的希望。我不愿提醒他十四个月以来的经历和那种猫抓老鼠似的把戏。

苏联人的新策略是明显的。我已讲过，它是想表明，在三角外交中北京只能使我们走一步，但与战略全局无关；莫斯科却能给我们以实际的好处。正如勃列日涅夫后来所说的，尼克松到“北京去赴宴，但到莫斯科来是办事。”莫斯科想用这种办法使北京透彻了解，它并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与莫斯科为敌已招致大军压境；如想打开与华盛顿的关系，那就只能使莫斯科再次表明，它的本钱更

雄厚。

没有必要去纠正苏联的想法。让这两个共产党国家竞相与我们搞好关系，这只能对和平事业有利；这正是三角战略的真义所在。在这种扑朔迷离的关系中，我们的方针是对各方都采取正直的态度。从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看，让苏联控制中国或者把中国重新赶向苏联一边，是对我们不利的。因此，我们决不可鼓励苏联把中国搞到软弱无能的地步。实际上，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我深信，一旦苏联进攻中国，我们不会袖手旁观——这个看法，在我的同事中是很少有人赞同的。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凭主观愿望去挑起这种事件。中苏关系紧张是按照本身的逻辑发展的，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我们也不能直接操纵这种关系。我们的行动肯定会影响这两个彼此敌对的共产党国家；它们都想把我们推向对其本身有利的方向；它们在确定与对方的关系时都要考虑我们的意图和行动。但要想操纵它们，那就会使我们成为它们的俘虏。我们没有能力去煽动一场我们根本不了解其根源的冲突；要想这样做，那就很可能引起双方都对我们进行讹诈。

我们必须谨慎从事。我们可以与苏联达成我们认为对我们国家有利的协议。但我们决不可鼓励共同统治世界的幻想，而且我们要抵制莫斯科对中国或对其他地方施展霸权的企图。我们要把我们与苏联谈判的情况告诉中国，而且相当详细地告诉它；我们要考虑北京的看法。我们决不可签订针对中国利益的协议。但我们不会让北京对我们的行动有否决权。这种三角关系一开始，我们就对双方严格遵循这些原则，但由于莫斯科是较强大的一方，我们对它介绍情况要简略得多，次数也少得多。

一九七一年八月初，我建议总统开始与勃列日涅夫直接联系。在这以前，两国最高领导人很少交换信件，而且一直是与柯西金联

系的。但这次党代表大会已清楚表明，多勃雷宁也曾加以强调，自此以后，勃列日涅夫要多关心外交政策了。因此，八月五日尼克松致函勃列日涅夫，——信件是我的工作人员和我拟定的——概述了我国对苏政策的基本要点。信件重申了尼克松就职以来我们一向强调的主张：两国关系的进展要求具体解决问题，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接着又按照既定方针扼要地表明了我们对其他问题的看法。信件强调，我们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工作将继续进行，这项政策不是针对苏联的，而是贯彻我们建立稳定的世界秩序的思想。

这封信发出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加快了步调。苏联信件的语气缓和多了。前三个月苏联所提的那些条件以及对美国总的行动所附加的例外条款都不见了。八月十日苏联人对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发出了正式邀请，日期是一九七二年五月或六月。苏联的照会表示，它"欢迎"北京与华盛顿关系正常化，但预先声明，一切要以这种关系如何发展而定。吹起口哨过坟场，照会故作镇定，它断言，苏联人不会被"暂时的考虑"所左右，"不管这种考虑看起来是多么重要"。我们想利用这种三角关系固然会破坏这种关系，但同样真实的是，苏联人宣称这种三角关系无关紧要，也是不能摆脱它所产生的影响的。

不管口头上怎么讲，以后发生的事情表明，莫斯科是懂得现实的。总统要访问北京的消息公布之后，有关柏林的未决的问题就在一周之内获得使我们感到满意的解决。关于突发战争的协议也于八月底完成，协议规定在发生技术故障的时候双方迅速取得联系，并且完全没有反华的含义。这项协议于九月三十日即葛罗米柯每年来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在华盛顿签字。在我们所有的其他交往中，莫斯科的腔调都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共处，至少是暂时的共处，实现了，不是由于刹那间就有了远见卓识，而是由于

我们协助形成的这种国际均势所使然。

八月十七日，我告诉多勃雷宁，我们接受了最高级会谈的邀请。这个月的其他时间就用来起草一项公告，要象在北京起草的那项公告一样，避免使双方看起来是在向对方恳求。九月七日，多勃雷宁和我最后完成了一个折中的文件，表明美苏关系有了很大进展，两国领导人将于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下半月在莫斯科会晤。公告将在葛罗米柯访问华盛顿之后于十月十二日发表。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葛罗米柯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表露出愉快的神情，他所使用的双重否定的词语全都是肯定的意思。他声明，莫斯科认为美苏关系是世界和平的中心问题；勃列日涅夫将亲自处理这个问题。他表明对中东问题要采取新的做法；一旦获得最后解决，苏联将从埃及撤走它的战斗部队（关于这个问题，第三十章中还要详细谈到）。他甚至还建议向河内转达消息。他表明，他对迅速完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确实是很关心的。

也象一年前一样，事先安排好尼克松把葛罗米柯带到总统办公大楼他的私人休息室里去见面。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时我们的官僚机构中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最高级会谈已经达成协议，更不用说那个拟好的公告了。尼克松私人会晤从休息室里出来后，满面春风，告诉国务卿说，他和葛罗米柯刚刚确定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计划，造成一个印象，好象葛罗米柯带来了邀请信，尼克松当场接受了邀请，他们两个共同商定了那项公告。（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使尼克松成了主要的谈判人，从而也就减少了罗杰斯和我之间的紧张关系。）葛罗米柯显得有些迷惑不解，但面无表情，沉着镇定，他毕竟是在无比冷酷的克里姆林宫政治中经受过几十年的锻炼的。

第二天我在苏联大使馆会见葛罗米柯。接待的气氛真是热情极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限制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关

系问题上，不再拖拖拉拉了；而是相反，葛罗米柯明确表示，为了举行最高级会谈，莫斯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两项协议。葛罗米柯还主动地表白，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即将访问河内不是由莫斯科倡议的，而是应北越人的紧急请求才去的。他很想知道，我们是否赞成在西贡建立一个既不包括共产党人也不包括阮文绍的"中立"政府。我回答说，我们不会把推翻阮文绍作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但对于在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由各种力量参加的一种政治局面，我们没有什么意见。这本来是重申我们一贯的立场，但葛罗米柯故意把它看作是一个重要消息，说愿意向河内转达。我们同北越有直接联系的渠道，我看不出由苏联来调解有什么必要；我们很难断定，这个调解人是否了解全部细节，是否象我们那样关心如实地转达情况。我想起了两年前万斯出使莫斯科时所抱的想法，因而建议赴莫斯科与北越的一位高级领导人举行谈判，如果河内认为有某些迅速解决的希望的话。

这一建议遇到了官僚主义造成的困难。自从我秘密访华以来，苏联人很希望我去访问莫斯科准备最高级会谈，得到与北京完全相同的待遇。（既然有秘密的北京之行，他们也希望我来一次秘密的莫斯科之行！）葛罗米柯首先提出邀请；十二月一日又提出书面邀请。这种邀请也反映了实际需要。最高级会谈期间很难进行谈判。会谈有时间限制，礼节性活动太多，若想会谈成功，任何重大协议都必须事先拟好。根据我国政府的组织情况，我是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对话人。

尼克松原则上同意我访问莫斯科，但是他想不出办法如何执行，同时又与罗杰斯搞好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我同意他的看法，因而从来没有催过他，一直到后来在预定的最高级会谈之前七个星期北越人对我们发动了攻势，迫切需要立即与勃列日涅夫联系的时候，我才催他让我去访问莫斯科。尼克

松不让罗杰斯去访问莫斯科已经快三年了，部分原因是他想成为访问莫斯科的第一个高级美国人，另外也还因为在这段时间内他和罗杰斯很少彼此去了解对这些问题的想法。但派我去访问——那时事情已很紧迫——又会不必要地伤感情。

在莫斯科举行越南问题高级会谈的建议，也和那次万斯访问的倡议一样没有成功，只不过这一次得到了一个正式答复而已。十月十六日多勃雷宁正式通知我们，河内愿与我们直接谈判，而不愿通过莫斯科。

在一九七一年里，我们的一些经济组织不断催促，要求放宽对苏联的贸易限制，我们都拒绝了。我们的战略是利用贸易上的让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当苏联人的行为带有冒险性时，我们就拒绝让步；当苏联人表现合作时我们就酌情作一些让步。一般说，我们赞成搞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来完成的项目，这样我们可以对苏联的行为不断地施加影响。我们在面对着经济机构和国会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确定了一项计划，由一家美国公司向苏联一家位于卡马河畔的民用卡车工厂出售齿轮切削机器，为期两年。我们接到了许多坚决反共分子的恐吓信，直到他们看到他们会得不到利润时才停下来。苏联同意了我们五月二十日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妥协方案后，这家工厂很快得到批准。有关卡马河工厂的其他一些项目则暂不批准，直到我的北京之行宣布之后柏林谈判取得突破时才予以批准。印度—巴基斯坦危机期间，我们又把一部分项目停下来。当时任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助理的彼得·G·彼得森作了有效的配合，把所有这类经济上的决定都服从于我们对外政策的战略。一九七二年他出任商务部长后，也灵活机智地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当时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一直施加压力，终于使尼克松总统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宣布了一九七二年五月在莫斯科举行最

高级会谈。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局面，但在一年之内我们就打开了对华关系，缓和了与莫斯科的关系，缔结了柏林协议和突发战争协议，并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突破。越南问题在这一年里也可说有进展。这个问题仍然支配着很多人的情绪，但现在已不再是一个举国关注的问题，而只是被看作过去遗留下来而正在解决中的一个痛心的问题了。河内知道了它的两个最大的共产党盟国不管印度支那战争在进行，却都跟华盛顿改善关系，不能不受到影响。这肯定会改善我们的谈判地位。除此以外，我们的种种创举已开始消除那种认为越南问题会侵蚀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信心的恐惧心理。我们已经表明，美国在剧烈的痛苦中仍能大有作为。我们看到了建立未来国际新秩序的希望，这种新秩序将反映我们时代的现实和渴望，而且要靠美国的远见和献身精神来实现。

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尼克松在我的帮助下坚持由白宫掌握外交政策而取得的。一九七一年，对于一些重大的主动行动，不仅是策划，而且包括具体执行，我们统统都抓起来。我在此书中已说过，我不认为这些办法从理论上来说是可取的；它们当然不能经常使用。不过，在这种“制度”下一个总统要改弦易辙，是很困难的。各部和各种机构宁可取得一致意见后才开始行动。他们制定政策喜欢通过一套批准手续，这样也就搞不清是谁的主张，因而也就没有明确的方向了。他们倾向于赶时髦。他们避免彼此对立，避免与新闻界和国会对立。可是当遭到挫败时，他们在反总统的政治斗争中却决不退缩，他们就会泄露机密，最严重的甚至于鼓励国会施加压力。所有的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有必要摆脱那套履行审批手续的官僚主义积习，摆脱那些没有政治方向单纯追求私利的经济机构，因为它们会使总统寸步难行。毫无疑问，尼克松为取得支配权做得太过分了。那些机构中有很多忠心

耿耿的人是愿意帮助他的。但如对中国的主动行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中东问题，前面的叙述已经表明，我们的许多想法是会跟那些固定的见解相矛盾的。

尼克松宁愿绕过那些程序而不愿实行纪律，这反映了他的个性。这种做法没有改变问题的性质，任何一个立志革新的总统还会遇到这个问题。尼克松顶住公众的巨大压力而作出果断的决定，他的战略才能，他的个人奋斗的精神，他敢于冒战争之险也敢于冒谋求和平之险的勇气，这一切都理应使他获得很大的荣誉。他的行政工作作风是怪诞的，给人的印象也是不好的，但历史必定会记下这一基本事实，即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已证明用通常的程序是无法做到的。

我们对苏联的动机不抱任何幻想。但过去我不同意、现在仍然不同意那种说法，即在政治斗争中我们一定不是苏联人的对手。的确，只要我们不怕探索共处的前景，我们国内是能够支持这种斗争的。只有那样做了，我国人民才能团结一致去制服对方的挑战；这也是能把我们的盟国团结起来的唯一方针。无论苏联人想要谈判还是想要对抗，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美国必须捍卫和平，但也必须做到，这种和平是一种公正的和平，而不要成为单方面的一味退让。

我们是在利用这个谈判的时代来实现我们争取和平、保卫自由的目的。我在向尼克松汇报九月三十日我与葛罗米柯谈话的内容时这样写道：

即使按照这个新的“积极的”方针去做，我们也只能预期苏联人追求自己的利益，顽强地为他们的朋友讨价还价，一如既往地施展各种手段。但你将举行的两次最高级会谈及其相互作用使我们可以施加有益的影响。如果我们的牌打得对，我们有希望取得某些建设性的成果。

① 例如，理查德·尼克松著《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斯特和邓洛普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五二三页。参见马奎斯·蔡尔兹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

②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华盛顿明星报》：《美国在国防支出问题上的分裂，马斯基告诉苏联总理》。

③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日《华盛顿明星报》：《向参议院小组报告裁军谈判的进展》。

④ 一九七一年二月四日《华盛顿邮报》：《美国谈判代表对限制反弹道导弹会谈的证词》；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华盛顿邮报》：《福斯特要求全面禁止原子弹试验》。

⑤ 一九七一年五月四日合众国际社。

⑥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纽约时报》：《参议院再次就反弹道导弹问题进行辩论》。

第二十一章

偏袒：一九七一年的印巴危机

悲剧的起源

每届政府都会碰到一些使人类预见能力的局限性戏剧化地表现出来的事件。在越南问题、向中国开放问题以及同苏联正在开展的关系都还捉摸不定的那个年头，几乎没有什么事比南亚出现一场危机更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愿望。似乎是为了强调我们一切计划工作都是靠不住的，这场危机居然是一场飓风触发的。

印度次大陆南临印度洋，北面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界，西面是高耸入云、似乎决心使芸芸众生与外界隔绝的兴都库什山脉，往东逐渐消失在孟加拉的沼泽与河流中。几千年来，这个次大陆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它的北方平原夏天在使人精神萎靡的热浪中受到炙烤，冬天又受到不调和的寒霜侵袭；它绿色葱茏的南方孕育着宁静安恬的生活。这里的人民语种庞杂，说明曾经有一批又一批征服者穿过高山隘口、越过邻近的沙漠、有时则跨海过洋光临此地——匈奴人、蒙古人、希腊人、波斯人、莫卧儿人、阿富汗人、葡萄牙人，最后是英国人在此建立帝国，然后一一消失。他们来了又走了，留下大批人群，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印度不同于中国。中国成功地在入侵者身上打上自己法律和文化的烙印，使入侵者逐渐同中国人混为一体，难以区分。印度不是通过同化、而是通过隔离的办法战胜外来者的。似乎是为了在极为冷淡的气氛中使自己相信自己的伟大，入侵者可能为自己的

重要性树立精美绝伦的丰碑，但是印度各族人民创造了一种几乎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关系，使自己的存在延续下来。同中东一样，印度是伟大宗教的发源地。但是和中东的宗教不同，这里的宗教信仰的不是欢乐，而是忍耐；它们感化人的办法不是预卜慈航普渡的前景，而是证明人的存在朝不保夕；它们不是使个人得到拯救，而是使人懂得命中注定的道理从而得到安慰。在人们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就分为等级的地方，个人失败从来不是个人问题；检验人的质量的标准是忍受命运摆布，而不是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种姓制度对坚决要在现世寻求满足的文明是缺乏吸引力的。它使人具有非凡的适应力，并从遥远的展望中得到安慰。印度教自命不凡，自成一体，不接受皈依者。一个人如果不是生来就是印度教徒，就永远得不到这种宗教所带来的舒适和有保证的地位。面对这种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状况，外国的征服归根结蒂只是过眼烟云，并不能使非印度人在印度社会中得到尊贵的地位。这种情况使印度文明在数百年外国统治下得到保存，有时甚至兴旺发达起来。当然，这么多次入侵必然不仅在建筑艺术方面、而且在人文方面也留下遗迹。穆斯林征服者（他们代表一种鼓励皈依的宗教）为低种姓的印度人通过大规模改变宗教信仰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提供了渠道。他们只得到部分成功，因为一旦改信伊斯兰教，这些新皈依者甚至连低种姓地位应当得到的那种尊敬也丧失了。使次大陆几代人陷入分裂的宗教仇恨的种子就是这时播下的。

英国只是最晚来到的征服者之一。它在北方取代了信仰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统治者和某些印度统治者，在南方扶植起土生土长的印度统治者——看来似乎是实行了多年的交替轮换办法。但是英国的征服有一个重要不同之处。的确，这种征服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英国按照已经成为传统的方式用一批统治者代替了另一批统治者，其心理基础是当时还不存在国家概念。但也正是英国，使

过去只是一个宗教、文化和地理概念的次大陆具有了政治特性。英国人使它第一次拥有了单一的政府、行政管理和法律结构，然后又提供了西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观念。自相矛盾的是，正是因为英国人给次大陆灌输了民族和民主观念才使英国人成了“外国人”，并把一种文化表现变成了一个政治运动。英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印度领导人要求把他们的统治者的价值观念应用到他们的人民身上。英国的抵制是半心半意的，说明它在实际战斗开始之前就已经在精神上输掉了这场战斗。

当成立国家的前景出现时，那些被入侵的洪流卷入印度的说各种不同语言的民族面临着各自日益增长的人口、极度的贫穷、特别是处理他们的相互关系等问题。整个人口中将近三分之一是穆斯林，他们集中在西旁遮普和东孟加拉，但在印度各地也都有小块然而重要的聚居地区。他们当中许多人现在已成为被印度社会遗弃的人；他们不能接受一个由数百年来一直鄙弃他们的那些人占统治地位的世俗国家。英国人一九四七年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按宗教不同实行分治。

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就是这样在难以描述的恐怖行为和宗教骚乱中诞生了。巴基斯坦由两部分组成：西巴由旁遮普人统治，东巴由孟加拉* 人统治，中间隔着一千英里印度领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把他们捏在一起的不是经济或历史因素，而是伊斯兰教和对印度统治的共同恐惧。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同其他独立运动领导人一样，梦想取得前殖民国家统治的全部领土。对他们来说，巴基斯坦的存在就是一种侮辱。在印度眼中，这个毗邻的穆斯林国家对他们的民族团结还是一种潜在威胁。还有五千多万穆斯林留在印度统治之下。他们迟早会要求承认他们的民族地位，

* 一九四七年分治时孟加拉也一分为二。东部成为东巴基斯坦，西孟加拉仍为印度的一部分。

否则巴基斯坦的创立事实上就是不必要的，是英国人强加于人的——这正是某些印度民族主义者不厌其烦地宣传的说法。至于巴基斯坦，它意识到甚至最低阶层的印度人也把自己看作是一种比穆斯林优越的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对那个较大的邻国充满恐惧、憎恶，有时是仇恨。

尽管印度人和穆斯林一起生活了几百年，但很少相处这样长久的老邻居比他们更缺乏共同点。印度人复杂隐晦，穆斯林则比较单纯直率些。这种差别在建筑艺术的对比上也反映出来。印度寺庙建筑玲珑透剔，大小角落精雕细凿，刻画入微，其含意和给人的印象都不是单一的。穆斯林莫卧儿人在次大陆北部三分之一的地区到处建立的清真寺和堡垒则规模宏大，风格优雅，散发着浪漫气息，其光彩夺目、富丽堂皇同炎热的农村单调平凡的景色适成对比；那里无数的喷泉表达了摆脱严酷环境的渴望和对已经赶走入侵者的比较淳朴的地区的怀念。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不了解这些新成立的国家正在专心致志忙于自己的问题，总是用自己的先入之见看待他们。我们按照表面价值相信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自称为世界事务中不偏不倚的道义仲裁人的作用。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正是弱小民族为取得同其实力不相称的影响而奉行的政策，也没有注意到印度除了在它认为自己命中注定处于优势地位的次大陆外，很少愿意承担风险以适应它的国际抱负。至于巴基斯坦，我们只把它当作反对共产党侵略的潜在军事盟友，而不了解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恰恰是把印度看作对他们安全的真正威胁。我们把印度供奉在抽象道德的万神殿里，而印度则把我们武装巴基斯坦看成是一种挑战，从而破坏了我们希望博得它的好感的尝试。

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获得印度政治上赞许的可能性，同时又错误地判断了巴基斯坦军事努力的目标。我们对印度自称代表"世界

舆论”过分敏感。而我们又想把巴基斯坦包括在它并不接受的遏制概念中去。我们以为共同防御的法律义务对共产党侵略是一种威慑，虽然有关联盟的成员几乎不能增强相互的力量，也很少共同目标。巴基斯坦成了我们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中的盟友，① 因此有资格获得美国武器援助。这种援助的目的是反对共产党侵略，但是印度怀疑它有其他更为可能的用途。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形成的军事联盟在美国引起了争论。在野的民主党以此为例攻击政府过分强调军事方面的考虑。印度成了美国自由派的特殊宠儿。他们从印度实行民主制度的决心中看到结成思想伙伴的基础，从印度希望获得的经济成就中看到对共产党自称代表未来潮流这种说法的最有力的驳斥。毫不奇怪，一九六一年政府易手之后，华盛顿对巴基斯坦的兴趣明显冷淡下来，越来越多地用提供美国保护的口头保证代替了军用品的供应。(这种保证的不断增加反过来在一九七一年使我们难以摆脱了。)整个这段时期，甚至在印度已经建立相当雄厚的军火工业并同苏联发展了牢固的军事供应关系以后，它还一直坚持不懈地、巧妙地努力破坏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军事关系。

一九六五年的印巴战争使我们得到在某种程度上脱身的借口。美国对双方都不再供应任何军事装备(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政策稍有修改，允许提供非杀伤性装备和各种装备的零件)。这种表面上的不偏不倚具有欺骗性，实际结果是伤害巴基斯坦，因为印度大部分武器可以由共产党国家或它自己的兵工厂提供。约翰逊总统意识到这种行动的片面性，答应通过土耳其一类的第三国安排把若干行将过时的美国坦克转让给巴基斯坦。但是他根本没有完成这项交易，一个原因是他不愿意把国会日益减少的支持，用于对他来说显然已是无足轻重的决定方面，另一个原因是第三国改变了主意。

我自己在次大陆的经历本来应当使我预见到那里存在的激烈情绪。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从技术上说还是肯尼迪总统的顾问。那时，美国新闻署安排我去次大陆发表一系列演讲。我国驻印大使、我的好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颇为不安，担心我这样一个主要由于《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而名噪一时的哈佛大学教授会在那些看来非常敏感的和平主义的东道主当中引起什么反响。我一到新德里机场就使他放下心来，因为我立刻卷入了同巴基斯坦的纠纷。在无法避免的记者招待会上，我用自认为是外交辞令的语言回答了一个关于克什米尔的问题，我说对这个问题还不大了解，无法做出判断。在回答关于巴基斯坦开始同中国调情的问题时，鉴于当时普遍认为中国是侵略成性的，我极不愿意承认自己对这一看来是荒谬的发展一无所知，因此表示我无法想象巴基斯坦会做这样愚蠢的事。巴基斯坦领导人原来就已经感到受了歧视，因为派驻新德里的大使是一位哈佛大学教授，而伊斯兰堡"只"配接待一位职业外交官。不过他们非常谨慎，不愿攻击肯尼迪的一个私人朋友。我在机场对记者讲的话是一次天赐良机，使巴基斯坦报界可以把自己的不满情绪发泄在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肯尼迪的次要僚属身上。我承认对克什米尔问题无知被说成是美国漠不关心的象征。把"愚蠢"这个字眼同"巴基斯坦"放在同一句话里——尽管这句话是否认巴基斯坦愚蠢——也变成了民族侮辱。我只得到一种补偿。巴基斯坦报界的攻击使我在印度陡然声价百倍。因此，至少是在一九六二年，人们对我的指责是偏向印度。

后来，事态终于平静下来，使我可以在同一旅程中在巴基斯坦露面了。我立即证明我并没有丧失自己的本色。当我在开伯尔山口游览后返回白沙瓦时，被一位巴基斯坦记者拦路截住。他问我是否看到任何普什图人动乱的迹象*。考虑到次大陆已有很久没能听到我说俏皮话了，我回答说："即使我迎面撞上，也认不出什么是普

什图动乱。”结果登出来的标题是：“基辛格不承认普什图尼斯坦。”这件事使阿富汗在华盛顿提出正式抗议，但至少使我暂时在巴基斯坦成了一名英雄。如果我按照自己喜欢漫游的习惯去访问阿富汗，很难说我还会得到什么成就。但是根据美国新闻署的判断，这种文化交流的收获已经超过它下的本钱，它认为就我的才能来说，还是回国比较安全。

因此，我也许本来应当更加聪明一点，不使自己卷入次大陆一九七一年的疯狂纠纷。

尼克松政府就职时，我们在次大陆的政策目标很简单，就是避免给自己的议事日程增加麻烦。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二十二年并不安宁的共处中打了两次仗。我们想同双方都保持良好关系。尼克松对印度自己吹嘘的道义领导地位，说得委婉一点，并不像他的某些前任那样容易受到影响；实际上，他认为他们是在奉承印度，并以此作为自由派人士缺乏判断力的重要例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一九六九年的环球旅行中到新德里进行了一次还算成功的访问。他很快就丢掉了幻想，知道他得不到可与艾森豪威尔一九五六年访问相提并论的群众欢迎场面。接待是有节制的；群众场面只能说是得体的；进行的讨论按照公报用语可以说是“建设性的”、“实事求是的”。尼克松在晚宴上发表了一篇娓娓动听的祝酒辞，赞扬圣雄甘地的智慧，并对现代世界和平的性质进行了富有思想的探讨。

但是尼克松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的个人关系，命中注定是无法融洽的。甘地夫人认为自己几乎生来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她这种自负和她那阴郁的沉默激起了尼克松全部潜在的不安之感。她对尼克松的态度既表现出发展中国家

---

* 指边境地区起来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要求脱离巴基斯坦，并同开伯尔山口另一边的、属于阿富汗的语言接近的人联合。

颇为时髦的对资本主义象征的鄙视，又暗示她过去从一些知识分子朋友那里听到的有关总统的那些丑事不可能全是假的。尼克松同她会晤后对她的评语有些是无法形诸笔墨的。另一方面，尼克松能够理解那些冷静地估计国家利益并据以行事的领导人。一旦透过那些刺耳的、自命不凡的辞藻，就会发现甘地夫人冷酷无情地估计各种权力因素的能力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的关系，从实质上说，比他们的个人关系要好得多。

无论尼克松个人对印度总理如何疑虑不安，在他整个第一届任期内，印度始终在国会和美国政府内部拥有一大批支持者。甘地夫人当时还没有进行核试验或实行独裁统治，因此还没有使美国人幻想破灭。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民主国家的感情联系依然存在。美国政府每年提出大量援助拨款，在国会里很少有人反对就通过了。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印度获得美国经济援助四十二亿美元，其中约十五亿美元是尼克松时期给的。

如果说印度得到国会的热情支持但受到总统的冷待，巴基斯坦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巴基斯坦是尼克松下台后尊敬地接待他的国家之一；尼克松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巴基斯坦粗鲁直率的军事领袖也比印度那些复杂而且显然倨傲的婆罗门领导人更投合他的脾气。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在美国、至少是在制造舆论的集团中从来没有像印度那样得到同情。同那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的"进步"口号和富于和平主义气息的伦理比较起来，它并不代表美国人乐于认同的那些原则。此外，印度比巴基斯坦大得多，人口等于其四到五倍。因此我们把同印度的关系放在优先地位是有很实际的理由的。

尼克松除对巴基斯坦语调多少比较热情以外，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过去对次大陆的政策。他和我作为了解情况的仅有的两个高级官员深为感激巴基斯坦所起的通向中国的渠道作用。巴基

斯坦领导人从来没有为这种服务要求任何报答或特殊照顾，这是永远值得崇敬的。尼克松所做的唯一具体姿态——也是为了维护他的前任的诺言——是一九七〇年夏天批准给巴基斯坦提供一小批军事装备。这是作为美国武器禁运中“仅此一次的例外”提供的，其中包括大约二十架飞机和三百辆装甲运兵车，但不包括坦克或大炮。这批装备约值四、五千万美元（也许稍多一点，视所选飞机型号而定)。平均每年增加三亿五千万美元——几乎十倍于巴基斯坦得到的数字——军事购货的印度提出了暴风雨般的抗议。同时，印度还指责我们干涉它的内政，因为我们大使馆——也许是我国外交机构中冗员最多的大使馆——的某些人偶尔会见过反对党领导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执行华盛顿策划的战略，而是在一个拥有自由制度的国家中自然会有的活动；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这种指责是很怪的。不过这场风暴很快就过去了。

到一九七一年，我们同印度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密切然而令人恼火地紧张的状况，就像一对既不能分手又无法相处的夫妇。我们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则是表面上友好而很少具体内容。至少在次大陆，看不出同美国结盟比不结盟有什么明显的好处。

一九七一年初，我们的高级决策人都没有料到次大陆会在我们议程上跃居首位。当时除每年的援助计划和因一九七〇年后期自然灾害造成的悲剧需要给予救济以外，似乎没有需要立即做出决定的问题。次大陆似乎是长远研究的理想主题。一九七〇年末，我曾下令进行三项有关次大陆的研究，其中两项涉及苏联在印度洋的海军实力及其影响，第三项是研究我们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长远政策，包括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目标及其相互作用。这些研究预定都要很久以后才完成；没有料到会出现任何严重危机。

两次飓风

巴基斯坦建国以来一直缺乏持续的法统。这个国家的缔造者逝世以后，没有一个政府是干完自己的任期的。每次改变都是通过某种政变实现的；军人政府和文官政府交替上台，而军方居于统治地位。一九七〇年预计要成立符合宪法的政府。选举将在十二月举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十月庆祝联合国二十五周年时拜访了尼克松。前面谈到尼克松托他给周恩来带信一事就是这次办的。我乘机询问叶海亚选举后总统权力会有何变化。叶海亚信心十足。他预计西巴和东巴都会出现大量政党；这些政党将在这个国家的两翼内部并在两翼之间互相倾轧；因此，总统将仍在巴基斯坦政治中充当仲裁人。

他的预言还来不及受到考验，东巴就在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遭到一场毁灭性飓风的袭击。我书面告诉尼克松，根据大多数报道，这是近百年来生命财产损失最惨重的一次灾难；据信有二十多万人死亡。尼克松下令全力以赴进行救济的计划只触及痛苦的表层。恢复工作十分混乱、缺乏效果。反对派指责叶海亚政府腐败无能，还加上更严重的罪名。这场政治风暴最后变得比自然界的风暴甚至更有破坏性。

或许是这场飓风使反抗中央政府的情绪明朗化了，并增加了东巴的愤懑和对自己特性的认识，也可能是叶海亚对群众情绪一直判断错误，总之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的选举变成了对叶海亚处理危机的方式的一次公民投票，给军事统治者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致力于东巴自治的人民联盟在东部争夺的一百六十九个席位中赢得一百六十七席，从而在共三百一十三席的国民议会中获得多数。因此，人民联盟领袖穆吉布·拉赫曼教长（以穆吉布而知

名）必然要成为东巴无人能与之抗衡的人物，在全国也将具有强大影响。使这场政治戏剧更形突出的是巴基斯坦人民党领袖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在西巴取得了可与匹敌的统治地位。布托反对军事统治，但鼓吹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巴基斯坦；他激烈抗拒穆吉布坚持的东巴自治，而在这方面肯定会得到军方的支持。（实际上，他很可能是为了使军方更能接受他而采取这种立场的。）人民联盟提出了在东巴基斯坦省实行充分自治的六点纲领，只在外交政策和国防方面给中央政府留下某种含糊不清的职责。它建议巴基斯坦两个组成部分分别发行货币、建立外汇帐目、征收赋税、确定财政方针并保持各自的民兵和准军事单位。叶海亚和布托拒绝了这个纲领，认为它等于宣告东巴独立。一场僵局或危机迫在眉睫。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六日，我请各部门共同研究，如果东巴试图脱离巴基斯坦，有什么对策可供选择；二月二十二日，我把自己的分析报告了总统：

（穆吉布和布托）至今未能就新宪法取得任何非正式协议。甚至一点苗头也没有。叶海亚总统仍决定把军人政权移交给民间政客，但表示他将不主持巴基斯坦的分裂。……（穆吉布）现在打算坚持他使东巴取得实际自治的要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很可能是得不到的——就宣布东巴独立。

叶海亚既不愿同布托合作，又拒绝接受穆吉布使东巴取得准独立地位的要求，结果是两头犯难。他推迟召开原定三月初开幕的国民议会，使政治领导人有更多时间清理他们的分歧。但是这个行动进一步增加了东巴的敌对情绪。叶海亚最后把召开国民议会的时间改为三月二十五日，把希望寄托在两位对立的文职人员在可能使国家分裂的僵局面前选择妥协的道路。事实证明叶海亚这次也判断错了。布托无疑是巴基斯坦政治中最有才华的人物，为人

傲慢，意志坚强，后来在他的被肢解的国家中主持恢复工作时表现了政治家的才干和勇气。但是在一九七一年初，他担心妥协会招致西巴群众的愤恨，而正是这些群众的支持才使他接近取得权力。穆吉布也无法制止他自己发动起来的力量。他走向妥协的愿望比布托小得多，而比布托更相信自己的言辞。同希腊悲剧中的人物一样，巴基斯坦这两个深得民心的领导人都拒绝让对方跨过门槛，获得自己也可能得到的权力；他们宁愿向必然低头，而不愿相互让步。

随着紧张程度的增加，我国政府研究了可供选择的对策。三月六日，高级研究小组开会考虑我二月十六日要求在部际小组中进行研究的意见。我们一致认为巴基斯坦无法用武力保住东巴。我向各部门明确指出，总统不愿同叶海亚对抗，但白宫不反对其他国家去说服叶海亚放弃使用武力。如果巴基斯坦分裂，这应是它内部的力量造成的，而不应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各部门一致同意，美国不应牵连进去。这也是同巴基斯坦的历史渊源更久的英国的政策。

三月间，我们体验到多数危机到来时特有的那种混乱状况。穆吉布在三月七日一次重要讲话中没提要同西巴完全断绝关系，但要求取消军事管制，恢复人民统治，明确表示他的目标仍然是“解放”东巴。叶海亚宣布他将于三月十五日飞往东巴省会达卡同穆吉布谈判。在此期间，印度总理甘地在三月初的大选中获得巨大胜利。到那时为止，巴基斯坦的事态一直还是一个友邦的内部问题；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不成其为外交政策问题。甘地夫人忙于竞选和处理选举后的迫切问题，采取了不干涉政策。迟至三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常务负责人特·纳·考尔还对我国驻新德里大使肯尼思·基廷说，印度希望巴基斯坦保持统一。三月十七日，印度驻华盛顿的手腕灵活的大使 L·K·杰哈向我表示了同样的

意思。两人都没有提供丝毫迹象说明印度将把毗邻的东巴出现的麻烦当作影响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

但是知名人物的神经有时也会突然绷断的。当他们不能耐心等待事态的发展时，就想勉强加快步伐，结果就会失去平衡。叶海亚就是这样。他以不到四万人的兵力，却决定对东巴的七千五百万人民实行军事统治，镇压人民联盟，逮捕穆吉布·拉赫曼教长。

这样一来，巴基斯坦危机就变成了国际问题。

军事镇压

现在也还不十分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叶海亚在三月二十五日采取那种不顾一切的行动的。毫无疑问，孟加拉群众辱骂了几乎完全来自西巴的巴基斯坦士兵。穆吉布的所谓自治看来同独立没有什么区别。几乎所有国家都会为自己的统一而战斗，即使心怀不满的地区压倒一切的情绪都要求分裂也罢。美国的内战是如此，尼日利亚对比夫拉是如此，刚果对加丹加也是如此。但是巴基斯坦与众不同的是：要求脱离的省分同西巴中间隔着一千英里印度领土。忠实于国家一翼的少量部队根本不可能无限期压服另一翼的七千五百万人。孟加拉当地对巴基斯坦统一的支持一旦消失，巴基斯坦的完整就结束了。即使印度不加干预，也肯定会出现一个独立的孟加拉国。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个变化将以什么方式出现。

我们同英国一样，希望尽可能对此保持超然态度。我们甚至得到消息，说西巴怀疑我们可能赞成东巴独立，其实英国和我们都不愿被人当作巴基斯坦解体的替罪羊。我们没有多少手段去影响局势。而且我们有一切理由要保持巴基斯坦的善意。巴基斯坦是我们通往北京的关键环节，并且是中国最亲密的盟国之一。我们

十二月份通过巴基斯坦传递信息，原则上接受派遣美国密使前往北京的想法。三、四月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即将有所反应。四月就出现了乒乓外交。

危机的第一阶段，美国政府——甚至那些毫不了解我们对中国的主动行动的人——一致认为应当避免仓猝行事。在三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我重申自己的看法，认为这场危机将引起内战，而且相当快就会导致东巴独立。国务院代表指出，英国不愿采取行动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我对同事们说："我在午餐前同总统简短地交谈过。他的倾向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他不希望采取任何行动。他不愿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使别人可以指责他曾鼓励巴基斯坦分裂。他不赞成一项很积极的政策。"

然而要求采取积极政策的压力开始增加。四月份开始收到有关巴基斯坦在孟加拉的暴行的报道，引起普遍的、理所当然的愤怒。我国驻达卡总领事给华盛顿发来电报，要求美国对巴基斯坦的镇压采取公开反对的立场；领事馆其他成员也在四月初联名发来一封类似的电报。国务卿罗杰斯对我说，他认为外交人员不写报告而写请愿书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但是，按照下级在想使上级无可抉择的情况下喜欢采取的办法，电报是以较低的保密等级发来的，因此得到广泛的传播。向国会和报界走露风声是不可避免的。曾经访问东巴的一位巴基斯坦编辑为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写了一篇描绘军队屠杀情况的第一手报道。我国驻新德里大使肯尼思·基廷向华盛顿报告说，他"对这种屠杀深感震惊"，并"十分担心人们很容易把美国同这种军事恐怖统治做有损美国荣誉的联系"。他主张美国立即公开以显著方式对"这种野蛮行径"表示遗憾，私下对叶海亚·汗进行干预，取消我们"仅此一次的例外"，立即暂停向巴基斯坦交付任何军用物资。

我们感到左右为难。美国不能对杀戮了数以千计的平民并使

几百万人逃往印度寻求安全的野蛮军事镇压表示宽容。巴基斯坦军方采取了高压手段，这是无可怀疑的。但巴基斯坦是我们通往中国的唯一渠道；这条渠道一旦关闭，就要耗费许多个月的时间另行安排。不仅如此，这个问题在华盛顿提出的时间正赶上越南问题引起的另一次周期性动荡。一场规模浩大的不服从运动订于五月一日举行。对于某些批评者来说，我们在巴基斯坦问题上保持沉默——其理由我们又不能加以解释——是说明政府对道义问题普遍麻木不仁的另一征兆。他们不可能接受所谓政府在两种相互冲突的迫切需要之间左右为难的说法；某些人出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出现任何问题时都要破坏政府的立场，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会使我们在越南的努力彻底失败。政府的反应也同样表现了胸襟的狭隘；关于道义上麻木不仁的指责是有某些道理的。尼克松下令把我们的总领事调离达卡；他讥嘲基廷“已被印度人接管”。越南战争带来的悲剧之一就是使我们不可能就外交政策进行合乎理性的辩论。

国务院自行其是地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它完全不了解我们对中国的主动行动，并受到国务院中倾向印度的传统偏见的严重影响，所以在四月初——未经白宫批准——就开始对巴基斯坦实行新的武器禁运；它暂停颁发出售军火的新许可证，已经到期的许可证也不得延期使用；它推迟了从国防部存货中运交的项目，使根据一九七〇年的“仅此一次的例外”提供的一批物资搁置起来。对巴基斯坦切断了价值约三千五百万美元的军火供应，使渠道里只剩下约五百万美元的涓涓细流。（这五百万美元七月初还在国会里引起了争论。）国务院还在未经白宫批准的情况下开始减少给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它用了一个巧妙的借口，说是由于发生内战，现行计划已无法在巴基斯坦全境实施了。我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里的专家哈尔·桑德斯写信告诉我，国务院正从超然

态度转向同巴基斯坦政府脱离关系的态度，但是“他们还不承认自己是在这样做，而是用技术理由解释自己的行动”。

任何熟悉尼克松的态度的人都十分清楚这种做法是违背他的意愿的；至于那些不熟悉的人则应当去同白宫核实。这种无视总统特权而擅自抢先的做法很能说明尼克松（以及我自己）后来为什么要采取那种态度。整个四月，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政府工作过程加以控制，目的有两个：既要保持通往北京的渠道，又要保持在巴基斯坦取得政治解决的可能性。那时，伊斯兰堡已不只是一个联络点，而且可能成为我前往中国的出发点。当时也开始出现种种迹象，说明印度为解决几百万孟加拉难民——这无疑是一种负担——问题提出的建议并不是帮助难民回国，而是加速巴基斯坦的解体（至少是使两个目标合二而一了）。三月三十一日，印度议会一致对孟加拉人表示全心全意的“同情和支持”。早在四月一日我就报告总统说：“印度似乎是在采取一种公开外交和秘密行动相结合的方针，这种方针将使次大陆已经很紧张的局势更加紧张，并有触发更广泛、更严重的国际危机的危险。”四月十四日，加尔各答成立了一个孟加拉国流亡政府。四月中旬，我们收到的消息说印度正在训练孟加拉难民，使他们到东巴进行游击战（即所谓解放军）。四月底，我们获悉印度即将使第一批共两千名游击队渗入东巴。

我认为克制政策是正确的。这是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的判断，同我们和中国的联系毫无关系。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尼克松政府的战略，无论好坏，目的不是对一个国家的主权提出肯定会遭到拒绝的挑战，而是在不公开对抗的条件下施加我们的影响。现在回顾起来，我认为我们有时把这个基本正确的方针执行到了迂腐的程度，以致使可能的支持者转而采取敌对态度。就巴基斯坦的情况来说，这个战略似乎是妥当的，因为它的政府是我们的

盟友，而且我们深信它一定很快就会认识到自己采取的方针是徒劳无益的。我们设法说服叶海亚·汗向承认东巴自治的方向采取行动，以朋友身份劝他采取某些步骤，而这些步骤如果我们公开提出几乎肯定会遭到他的拒绝。正如四月二十九日我在给总统的信中说的那样，中央政府"可以承认使东巴逐渐获得更大自治权的必要性，从而得到孟加拉必要的合作。因此，我们似乎面临着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东巴将获得更多自治权、或许最后获得独立。"但是，我指出，印度的政策必然同这种解决办法背道而驰："通过训练和装备一支人数较少的孟加拉抵抗力量，印度就可以帮助积极的抵抗继续下去，增加开展持久游击战的机会。从一切迹象看来，印度是打算奉行这种方针的。"

按照我们惯用的程序，我在四月份请国务院根据危机发展的情况就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政策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建议，以供总统抉择。一个大致的决策将使处理对巴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等具体工作有章可循；鉴于国务院已经开始朝它自己希望的方向行动起来，这种决策就尤其必要。国务院照例把它喜欢的方案夹在荒谬得根本不可能作为决策依据的各种方案里面。（例如，有一个建议是全力支持叶海亚。这既不代表白宫的信念，也不是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我从国务院提出的各种方案里提炼出一个建议。考虑到国会和公众的愿望，我建议总统批准国务院四月初未经授权采取的关闭军用物资供应渠道的行动，只允许某些零件和非杀伤性装备通过。我还建议用经济援助作为导致政治让步的诱饵，"作出认真努力，帮助叶海亚结束战争，并做出向东巴自治过渡的安排"。尼克松五月二日批准了我的建议，还亲手写了一个批语："致全体成员。不要在此时此刻去压叶海亚。尼克松。"

但是我们碰到三种障碍：印度的政策，我们自己的公开辩论，还有我们官僚机构的缺乏纪律。

五月十八日——当我们同伊斯兰堡安排去北京秘密旅行的准备工作已经相当深入的时候——甘地夫人在一次公开演说中警告巴基斯坦说，印度“完全准备战斗，如果有人把这种形势强加给我们的话”。印度大使也提醒英国和法国说，鉴于难民已如潮涌，印度“可能被迫采取行动以维护国家利益”。当时估计难民已达二百八十万人。② 难民造成的负担确实极为沉重；宗教骚动的危险也不能排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越来越怀疑甘地夫人意识到了一个更大的机会。随着巴基斯坦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她看来首先是要使巴基斯坦受到屈辱，或许还试图把东巴的离心倾向扩大到西巴去。当美国同意承担救济难民的主要费用时，印度又转而坚持没有政治解决就不可能解决难民问题。然而印度为解决问题提出的条件又不断升级。当美国提出为减轻东巴饥馑出力时，印度——同美国国内许多人一起——要求由国际机构来执行救济计划。表面的理由是保证救济物资得到公平分配，但这种做法也使巴基斯坦政府不能借此提高自己在人民中的声望。

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们从迄今一直可靠的来源获悉甘地夫人已下令制定计划，要通过一次“以色列式”的闪电战接管东巴。我们还拥有无可置疑的证据，说明印度正在分散飞机，向边境调派战斗部队和装甲部队。尼克松十分认真看待这些消息，所以在五月二十三日下令在印度发动这种进攻的情况下切断美国给印度的经济援助。五月二十六日，我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研究我们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政策。在这前后，我们获悉印度军方领导人认为甘地夫人进攻东巴的建议过于冒险。他们担心中国干涉，担心其他国家（特别是伊朗）会给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苏联武器的补充并不可靠，并且可能要占领巴基斯坦全境才能结束战争。印度的司令官们坚持至少要等到十一月喜马拉雅山脉的气候使中国更难于进行干涉的时候。

在甘地夫人着手系统地消除这些反对意见并等待山区降雪的时期，我们得到了一段喘息时间。(我必须强调指出，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多数人并不像我一样相信这些消息；多数高级官员认为印度不大可能进攻。)我们利用这段间歇时间首先加紧给难民提供援助；原来在春天授权使用的二百五十万美元，最后增加了一百倍，达到二亿五千万美元。与此同时，我们大力要求巴基斯坦采取政治和解步骤，敦促叶海亚首先使东巴救济工作国际化，然后提出政治方面的建议。我们还建议用文官代替东巴的军人省长；我们成功地使巴基斯坦宣布，除具体的刑事罪犯外，对所有的人实行大赦。

五月二十八日，尼克松致函甘地夫人和叶海亚·汗，概述了我们的政策。给叶海亚的信措辞并不强烈；这反映我们需要叶海亚作为通向北京的渠道。但信件使人毫不怀疑我们是赞成用政治办法而不是用军事办法解决东巴问题的。尼克松感谢叶海亚愿意接受救济工作的国际化，鼓励他继续奉行“政治和解”方针。尼克松写道：“我还满意地注意到你已对难民公开宣布大赦，并保证把权力移交给选举产生的代表。我深信你将把这些声明化为现实。”尼克松要求巴基斯坦在印巴关系问题上保持克制；他认为恢复东巴状况、“使难民尽快离开印度领土回国”是“绝对必要的”。

总统在五月二十八日同时写给甘地夫人的信中强调我们希望减少难民流入印度的人数并通过财政、技术援助帮助印度减轻负担。尼克松把我们努力推动叶海亚的情况通知了甘地夫人：

正如我们已经通知你们的大使和外交部长的情况一样，我们选择了主要通过悄悄的外交进行工作的方式。我们一直在同巴基斯坦政府讨论达成和平的政治和解、恢复使难民停止外流并能返回家园的条件的重要性。我感觉叶海亚总统至少是部分地采取了这种态度，所以他才举行了五月二十四日那次记者招待会，特别是公开宣布接受国际援助，对难民实行大赦，并保证把权力移交给选举产生的代表。

尼克松赞扬了印度民主的活力和它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的进步，并对军事解决办法提出了含蓄的警告。他说："如果这种进步由于战争而中断，印度的朋友将感到沮丧。"六月三日，我向肯尼思·基廷解释了我们的战略。我深信东巴终将独立。我们的政策是"使事实有时间自行表现出来"。

六月，印度外交部长斯瓦兰·辛格到达华盛顿，要求我们同时结束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印度越来越给我们提出无法解决的难题。它说难民的洪流迟早将迫使印度采取激烈措施。但与此同时印度又不采取任何行动约束——事实上是训练、装备和鼓励——从印度领土向外渗透的游击队，这肯定使局面无法安定，并将形成更多的难民。尽管叶海亚宣布了大赦，印度仍要把东巴政治解决作为难民回国的条件。但是，在属于邻国主权范围的领土上究竟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呢——对此印度还保留由它来决定的权利。六月中旬，甘地夫人宣布印度不会同意任何意味"孟加拉国灭亡"的解决办法；换句话说，印度要求肢解巴基斯坦作为它不动手的条件。在逐渐实行自治的方案遭到拒绝、难民得到鼓励、难民回国的可能性已被排除的情况下，印度使危机的增长成为不可避免了。

我们国内许多人有不同看法。不幸的是这场辩论开始带上辩论越南问题时特有的某种激愤情绪和对动机的责难。政府虽然有道理可说，但却保持沉默，因而无济于事。众议院有关这个问题的小组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众议员科尼利厄斯·加拉格尔访问印度难民营后，六月十日在众议院发言时说，印度在难民这种负担面前表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克制"。(这是在甘地夫人公开提出战争威胁的三个星期以后。)六月十七日，《纽约时报》又责难政府，说我们要求双方克制的公开声明"姗姗来迟"。它说我们的呼吁是徒劳的，除非我们言行一致，即在东巴达成真正政治和解以前切断美

国给巴基斯坦的一切援助。《纽约时报》也赞扬甘地夫人在令人咋舌的难民问题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克制”。

然后出现了新闻界那种用小事件代替大辩论、把焦点集中于某些问题而同时加以歪曲的情况。六月二十二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有一艘载运军事装备的巴基斯坦货轮准备从纽约市启航到巴基斯坦去，似乎违反了政府正式宣布的禁令。不久又有一艘载运军用品的船据报正在前往巴基斯坦途中。报界、国会、还有印度都是义愤填膺。第二天，《纽约时报》指责这种运输对美国人民和国会、对印度都是“失信的行为”，“进一步”破坏了美国的信誉。斯图尔特·赛明顿参议员说这不是无知就是蓄意欺骗。国务院六月二十四日宣布华盛顿再给印度提供七千万美元作为难民费用，但这个宣布却淹没在有关第三艘载运军事装备的巴基斯坦货轮从纽约启航前往卡拉奇的消息中了。

所有这些装备都是根据宣布禁令以前颁发的许可证购买的，因此从法律上说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而第三艘货轮是在国务院暂时停发许可证的指示生效的四天以前启航的。③然而这些事实都没有制止说政府是在骗人的指责。这是越南战争期间人们非常喜欢谈的信用差距的又一个例证。我们无法使任何人相信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追查已经发出的许可证，无法使他们相信“渗漏”的数量微不足道，不能影响次大陆或孟加拉军事力量的对比。七月五日，《华盛顿邮报》怒不可遏地说：

这是一份惊人的、厚颜无耻的记录……必须放在当前围绕公众了解情况的权利和政府隐瞒情况的权利问题展开的有关五角大楼文件的争论这个背景上来阅读。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能够说明现行体制实际如何工作的典型事例；政府官员躲在公众视线之外，一直在给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同时不断毫不含糊地告诉公众，说这种供应已经切断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次“信用差距”是因为在禁运方面仓猝行事而使白宫大为恼火的国务院造成的。同新闻界和国会的批评意见最一致的这个部门无意中却成了这种批评的焦点。

危机日益激化

六月二十八日，就在我启程前往亚洲之前，叶海亚宣布了向文官交权的计划。四个月内将公布由专家拟定的新宪法；同分裂运动无关的人民联盟成员有资格参加政府。叶海亚没有解释这条规定适用于哪种类型的领导人。

我在旅途中收到令人不安的消息，说明苏联终于看到了它可以从战略上加以利用的机会。它放弃了过去的谨慎态度，通知印度它赞成让游击队进入东巴作战，并答应在中国采取报复行动时保护印度。这场冲突增加了一种新的不祥因素。(这是我们对中国采取主动以前很久的事。)

我访问新德里时有两个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使命。一个使命是要小心翼翼地使印度对我访华的消息有所准备。我谈到乒乓外交和我们两年来在贸易和旅行方面主动做出的一些表示，着重指出我们必然要同北京继续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无缘无故进攻印度，我们将严肃看待。如果我主动谈的这个意见并没有使我的对话者感到大惑不解的话，他们可能得到短暂的鼓舞——虽然随着七月十五日有关我访华的消息的宣布，这段欢欣鼓舞的时刻肯定就宣告结束了。

我们必须等到我的对话者写出回忆录之后才能知道印度的部长们当时是怎样看待我的再次保证的，是把它看作我们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尽了最大努力，还是看作一种意图欺骗的行径。我在新德里会谈的主要题目是东巴危机。我向总统报告说：

现在似乎存在一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或至少会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广泛发生暴力行为的日益增长的感觉，不一定是有任何人希望如此，而是因为他们担心他们最后可能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我（向甘地夫人）保证，我们政策的整个着眼点是要保持足够的影响，以便促使人们创造容许难民回国的条件，虽然我们不能保证结果如何。我询问她认为在局势变得无法控制以前还有多少时间。她回答说，现在就已无法控制，他们"只是靠意志力才使局面得以维持。"

我同印度领导人的谈话事实上还是按照前几个星期那种程序进行的。像我对印度驻华盛顿大使杰哈多次谈过的那样，我试图使他们相信美国渴望同印度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并不反对孟加拉自治，并且深信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朋友而不是作为又一个折磨者同叶海亚打交道的话就可以促成一种有利的变化。我邀请甘地夫人访问美国，同尼克松总统一起对印美关系进行一次带根本性的研究。

但是甘地夫人和她的部长们根本没有和解的心情。他们对访问华盛顿的邀请避不作答。他们表示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但激烈指责我们在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问题上进行欺骗。这些怨言的刺耳程度并没有由于以下事实而稍有降低：包括"仅此一次的例外"在内的对巴基斯坦的武器运输几乎已经全部停止；当时已不再颁发新许可证；只有在禁令生效前获得许可的极少量物资尚在运输途中。印度不可能对这种涓涓细流感到严重担心；许可证到期时运输就会自动停止；确实，我们估计在十月以后运输渠道里就不会留下任何东西了。甘地夫人甚至对我承认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它的象征意义。换句话说，印度想要通过美国引人注目地同巴基斯坦脱离关系来破坏巴基斯坦的士气。他们不但压我切断武器供应，而且压我切断一切经济援助。一个以不结盟名义同我国外交政策的大多数目标保持距离的国家，居然要求我们在一个从国

际法角度说属于国内冲突的问题上同一个盟国完全断绝关系——这种做法印度领导人显然是不以为怪的。到七月为止，美国为救济难民提供的捐款已接近一亿美元；但这并没有使甘地夫人不去扩大她批评的范围，把二十四年来我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的整个记录都包括进去。我离开新德里时，深信印度已决心同巴基斯坦摊牌。它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同一个由于自己目光短浅而陷入孤立的对手算账的机会实在太富诱惑力了。

我访问伊斯兰堡时，一心只想着即将前往北京的事。但是我同叶海亚总统和外事秘书苏勒坦·汗谈过几次话。我敦促他们提出鼓励难民返回家园的全面建议，使印度找不到进行战争的借口。我敦促叶海亚和他的僚属在使救济工作国际化方面再前进一步，允许联合国监督救济物资的分配。我还建议早日为东巴任命一名文官省长。叶海亚答应考虑这些建议。然而他基本上不了解自己的危险处境，还不准备正视必然会发生的事。他和他的同事都不相信印度打算进行战争；他们深信，如果发生战争，他们一定会胜利。当我尽可能婉转地问到印度在人数和装备上占优势的问题时，叶海亚和他的同事们的答复是把穆斯林战士的历史优越性吹嘘一通。

一个根本无法闭目不视的事实是：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陷入了一个他们无法理解的过程。他们不能想象自己的国家会遭到肢解；能够想到的人则认为如果他们适应潮流就无法在经过这场灾难以后保持自己的政治生命。他们不了解他们已经通过野蛮镇压使自己的国家陷入了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孤立。他们理论上同意需要制定全面方案才能摆脱困境，然而他们给“全面”下的定义太勉强，太抠法律字眼，太技术性，也太零碎。结果在整个危机时期，巴基斯坦都未能提出一种主张，使它可以在国际上表明立场。事实上，它零零碎碎的让步虽然积累起来也不小了，但却正好对印度有

利；这些让步证明了印度的说法，即出现了问题而又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解决办法。叶海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悲惨的困境。保守的同事指责他拿国家的统一冒险，外国舆论又指责他野蛮地压制自由。他则是摇摆不定，对保守派来说走得太远，对世界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来说又走得不够远。

在我启程前往北京的前夕为我举行的晚宴上，我找到了责备叶海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机会。叶海亚用他粗率的、模仿桑赫斯特军校风度的方式大声吼叫说："每一个人都把我叫做独裁者。"他逐个询问每一个客人，包括美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在内："我是独裁者吗？"大家以不同程度的诚挚态度明确地说，叶海亚当然不是独裁者。当他问到我时，我说："我不知道，总统先生。我只知道您搞了一次对于独裁者说来是很糟糕的选举。"

日益恶化的危机自然也成了我在北京谈话的内容。周恩来对事物的观察同华盛顿那些墨守成规的看法相去十万八千里。他非常直率地认为印度是侵略者；他占用我们一小时宝贵的时间，按他的版本回顾了据他说是由印度蚕食引起的一九六二年中印冲突。周坚持指出，如果印度进攻巴基斯坦，中国将不会置之不理。他甚至请我把表示中国支持的这种看法转达给叶海亚——这是做给华盛顿看的姿态，因为北京有大使驻在伊斯兰堡，完全能够传递消息。我回答说，美国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传统的纽带，我们也感激巴基斯坦为我们安排了通向中国的途径。我们将继续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但将强烈反对印度的任何军事行动。尽管如此，我们的反对却不能以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或为它采取军事措施的形式出现。

我是带着灾难的预感回到华盛顿的。照我看来，印度几乎肯定会在雨季结束之后不久进攻巴基斯坦。虽然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推动伊斯兰堡走向东巴自治，我怀疑印度是否会给我们这么做的时间，因为这样一来，印度就会失去一个短期内不可复得的、同

一个国家算帐的机会；而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对许多印度领导人来说就是很大的冒犯。那时，中国可能采取行动。苏联可能乘机给北京一个教训。如果我们结成一伙来对付巴基斯坦——就像新闻界和国会坚持要求的那样——就会使危险更快到来，并使印度更有发动进攻的借口。这将危及我们对中国的主动行动。当时，在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前，我们无从了解中国向华盛顿开放的决心究竟有多大。

七月十六日，在尼克松宣布要去中国访问的第二天，他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这是说明他如何认真看待这场危机的一个迹象。他要我把问题归纳一下。我说印度似乎已决心要打。我认为叶海亚缺乏及时解决政治问题以阻止印度进攻的见地。另一方面，七万西巴士兵（从三月起就增加了）不可能长期压制七千五百万东巴人民。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实现一种终将导致东巴独立的逐渐演变的过程。不幸的是，要及时实现这个过程以防止印度进攻是不大可能的。因此需要立即努力制止难民外流并使他们回国，从而消除发动战争的借口。

没有人不同意我的分析。罗杰斯补充说，据他判断印度正在尽它所能阻止难民回国。尼克松的结论是：我们要请巴基斯坦在难民问题上做最大努力。我们不赞成印度进攻；如果印度使用武力，美国将切断一切援助。要做一切努力来避免战争。

七月二十三日，巴基斯坦大使阿哈·希拉利通知我们，他的政府接受我们的建议，让联合国监督难民重新安置工作，以保证他们不会受到打击报复。叶海亚也同意我们提出的、为监督难民救济和重新安置工作任命一名文职管理人员的建议。我强烈敦促希拉利加快他们的努力。

不幸的是，印度什么也不接受。我们对集中解决难民问题的策略感到兴趣的理由，却正是使印度进行阻挠的理由。早在七月

十五日，印度大使杰哈就告诉我们，印度不能接受制止游击队从印度领土出击的建议。七月十六日，印度外事秘书考尔告诉我们，印度不同意联合国人员到它的边境去，即使是去处理难民问题也不行。这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大家一致认为巴基斯坦部队返回兵营是在东巴取得政治进展的条件，这是我们强烈要求任命文职管理人员的理由之一。但是，只要它的邻国还在对它进行游击战——而且宣布了使战争升级的决心——就不可能劝诱巴基斯坦部队返回兵营。巴基斯坦已经同意把重新安置难民的工作置于联合国监督之下。但是，如果禁止联合国人员与住在印度的难民进行任何接触、向他们解释回国后的前景，难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巴基斯坦的建议，这种办法就无法执行。在难民营没有任何外来观察员的情况下，我们甚至无法肯定究竟有多少难民。

七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高级研究小组开了两次会来讨论这些难题。在任何问题上——柬埔寨或许是例外——白宫同各部门的分歧都不像在一九七一年夏天的印巴危机问题上那么深刻。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不曾出现过如此明目张胆地无视总统毫不含糊的指示的情况。国务院控制着执行机构。尼克松给我的任务是保证他的政策得到执行，如有重大分歧就向他报告。但我们面临的是在一些看来属于细微末节的问题上不断明争暗斗，其中每个问题似乎都微不足道或太技术性，不值得提交总统，而积在一起却能确定国家的政策方针。尼克松不愿意在他认为次要的行动问题上否定国务卿的意见；这就使国务院可以按照自己的偏爱任意解释尼克松的指示，从而使尼克松规定的方针失去作用。

任何人只要同尼克松谈上五分钟就会听他谈到他对印度的动机深为怀疑，他对苏联干涉的担心，特别是他希望避免由于考虑不周的姿态危及通往中国的努力。尼克松一再命令我们通过谅解而不是通过压力推动巴基斯坦走向政治和解。国务院完全有权利

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巨大的公开压力会使巴基斯坦更易就范。由于总统已经选择不同的方针，而国务院还要自行其是，因此白宫同国务院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例如，我们九月初通过巴基斯坦了解到，国务院曾经暗中同他们开始谈判，甚至要切断三月二十五日以前发了许可证的那一点点军事装备。白宫认为巴基斯坦正处在痛苦的解体过程中，要考虑这个老盟国极端苦恼的状况、它的领导人眼界的局限性以及它内部的压力；因此我们希望避免宣布正式禁运，虽然我们行动上已经这样做了。国务院对国内批评我们的人比较敏感，很不愿意引起印度的反感。使我害怕的是安抚印度的努力将会引起战争。我在七月三十日对高级研究小组说："我们应当敦促叶海亚逐步恢复东巴人民参预政治的状况。但是印度的战争钟表比政治和解的钟表跑得快。我们决心避免战争。"七月二十七日我曾告诉总统，国务院甚至要开始掐断我们给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我说："如果有任何事情会诱使印度进攻，那就是巴基斯坦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状态。"这场辩论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事实是尼克松是现任总统，各部门在各抒己见之后，即使存在不同意见，即使它们必须面对外界或国会的批评，它们仍应不仅按照总统决定的字面、而且按照总统决定的精神贯彻执行。

这个问题由于一种反常情况而更加突出：国务院在早已为人遗忘的某次改组中把次大陆划给了近东司，而这个司的管辖范围只到次大陆东沿为止，把东亚和对中国的任何考虑都排除在外。那些可能意识到中国的担心的高级官员都排除在向北京开门的努力之外。因此，国务院里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对"中国账户"负有完全责任或至少是充分了解这样做的理由——这是我们政府工作的非正统方式付出的代价之一。在跨部门的辩论中，经常有人指责我的办公室一心想要"保护前往中国的旅行"，似乎认为保持这种做法是毫无价值的事。官僚机构这个时期对印巴关系进行的任

何分析都没有认真考虑我们的行动对中国的影响。我们的官僚机构并不是排斥北京，而是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白宫和政府其他部门的看法差距之大在一份为七月二十三日高级研究小组会议准备的、列举各种抉择的文件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份文件建议：如果中国干预印巴战争，美国就应当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并同苏联和英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个建议违反总统外交政策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尼克松在八月四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简单明了地指出，我们不准备对巴基斯坦公开施加压力。他说："那种做法的效果将是适得其反。这些事我们将只通过私下的渠道讨论。"尽管如此，官僚机构提出的几乎全部行动建议都是要增加对巴基斯坦的压力。我在七月三十日高级研究小组会议上问道："就是敌人又会对巴基斯坦怎么做呢？我们已经在切断给他们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总统一再说我们应当倾向巴基斯坦，但提出的每一个建议都直接违背了这些指示。"

如前所说，国务院曾经建议同巴基斯坦取得协议，把军事供应渠道中剩下的三、四百万美元的物资也撤销掉，理由是我们这样做就比较容易保持经济援助。虽然我认为这种做法对巴基斯坦在中国问题上给我们的帮助是一种可耻的回答，我还是勉强同意了。断绝供应渠道的谈判进行了两个月，终于在十一月初在伤害巴基斯坦感情的条件下结束，正好赶上为甘地夫人的访问创造了"良好的气氛"。但是，巴基斯坦刚刚同意谈判完全切断武器供应问题，人们就开始在经济援助方面拖沓不前。整个一九七一年都没有提供新的发展贷款。我在九月八日的高级研究小组会议上尖刻地指出：国务院卖给我们一条枯竭的武器供应渠道，代价是一项使经济援助也停止的政策。

所有这些花招都没有考虑到核心问题。我确信东巴较快就会

变成独立的孟加拉国。然而叶海亚不可能在十月或十一月、即印度最可能发动进攻的时期以前做到这点。因此我认为必须做巨大努力使难民问题立即得到缓和，并运用我们的影响推动事态以巴基斯坦政治结构所能承受的最大速度向宪法统治方向发展。按照宪法成立的政府几乎肯定会使孟加拉国至少获得自治，并最终获得独立。因此我们大大增加了援助捐款，给印度约九千万美元，为东巴在国际监督下救济饥民提供了一亿五千多万美元，以便扭转难民外流的浪潮，我们任命国际开发署一位能干的高级官员莫里斯·威廉斯负责协调美国的全部难民救济工作。

然而结果仍然无济于事。我们的行动落后于印度蓄意加剧紧张局势的速度。七月二十四日，考尔再次拒绝了让联合国人员到印度边界去的想法。八月四日，杰哈大使拒绝了副国务卿约翰·欧文要求印度控制从印度领土出击的游击队的建议。杰哈提出了一个新建议，要求美国接受加尔各答孟加拉国流亡分子提出的进行接触的要求。以后就会知道，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这种接触又部分是由于印度阻挠而流产了。

苏印友好条约

八月九日传来了苏印签订友好条约的爆炸性消息。

我们起初是从报纸上获悉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结束对新德里的访问时签订了一项为期二十年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条约的温和规定掩盖不了它的战略意义。它包括通常的有关持久友谊、互不干涉内政以及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的条款。更重要的是两国保证要就影响双方的“重大国际问题”定期磋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第九条。这一条要求缔约国不得援助参加了同另一缔约国发生的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国，并保证在任何一方遭到进

攻或进攻威胁时立即进行磋商，以便采取“适当的、有效的措施”。

我国政府的初步反应是令人惊奇地乐观。情报机构的估计可能下意识地受到长期存在的看法的影响，以为印度是一个和平主义的、不搞强权政治的国家。当时人们也很难接受这样一种见解，即尼赫鲁的女儿会蓄意把不结盟的印度引向事实上同苏联结盟。因此，到八月十一日为止的估计是：甘地夫人是在抗拒要求摊牌的高涨的舆论。据说苏联担心她可能违反自己的意愿被迫承认孟加拉国，从而促使巴基斯坦宣战。这种分析认为，苏联通过签订条约使甘地夫人获得外交成就，从而帮助她维持温和、克制的政策；反过来苏联则可以肯定印度领土不会被用做敌视苏联的基地。

现在回想起来，要炮制一种比这更愚蠢的估计是几乎不可能的。它是偏见影响情报估计的典型例子。当时根本不存在任何外国在印度国土上建立基地的现实前景；即使有，也肯定不足以使印度如此异乎寻常地背离原来的行动方式或使苏联放弃它惯有的谨慎态度。我们知道制止军事冲突的主要因素是印度军事计划人员的害怕心理，担心发生一场苏联不赞成的战争，可能使苏联的供应中断，并且会鼓励中国进行干预。苏印友好条约必然会消除这种担心，因此客观上增加了战争的危险。苏联抓住了战略上的良机。一个能够表明中国软弱无能、又使中国和美国的共同朋友遭到屈辱的机会，其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如果中国无所作为，就会暴露它的无能；如果中国增加赌注，就要冒受到苏联报复的风险。苏联签订这个条约，等于向火药桶里扔进一根擦着了的火柴。

条约宣布的那一天，我应印度大使邀请同他共进午餐。L·K·杰哈是在一个困难时期到华盛顿任职的。他非常善于分析美国情况，了解国际政治，不感情用事。他至少对我从来没有使用过印度外交官有时使对话者丧失耐性甚至善意的那种自以为道德上高人一等的盛气凌人的口气说话。他善于使报界宣传印度对问题

的看法；我总能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找到他的足迹——当我们处在对立面时，这种经验是令人痛苦的。（我应该说是善于对付新闻界的。在印巴关系问题上杰哈显然胜我一筹。）但是我很尊敬、甚至喜欢杰哈。我在社交场合或为了交换思想经常同他见面——一部分原因是我认为不论我们是否同意印度的全部政策，印度在世界事务中是一个重要国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总是能够从他实事求是的分析中得到教益。

这次杰哈带来了甘地夫人给总统的一封信。甘地夫人把造成紧张局势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巴基斯坦。她在信中绝口不提我们给难民的大量经济援助，也不提我们推动伊斯兰堡政府采取的和解步骤。相反地，她用大量篇幅影射我们在武器政策方面欺骗了印度，甚至通过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而给次大陆全部紧张局势火上加油。她再次拒绝在印度领土上派驻联合国人员。她没有提到同苏联签订的条约，但是暗示接受我七月份访问新德里时代表尼克松转达的、请她访问华盛顿的邀请。这种和解姿态伴随着一长串指责，使人无可怀疑地看到，当两位领导人见面时，谁应当处于受审判的地位。

正式解释条约的任务留给了杰哈。有趣的是，他的叙述同报纸社论的批评是完全矛盾的——按照报纸的说法，是我们把印度逼得走投无路了它才投入苏联怀抱的。他证实了我怀疑的事：同苏联签订的条约不是对美国在印巴危机中奉行的政策的反应，而是印度经过慎重考虑已经准备了一年多的战略。我至今还不理解杰哈为什么认为这种解释会使我们放心。（多勃雷宁也对我提出过同样的论点。）④我回答说，从字面上看，条约同印度的不结盟政策虽然难以调和，但还是次要问题。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印度可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它现在可以对巴基斯坦为所欲为了。我以再明确不过的方式警告说，印巴发生战争将使印美关系倒退五年。

无论我国政府其他的人对大使是怎么说的，我希望他了解对东巴进行军事干涉很可能会导致断绝对印度的援助。美国同印度没有理由为一个看来已成定局的问题争吵。我们把印度当作一个世界大国认真对待，希望建立良好关系。东孟加拉肯定会获得自治，只要我们给这个必然要发生的事一个机会；我们希望这件事将以和平方式解决。杰哈否认同苏联签订的条约不符合不结盟政策。他避而不谈印巴问题，说甘地夫人访问时将使我们有机会加以讨论。我再次提出警告，反对用战争解决问题的企图，指出在我们支持下通过逐渐演变将使东孟加拉获得自决。

但是印度对逐渐演变不感兴趣。叶海亚也还不了解自己的危险处境。他被事态的发展逼得一筹莫展，于是采取了绝望的人借以使自己相信还有回旋余地的那种蛮横行动，因而使我们的任务复杂化了。八月九日，叶海亚政权宣布将以叛国罪把穆吉布交付秘密审判。我至今仍不理解叶海亚希望通过此举得到什么结果。他肯定会招致世界更大的压力，使印度更加拒绝妥协。甘地夫人立即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出了抗议书。十一名参议员和五十八名众议员要求美国压巴基斯坦表示宽大。八月十一日，罗杰斯国务卿向希拉利大使转达了美国的关注。

八月十一日，我安排总统同高级研究小组开会，以克服官僚机构办事拖沓的状况。他们之所以拖沓，是怀疑我把自己的偏爱当作总统命令向他们传达。尼克松按照七月十六日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讲话的精神发表了一篇强硬声明。他要求制定大规模救济难民的计划；我们要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来减轻人们的苦难。他认为新闻界的攻击大多出于政治动机；对于他的批评者来说，巴基斯坦正在成为越南的替身——由于我们向中国开门，越南问题没有多少可谈的了。尼克松并不为叶海亚的行动辩解；但是这些行动不能构成发动战争的理由。任何人都不应怀疑他的决心：如果印

度发动进攻，他就要断绝对印度的援助。苏联的举止使他想起他们一九六七年在中东的所作所为，那时苏联挑起了一系列事件，结果无法控制。总统说：关于政治演变，不要对巴基斯坦政府公开进行攻击，“我们将在私下处理政治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方针。八月十四日，尼克松给叶海亚去信，敦促他加紧执行救济计划，设法获得东巴当选代表的支持，从而加快民族和解过程。尼克松写道：这种措施

> 对于应付侵蚀人心的造反威胁、恢复世界上贵国所处地区的和平将起重要作用。它们也将加快这样一天的到来：那时美国和其他国家将能在经过修订的国家发展计划范围内，重新承担援助贵国发展经济的任务，而这种经济发展由于最近的事态而可悲地复杂化和延缓了。

无论使用多少外交辞令，这封信的含意是清楚的：长期经济援助同向选举产生的代表交权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们是以友谊的名义要求让东巴自决。我们同新德里的主要区别在于它要求的变化速度甚至可能使西巴的团结也遭到破坏。

同孟加拉国流亡者的接触

杰哈要求美国同住在加尔各答的孟加拉国流亡人士直接接触，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从而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寻求政治和解的徒劳无益的努力。如果印度和孟加拉人希望的话，这种努力本来是可以取得某种成果的。七月三十日，同孟加拉国流亡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一位人民联盟当选代表加尧姆先生同我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联系，自称奉令来同美国建立接触。他将过两个星期再来听取回音。领事馆通过国务院渠道报告了这件事。

我们认识到这种接触如果给伊斯兰堡知道将造成爆炸性影

响——而且我们不能不设想印度有一切理由要对此大肆宣扬。尽管如此，在征求总统意见以后，我同意了国务院的建议：让领事馆接待加尧姆，并试探人民联盟是否愿意同巴基斯坦政府谈判。（采取这种主动的指示是国务院近东司起草并经白宫批准的。）加尧姆如期在八月十四日出现了。他肯定地说，如果让穆吉布参加谈判，如果伊斯兰堡接受人民联盟的六点要求，他的集团可能接受低于完全独立的解决办法。他希望美国会鼓励这种演变。几天之后第二次会晤时，加尧姆指出，如果印度一旦正式承认孟加拉国，甚至这种基本上可以保持面子的建议就行不通了。

我们认为，不通知叶海亚就不可能继续前进；同时，加尔各答的接触可能是推动伊斯兰堡走向政治解决的机会。国务院指示约瑟夫·法兰大使把我们在加尔各答的接触和以六点要求为基础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告诉叶海亚。法兰奉令避免提出任何建议，但叶海亚不会看不出这一步骤的含意。在正常情况下，各国政府是不会为已被本国宣布为非法的流亡分子传递建议的。

叶海亚的反应出乎意料地有利。他认识到自己已陷入困境，正在摸索出路。他欢迎我们在加尔各答的接触，只要求把情况随时告诉他。他甚至接受了法兰的暗示，即由我们从中斡旋，安排他的政府同孟加拉流亡者秘密接触。

八月二十七日，当加尧姆对促进接触表示有兴趣时，我们又采取了新的步骤。九月四日，法兰向叶海亚建议，由我们同孟加拉国“外交部长”联系，表面上是核实加尧姆的诚意；我们将告诉他叶海亚愿意进行秘密谈判。向一个友好国家的总统提出让我们同已被他作为颠覆性组织加以取缔的一个运动的“外交部长”——这个头衔本身就包含着叛国或至少是改变宪法的意思——进行接触的建议是异乎寻常的。但叶海亚的困难处境使他不得不同意了。

叶海亚还接受了我们其他方面的建议。九月一日，他给东巴

任命了一名文职省长，代替受人憎恨的军事管制执行官。九月五日，叶海亚把原来对难民的大赦扩大到除已经因刑事犯罪起诉的人以外的一切公民。（但把穆吉布排除在外。）在这前后，叶海亚曾向我们的援助协调人莫里·威廉斯保证对穆吉布的死刑判决将不予执行。十月一日，尼克松宣布他将要求增拨两亿五千万美元用于救济难民，使我们的捐款几乎等于其他国家捐款总额的一倍。

加剧危机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拒绝对方的一切建议而又不提出代替方案。这就是印度的方针。任何政府都不会从一开始就提出自己最后的让步；在谈判进行到某种程度以前甚至它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准备走多远。对于一九七一年巴基斯坦忧心忡忡的军事领导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现在知道三月二十五日在东巴开始的野蛮镇压是一个天大的错误，用塔列朗*的话来说就是：比犯罪更糟。但是他们一辈子都是主张巴基斯坦统一的；要他们同意把一半国土分割出去是不可能的。叶海亚既害怕由于自己的僵硬态度引起战争，又怕别人指责他让步过多、因而要推翻他。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他想把权力尽快移交给文官政府，把最后失败的责任推给它。在此期间，他希望通过某些让步使冲突推迟，同时避免西巴出现动乱。

但是甘地夫人却不打算让巴基斯坦领导人如此轻易就逃出困境。她知道巴基斯坦同人民联盟一旦开始谈判，就有可能出现某种妥协；那时印度对事态发展可能失去控制。甘地夫人不愿冒这种风险。巴基斯坦处境如此不利，中国正在经历国内动乱（林彪事件）的阵痛，美国由于越南问题而意见分歧，苏联几乎无条件地站在印度一边——这种局面她以后不会很快再碰到。九月一日，我们获悉印度武装部队已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巴基斯坦的反应是

* 塔列朗（Talleyrand）是拿破仑的外交大臣。拿破仑战败后，曾组织法国临时政府。——译者

可以料想得到的：它在九月四日增调部队进入靠近西巴—印度边界的前进阵地。九月九日，印度唯一的装甲师所属的一些部队和一个独立装甲旅向西巴边界移动。九月十六日，有报道说印度打算从十月初开始再让九千名孟加拉解放军游击队渗入东巴。

同时，我们同孟加拉国在加尔各答的代表的接触开始困难起来。九月九日，我们的领事会见加尧姆，以便安排同孟加拉国“外交部长”会晤。但是加尧姆这次不仅要求立即释放穆吉布，而且要求巴基斯坦军队立即撤离东巴，要求联合国保证孟加拉国的安全——一句话，就是立即独立。九月十四日，加尧姆告诉我们，他的“外交部长”看不出会晤有什么意义。他把这种消极情绪归之于印度政府的监视。据他说，同美国的任何接触都使印度政府感到心神不安。九月二十一日，叶海亚表露了他的忧虑，向法兰问及我们在加尔各答接触的情况。他希望法兰在出现任何新发展时随时通知他。法兰受到足够的鼓励，所以建议让我们的领事会见孟加拉国流亡政府的“代理总统”——如果还找不到外交部长的话。

但是在加尔各答，一切信号现在都指向相反方向。九月二十三日，加尧姆派一个信使告诉我们的领事，说印度政府已察觉他同我们的接触并对他们提出了正式警告。我们的反应是建议会见“代理总统”。加尧姆不久就亲自出面证实了他的信使说的话：印度要求一切接触必须通过新德里进行。

与此同时，印度对我们讲的话则完全相反——至少在难民问题上是如此。只要我们一提美印联合救济计划的建议，他们就拿出老一套的回答：这件事应当同加尔各答的孟加拉国代表去谈。印度要我们找孟加拉流亡人士谈，而孟加拉流亡人士则以印度不悦为借口避免高级接触——如果我们怀疑这都是使我们兜圈子的遁词，这种怀疑应当是情有可原的。

九月二十七日，乔·西斯科为了澄清混乱状况，就向杰哈建议

由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代表无条件地进行直接谈判。杰哈持否定态度，自称不能从这一建议中看到任何进展（尽管这种谈判包含承认孟加拉国的意思，其结果几乎肯定是自治，最后则是独立）。他回到老一套的、明知不可能马上实现的要求：同孟加拉国代表的任何谈判必须从一开始就包括穆吉布，其目的必须是立即独立。（释放穆吉布这时基本上是个面子问题。军人政府无法以如此令人屈辱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谈判。另一方面，它必然清楚除非把人民联盟的领导人最后释放出狱，它主动同人民联盟进行的任何谈判都得不出多大结果。）

第二天，孟加拉国的“外交部长”终于同我们驻加尔各答的领事见了面；他说除非美国施加影响使孟加拉的“愿望”得到实现，否则谈判是徒劳无益的。这些“愿望”包括完全独立、释放穆吉布、美国援助和建立正常关系。为了避免使我们受到诱惑、产生任何让步的念头，加尧姆十月三日又来给孟加拉国的“愿望”加码，要求让苏联参加谈判。既然印度军队将使巴基斯坦部队忙于边境防务，使游击队可以自由行事、最后控制全国，他当然看不出有任何让步的必要。十月十六日，加尧姆以印度反对为理由排除了我国领事会见孟加拉国“代理总统”的可能性。十月二十日，孟加拉国另一位高级官员侯赛因·阿里对我们的领事说，他的组织对向叶海亚传话不感兴趣；“明显的解决办法”是释放穆吉布和使孟加拉国立即独立。到十月底，印度报界就公开提出警告，反对孟加拉同“外国代表”谈判。总而言之，鼓励巴基斯坦政府同孟加拉国流亡政府谈判的努力就此归于无效。

甘地夫人来到华盛顿

与此同时，我们为同印度达成谅解也尽了一切努力。我在同

杰哈大使谈话时重申了我经常的主题。我们认为印度同美国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使甘地夫人的访问成为两国关系的分水岭。八月二十五日，九月十一日和十月八日，我强调美国并不坚持要东孟加拉留在巴基斯坦之内。相反地，我们认为自治是不可避免的，独立也是很可能的。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使目前的程序有机会进行下去，到一九七二年春天孟加拉国就可以建立起来。我们只是在方法上而不是在目的上存在分歧。如果甘地夫人准备根本改进两国关系，她将发现我们是热切的伙伴。如果她利用这次访问掩盖印度的军事进攻，我们的关系就不是短期可以修复的。国务院奉令采取类似的方针。十月七日，我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说，如果印度接受逐渐演变的过程，它将在我们协助下达到它大多数目标。“如果他们同我们合作，我们可以同他们一起设法解决他们百分之九十的问题，例如释放穆吉布、使孟加拉国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治。而这些步骤最后将使他们得到一切。”

同美国国内的批评者不同，杰哈非常了解我们并不反印度；他指望这一点将限制我们对印度显然正在计划采取的行动作出反应。印度继续以难民造成的无法忍受的负担作为理由。据说现在难民已经达到七、八百万人。然而印度在叶海亚宣布大赦以后又不愿鼓励难民回国，也不愿在制止难民外流方面合作，而且不让联合国人员常驻难民营，使难民了解大赦的情况。它拒绝为孟加拉游击队在造成混乱方面起的作用负责。虽然这些游击队是在印度领土上招募、由印度军官训练、用印度武器装备并得到部署在边界地带印度一侧的印度炮兵支援的，印度仍然声称他们并不在它控制之下。新德里甚至拒绝承诺使游击队不干预救济物资的供应。战争威胁日益明显。十月八日，杰哈对我说，如果印度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它将在年底采取行动；印度外交部长和外事秘书也在新

德里向美国外交官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印度蓄意规定这样短促的限期，必然要动摇巴基斯坦的宪法结构。

苏联起了大肆煽风点火的作用。它虽然一再声称要献身和平，但提出了同新德里一模一样的条件，从而对印度表示支持。这就使摊牌成为不可避免了。虽然它一再表白它对缓和有新的热诚，它却利用同我们关系的初步改进来避免承担爆炸的后果，而不是防止爆炸。在这整个时期，莫斯科的行动都象一个纵火狂。它在纵火之后还要捞取通知救火队的功劳。

我第一次同多勃雷宁讨论印巴危机是七月十九日，即我秘密访问北京之后不久。多勃雷宁装扮出一副和解的面孔询问我的看法，我回答说，我们主张和平的政治演变，因为战争是无法局部化的。多勃雷宁说这也是苏联的观点；莫斯科支持印度的政治目标，但强烈劝阻军事冒险。苏印友好条约签字以后，我们在八月十七日再次会晤。多勃雷宁给我的解释同杰哈过去的解释一样，坚持说条约经过长期的准备。同杰哈一样，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说是早已预谋就会减轻我们的担心。他说，条约并不是针对任何人的。（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是外交上常用的橡皮奶头，外交官用这种办法对他们希望使其保持悬念的人提供形式上的保证；这也是暗示自己能够做得更厉害些的一种漂亮手法。）我警告说，我们将对军事挑战做出尖锐反应。多勃雷宁的答复是：苏联正呼吁和平解决。

不幸的是苏联的行动同它的保证日益发生矛盾。接近八月底的时候，我们得到不容置疑的证据，说明莫斯科非但没有约束印度，反而答应如果安理会提出印度是侵略者的指责就使用否决权；此外，如果巴基斯坦或中国进攻印度，苏联将以空运军事装备方式做出反应。换句话说，苏联差不多给了甘地夫人一张空白支票。已经发表的有关甘地夫人九月底访问莫斯科的报道也支持这种解

释。柯西金总理同甘地夫人一起呼吁叶海亚消除紧张局势——把整个责任都推给了巴基斯坦。柯西金宣称为了避免战争，必须早日取得政治解决——这是克里姆林宫到那时为止对印度战略最强烈的支持。苏联主席波德戈尔内十月初对印度的访问使苏联的支持进一步戏剧化。

九月二十九日，尼克松在华盛顿会见葛罗米柯时说：劝阻印度进行战争对我们两国都有利。葛罗米柯避不表态。避免战争当然是使人向往的；不幸的是，根据他审慎的判断，战争的危险首先在于巴基斯坦的挑衅。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种有趣的判断，即显然处于较弱地位的、已经得不到任何武器供应的国家却可能进攻那个较强的国家。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等到三月份巴基斯坦把权力移交给文职人员后再考虑可以采取什么行动。

十月九日，我紧急要求苏联协助阻止四万游击队渗入东巴，因为我们已收到令人不安的消息说这种情况即将发生。我对多勃雷宁说，总统认为最重要的是避免战争。多勃雷宁的态度极为友好——其无济于事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说，苏联正在向双方呼吁，但是印度正在变得极为困难。我说我们准备考虑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来消除危机。这个建议从来没有得到理会。印度使巴基斯坦丢脸的机会也是苏联使中国丢脸的机会。莫斯科尽量增加赌注。巴基斯坦是比较弱的一方。可能使天平保持平衡的美国又由于自行规定的武器禁运，由于越南问题引起的对卷入任何外国事务的恐惧，由于国会和新闻界几乎一致认为印度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有道理的情绪，而不能帮助巴基斯坦。而中国又由于国内的阵痛而陷入了暂时的瘫痪。

整个十月份，尼克松政府都不断受到激烈批评。十月五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投票决定暂时停止美国对巴基斯坦的一切经济

和军事援助。许多参议员叫嚷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华盛顿邮报》十月二十二日的社论为这种态度做了总结：

美国的立场仍然是不光彩的。国务院前些日子拼凑了一个要求双方克制的软弱无力的呼吁。这个呼吁由于以下两个事实而显得十分荒唐：争论一方即巴基斯坦几乎应对和平受到的威胁负全部责任，而美国——通过武器、供应、政治支持、救济等等——是偏袒这一方的。事实上，对次大陆和平的威胁不在于印巴之间的传统分歧，而在于巴基斯坦以难民形式向印度输出国内政治问题的政策。美国在提供救济方面领先是根本不够的，必须伴之以严厉的政治措施，促使巴基斯坦停止迫害它自己的人民。

引起危机的责任在于巴基斯坦，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到了十月，中心问题是如何纠正原来的错误，避免一场影响远远超过次大陆范围的战争。在我们对中国采取主动行动以后，苏联的目标是要使北京丢脸，同时证明中国和美国这样的盟国都是靠不住的。不仅如此，如果印度这种策略得逞，就很可能扩展到中东——在那里，也同莫斯科签订了友好条约的埃及正威胁要在所谓决定的一年通过战争解决使它不满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苏联能以南亚为例证明战争的效果和美国的无能，那将给中东带来不祥的前景。

十月七日，我在情况室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考虑能够采取什么行动阻止走向战争的趋势。对中国干涉有一种习惯性的担心；有人建议对北京提出正式警告，其实际结果将是消除抑制印度的又一个因素。不过这次会议开得比较融洽。国务院建议我们要求印巴双方都从边境撤出武装部队；要求莫斯科和德黑兰支持这种观点；再次向双方阐明，如果发生战争，就要切断美国援助；鼓励巴基斯坦同当选的孟加拉领导人开始对话——并不十分隐讳地暗示它要重新考虑对待穆吉布的态度。会议同意了国务院的方案。

现在回顾起来可以清楚看出，我们当时大大地过高估计了停止援助的威胁对印度的影响。要查明哪些物资已经卖出和尚在途中，并加以处理是很复杂的事，因此断绝援助从来也不像外科手术那样干净利索。印度能够推测——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它可以依靠供应渠道中已有的物资度过暂时困难，等到舆论风向再次变化就可以重新得到援助。

我们首先找叶海亚交涉，结果令人鼓舞。十月十一日，他接受了我们提出的双方共同从边境撤军的建议。这时，他给了我们一个政治解决时间表。他将在年底以前召开新的国民议会，把宪法提交议会讨论。紧接着他就要把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西巴和东巴都要召开省议会。东巴将在文职的全国政府中占多数（实际上保证得到的结果会符合孟加拉人的愿望）。他再次承诺不执行处死穆吉布的判决；文官政府可以在三个月内处理有关穆吉布前途的问题。十月十六日，我国驻伊斯兰堡代办会见了布托。布托同意新政府的领导职务应当属于东巴；穆吉布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时几乎可以毫不怀疑，叶海亚一旦下台，东巴就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

同印度交涉的结果却不那么顺利。十月十二日，基廷大使见到斯瓦兰·辛格，听到的还是印度一连串老一套的怨言：美国没有充分运用自己对伊斯兰堡的影响；同孟加拉国流亡人士开始对话的努力是想绕开穆吉布的花招。印度外交部长表示：共同撤军是无法接受的，但巴基斯坦单方面撤离边界将是有益的；如果巴基斯坦确实撤了，印度可能重新考虑。辛格没有解释，当印度在印巴边境集结军队并使数以千计的游击队进行渗透时，巴基斯坦怎么可能撤走军队。

尼克松获悉这些挫折后，十月十九日命令黑格“还要就这个问题盯住印度人”。（我正在前往北京途中，由黑格代理我的工作。）

这个指示还来不及执行，印度国防部长就再次拒绝了共同撤军的办法——这次是十月二十日对莫里·威廉斯说的。这位印度人不祥地补充说：不存在发生偶然性对抗的危险。

十月十八日，驻莫斯科的比姆大使把我们关于共同撤军的建议交给了葛罗米柯。黑格又向多勃雷宁提出警告，以强调尼克松对此事的关心。十月二十三日，我们得到苏联的答复，内容同新德里的答复一模一样，认为避免战争的唯一有效办法是立即释放穆吉布，并以"最快速度在东巴取得政治解决"。双方共同撤军只有在采取"(其他)综合措施"的情况下才是有益的。莫斯科显然不打算在实现克制方面合作。

在此期间，战争危险开始具有自己的势头。十月十八日，印度使陆军和海军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东巴冲突不断增加。十一月一日，印度部队采取重大行动把他们声称曾向印度境内开炮的巴基斯坦炮兵阵地打哑了。(考虑到驻在东巴的巴基斯坦部队处于大约一比五的劣势，而且还得同游击队作战，他们主动挑起敌对行动的积极性不可能很高。)十一月六日，在尼克松同甘地夫人会谈之后，我们获悉小股印度正规部队已于十月三十日开始越过东巴边界。十一月一日，苏联开始向印度空运军事装备。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尼古拉·费留宾十月底访问了新德里；印度报界说他曾要求克制。根据设想，他在这么做的时候得到了后来访问印度的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参谋长帕·斯·库塔霍夫元帅的帮助。

在甘地夫人到达华盛顿之前，我们为缓和紧张局势又做了一次努力。法兰大使奉令提请巴基斯坦考虑不顾一切从边境单方面撤军的问题，并敦促叶海亚在政治改革方面发挥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十一月二日，法兰给叶海亚送去尼克松写的一封措辞并不十分隐讳的信：

我知道你非常重视使经过选举产生的东巴人民代表最大限度地参预国事。我也相信你会同意，这一过程对恢复贵国东翼地区状况、从而制止难民流入印度并在巴基斯坦全体人民之间实现切实可行的政治和解是必需的。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叶海亚同意单方面撤军。第二天，他派驻华盛顿的大使在同我会晤时重申了这个建议，条件是甘地夫人要同意在“不久之后”撤退印度部队。叶海亚还同意我们乘甘地夫人访问的时机宣布完全停止对巴基斯坦的武器供应——他以体面的方式做了这个令人屈辱的让步。最后，叶海亚还准备同人民联盟的某些领导人、或未因重大罪名受到控告的现在印度的某些孟加拉国领导人进行讨论；他说他愿意考虑同穆吉布指定的某个人会晤的想法。如果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就得等到文官政府成立——按照叶海亚的时间表，也就不到两个月了。十一月三日，布托对法兰说，同孟加拉国代表——包括穆吉布——会谈是必要的；在两个月内，布托可能成为巴基斯坦新的文官政府的领导人之一，如果不是政府首脑的话。

这就是尼克松同任何外国领导人举行的会晤中无疑是最不幸的两次会晤——他在十一月四日和五日同英迪拉·甘地总理的谈话——的背景。这并不是说会谈的参加者气势汹汹或者缺乏礼貌。事实上，他们都着意按照这种场合的常规办事。政府首脑很少直截了当地发表不同意见；他们不希望使自己无法打破的僵局固定下来——否则等于承认自己缺乏谈判技巧或找不出解决办法。政府首脑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常常表现为各说各的，不管对方说些什么，或者表现为意味深长的沉默，这时双方无疑都在考虑僵局的政治后果。要不然——正如尼克松同甘地夫人会谈时出现的状况——就是突然把关键问题完全抛在一边不谈了。

总统和总理分别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壁炉两侧的椅子上，她的

秘书室秘书帕·纳·哈克萨尔和我坐在椅子旁近的沙发上。在摄影记者匆匆拍完照片并被轰出去之后，甘地夫人开始像一位教授赞扬一个略为落后的学生那样对尼克松处理越南问题的办法和他对中国采取的主动行动表示赞佩。她自鸣得意地对尼克松在中国问题上做了印度十年来一直建议的事情表示满意，这就使她的赞扬失去了几分光泽。尼克松的反应是目光呆滞然而合乎礼节。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只是由于他不愿当面表示不同意见才使他克制住自己的愤恨。

尼克松没有时间欣赏甘地夫人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他私下曾嘲笑过她在道德方面矫揉造作。他对这一点特别感到不快，因为他怀疑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实际上比他更不择手段。他确实认为她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玩弄强权政治的人。八月十一日，尼克松曾向高级研究小组承认，他如果处在甘地夫人的地位，也可能奉行类似的方针。然而他并非处在她的地位——因此他就要拖延时间。和我一样，他希望避免摊牌，因为他知道战争将威胁我们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设想，而且根据我们两人的判断，东巴自治是势在必行的，虽然实现的时间可能比印度暗示的稍晚一些。(事实上，印度从来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时间表，而是一直暗示昨天就已经太晚了。)

甘地夫人使人难以对付的程度同她自以为屈尊的态度颇为相似。她对尼克松打算做什么并不抱幻想。她自己也受到内心冲突的压力。她的议会将在两星期内开幕，充满嗜血的情绪。她对这种危机气氛起了不小的推波助澜作用，现在这个危机已经产生自己的势头，如果她不能驾驭它，就可能把她压倒。她对尼克松的厌恶表现在冷若冰霜的拘谨态度上。这种厌恶也许由于她不安地认识到下列的事实而复杂化了，即她的全部教养都使她鄙视这个人，而此人观察国际关系的方式却又和她自己的方式相似得令人

感到别扭。这并不是说她正像尼克松想的那样是个伪君子；如果说她是个伪君子，就是设想她自己已经意识到她的行动和她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差距，而是说她的利益同她的价值观念对她来说是不可分割的。

我自己对甘地夫人的看法同尼克松的看法相似，主要区别在于我不是从个人角度看待她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后来人们指责尼克松和我对印度有偏见。这完全是误解。严肃的政策必须以分析为基础，不为情绪所左右。当然，正如我已经谈到过的那样，从印度的历史以及印度对待本国人民和邻国的态度中看不出它有什么独特的道义感。照我看来，印度在激烈动荡的历史进程中正是因为在掌握和操纵洋人的心理方面具有不寻常的敏感，因此才生存下来；印度领导人在道德方面的自命不凡似乎完全是为了利用自由主义的、略带社会主义色彩的西方的内疚心理；这种自命不凡是实力弱小的独立运动必不可少的武器——独立运动正是用殖民国家的伦理范畴使殖民国家动弹不得的。对于一个决不可能单凭实力建立国际地位的新独立国家来说，这种武器是无价之宝。

甘地夫人是一个以巧妙的手腕专心致志地、不屈不挠地追求印度国家利益的强有力的人物。即使在她的政策对我们国家利益有害时我也尊重她的力量；但是我不能同意印度所谓我们如不支持印度在次大陆称霸的野心就会永远“丧失”印度的友谊的说法。我相信，无论一时的情绪是冷是热，我们不可能永远“丧失”印度，正如我们不可能永远“赢得”它一样。和大多数人比较，我心目中的甘地夫人是不会因为我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反对我们的。她不会轻易放弃她赖以取得讨价还价地位的不结盟政策，至少表面上还要保持可供选择的向美国靠拢的可能性。当她认为印度有此需要时，甘地夫人就会像她现在力图肢解巴基斯坦一样无动于衷地同我们合作。眼前的爆发过去之后，她就会迅速修复同我们的紧

张关系；似乎矛盾的是，关系越紧张，她至少使表面恢复正常的积极性就越高。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但是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关系还在继续恶化。使尼克松设法拖延时间的全部理由也正是使甘地夫人要强行加快速度的理由。孟加拉国的不可避免的出现——这是我们料想到的——给印度带来极为头痛的长远问题，因为孟加拉国实际上就是东孟加拉，同印度的最倔强、最具有分离倾向的西孟加拉邦只是宗教不同，而在语言、传统、文化、特别是容易激动的民族性格方面则是共同的。无论孟加拉国将来是成为民族主义国家还是激进的国家，迟早都会加剧印度内部的离心倾向。它可能为建立其他穆斯林国家开创先例，而这一次可能是从印度分割出来的。孟加拉国一旦独立，它的穆斯林传统最后可能使它同巴基斯坦恢复友好关系。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新德里那些不为感情左右的策划者考虑，在孟加拉国诞生的同时，必须使印度在次大陆凌驾一切的地位戏剧性地表现出来。

叶海亚不断让步使甘地夫人的难题愈益严重。如果她能肯定叶海亚口是心非，肯定不会成立文官政府、穆吉布不会获释、东巴不会获得自治并在几个月内获得独立，她可能会放长线钓大鱼，利用我们计划的失败作为摊牌的借口。正因为我们的计划几乎肯定会取得有利结果才使她的行动具有了紧迫性。文官政府可能领导巴基斯坦摆脱孤立状态。孟加拉国代表同巴基斯坦谈判，如果不是使印度无能为力的话，也可能会限制印度强行加快步伐的能力。印度必须在这一连串事情发生之前采取行动。甘地夫人走向战争并不是因为她肯定我们会失败，而是因为她担心我们会成功。

因此，尼克松同甘地夫人的会谈就成了典型的聋子对话。两位领导人听不进对方的意见，不是因为他们相互不了解，而是因为太了解了。尼克松强调他相信东巴结果必然获得自治并从而获得

独立；我们的全部要求不过是一张避免使已在向文官政府过渡的西巴的团结遭到破坏的时间表。他列举了美国通过说服取得的成就：避免了东巴的饥馑；救济工作的国际化；东巴任命了文职省长；宣布大赦；不处决穆吉布的承诺；巴基斯坦同意单方面从边境撤军；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叶海亚愿意同孟加拉某些领导人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战争是美国根本无法理解、也不会当作解决问题——其严重性我们并不否认——的办法加以接受的。

甘地夫人以傲慢的冷淡态度听取实际上是尼克松一次比较成功的表述。尼克松的论点，她一个也不答理，虽然其中某几点——例如巴基斯坦提出单方面撤军、叶海亚愿意同孟加拉国领导人谈判——她本人是第一次听到。巴基斯坦的让步并不涉及她的根本利益。真正使她念念不忘的是巴基斯坦的性质，而不是这个饱经折磨的国家的一部分地方正在发生的非正义的行为。她不理会造成危机的原因，而是就巴基斯坦的历史说教了一番。她否认自己反对巴基斯坦的存在，但她的分析却很难支持她的否认。她断言人们曾经责备她的父亲接受分治。她说经常听到的一种指责含有某种真实的因素，即印度是土生土长的独立运动领导人缔造的，而巴基斯坦是同英国勾结的人组成的，他们一"独立"就开始囚禁真正的独立战士。巴基斯坦是匆匆拼凑起来的一种结构，是出于对印度的憎恨而结合起来的，巴基斯坦每一代新的领导人都给这种憎恨火上加油。东巴的状况反映出来的倾向对整个巴基斯坦都是适用的。俾路支和西北边境省都不是正当地属于巴基斯坦的领土；它们也要求、并且应当得到更多自治权利；它们本来就不应当包括在原来的解决办法之内。

这堂历史课的目的很难说是想要平息对印度意图的担心，说得好一点是不着边际，说得坏一点甚至是对西巴的团结也提出了威胁。甘地夫人如此坚持强调巴基斯坦的先天缺陷，言外之意是

仅仅要求东巴分离已经算是印度的克制；西巴的继续存在就反映了印度的容忍。她对叶海亚十一月二日的让步根本不当一回事。她不反对巴基斯坦单方面撤军，但拒绝说明印度是否会照着做。她答应第二天提出正式答复。尼克松向这位总理保证，她可以指望我们尽一切努力使危机得到缓和，包括鼓励政治解决的迅速实现。但是这位钢铁似的夫人把所有这类讨论都推到以后会晤进行。

下午，我同她的助理哈克萨尔再次详细研究了叶海亚的让步。我向他保证，我们将坚持推动即将成立的文官政府走向承认东巴自决。我预计东巴将在三月获得自治，其后不久就会得到独立。我建议我们一起拟订一张时间表。哈克萨尔毫无兴趣。

尼克松同甘地夫人第二天的会谈证实了美印关系的虚幻。甘地夫人根本不提巴基斯坦问题。整个会晤限于回顾世界局势。甘地夫人深入询问了我们对其他地区的外交政策，似乎次大陆是全球唯一的和平而安定的角落。除有关次大陆的问题外，她给我们判的分数都是优等。尼克松自己也十分愿意把前一天的话题略而不谈，一部分原因是害怕出现不愉快的场面，同时也是因为他正确地判断这是甘地夫人拒绝我们业已提出的各种方案的办法。这个典型事例说明政府首脑为什么不应谈判有争议的问题。由于他们之间的僵局似乎是无法打破的，这就加剧了他们避免明确表态的倾向。因此，甘地夫人的访问没有在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甚至没有在寻求进展的程序方面取得进展就结束了。

到十一月十日，已经无法忽视印度军队攻入东巴的消息了——根据一份已经核实的报告，有两营人。当时存在巴基斯坦反击的危险。西斯科召见巴基斯坦和印度双方的大使，敦促两国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巴基斯坦新任大使纳·阿·穆·罗查保证他的政府将避免采取任何挑衅行动。杰哈则否认印度有任何入侵；我们不能揭穿这种谎言，否则就会泄露情报来源。十一月的上

半月，我们收到的报告说印度某些官员正在谈论月底以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这些报告同实际情况只差一个星期。

十一月十二日，我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国务院提议压叶海亚再制定一个最大限度的政治方案，作为——像国务院的一名代表指出的那样——"帮助（他）在免于战争的情况下摆脱困境"的办法。可惜叶海亚唯一尚未做的让步就是立即释放穆吉布和宣布让一半国土独立——他认为这种让步是令人屈辱的，因此留待即将成立的文官政府去办。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这件事可以及时完成，以避免印度莽撞地投入冲突。唯一可能稍有成效的办法是对新德里采取威胁手段，但是谁也不愿提出来。我对我的同事们重申，我们鼓励政治演变，但不支持印度强行加快速度、致使西巴无法生存的战略：

> 如果甘地夫人希望找台阶下，我们应当努力给她台阶。但是我们为帮助她已经搞得筋疲力竭，而她干了什么呢？我们的建议她一条也不接受。她对总统说了不少友好的话，但却同总统说的话毫不相干。她只是一个劲儿地要手腕，让我们当恶人。问题在于：我们满足她三分之二的要求，并让她以此作为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基础，这样我们怎么约束她呢？

然而现在已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了。我们面临一场危机，除了规劝外几乎无计可施。于是我们又回到发报机上去。我们要进一步检验一下叶海亚对待穆吉布的灵活程度。国务院也发电报劝双方克制。印度几乎不屑于答复；它抱怨我们的做法把印度同巴基斯坦相提并论。印度在外交上所要求的让步大多数已得到满足，现在只限于让它的大使来询问它明知不可能很快实现的那个条件：释放穆吉布并承认他是巴基斯坦的唯一谈判对手。

我在十一月十五日会见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巴基斯坦外事秘书苏勒坦·汗时也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这位正派而能干的人就在四

个月前我前往北京时曾在伊斯兰堡给我送行。现在我不得不尽可能委婉地敦促他在穆吉布问题上表现最大的灵活性。他回答说，照他看来现在的军人政府已经走到让步的极限。但是，一旦成立文官政府——约六个星期以后——将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十一月十八日，叶海亚本人也对法兰大使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强调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建立文官政府的时间表："如果文官政府那时想通过穆吉布同孟加拉国打交道或采取别的办法，那是文官政府的事，与我无关。我那时将已完成把权力交还人民的目标。"

十一月十五日和十八日，我同多勃雷宁两次谈话时都提出警告，指出苏联继续空运武器，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多勃雷宁和蔼地回答说：苏联事实上是建议克制的。十一月十九日，我同杰哈讨论了使东孟加拉在三月份以前获得充分自治的时间表。他只是耸耸肩，根本不屑一顾。

当潜在的侵略者看到战利品近在咫尺，自己在当地又享有压倒优势，而作为牺牲品的对象处于孤立状态、士气涣散、解除了武装，这时和平的前景就黯淡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次大陆开始了全面战争的第一个阶段，然而将近一个星期以后印度才承认，我们的各个部门才愿意正视这场战争的含意。

印巴战争

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向尼克松报告说：

巴基斯坦今天在电台广播中声称印度"未经正式宣战即向东巴发动全面进攻"。……印度声称这些报道是"绝对虚假的"。……我们此刻尚未获得站得住脚的证据，但看来显然发生了重大事件。

危机开始时总是一片混乱，这一次则比其他危机更为混乱。巴

基斯坦大使没有得到情报；消息来源并不比我灵通的罗杰斯国务卿只能记下相互矛盾的报告。尼克松急于执行他从五月份以来一再重申的停止对印度援助的威胁。为了避免国内批评，他希望用停止向交战双方提供援助的形式予以宣布，因为他知道给巴基斯坦的援助已接近枯竭。我建议他推迟到下午召开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之后再作决定。如果事实证明印度是侵略者，我甚至对是否应当宣布切断给予巴基斯坦的援助也持怀疑态度。这样做未免过于不分是非；并且可能造成北京的误解。尼克松则主张采取任何使印度受到更大伤害的方针。

我毫不怀疑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印巴战争的开始，而且这场战争是印度发动的。无论流行的神话怎么说，大部队作战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由某个司令部指挥它们行动的。说七万名正在对游击队作战的巴基斯坦士兵会进攻二十万印度军队，或者说仅有十二架飞机驻在东巴的巴基斯坦空军会向二百架严阵以待的印度飞机挑战，无论如何胡说八道都不可能使人相信。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借口。我毫不怀疑——尼克松甚至更强烈地认为——印度蓄意不断提高要求正是为了使问题无法解决。当然，巴基斯坦对东孟加拉的镇压是野蛮的、目光短浅的；几百万难民也给印度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按照尼克松和我的看法，战争的起因并不是难民问题，而是印度决心利用危机建立自己在次大陆的统治地位。

但是我们最关切的事超出了次大陆的范围。苏联本来可以抑制印度而不这么做。事实上，它通过签订友好条约、外交上支持印度的最高要求、空运军事物资并保证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印度不方便的提案，积极鼓励了战争。苏联鼓励印度利用巴基斯坦的苦难，一部分是为了打击我们的结盟系统，更重要的是证明中国的软弱无能。北京和华盛顿正是对苏联力量有一种共同的关切才

走到一起来的。因此，如果证明美国根本不起作用就会使我们同中国新建立的尚不稳定的关系受到严重压力。如果我们按照批评者的意见办——公开地、大规模地同巴基斯坦脱离关系，在它陷入绝望的时刻站在它的对立面——我们的行动看上去就正好是中国恐惧的美苏共同统治；几乎可以肯定，这样做将使我们对中国的主动行动化为乌有。我有时在跨部门的会议上听到一些意见，似乎我们一心只想保持到中国去的机会。但是，正如我对尼克松说的那样，“这些人不了解，我们不到中国，也就去不了莫斯科。”

我们捍卫的也不只是抽象的国际行为准则。不管许多人多么不愿承认，这次进攻的受害者是一个盟国，正是针对这种意外事件我们曾对这个盟国多次做过明确的承诺。这种明确的条约义务加上我们承担的其他责任可以追溯到一九五九年。承担这些责任是否明智是可以辩论的（我们的许多官僚机构如此渴望忘掉它们，以至有一段时间甚至白宫都几乎不可能取得一九六二年往来信件的副本），但是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否则就会使伊朗和土耳其这类盟国失去信心。这些国家同情巴基斯坦，他们得到我们同样的保证，把我们的反应看作是美国在可能涉及它们的危机中态度是否坚定的象征。因此，这里涉及到很大的赌注。十二月五日，我对尼克松说，印巴冲突将成为春天中东局势的一次彩排。十二月六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前后，我曾对约翰·康纳利提出过同样的论点。

不存在“挽救”东巴的问题。尼克松和我几个月以前就已经认识到东巴独立是势在必行的；但是实现这一点并没有必要通过战争。我们力图保持西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因为我们判断印度的真正目的包括使西巴解体。我们力图防止事态的发展证明苏联的武器和外交支持在出现危机时必然会起决定性作用。十二月四日，我对尼克松说，正因为我们正在退出越南，我们不能容许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赤裸裸的武力加以解决。虽然

现在要防止战争为时已晚，我们仍有机会——通过加强我们的反应——使苏联在其他地方采取冒险行动以前感到踌躇。正如我十二月五日对尼克松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提出足够的威胁才能阻止苏联在其他地区的朋友、特别是在中东的朋友采取类似行动。如果我们采取足够大胆的行动，我们可能在印度吞没和摧毁西巴之前使它停止进攻。

这种战略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各个部门是按不同的前提行动的。它们担心惹恼印度，认为无论我们怎么做巴基斯坦都输定了，而且知道我们的方针在国会和新闻界都不得人心。尼克松理解这件事在战略上的利害关系，但下不了为实现行动指令所必需的执行纪律的决心。

外交部门是一个训练有素、干练而有献身精神的非常出色的工具。我担任国务卿时，逐渐对这个机构的作用感到赞赏，对它的成员感到尊敬，并同其中许多人产生了亲密的友谊。但是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把忙于日常工作、各管一摊的各个司捏在一起，特别是在奉行的政策不得人心或同长期的偏爱发生矛盾时更是如此。这种方向感必须由七楼——国务卿及其直接下属办公的地方——提供。不幸的是——并非由于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原因——我同罗杰斯的关系的恶化加深了我们在政策方面的分歧，危及了政策的连贯性。他容易单纯为了肯定自己的特权而反对我提出的任何建议；我则力图尽可能绕开他。（至于哪个原因在前，必须由比较超然的历史学家去确定了。）罗杰斯深信我们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尼克松是受到我的有害影响才采取这种方针的。我则认为罗杰斯没有掌握地缘政治的利害关系。结果出现了官僚机构之间相持不下的局面，白宫和国务院的代表打起交道来像两个相互竞争的拥有主权的实体，而不是同一个班子的成员。总统采取迂回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使我们政府内部的紧张关系复杂化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战争爆发后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说我们还缺乏足够事实来做决定。它建议我们压巴基斯坦再做政治让步。虽然这场战争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国务院对是否提交联合国却犹豫不决；它决心不与印度发生冲突，认为提交联合国的好处不是援引宪章条款反对武装进攻，而只是为了使我们同整个这件事摆脱关系。我——恐怕是颇不耐烦地——问他们从巴基斯坦榨取新的让步来报答进行侵略的印度究竟有什么意义。要求印度等待四个星期看看向文职当局移交权力的结果难道不合理吗？至于提交联合国问题，我请国务院在第二天开始工作前准备好详细方案。当天晚上，总统给我送来一份指示，要求给新德里、莫斯科和伊斯兰堡发出态度强硬的电报，提出反对战争的警告。尼克松特别要求就苏联向印度提供武器一事警告莫斯科。

军事后果逐渐明显起来。巴基斯坦告诉我们，印度有两个旅在东巴境内作战。十一月二十三日，尼克松收到一封叶海亚来信，信中描绘了印度的军事部署，说明印度实际上已经在东巴形成对政府军的包围，并正在通过大规模的无端进攻缩小包围圈。叶海亚向尼克松保证，即使在这么晚的阶段他仍然希望避免战争。他呼吁尼克松"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他"个人的首创精神"，这"对避免战争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

同日，即十一月二十三日，我们收到甘地夫人的来信，不知道为什么信中日期写的是十一月十八日。甘地夫人以对联合企业合伙人说话的口吻，对自己的克制评价甚高，说她之所以克制是因为深信正义必将取得胜利，同时也是因为"从我同你的讨论中得到了支持"。当印度部队在邻国领土上纵横驰骋时，甘地夫人建议不要召开安全理事会，理由是"这种行动将堵塞通往我们共同寻求的解决办法的道路"。诉诸联合国居然可能妨碍军事冲突的解决，这真

是一种有趣的国际法理论。关于印度既已进攻邻国，我们正在寻求"共同解决办法"的暗示并没有平息总统的怒气。甘地夫人呼吁尼克松运用他"巨大的勇气"来促进问题的解决，并表示她希望改善美印关系。她对自己希望得到什么解决办法、对改善印美关系的内容，并没有惠予说明。但她显然不愿意被叫到联合国去，当着世界各国的面为印度的政策辩护并申诉理由。

现在双方都要求美国施加影响，但是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会议并没有明确美国施加影响的方向。国务院不反对向莫斯科和伊斯兰堡发出要求克制的电报（对于后者，谁也不曾认为要求军事进攻的受害者表现克制有什么奇怪）。造成麻烦的是给新德里的电报。欧文副国务卿建议推迟到我们有"独立的"情报证实是印度进攻之后再发这份电报。我回答说："我们这种猜谜游戏只能到此为止了。"

国务院也不愿意按照尼克松的要求切断给印度的军事援助。国务院的代表怀疑切断援助是否符合我们约束甘地夫人的努力，也怀疑这种做法的效果。这同他们几个月来在巴基斯坦军援问题上说的意见恰好相反。几个月来在掐断巴基斯坦供应渠道方面表现了巨大独创性的这些人现在似乎完全不懂得如何对印度实行这个办法，反而大讲寻找已发许可证的装备是如何困难。此外，停止给予双方的经济援助，说到底，对巴基斯坦的损害比对印度严重得多。我指出了本来应当不言自明的道理：我们已经对受害国停止供应军事装备却不对进攻国停止供应，这是没有道理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也是我在纽约第一次秘密会晤中国人的日子。黄华此时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的常驻代表。北京同意在有关联合国的问题上或有紧急信件时我们可以利用驻在纽约的黄华作为联系人；其余事务则照旧通过巴黎进行。我认为使北京详细了解我们的行动是很重要的，至少必须使中国领导人理解

我们并没有同苏联勾结。北京需要了解我们抵抗扩张主义的决心以及我们在这件事上实际可能做到的限度。

黄华同我在纽约市东三十区* 一个秘密地点见面。这是中央情报局曾用作安全接头地点的一幢古老的褐石建筑物里面一套狭小而寒伧的房间。对这种地点的要求之一是没有看门人，其他住户也很少，否则让过多的眼睛很尖的纽约人看到三位穿毛式制服的中国外交官走进一座建筑物，亨利·基辛格又接踵而至，那我们就太冒险了。（后来我们把会晤地点搬到东七十区一幢同样寒伧然而外观稍微华丽一点的建筑物里去了。）当时我能向黄华介绍的只不过是军事形势。我给他看了我们准备在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时提出的决议草案，指出我们尚未做出最后决定。黄华强调中国将在安理会支持巴基斯坦，至于是否把问题提交安理会则按巴基斯坦的意见办。

十一月二十四日，甘地夫人第一次承认印度军队越过了巴基斯坦边界，但说只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越过一次。她通知印度议会说，印度军队的行动是行使自卫权利。将来是否越过边界将由"现场人员"——一批急于证明自己的才能的司令官——去决定。

在所有这些证据面前，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十一月二十四日开会时仍然踏步不前，等待我们在新德里、伊斯兰堡和莫斯科采取的措施的反应。我问各个部门它们对印度正规军入侵东巴一事是否还有任何怀疑。大多数人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尽管甘地夫人已经承认——国务院的代表仍然认为证据缺乏说服力。他提出的行动建议仍然是压巴基斯坦再做政治让步。如果说美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存在"偏向"，它客观上是偏向印度一边的。官僚机构陷入瘫痪的实际效果是配合了印度在外交战线上采取的拖延行动。

* 指东三十号大街至东三十九号大街之间的地区。——译者

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午，尼克松同罗杰斯和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立场同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时一样，罗杰斯说我们尚无足够证据使安理会采取行动。不幸的是当时直接讨论的问题都过于技术性——可能提交联合国的决议措词问题和在不同程度上切断援助的方法问题。尼克松讨厌这种细节；讨论这种问题使他明显感到烦躁。无论怎么说，否定老朋友的意见是违反他的性格的。因此，会议开完也没得出结论，后来尼克松又烦躁地对我说不知道把他这位国务卿怎么办才好；他曾动过念头要让约翰·米切尔去约束一下罗杰斯，但最后什么事也没做。

结果是大家都随自己高兴而自行其是。国务院让它的发言人在一次为报界举行的情况介绍会上宣布美国没有证据可以指责印度侵略，从而宣扬了它的观点。当巴基斯坦大使向国务卿提出抗议时，罗杰斯又重申我们"没有独立的情报来证实或否定"印度参预了武装进攻。罗杰斯解释说，在相互矛盾的报道的真实性问题上，华盛顿不愿意处于偏袒一方的地位。当然，战线位置深入巴基斯坦领土这个情况本来会给我们提供相当明确的线索，说明谁可能处于进攻一方。

官僚机构的内讧使美国到第三天还没有做出任何认真的反应。我在前面几章中曾经指出，危机必须及早克服才能加以控制。一旦危机取得势头，有关各方承担了义务就容易使危机失去控制。如果第一天就对印度提出严厉警告，同时无情地执行看来是当真的切断援助的威胁，就有可能使甘地夫人在使行动升级之前感到踌躇。（如果在进攻之前就这么做当然更好。）对谁是进攻者的怀疑大部分是虚假的。游击队是不会用坦克和飞机在几百英里领土上纵横驰骋的。苦苦哀求克制只能说明我们优柔寡断；这种哀求可能鼓励了而不是约束了印度的军事行动。

基廷大使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感恩节那天同斯瓦兰·辛格打交

道的经验说明印度是坚持不让的。辛格在气势汹汹地答复我们要求克制的呼吁时，抱怨说从甘地夫人访问以来没有取得政治进展。他没有告诉我们，由于他的总理根本不屑于对我们的提议做出反应，并且直到十一月二十三日即四十八小时以前才同我们联系，怎么可能取得政治进展。他说，如果巴基斯坦单方面撤军就会造成新的形势，但他拒绝告诉我们印度是否会跟着撤军。辛格说是巴基斯坦威胁了印度，而不是相反。当基廷谈到巴基斯坦领土上的印度军队时，辛格轻松地回答说，这同他所了解的事实不符。甚至基廷（这位强烈支持印度观点、在国会中为印度游说、并经常在私下严厉批评尼克松和我的人）也不得不勉强承认辛格"在有关东巴境内的印度军事人员的问题上对我并不是十分坦率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我们还从可靠方面获悉甘地夫人曾对她的同事们说，印度将继续进攻并使进攻升级。她的司令官的行动同她说的话是一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印度在杰索尔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苏联阻止了日本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的试探。他们对比姆大使说，苏联只有在取得使印度满意的政治解决的情况下，才支持结束军事行动。尼克松打电话给英国首相希思，告诉希思他担心印度的目标可能远远超出东巴的范围。希思一般地表示同意，但明确指出英国将保持超然的态度。

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兰设法见到叶海亚。叶海亚接受了法兰要他请求联合国派观察员到战线的巴基斯坦一侧去的建议。叶海亚还要请求联合国接管东巴难民设施，并考虑让孟加拉反对派的人去会见仍在狱中的穆吉布。在新德里，基廷借弗兰克·丘奇和威廉·萨克斯比参议员访问的机会见到甘地夫人。她的方针甚至变得更加强硬起来。她再次抱怨从她同尼克松会谈以来一直没有取得政治进展。她说，无论怎么说，现在已不是东巴问题，而是在邻国局势动荡时印度的国家安全问题。甘地夫人始终扮演一个爱

好和平、然而为形势所迫的温和派的角色。她说她好不容易才顶住国内要她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的巨大压力——虽然很难看出印度在骚扰、伤害和侵入邻国方面还可能再多干些什么。

尼克松的本能还是要用切断援助的办法来答复甘地夫人。我劝他等待印度下一步行动。在挑衅十分明确、事实无可争辩的时候做出反应对我们比较有利。国务院提议总统致函叶海亚、甘地夫人和柯西金，再次要求撤军，但却毫不表示拒绝我们的建议将带来什么惩罚。虽然总统信件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以致降低了它们的价值，我还是同意了，因为这种信没有害处，还可以为以后采取较强硬的行动提供基础。

总统给甘地夫人的信告诉她叶海亚愿意让联合国观察员前往边界巴基斯坦一侧，并提醒她注意巴基斯坦关于单方面撤军的仍然有效的建议。信件注意到她已承认印度部队在巴基斯坦领土上作战，强调指出："如果印度的行动导致广泛的敌对行为，美国人民将无法理解。"

致柯西金的信件再次要求苏联在促进危机的和平解决方面予以合作，并敦促苏联压新德里撤军。这种姿态是徒劳无益的。苏联所谓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同印度如出一辙。

给叶海亚的信则劝阻他不要为了减轻被围困的东巴所受的压力，而从巴基斯坦大部分军队驻扎的西部地区进攻印度。尽管进攻也注定会失败，但走投无路的领导人仍可能为荣誉所驱铤而走险。我们担心巴基斯坦从西面进攻只会使印度终于找到借口来完成它瓦解整个巴基斯坦的计划。尼克松的信列举了我们为促使印度克制而采取的各种没有发生效果的行动，但也提出了反对扩大战争的警告。叶海亚十一月二十七日接见了法兰。他深感绝望，但愿意合作。他表示请联合国立即派遣观察员去边界巴基斯坦一侧，以便为巴基斯坦的防御意图担保。他主动提出让法兰会见

穆吉布的律师。(随着战争升级，叶海亚后来撤销了这个建议。)他还重申他愿意同加尔各答的孟加拉国临时政府成员接触，并且说“他们将发现我不是毫无反应的”。

战争中正在取胜的一方很少是急于谈判的；战斗持续时间越长，它讨价还价的地位就越好。唯一的约束是担心把牌打过了头会触动外部力量，因而可能使它丧失胜利的成果。十一月底正是甘地夫人乘风破浪胜利前进的时候；美国和中国的行动都不能使她感到有多少理由要谨慎从事。尼克松政府正受到压力，要它反对巴基斯坦；处于文化革命尾声的中国则在军事上缺乏准备，而且刚刚度过国内一场涉及军方忠诚问题的危机。

在此期间，国务院发言人出面发表了一通评论。这种评论说明他的同事们多么难于按照白宫的战略办事，又多么难于断绝三十年来同印度的感情联系。前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小本杰明·H·奥勒特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十一月三日的该报上，内容是说“当巴基斯坦受到任何其他国家进攻时”，美国有义务“甚至以我们的武器和人员”去援助巴基斯坦。十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发言人在回答问题时说，不存在使美国必须援助巴基斯坦的具有约束力的秘密保证。如果对“武器和人员”这个短语给予足够强调，如果让一位精明的律师来解释“具有约束力”的含意，那么这个声明非常接近真实。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制止印度对我们的一个盟国的进攻，这个声明又碰巧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信号。

找不到甘地夫人来接受总统的信件。她已决定去访问边界附近的印度部队。她猛烈抨击超级大国(意指美国)居然厚着脸皮“由于我们采取了保卫边界的行动”而发出怨言。这篇演说不可能使军事司令官们的思想转向和平，他们现在已经拥有穿越边界的自行决定权。同日，印度国防部长贾格吉凡·拉姆在加尔各答一次政治集会上向欢呼的群众透露，已经授权印度部队推进到巴基

斯坦境内去“打哑”巴基斯坦炮兵。在同一次集会上还有一个演说者宣布“印度要把巴基斯坦打得粉碎”。一位印度上校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对记者讲了美国政府中一部分人还不愿承认的事情——“我们的部队是因为孟加拉解放军要求帮助才参加进去的。”⑤

基廷终于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赶上了甘地夫人。甘地夫人对他的接待是冷若冰霜地又背诵了一次印度的抱怨。她相当准确地指出，叶海亚的困难是他自己造成的，“我们并不处于减轻他的困难的地位。”她不能继续告诉印度人民等待。她还寓意不祥地补充说：“我无法加以控制。”当基廷试图提出侵入巴基斯坦边境问题时，甘地夫人打断他的话头说：“我们无法倾听要削弱我们力量的意见。”

于是问题回到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个小组讨论了印度究竟是在尼克松和甘地夫人会谈以前还是以后决定进攻的问题，没有得出结论。这个问题之不着边际正如答案不言自明一样。甘地夫人显然事前早就计划进攻了；她到华盛顿来不是为了寻求解决，而是为自己的行动施放烟幕。从甘地夫人回国到第一次越过边界作战之间的十天中是不可能完成印度的部署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最后不得不接受事实，即总统要停止对印度的某些援助。然而国务院还在顽固地维护他们的立场，要把对印度的削减保持在最低限度，同时把指示搞得极为含糊，以便执行时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处置权。关于我们可能切断哪些武器种类的供应，情况混乱之至，所以我说，“我们有没发许可证的合同，又有没签合同的许可证”，究竟停止供应什么呢？后来才搞清楚他们赞成的办法是拒绝颁发新许可证——其理论基础无疑是在战后情绪冷静下来时这种决定随时可以推翻。从各部门轻而易举就达成协议的情况来看，我应当知道所涉及的数量一定很小（约一千七百万美元）。第一步是十二月一日由国务院宣布的，禁止给运往印度

的军事装备颁发新许可证。

十一月二十九日，我通过巴黎渠道把我们向其他国家提出的一切建议以及这些国家的反应都通知了北京。

十一月三十日，甘地夫人又使压力升了一级。她在国会发言时以挖苦的口吻对要求撤军的呼吁表示欢迎，但是“应当立即撤退的军队是现在孟加拉国的巴基斯坦军队”。她给同巴基斯坦举行任何谈判的念头泼冷水，理由是只有通过选举产生的孟加拉国的代表才能决定孟加拉国的前途，而照她看来，除了“解放”外，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其他解决办法。因此，除了肢解巴基斯坦问题外没有什么可以同巴基斯坦谈判的。

于是，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十二月一日再次开会，讨论在敌对行动已经开始一个多星期后是否到了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时候，也讨论在切断印度武器供应方面还可以采取什么步骤。奇怪的是，国际上一致的意见是不要把问题提交安理会。印度不希望召开安理会，因为即使在这个机构里也不能虚伪到如此程度，可以不承认联合国一个拥有主权的成员国已被入侵的事实。只有苏联答应使用的否决权才能使它逃避谴责。巴基斯坦不希望安理会讨论，是因为它担心这种讨论会扩大范围，引起对东孟加拉镇压行为的普遍批评；同时，它希望使注意力继续集中在它邀请联合国派观察员驻在边界巴基斯坦一侧的建议上——这个建议已正式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苏联并不渴望得到被迫使用否决权的机会；黄华则对我说过，中国将支持巴基斯坦的任何要求。在我们政府内部，国务院不急于前往安理会是因为它担心白宫的指示会有“偏向”。我不愿开安理会则是因为我厌恶我们的指示将引起的国内争吵。当一个重要国家遭到全面入侵时，受害国、盟国、侵略国和其他大国都不愿提请按照宪章有责任帮助维护和平的世界性组织正式注意，认为这样做过分危险——这对联合国的状况是一个可

悲的评价。

战争扩大了

十二月二日，巴基斯坦大使罗查交来叶海亚给尼克松总统的一封信，信中援引一九五九年美巴双边协议第一条作为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的基础，⑥从而正式提出了美国对巴基斯坦承担的义务问题。国务院振振有词地辩解说根本不存在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它在公开举行的情况介绍会上定期发表自己的观点，指出协议第一条只谈到按照我国宪法程序采取“适当行动”，并没有具体说明要采取什么行动。国务院还声称这种义务受到当时的背景、即一九五八年关于中东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决议的限制。它说这个决议的目的就是把印巴战争排除在外。国务院干脆无视我国政府同巴基斯坦之间的全部其他往来文件。

一个伟大国家像钻法律空子的讼棍那样办事，这种形象不大可能使同我们签有条约或相信我们说的话基本上是算数的、因而加以信赖的其他盟国得到鼓舞。同巴基斯坦签订的条约是同另外好几个双边和多边协议一模一样的——我们的声明似乎使所有这些协议都值得怀疑了。而且就巴基斯坦而言，我们除签订条约外还做过多次表示支持的保证。事实上，在我们同巴基斯坦长达数十年的关系中，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同它相互传递的信息汗牛充栋，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内容超过了一九五九年条约的规定，其明显含意是：如果巴基斯坦遭到印度进攻，美国将援助巴基斯坦。⑦当然，当时提出这些保证的目的是为了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印度进攻果阿和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之后避免巴基斯坦要求我们提供武器，也就是用美国保证将来支持的办法代替了立即的物资援助。我们现在发表这样的声明，如果有任何作用，那就是把事

情搞得更糟。似乎美国就是为了避免给一个盟国提供武器，所以起初答应在将来威胁成为事实时提供支持，然后又用绝顶聪明的抠法律字眼的办法避不实现诺言。

我并不是说我们应当盲目地仅仅因为我们的前任说过什么就决定我们的政策。大国的决策取决于当时理解的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仅仅取决于抽象的、无论是含糊还是明确的法律义务。不能期望任何国家在自己的利益和义务完全不一致时承担严重风险。然而一贯无视自己保证的国家同样要背上沉重的包袱；它的外交就会丧失可靠的信誉带来的灵活性；它就不再能用答应将来采取行动的办法满足盟国的当前要求。不仅如此，巴基斯坦还是其他盟国——伊朗、土耳其——的盟国，是在当时激进倾向仍占主要地位的中东受到孤立的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的朋友。它也是中国的朋友，同北京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北京希望我们能维持全球均势，因此正在小心翼翼地探索同我们建立新的关系。弄得信誉扫地是我们吃不消的。

尼克松当时退居比斯坎岛；我们频繁交谈。他并不想从军事上卷入，但决心有所行动。他下令停止执行已给予印度但尚未执行的军火许可证，要求完全切断经济援助（我知道，由于官僚机构的偏见，这一点是绝不会实现的）。他要国务院发表声明，严厉批评印度顽固不化的态度。“如果他们不愿干，齐格勒将从佛罗里达发表声明，那将是一场爆炸”。我把这些指示转告给毫不热情的罗杰斯之后，他就开始想方设法把发表声明的时间推迟到一天当中很晚的时候，以缩小新闻报道面。

次大陆的形势再次赶在了我们前头。叶海亚终于被他在新德里的狡猾的死对头逼得走投无路。整个危机时期，叶海亚都是长期处在瘫痪的无所作为的境地，然后突然爆发，试图适应自己的困境——一般来说为时已晚。当印军向东巴境内推进日益深入、实

际上是在肢解他的国家时，他一连十一天置之不理。对于他的主力部队来说，在西巴边境按兵不动等于放弃职守，但如果有所反应则会落入印度圈套，给印度提供一个在东巴——最后还要在西巴——发动全面进攻的借口。叶海亚选择了他认为是光荣的道路。十二月三日，他让军队从西面发动了一场他自己必然知道是自杀性的进攻。正如我对尼克松说的那样，叶海亚以军人的纯朴方式决定，如果巴基斯坦终将遭到摧毁或肢解，它也应当是在战斗中倒下的。

我们政府内部的反应是利用巴基斯坦进攻作为再好不过的遁词来推迟尼克松头一天下令发表的谴责印度越境的声明，借口是我们又不了解全部事实了。结果我同罗杰斯一再发生争论。他认为战争既已扩大，现在提交安全理事会是势在必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印度，无异擅自承担了最好是留给那个世界性组织去承担的审判任务；换句话说，我们将作为法官，而不是作为一个盟国、甚至也不是作为一个利益攸关而且承担了义务的超级大国而行动。国务院原来反对把问题提交安理会，现在则赞成提交安理会，因为这可以作为借口来避免由美国单方面做出反应，并使我们暂时无需采取任何立场。我最后默认了国务院的主张，让它溜过了按照尼克松的命令谴责印度这一关。既然安理会要处理战争扩大问题，我们可以到安理会去陈述自己的理由。而且我知道我们驻联合国的那位能干的大使乔治·布什将会执行总统的政策。国务院经过长时间的拖拉以后，终于在十二月三日宣布停止执行发给印度但尚未执行的军火许可证——对次大陆爆发的全面敌对行为来说，这很难说是一种强有力的反应。

尼克松现已加快速度。他的态度照例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他要保持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他了解“不偏不倚”将有利于印度。对于当时发生的情况，他希望推卸责任。他害怕同罗杰斯发生冲突，

但坚持要在安理会上采取强硬路线。我的办公室接二连三收到他提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指出的方向是明确的，至于方法则不那么明确。

在这种气氛下，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于十二月三日开会制定一项方针。这次会议的记录后来泄露给了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如果孤立地看这些记录，似乎白宫一意孤行；但是，只有看到几个月来官僚机构对总统的明确决定一直进行令人沮丧的猛烈抵制这一背景，才能理解这些记录。在情况室这个我认为是私下的场合，我说："每隔半小时我还来不及穿衬衣就被总统叫去训斥一通，他说我们还不够强硬。他真的不相信我们在照他的意思办。他要偏向巴基斯坦一边，而他认为每次介绍情况或发表声明却是背道而驰。"这当然是说的实话。

我的挖苦话对各部门的倾向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当我转达总统的指示要求中断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时，国务院建议对巴基斯坦也采取类似步骤——尽管总统认为印度采取了好战行动，因此是有罪的一方。这使我在愤怒中又发表了一次有"偏向"性的谈话："如果每次我们对印度采取某种行动，就必须对巴基斯坦也如法炮制，那就很难做到象总统所希望的那样偏向巴基斯坦一边。在我向总统请示之前，这只能作为非正式意见。"

国务院代表在跨部门会议上的地位是极不舒服的。我挖苦他们拖沓不前，他们自己的头头又极力要他们更积极地对抗白宫，结果他们不得不在激流险滩中航行，动辄得咎。例如十二月四日白宫指令乔·西斯科向报界非正式介绍情况，阐明我们对印度政策的批评。西斯科忠实而能干地执行了命令，但国务卿极为不快，后来并禁止他在电视中公开阐述同样的论点。我说的这些情况之所以出现，责任在于最上层的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回顾官僚机构的斗争不是为了追究责任，而是为了阐明公开的记录，否则这些

记录是无法理解的。

分歧在于白宫是从地缘政治观点看问题而国务院则从区域观点看问题，在于执行我国外交政策时双方对中国和印度重视的程度不同。白宫认为这场冲突是一场无情的权力游戏，即印度在苏联鼓励下利用巴基斯坦政府的不称职和巴基斯坦政治结构的脆弱性强行用武力解决东巴危机，虽然当时看来显然是有办法从政治上解决的。无论我们的官员是否高兴，巴基斯坦是我们的一个盟国，我们对它负有条约义务，而且私下还对它做过保证；因此，巴基斯坦的命运将影响好几个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美国诺言上的关键国家的态度。中国将仔细注视巴基斯坦的情况。中东那些热衷于武力解决问题的国家也容易情不自禁地要采取军事手段。如果苏联的政策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次大陆得逞，它就可能在其他富有爆炸性的地区采取类似策略——后来在水门事件使政府的权威遭到削弱的时候，它的确这么做了。因此，如果巴基斯坦被武力肢解、最后又遭到毁灭而美国毫无反应的话，就会造成深刻的国际影响。

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我们是在毫无必要地牺牲印度的友谊，认为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挽救东巴，而且不管怎么说，挽救东巴也不符合我们的愿望。罗杰斯抱怨我们采取"中国的立场"。我们是在鲁莽行事，不必要地冒军事上卷入的风险。印度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我们需要同它交朋友。但是尼克松和我并不鲁莽。我们深信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并非出于对美国的热爱，而是出于它心目中的国家利益；眼前的危机一旦过去，这些考虑就可能再起作用。对我们来说，问题在于苏印勾结所包含的对国际秩序的进攻。我在十二月四日对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最后将面临印度对东巴的占领。"但是我们不得不采取坚决行动，挽救更大的利益和关系。我们手上的牌很弱，但绝不能在软弱之外再加上胆怯。十二月五日，我对尼克松说："我承认这并不是

一种英明的主张。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垮下来，苏联不会因此就尊敬我们；中国将瞧不起我们，其他国家也将得出自己的结论。”

此外，一旦战争扩大到西巴，就不是成立孟加拉国的方法问题，而是巴基斯坦本身的存亡问题了。印度的军事力量大大超过巴基斯坦，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六年来禁止向双方出售军火，而这种禁令主要伤害了巴基斯坦。由于印度可以获得苏联武器，自己也有庞大的军火工业，它必然会摧毁巴基斯坦的武装部队。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可能找到办法说明我们对巴基斯坦并没有承担有约束力的义务，但地缘政治的影响并不会因此有所削弱。我们最低限度必须证明我们不会由于昏庸无能而使自己更加软弱。我们行动的方式必须使苏联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中东——埃及总统这时已宣布一九七二年是另一个决定年——有可能采取冒险行动之前三思而行。

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的软弱地位使我们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做法；弱者表示克制就会鼓励对手进一步施加压力，使对手体会到自己地位的强大。我对我们的有利因素不存幻想；但是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领导人有时必须用大胆代替有利因素。十二月十一日，我对霍尔德曼说：“我们现在是在无牌可打的情况下大搞虚声恫吓。”我恳求他设法使总统这次坚持要求政府内部遵守某种纪律的意见能够实现。十二月九日，我向我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那些难以驾驭的同事呼吁说：“除非我们能够确定一项战略，用同一声音说话，不再通过不同部门发表任何相互矛盾的消息，制止一切泄密事件，否则我们就不配取得胜利。”

使政府各部门保持团结是不可能的，就是使它们在行动上具有任何一致性也非易举。为了使国务院同意由乔治·布什发表演说，对印度诉诸武力表示责难，对安理会要求停火和撤军（指印度军队）的决议表示支持，就耗费了十二月四日大部分时间。

十二月四日，布什按照这个精神提出了一个提案。安理会支持我们的立场，有十一个成员国赞成我们的提案，但由于苏联否决而未获通过。(英国和法国弃权——这个例子也反映了我们的西欧盟国让我们单独承担全球安全责任的倾向。)由于苏联的否决在安理会造成了僵局，我们根据“团结起来争取和平”的决议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并于十二月七日以一百零四票对十一票获胜。只有苏联集团和印度反对我们的立场。

这是一种离奇的局面。多年来，国内批评者一直指责政府对世界舆论注意不够。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世界共同体中得到的支持比十年来在任何其他问题上得到的支持都要多。只有这一次几乎所有不结盟国家都站在我们一边。许多不结盟国家都有边界冲突或种族分歧；谁也不愿意让外来势力成为这种争端的最后仲裁者。从联合国早期算起，苏联从来没有这么孤立过。我们得到了压倒多数的赞成票。然而我国那些通常鼓吹世界舆论的人却忙于抨击白宫，似乎白宫毫无理性地反对人类的公正舆论。至于显示美国无能和联合国陷入瘫痪会在全球造成什么影响，则很少考虑。两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安理会的保证是中东和平的关键。如果在继续蔑视联合国决议的情况下进行明目张胆的军事进攻，而美国不能站在一个盟国方面采取任何行动，这对中东外交意味着什么？

在这整个时期，苏联都在为印度争取时间，使它可以完成自己的军事行动。十二月五日，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声明，毫无保留地支持印度，反对在按照东巴人民的“合法权利”取得政治解决以前实行任何停火。尼克松获悉此事后，决定对莫斯科施加压力。同多数危机时期的情况一样，多勃雷宁不在华盛顿。他的代办伏龙索夫只有权接受和传递信件，而无权谈判。

十二月五日，我对伏龙索夫说，我们正处于分水岭上。莫斯科

鼓励印度侵略，这同改善美苏关系是不协调的。伏龙索夫采用抚慰态度。危机会在一个星期内过去，无需影响美苏关系。我严厉地指出，如果苏联继续奉行现在这种方针，无论次大陆发生什么情况，危机也不会在一星期内过去。

十二月六日，甘地夫人正式承认孟加拉国独立。虽然她的政策一直具有这种含义，她的声明起了排除取得政治和解的一切剩余可能性的作用。在尼克松下令四天之后，国务院终于宣布切断给印度的经济援助（然而只是半心半意地加以执行，所以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尼克松于十二月六日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因为他终于相信有必要实行某种纪律了。但是，同往常一样，尼克松执行纪律的努力是模棱两可的，结果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由于他基本上采取被动态度，这次会议的作用只是明确了罗杰斯同我的哲学观点的分歧，这种分歧由于并不能为我们任何一人增光的个性冲突而扩大了。尼克松明确表示了他对甘地夫人的不悦，但没有下行动命令，以免造成不愉快的场面。但是，他的顾问们刚刚离开，他就以典型的方式命令我找约翰·康纳利和梅尔·莱尔德设法使罗杰斯按照白宫的方针办事。可是，既然罗杰斯没有听见尼克松说这种话，他坚信自己是在执行总统的愿望，认为我是在自行其是。尼克松指示齐格勒发言，指出印度的行动“违背”了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分歧的“国际潮流”。然而各部门并不了解齐格勒的一切发言都必须得到霍尔德曼或尼克松的批准，因此以为这也是我要的手腕。

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工作越来越集中到白宫，使尼克松和我可以加以控制。而这时各部门正乐于让我们承担一切事态发展的责任和几乎肯定会引起的责难。我们确认使西巴免遭印度摧毁的最大希望在于增加莫斯科所冒的风险，使它看到次大陆的事态可能

危及它同美国举行最高级会谈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姆林宫有可能敦促印度保持克制。因此，十二月六日，把尼克松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交给了伏龙索夫，信中强调“我们原先商定”举行最高级会谈时“所遵循的精神”，要求“实行最大限度的克制，采取最紧急的行动来结束这场冲突和恢复次大陆的领土完整”；如果印度造成“既成事实”，将“使国际局势长期复杂化”，“破坏信任”，并对“其他一系列问题产生不利影响”。

当晚十一点钟，我们收到苏联对我前一天同伏龙索夫谈话的答复。答复的口吻是和解的，但采取了军事行动进行顺利的一方的传统姿态——拖延时间。苏联否认次大陆的事态代表一个分水岭。它按照塔斯社声明的精神——形式上则比较讲究——要求以东巴的政治解决作为停火先决条件。而苏联所谓政治解决含意同印度是一样的，就是立即独立。莫斯科显然希望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尼克松的反应是，在我的建议下，下令放慢同莫斯科进行经济谈判的速度。这件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那时已经有相当多的部门在东西方贸易方面有了既得利益，都想保护自己的地盘，即使拖延执行命令也在所不惜。这种抗拒是商务部长斯坦斯带的头。他反映了许多商人强烈认为不应因为政治而牺牲利润的观点。不仅如此，肯定是激烈反共的斯坦斯幻想他已同苏联领导人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极不愿意为了数千英里外玩弄的神秘的外交把戏危及这种关系。

十二月七日，叶海亚通知我们，东巴正在土崩瓦解。对我们来说，这一天是以《华盛顿邮报》一篇社论开始的。这篇社论尖锐抨击政府对次大陆的政策，把切断对印援助称为“莫名其妙”、“单纯惩罚性的”，认为这样做的理由是“可笑的”。《华盛顿邮报》正是在已经可以明确看出问题远远超过东巴自决范围的那一天得出这种

结论的。我们从一个其可靠性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怀疑、而且直到今天我也不怀疑的消息来源得到的报告说，印度总理甘地夫人甚至决心要把西巴也搞瘫痪。她已表明：在孟加拉国获得“解放”以前，印度不会接受联合国大会关于停火的任何呼吁；在那以后，印度部队将去“解放”自由克什米尔南部——即克什米尔属于巴基斯坦管辖的那部分地区——并一直战斗到巴基斯坦陆、空军全部消灭为止。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西巴也遭受肢解，陷于毫无防御能力的境地。甘地夫人还告诉她的同事说，如果中国“动刀动枪”，苏联已答应采取适当反击行动*。其他情报表明，这意味着在新疆对中国采取牵制性军事行动。在这种相互配合的重重压力下，巴基斯坦——西巴——不可能生存下去；中苏战争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在这种背景下，我向报界介绍了一次情况，后来引起了很大争论。我这样做是因为罗杰斯已经禁止国务院人员公开介绍情况，因为有人大量泄密、力图破坏总统一再下达的命令，同时也因为我们需要表明我们一贯的立场。我试图阐明我们的理由，警告印度而又使它对我们基本上是善意的态度感到放心，同时向苏联表明情况正日益严重起来。我否认政府是“反印度的”。我着重指出，我们没有原谅巴基斯坦一九七一年三月在东孟加拉的镇压行动；我们中断了军事援助，并且做了很大努力来促使巴基斯坦政府同孟加拉国在加尔各答的官员取得政治和解。尽管如此，在我们看来，印度应对这场战争负责。我指出，印度“……本来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份时间表，或等待一下，看看不过三星期以后就要恢复的文官统治是否会使局势有所变化。……”我们的结论是，“在我们看来，采取军事行动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印度拒绝或无视了我们的

---

* 杰克·安德森发表了——作为我们制定政策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的——有关印度想法的这些报告，但显然没有理解报告的意义。⑧

建议。我警告苏联说，它有责任起约束作用，因为“企图获得单方面利益的做法迟早会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从而必然危及缓和的前景”。[9] 我当时相信，现在也仍然相信，这种说法准确地反映了现实状况。

乔治·布什根据指示在联合国走得更远，给印度戴上了侵略者的帽子。我们在联合国大会支持的一项要求停火和撤军的决议案，赢得了压倒多数的支持，如我已指出的那样以一百零四票对十一票通过。但是，我们介绍的情况和世界舆论的强有力的表现都未能使新闻界或国会的批评缓和下来。《纽约时报》嘲笑我关于本来可以同叶海亚取得政治和解的说法。《华盛顿邮报》继续表示“对尼克松先生亲巴基斯坦的政策持严重保留态度”。

对我们来说，现在的问题是防止西巴遭受肢解。我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十二月八日的会议上说：

> 现在让我们转到关键问题上来。如果印度进攻西巴，占领自由克什米尔并粉碎巴基斯坦的空军和坦克部队，看来会导致若干不可避免的情况。我们应当心安理得地让分裂势力在西巴同在东巴一样自由活动吗？按照我的理解，正如甘地夫人在同总统谈话时以及在纽约举行的哥伦比亚大学讨论会上讲话时表明的那样，俾路支和其他类似问题必然会突出起来。巴基斯坦将毫无防御能力，西巴将变成一个仆从国。

高潮：重大的决策

从根本上说，我们只剩下一张牌可以打，就是增加苏联的风险，使莫斯科看到更大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尼克松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十二月八日晚上向我提出，我们也许应当取消莫斯科最高级会谈。这表现了总统不愉快的程度；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希望我

执行这个建议。他说这句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给历史留下表示他态度强硬的记录，以后可以用来说明，当僚属们动摇犹豫时，他却如中流砥柱，坚定不移。不到一个星期我就了解到，如果照字面理解总统的话就有招致他不快的巨大危险。但是我当时告诉尼克松说，采取这种行动的时机尚不成熟。我们尚未收到勃列日涅夫对总统十二月六日信件的正式答复。一旦把苏联公开逼到墙角，他们对制止印度进攻巴基斯坦就不再感兴趣了。但是我确实赞成加大压力，把取消最高级会谈的威胁留作后备："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使苏联对我们保持尊敬。"我说："我们必须防止印度进攻西巴；这是主要的事情。"如果我们完全无所作为，"我们就会促使苏联采取真正强硬的行动"。我对赫尔姆斯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如果什么事也不干，我们就输定了。如果干点什么，大胆地干，同时采取其他步骤，我们就可能使苏联停止玩他们那套把戏。"

十二月九日，我们收到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其中有引起希望的一面。复信建议实行停火，并在谈判中断时取得的基础上恢复巴基斯坦各方的谈判。如果苏联打算借此敦促各方回到三月二十五日的局面，那就有希望，就会提供一块遮羞布，使人们可以说谈判是在统一的巴基斯坦这个大前提下开始的，尽管谈判的结果必然是孟加拉国独立。勃列日涅夫还要求同穆吉布谈判，这样做将需要时间；这可能是一种争取时间的办法，因为我们要向莫斯科探索这个建议的含意。此外，我们必须肯定印度不会利用这段时间来实现它摧毁西巴的意图。

在印度大使同副国务卿谈话时，这种不祥的可能性就更明显了。约翰·欧文召见杰哈，要求印度保证不夺取包括自由克什米尔任何部分在内的西巴任何领土。杰哈回答说，印度无意兼并西巴领土；但在自由克什米尔问题上，他必须请示新德里。（印度从来没有承认克什米尔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因此声称——按照它

的看法——它并不是在肢解西巴。)这次会晤结束时，欧文强调指出，我们正走向印美关系的转折点。

巴基斯坦如果同时丧失孟加拉和克什米尔，就无法生存下去；一切离心势力就会泛滥起来。我们利用苏联农业部长弗拉基米尔·马茨凯维奇十二月九日访问美国农业部长厄尔·巴茨的时机强调了我们的严肃的看法。马茨凯维奇没有想到会把他请到椭圆形办公室去见总统。他倔强而热情，焕发出一种天真的善意，向总统转达了勃列日涅夫个人的问候，说勃列日涅夫正满怀期望地等待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尼克松回答说，美苏关系的一切进展都受到次大陆战争的威胁。我们坚持要求停火。如果印度军队进攻西巴，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尼克松又说："苏联同印度有条约关系；我们同巴基斯坦有条约关系。你们必须认识到实行停火、用政治手段解决危机的紧迫性。"马茨凯维奇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声称这种属于高级决策的事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陪他来的伏龙索夫也不能使我们得到教益。这就为印度继续挺进争取了时间。

十二月九日，我们政府内部的紧张关系表面化了。那天，尼克松因为报界说美国高级外交官员反对总统的"反印偏见"而气得要命，就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主要官员召集起来，对他们说，虽然他并不坚持要求国务院效忠总统，但国务院应当效忠美国。这是使尼克松后来感到遗憾的一次感情冲动的发言；这次发言使他失去了大量支持。国务院按照它自己的标准说是效忠美国的；它碰巧不同意总统的政策，而是按照国务卿的方针办事的。正如我曾对亚历克斯·约翰逊说过的那样，指示基廷批评新德里的电报要好几天才能草拟出来签发，而发往伊斯兰堡批评巴基斯坦的电报却可以奇迹似地在两小时之内发出。

很少人愿意正视的基本事实是，苏联和印度本来只需要做一个简单姿态就可以结束危机(和我们国内的争执)。我们只需要得

到不进攻西巴和不肢解克什米尔的保证，就可以让局势自行发展。那时，东巴的战争就会按照本身的势头自行结束。以六比一占优势的印度部队显然会取得胜利。但是印度就是拒绝给予这种保证，苏联也就是拒绝鼓励印度给予保证。杰哈始终没得到新德里的指示。伏龙索夫甚至在尼克松亲自干预后也没有带来这种消息。

十二月十日，我们同叶海亚制定了提交联合国的新建议，其中吸收了勃列日涅夫的提议，即在谈判中断时的基础上恢复谈判。我们的建议放弃了有关印度撤军的要求，而是呼吁就地停火，并在东部和西部地区都由联合国代表进行监督；一旦停火生效就谈判撤军和满足孟加拉愿望问题。简单地说，巴基斯坦为了使印度停止在西巴的军事行动，准备接受（当时大部分已被印度占领的）东巴军事现状，并准备参加谈判——虽然谈判的唯一可能的结果是孟加拉国独立。

我在十二月十日上午把这个建议交给了伏龙索夫，并附有尼克松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上面讲到勃列日涅夫要求在东巴实行政治解决的建议正在得到满足。“现在，下一步必须在西线立即停火。”按照处理西恩富戈斯危机时使用过的那种程序，我把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的备忘录念给伏龙索夫听了——在这个备忘录中，美国答应在印度进行侵略时援助巴基斯坦。我警告他说，我们将实行这个保证。伏龙索夫当然没有得到指示。而且整整四十八小时我们都没有听到他的回音。

俾斯麦曾经说过：“在对外政策方面，勇气和成功并非巧合；二者是同一的。”尼克松有许多毛病，但是在危机时期他具有令人注目的勇气。原先已处于戒备状态的一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现在奉命驶向孟加拉湾，表面上是为了撤退美国人，实际上是给我们为反对进攻西巴发出的警告增加份量。我们让舰队停留在马六甲海峡

以东，距离孟加拉湾约二十四小时的航程，因为我希望在采取下一步行动前同中国磋商。我向梅尔·莱尔德解释舰队行动的目的时指出，我们认识到印度占领东巴已是既成事实；我们的目标是要吓退对西巴的进攻。（我没有说的是，我们也希望在苏联向中国施加压力时有部队在适当地点。）同往常发生危机时的情况一样，莱尔德是忠诚可靠、愿意提供支持的。

我还来不及前往纽约同黄华秘密会晤，我们就得到消息说巴基斯坦驻东巴的司令官正在要求停火。国务院喜出望外。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每天举行的会议上，亚历克斯·约翰逊就讨论了如何实现停火问题。我感到为难。东线单独停火同刚向苏联提出的建议是背道而驰的。停火将消灭东线已在沉寂下来的战火，但将加剧我们的主要担心，因为它将使印度陆、空军脱出身来对西巴发动全面进攻。我们知道甘地夫人已下令把印军迅速调往西线，等东巴战斗一结束就发动全面攻势。我召见巴基斯坦大使罗查，要他使停火建议与已经和叶海亚达成的协议一致起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同意通过正式渠道办这件事。停火必须同时包括东巴和西巴；否则孟加拉的战斗结束时，西线的危险将增加。因此，伊斯兰堡暂时撤回了东线停火的建议。但这显然只给了我们一个短促的喘息时间。不久之后，东线的巴基斯坦军队就会覆灭。印度军队将会脱出身来按照计划进攻西巴。我们绝对必须紧张起来。

黄华和我在六点钟左右在东七十区属于中央情报局的一幢没有电梯的公寓里见面。这套公寓里到处挂满镜子的墙壁和华丽然而俗气的绘画，说明这里本来不是为清教徒式的共产党政权代表同美国总统助理开会讨论如何挽救一个遥远的国家用的。

我向黄华详尽地介绍了我们同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各方交换意见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拥有可靠情报，说明印度计划摧毁西巴武装部队。我们无可奈何，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要挽救巴

基斯坦，使它免于全面覆灭，我们必须施加最大的政治压力，要求按照同叶海亚一起制定的计划的精神实行就地停火。任何其他方针都不能防止印度拟议中的对西巴的进攻，而这种进攻肯定会取得胜利。我们通过派遣一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前往马六甲海峡附近，正在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

显然没有得到指示的黄华，采取了强硬路线。他坚持认为就地停火等于客观上同苏联狼狈为奸。侵略就会得到奖励。东巴将成为优势兵力下的牺牲品。我们不应放弃印度必须在举行谈判前撤军的原则。我尖锐地回答说，如果巴基斯坦和中国坚持这种立场，我们可以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但是，事实将说明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它正好适应了印度和苏联肢解整个巴基斯坦的战略需要。黄华这时才谈到中国真正关心的事——这将提供一个先例，使印度和苏联有可能勾结起来肢解其他国家。我对他说，美国不会对苏联进一步行动漠然视之。特别是进攻中国将引起严重后果；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不顾舆论、国会和大部分官僚机构的反对而保持了如此强硬的立场。我们甚至把舰队派往受到威胁的地区去了。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状况；我们正在同一个我们当时并不承认的国家发展一种虽然只是心照不宣、但是积极的合作关系。黄华说他将把我们的看法转告周恩来总理。他又说，他现在就可以告诉我，中国只要还剩下一杆步枪就决不会停止战斗；它肯定要增加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我以为——后来证明是错误的——这种迹象说明中国甚至在这么晚的阶段还可能从军事上进行干预。

为了增加对苏联的压力以实现停火，我让黑格在十二月十日很晚的时候打电话告诉伏龙索夫，如果我们的建议不能很快得到满意的答复，美国就要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调动舰队在内。

第二天早晨，我在纽约市瓦尔道夫塔我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漂

亮公寓里，同几天前刚被任命为副总理的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共进早餐。中国壁纸和服务周到的仆役几乎使人忘记了八千英里外我的客人的祖国的前途正危在旦夕。布托风度优雅，能言善辩，感觉敏锐，是一个终于能够同印度领导人在争取公众注意方面相抗衡的代表人物。他过去的经历是坎坷不平的。当美国领导人还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时，是他使巴基斯坦同中国建立了友谊；为了适应他在国内的目的，他也不免要弹一些带煽动性的反美调子。在布托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浮夸的举止和有时带有愤世嫉俗气味的行为使我国政府对他一直缺乏信任。我发现这个人才华横溢，具有魅力，能纵观全球，懂得姿态与政策的区别。他对愚蠢无能的人不能宽容。由于他不得不同许多蠢人抗衡，因此树敌甚多。他对巴基斯坦军人领袖行动迟缓并不满意，后来无疑由于过分相信自己纵横捭阖的技巧而忘乎所以。但是在他的祖国发生悲剧的日子里，是他把国家剩下的部分捏在一起，使它恢复了自信。他在最急需的时刻挽救了国家，使它免于彻底毁灭。后来他由于过分骄傲而垮台。但是他在一九七一年表现的勇气和眼光本来应当使他得到较好的命运，而不是他那些感情冲动的同胞为他安排的那种悲惨的下场——这种下场也玷辱了他们生性仁慈的声誉。

在十二月十一日的会晤中，我对布托说，虚张声势的强硬词藻挽救不了巴基斯坦；我们必须商量出一种能够坚持下去的行动方针。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并不是我们不愿意帮助你们，而是我们希望保持你们的生存。高谈原则当然好得很，但归根结蒂我们得保证你们能存在下去。”我敦促他同中国人确定共同立场；如果我们努力帮助的人反过来揍我们，那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坚持原来的立场，我们愿助一臂之力使联合国通过虚有其表的决议，但我们将丧失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未来四十八小时是决定

性时刻。我说，我们不应浪费时间为青史留名而装模作样。

布托神态自若，能够理解我的意思。他同我一样了解事实真象；他是一个不抱幻想的人，准备为挽救自己国家残存部分采取必要的行动，而无论这种行动是多么令人痛苦。他说，中国人对我们政府里明显的分裂状态感到莫名其妙。一个星期来，他们听到太多的相互冲突的言论——从乔治·布什指责印度侵略的演说到国务院宣布严守中立的声明。他们应当相信什么呢？我对他说：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不是秘密；尼克松和我的立场同样也不是秘密；最后还是白宫说了算。他有责任同我们当中希望拯救西巴的人合作；我们不能让我们国内的反对派在我们的朋友当中混淆视听，从而达到他们的目的。布托和我最后达成协议：如果第二天中午还听不到莫斯科的回音，我们就以东巴敌对行动即将结束为借口把问题交回安全理事会去。我们开始时将要求停火和撤退印度军队，但准备同意只是就地停火，实际上接受印度在孟加拉造成的既成事实。我不得不靠布托使中国人确实了解我们的立场。

我回到华盛顿就给伏龙索夫去电话，指出十二月十二日中午是一个期限，过期我们就要单方面行动。伏龙索夫告诉我，苏联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已被派到新德里去安排令人满意的结局，敦促印度克制。我对尼克松说，这很可能是真的；印度无需苏联人前去加强他们摧毁巴基斯坦的决心，而据我们了解，库兹涅佐夫是一个温和派职业外交官。但无论苏联是去要求停火还是去怂恿印度，我们都得坚持同样的方针：我们必须增加压力，直到印度保证实行停火并且不兼并西巴领土为止。

印度那时还不准备做任何保证。当时在纽约的印度外交部长辛格反对把问题交回到联合国去；而联合国不做决定，就不可能有相应的停火决议。他断然否认对西巴有任何领土野心，然而引人注目地把自由克什米尔作为例外，因为印度不承认自由克什米

尔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杰哈大使终于回答了副国务卿欧文两天前对印度意图的询问。他也否认存在领土野心，但也未说明印度对克什米尔的抉择。他争辩说，克什米尔属于印度，其中巴基斯坦那部分是非法占领的。所有令人慰藉的词句加在一起，不过是精心安排的遁词。印度和苏联仍然拒绝承认西巴领土现状；他们蓄意保持兼并领土的可能性，而这种兼并只有完全摧毁巴基斯坦军队、进而使巴基斯坦土崩瓦解才有可能实现。

十二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就在尼克松和我即将动身前往亚速尔群岛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之前，尼克松、黑格和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在椭圆形办公室碰头的。当时存在一种紧迫感。我们期望中国对我同黄华的谈话会做出某种反应。这是一次关键性会议；事实表明，正是在这次会上我们第一次决定在苏联—中国—美国的三角关系中冒战争风险。但是，国务卿没有参加，国防部长没有参加，这两个部门也没有任何其他代表参加——这是尼克松政府内部关系的一个典型写照。

当战争扩大到西巴时，罗杰斯在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会议。他回来之后就禁止乔·西斯科在电视中为总统的政策辩护，以此表明他对这种政策的不快。同往常一样，尼克松既不打算同他的老朋友对抗，也不打算压服他。而罗杰斯也不太想介入此事：危机的结局不大可能带来什么光荣；避免灾难就是胜利，这很难说是什么值得喝采的成就。

因此，尼克松和我以及黑格是在笼罩一切危机的孤独状态中、在相互矛盾的压力和猜测和逐渐增长的紧张气氛中，在椭圆形办公室碰头的。大家知道这种紧张即将到达爆发程度，但还不知道朝什么方向爆发。伏龙索夫上午十点零五分来电话打断了我们的讨论。他告诉我们苏联的答复已在途中。它向我们保证印度对西巴并无侵略意图——但对印度在克什米尔领土方面的目标这个关

键问题则仍保持沉默。这可能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争取时间，造成新的既成事实，也可能是真想解决问题，两方面同样解释得通。我们决定，为了强调我们把危机看得多么严重，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交联合国。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强调局势的紧迫性，并提出就地停火的建议。

因此，上午十一点半，我们通过热线向莫斯科拍发了一份由黑格和我起草的电报，以保持压力。这是尼克松政府首次启用热线。*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条莫斯科—华盛顿电报线路使用起来还没有苏联大使馆的通讯线路快。但是它给人一种紧迫感，因此可能使苏联加快做出决定。这份仅有一页纸的热线电报说，在等待苏联对我们同伏龙索夫和马茨凯维奇的谈话做出反应达七十二小时之久以后，总统已经“准备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行动”。“我必须同时指出，印度的保证仍然缺乏任何具体内容。我仍然准备按照我十二月十日信中提出的方针行事”——换句话说，即就地停火并立刻开始谈判。尼克松的电报最后说：“我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为了避免我们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后果，时间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给莫斯科的热线电报刚刚发完，就听说黄华带有来自北京的紧急答复，需要见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因为中国人有一种可爱的中央王国传统，过去总是把他们要想传递的话留到我们要求会见时才讲。我们认为，只有严重的事态才会促使他们脱离这个传统。我们猜想——正如我以为黄华在四十八小时前曾经暗示过的那样——他们大概就要从军事上支援巴基斯坦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能要马上摊牌。因为根据我们得到的一切情报，如果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苏联按照它承担的义务就要对中国使

---

* 勃列日涅夫后来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期间使军队戒备时也使用了热线。

用武力。那时，我们将不得不确定是否援助直到一年以前还被认为是我们最不可调和的敌人的一个国家。

尼克松立即认识到，如果苏联羞辱中国的行动得逞，一切保持世界均势的前景都会化为乌有。他决定——我完全同意——一旦苏联威胁中国，我们将不袖手旁观。我们尚未承认而且二十年来几乎毫无接触的这个国家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将得到某种重要援助——其确切性质将视当时情况而定。尼克松做这个决定时既没有通知国务卿，也没有通知国防部长；这不是处理危机的理想方式。由于尼克松和我都要动身前往亚速尔群岛，艾尔·黑格和温·洛德必须到纽约去接受中国的信件。如果信件包含我们猜测而又担心的内容，黑格奉令答复中国人，说我们不会对苏联干预置之不理。为了采取某些军事手段使我们的战略产生效果，并使我们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更有份量，尼克松这时命令航空母舰特遣舰队驶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

这时迫切需要确定苏联的意图，同时使他们深信我们说话是当真的。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我打电话给伏龙索夫，告诉他有关热线电报的事和舰队调动计划，但同时表示我们仍然愿意按照总统致勃列日涅夫信件的精神进行合作——也就是说，接受就地停火。我们正把问题重新提到安全理事会去，但愿意在联合国辩论中采取和解态度。现在要由苏联做出抉择。伏龙索夫暗示，根据他从库兹涅佐夫那里得到的报告，我们正在为同一目标而努力。他希望到安理会开会时，苏联在新德里进行的努力已经获得成果。我对他说，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

中午，龙·齐格勒宣布，鉴于印度继续抗拒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的要求停火的呼吁，美国即将把问题重新提交安理会。他警告说："在东巴实际上已被印军占领的情况下，继续战争将日益具有危及联合国一个成员国的生存的武装进攻性质。"

结果，中国电报的内容并不是我们预料的。相反，它接受了通过联合国的做法以及我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向黄华概括叙述的政治解决办法：要求停火和撤军，但准备接受就地停火。周恩来的分析同我们一样。令人惊讶的是，巴基斯坦、中国以及——如果伏龙索夫是可信的话——苏联这时都在我们赞助下朝同一方向努力。但是尼克松在独自作出他那果敢的决定时，并不了解这种情况。如果事态发展象我们上面预料的那样，我们将毫无选择余地，只有不顾政府、新闻界和国会中许多人可能提出的反对，以某种形式援助中国。而我们当时还在越南打仗。当历史评价尼克松时，无论得出什么结论，都不应忽视他为保持世界力量均势、最终也是为了所有自由民族的安全、不惜使自己的眼前政治利益遭受风险而做出这种决定所表现的勇气和爱国心。

我们收到中国的电报后，就让舰队暂缓二十四小时行动，使莫斯科有机会答复我们的热线电报。复电也是通过热线在十二月十三日上午五时收到的。当时，总统和我都在亚速尔群岛。电报重复了伏龙索夫已经对我们说过的话：苏联正在"设法澄清印度的全部情况"，有了结果将立即通知我们。因此，问题原封未动，还是像头天晚上乔治·布什按照我们的指示在安全理事会说明的那样：

现在对印度进一步的意图提出了问题。举例来说，印度是否打算利用目前形势摧毁西线的巴基斯坦军队？印度是否打算利用巴基斯坦在西线反攻作为兼并西巴领土的托词？它的目的是否违背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占领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部分地区？如果印度不打算这样做，就需要立即予以否认。世界有权了解：印度的意图是什么？巴基斯坦的目的已经清楚：它已经接受了联合国大会以一百零四票对十一票通过的决议。我国政府在过去一周中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我遗憾地通知理事会：印度的答复是令人不满意而且不放心的。

我们的舰队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引起新闻界很大注意。我们是在威胁印度吗？我们是在设法保卫东巴吗？我们是否失去了理智？实际上，我们做过清醒的估计。我们约有七十二小时的时间，可以在西巴被卷入这场大漩涡之前使战争结束。印度需要这么多时间来调动军队，发动进攻。一旦巴基斯坦的陆、空军被毁灭，这个国家最后必然由于软弱无力而分崩离析。我们必须警告苏联：我们这方面的情况也可能失去控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在我们在联合国的努力失败、中国人终于在最后一分钟参加进来的时候给以支持。克里姆林宫需要一个借口来增加它声称正在对印度施加的压力。无论美国对印度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如何微小，对方是拿不准的；甚至连我们可能不顾理性而采取行动这样一种较小的风险，它大概也是不愿接受的。这也是分裂苏联和印度的最好的手段。莫斯科准备折磨我们；但据我们判断它并不准备在军事上冒风险。让航空母舰特遣舰队驶入孟加拉湾并不会使我们非采取最后行动不可，但恰好造成迫使新德里和斯莫科做出决定所需要的那种幅度的捉摸不定的状态。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三时，伏龙索夫向艾尔·黑格递交了一份苏联正式照会。这份手写的长达九页的备忘录声称注意到“我们的立场已大为接近”。它报告说，“印度领导人坚决保证，印度没有夺取西巴领土的计划”。这算是略有进步，但仍然没有回答印度是否认为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是巴基斯坦领土这个主要问题。而且它对停火问题也保持缄默。我们从印度方面也没听到任何消息。如果不能很快实行停火，印度军队将处于可以进攻西巴的地位，从而使我们的一切讨论成为空谈。

因此，在离开亚速尔群岛回国途中，我在“空军一号”飞机上作为背景介绍向联合采访的记者代表说：苏联在次大陆的所作所为同真正共处要求双方采取的克制态度是不符合的。如果这种情况

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得不重新估价我们之间的整个关系，包括最高级会谈在内。最后这一点我并没有征得尼克松的批准。我设想这种说法反映了他的思想，因为他自己曾在十二月八日对我提到过。取消最高级会谈的威胁促使《华盛顿邮报》以“人民了解情况的权利”为名破坏了背景介绍的规则，指名道姓说是我讲的话。这是书呆子气的一场暂时的发作，后来《华盛顿邮报》为了继续得到参加背景介绍会的邀请，就不再犯这种毛病了。

十二月十五日相当大一部分时间是在由此引起的喧闹声中度过的。尽管国务院拼命否认，龙·齐格勒甚至公开向后退缩，信息仍然传到了莫斯科。当时，莫斯科已经懂得我说的话是反映总统思绪可能发展的方向的。（当然，如果官僚机构中那些批评我的人曾经分析过形势的话，他们本应了解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我是无法继续留任的，更不用说占上风了。）伏龙索夫接连几次出面，一次比一次急迫，又是劝慰，又是要求重新保证。第二天即十二月十六日上午，我们得到可靠的消息说，库兹涅佐夫确实在向新德里施加压力，要它接受包括克什米尔在内的西巴领土现状。

十二月十五日较晚的时候，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巴基斯坦驻东巴部队的司令官再次要求停火。他第一次要求停火是在十二月十日，现在已经比我们认为可能的时间多坚持了五天。他的部队的抵抗使我们有时间施加压力，从而阻止了对西巴的进攻。

第二天，甘地夫人提议在西巴实行无条件停火。我直到现在也毫不怀疑，这是在苏联压力下勉强做出的决定，而苏联的压力又是由于美国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包括调动舰队和甘愿拿最高级会谈冒险在内。在四个月后越南问题爆发时，这种知识对我们大有好处。周恩来的判断也是如此；他后来对布托说过，是我们拯救了西巴。危机已经过去。我们避免了最坏的情况，有时这也就是政治家可能获得的最大成就了。

后 果

一九七一年的印巴战争或许是尼克松第一届任期内最错综复杂的问题。并不是说当时的情绪同越南战争引起的情绪同样激昂，也不是说它的影响非常持久——虽然在辩论中流传的说法曾把“偏袒巴基斯坦”看作是政治上判断错误的案例。这场危机之所以难于对付是由于它涉及的赌注比一般看到的大得多。当我们突然面临这个问题时，巴基斯坦是我们通往中国的唯一渠道；我们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同北京取得联系。如果我们同苏联勾结起来使中国的朋友——和我们的盟国——公开受到屈辱，美国采取的、对保持全球力量均势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一次重大主动行动就会完蛋。苏联的一个伙伴在苏联武器和苏联保证的支持下赤裸裸地诉诸武力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结构。当时我们的整个中东战略都取决于是否能证明这种策略毫无效果，而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因素的份量正由于我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分歧而日益削弱。照我们看来，对巴基斯坦的进攻是苏联做法的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如果我们不想引起动乱升级就必须进行抵抗。如果我们默认这种强权游戏，就会使莫斯科得到错误的信号，使我们所有的盟国、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爆炸性地区主张克制的力量灰心丧气。首先，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苏联才使印度进攻巴基斯坦成为可能。

但是，一个基本上属于地缘政治的观点在我国公开讨论外交政策的人当中却得不到理解，因此使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个根本矛盾戏剧化了。（我所谓“地缘政治”指的是注意从均势需要看问题。）尼克松和我希望把美国外交政策建立在清醒地认识国家长远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起伏不定的情绪基础上，因为这种情绪过去曾经使我们在进行干预和放弃责任两方面都做过了

头。我们对印度是根据它的行动的影响、而不是根据它的宣言或二十年积累的情绪做出判断的。但是我们的估计取决于对印度进攻的更广泛的后果的推测。为了影响事态的发展，必须在当时还无法证明是否正确的估计基础上采取行动。我们对进攻巴基斯坦的影响所做的一切判断都是无法证明的。等到这些影响都了如指掌时再做判断就太晚了；当然，那时可能又要争论这些影响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大部分了解情况的人都试图根据造成危机的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对次大陆的对抗做出判断。巴基斯坦的行动无疑是不聪明的、野蛮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虽然按照国际法来看所涉及的问题显然属于它内部管辖范围。但我必须说，即使在这方面，我们对事实的估计也不同于我们的批评者。直到今天我仍然深信甘地夫人的所作所为主要并不是东巴的状况引起的；东巴自治是不可避免的，但解决办法很多，其中好几种办法就是我们提出的。比较准确的看法是：印度总理是在巴基斯坦陷于孤立、苏联提供外交和军事支持、中国国内局势紧张、美国国内意见分歧等因素的鼓励下，早在一九七一年春天或夏天就决定乘机同巴基斯坦算总帐，以确立印度在次大陆的凌驾一切的地位。她拖到十一月才行动是为了完成军事训练和准备工作，并等待冬天大雪封山使中国难于跨越喜马拉雅山脉。决定既已做出，印度就把巴基斯坦的每一个让步当作提出新要求的起点，使要求越来越高，做出反应的时间越来越短，直到最后使摊牌无法避免。我们的国家利益并不要求我们阻止东巴自决——事实上，我们提出了好几个实现东巴自决的方案——但是自决实现的过程却同我们有利害关系。我们希望通过逐渐演变的办法实现自决，而不是对一个其生存使美国、中国和世界大家庭（如联合国投票一再表明的那样）确实感到利害攸关的国家进行外部冲击，也不是明目张胆地违犯世界要存在下去就必须遵循的

那些准则。印度是十一月末进攻的。按照我们劝说叶海亚接受的时间表，到十二月底就会结束军事管制，由文官政府接管政权。这几乎肯定会导致东巴自治和独立——而很可能不会发生印度训练的游击队、即孟加拉解放军反过头来在达卡实行恐怖统治时出现的公开杀戮等野蛮暴行。

如果国内目光短浅的镇压政策成为外国军事干涉的正当理由，不用多久国际秩序中一切约束因素就会荡然无存。有人以道义的名义猛烈抨击我们支持了输家而得罪了赢家——这真是一种有趣的"道义"理由，且不用说从历史上看深谋远虑和不偏不倚的做法通常都要求站在弱者一边去遏制强者。人们三年来不断责骂我们对和平事业不够虔诚，现在一位属于自由派的专栏作家又提出了一个令人莫名其妙的理由向我们挑战，认为不能总是把战争看成坏事，因为战争有时是实行变革的工具。[10]看来他的原则是：如果理查德·尼克松赞成和平，战争就不全是坏事了。

美国有一种理想主义传统，认为外交政策是善恶之争。有一种实用主义传统，希望就事论事地解决"疑难问题"。有一种墨守法规的传统，把国际争端当作法律案件。但就是没有地缘政治的传统。构成我们的国际经验的一切因素都同一九七一年秋天我们力图在次大陆实现的目标背道而驰。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得到大量同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东巴自决；这个"案件"应当像罗杰斯不厌其烦地指出的那样提交给联合国。大家都不相信我们在地缘政治方面感到的担心，把这些担心说成是个人意气用事、反印偏见、对苦难无动于衷，或者是莫名其妙地缺乏道德观念。

如果我们按照这些人的建议办事，巴基斯坦在丢掉东翼之后还会丢掉克什米尔，可能还有俾路支和西翼其他地方——换句话说，它将彻底分崩离析。为了防止灾难，我们的策略是相当巧妙

的；考虑到我们手上牌很少的事实，这种策略也是颇为大胆的。我们成功地使冲突的影响局限在次大陆。印度这场强权游戏并未动摇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没有破坏我们对中国的主动行动，虽然这种可能性本来很大，而且苏联无疑希望如此。既然这些危险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我们很难期望人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动机。

相反，注意力都集中在代价方面。我们当时相信，事实将证明这种代价是暂时的，正如它是不可避免的一样。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已经给美印关系造成永久性危害，或者是把印度无可挽回地推到苏联那边去了——就像经常有人激烈地声称的那样。我们也绝不可能同苏联为这场危机给予印度的东西进行竞争：它同印度进行了六年武器交易，而我们对双方都实行武器禁运；它对北京进行军事威胁以阻止中国干预；它还在安全理事会两次使用否决权，使停火和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努力无法实现。在这方面我们不可能比苏联出更高的价钱——就我回忆，我们国内也没有任何批评者建议我们这样做。我们求爱二十年之久，并没有使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因此印度也不大可能由于我们捍卫了自己的利益就无可挽回地倒向一边去。不结盟使印度在国际交往中有最大的回旋余地。由于这个理由，我们深信印度迟早会设法同我们重修旧好，哪怕只是为了避免莫斯科把它当作囊中之物也罢。眼前危机过去之后，我曾提醒多勃雷宁，要他记住一八四八年俄国军队帮助镇压匈牙利起义后，奥地利大臣施瓦岑贝说过的一句话："总有一天，我们将以自己忘恩负义的深度使世界愕然。"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危机过去后，美印关系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过去那种目标并行不悖，但相互缺乏理解的状况。我们还没有幸运到免于遭受通常那种责难的程度，但是不过三年美印联合委员会就在各种经济和文化领域中进行合作了。一九七一年曾经恶狠狠地推行对抗政策的印度外事秘书特·纳·考尔奉派到华盛顿

当大使，其任务就是要修补关系。他以一九七一年印度无情地肢解巴基斯坦时特有的那种专心致志来从事这项任务。

十二月二十日，危机过去之后，尼克松在百慕大对希思首相谈到我们试图达到的目标时说得很好：

我感觉如果她（甘地夫人）的目标真的是要在西线迫使巴基斯坦投降的话，就会在世界局势中产生严重反响。这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是一个教训。……苏联人对我们进行了考验，想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操纵事态的发展。当然，你们必须考虑在中东和欧洲投放的大得多的赌注。我们撤出越南的行动之所以如此迟缓，一部分原因就是要发出某种信息，说明我们不准备为结束战争支付任何代价；现在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愿意为避免战争支付什么代价。如果不愿意，今后的日子将是不好过的。

我同意尼克松的看法，但是新闻界、我们的官僚机构以及国会都不同意。我现在仍然认为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这次危机也证明：所谓尼克松在我的协助下像章鱼一样控制着一个对我们的活动毫无所知的政府这个神话纯属无稽之谈。在某些主动行动上——特别是在双边谈判领域中——确有这种情况。但是在其他领域中，尼克松使用的方法部分是由于官僚机构桀骜不驯、或是他不愿用纪律约束官僚机构的结果。同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对印巴危机的处理反映了我们政府内部的深刻分歧，这种分歧由于尼克松表达自己的意见时转弯抹角而更形复杂了。结果同民间传说正好相反：不是白宫日益扩大统治，而是各部门为了坚持自己的阵地而顽强地抵抗；不是发布了明确的指示，而是用略而不详的手法保持选择的自由；不是政府各个机构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总统难以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这种种情况反映了尼克松心理上某些怪诞之处，但并不能改变基本结论。所谓"偏袒"的历史与其说表现了

总统的固执己见，不如说表现了管理现代政府的复杂性——特别是由一位不愿直接作出规定的总统来管理。这场争论中究竟谁是谁非是无关紧要的；一个总统必须能够指望他的意见被接受，即使这些意见同官僚机构的成见背道而驰。我一再说过，尼克松政府在行政工作方面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从长远看也是不能持久的；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做法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否则就不公平。

危机刚刚过去，白宫就发现自己已处于一场不断泄密和遭到谴责的风暴中心。早在十二月十三日，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就开始发表国防部有关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记录的摘要。我们反对印度的军事行动——这个立场是公开的，而且我们曾经因此受到攻击——被说成是一次令人震惊的揭发，用来证明我们否认具有反印偏见是在说谎。大量其他保密情报也迅速出现在报纸上——例如肯尼思·基廷从印度发来的敦促我们对叶海亚施加压力或对我十二月七日的背景介绍表示异议的电报。[11]我们舰队的行踪照例是保密的，但一转眼就印在报上了。罗杰斯发泄多年积郁，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同我在"空军一号"飞机上讲的话针锋相对，宣布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丝毫不受次大陆事态影响。他还否认我们在巴基斯坦受到印度威胁时对巴基斯坦承担了任何军事义务——这是一个精明的律师的观点。对泄密事件进行的调查表明，一个曾经在我的工作班子里当办事员的海军文书军士有计划地复制了交给他保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并转交给他在五角大楼的上级。

尼克松在危机时期英勇果敢，在宁静时期琐细卑微；他在捍卫国家利益时眼光远大，对待僚属则器量狭小。在甘地夫人宣布停火引起的一阵欢乐过去之后，尼克松下达了严格的命令，要在一切介绍情况的场合突出他起的中心作用。但是在批评日益增加时，他就开始寻找从火线溜走的办法。他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无

疑是受到一种可以理解的不满情绪的影响，因为他认为我从政府对外政策的成功中获得过分声誉，而政府比较严厉的措施引起的一切责难都落在他的头上。然而近因还是最高级会谈。虽然尼克松十二月八日谈到取消最高级会谈，而且后来在十二月十六日还要谈，但我在十二月十四日当真对报界提到这件事却触发了他内心的一切矛盾。他原来决心要完成艾森豪威尔一九六〇年计划进行、但没有实现的那次旅行。成为访问莫斯科的第一个美国总统对他具有重大意义。他表面上虽然支持我，内心其实不愿使这步颇为漂亮的棋受到威胁。于是白宫那些公共关系专家就设法把印巴危机期间我们的表现所引起的攻击推到我身上来。当时执行的政策成了我的政策。我一连几个星期都见不到尼克松。齐格勒既不出来说话对我表示支持，也不否认报界所谓我已失宠的消息。没有人告诫各部门停止用走漏消息的办法反对我。用后来出现的文学语言来说，尼克松情不自禁要让我在风中慢慢地、慢慢地摇晃。这是一个严厉的教训，使人懂得了总统助理对头头的依附地位。我第一次体会到公众不断批评和总统压力的滋味，我的反应不佳，甚至也不成熟。

然后，一切突然成为过去。次大陆危机既然不存在了，不断强烈的批评就失去了焦点。我很快又受到总统的青睐；我们恢复了过去那种实质上亲密、个人之间冷淡的谨慎关系。还有别的工作需要做。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结构完整无损。为两次最高级会谈制定计划的工作很快就恢复了。外交政策上一连串辉煌胜利使这段插曲很快成为过去，也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北京已经了解我们对均势需要的认真态度；莫斯科已经看到足够强硬的反应，不至于在我们更加集中关切的地区再来考验我们。我们成功地度过了这场风暴，船舵完整无损。我们可以继续航行了。

① 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南越是联系国）。中央条约组织使所谓"北层"国家——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同英国结成一个集团；美国除名义上外，实际上也是成员国。

② 《华盛顿明星报》，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九日。

③ 六月二十二日，国务院承认它原来在四月十五日宣布禁运时没有提到以下事实，即在此以前达成的交易不一定会受到影响。见《纽约时报》，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④ 多勃雷宁也说这个条约已经酝酿了一年。杰哈对罗杰斯说是两年，印度外交部长辛格公开宣布也是两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松宣布有关中国的公告之后，辛格含蓄地对印度议会说，关于中美可能和解的对策，印度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了。（见第十九章）

⑤ 西德尼·H·山贝：《印度确定在东巴进行报复的范围》，载《纽约时报》，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⑥ 这一条原文如下："巴基斯坦政府决心抵抗侵略。在发生针对巴基斯坦的侵略时，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巴基斯坦政府要求下，将按照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按照促进中东和平与稳定联合决议的规定，采取双方同意的、包括使用武装部队在内的适当行动，给予援助。"

⑦ 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都曾提供保证，其中包括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约翰·F·肯尼迪总统致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的信；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美国大使递交的备忘录；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国务院的公开声明；以及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林登·约翰逊总统给阿尤布·汗的口头承诺。

⑧ 见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华盛顿邮报》的安德森专栏，以及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五日《纽约时报》发表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十二月八日会议记录。

⑨ 《华盛顿邮报》，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八日以一栏地位报道了我的背景介绍会消息，标题是："白宫缓和亲巴基斯坦的态势"。巴里·戈德华特参议员如此热衷于我的介绍，没有通知我们就把它全文登载在《国会记录》上。见《国会记录》（日刊），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第S二一〇一二页。

⑩ 米尔顿·维奥尔斯特：《战争令人厌恶，但并非都是坏事》，载《华盛顿明星报》，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⑪ 见《纽约时报》，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华盛顿邮报》，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

第二十二章

联盟中的危机：曼斯菲尔德修正案和经济对抗

地中海之行

一切总统出访都必然被说成是了不起的外交行动。凡是曾陪同总统出访过的人，在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认真看待这种说法。外交是通过对峙进行的。对峙是双方借以考验对方决心的一种办法。即使政府首脑自命不凡想来解决僵持不下的局面，也很少有时间这么做的；他们会晤的时间过分短促，礼宾要求也过分累赘。因此，政府首脑出访的主要理由通常都是为了制造一种象征，为下级谈判规定期限，并使领导人有机会相互衡量。出访也是表明意图和强调所承担的义务的一种办法。

当然，还有一种比较狭隘的政治利益。说尼克松决定第二次访问欧洲时，并未意识到这种访问可能给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带来什么影响，这等于否认他具备登上总统宝座的才能。他毕竟曾经力图在这个时期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也曾在一个短时期内转过同英国、法国以及联邦德国政府首脑举行会谈的念头。这样一次会议是维利·勃兰特为了推动和使人赞同他的*东方政策*而建议的。蓬皮杜逡巡不前，因为他希望避免给人一种暗示，即勃兰特是代表整个西方进行谈判的。前面已经谈到的尼克松对*东方政策*的看法使他并不亟于用如此戏剧化的方式表示赞同。因此这次

旅行的中心是访问意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和爱尔兰，此外还要在第六舰队停留一夜，并在契克斯同新任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共进午餐。以地中海为焦点并在第六舰队停留，都是为了强调我们仍然决心要在这个地区的安全和演变方面起自己的作用。从一九六七年以来，苏联在中东的影响不断增加。我们刚刚经历了苏伊士运河沿岸和约旦秋天出现的危机。利比亚政权已被激进派接管。

尼克松出访是从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到达罗马开始的。我在巴黎会见春水后也到罗马同他会合。那年秋天，意大利政坛正处于错综复杂的变动的阵痛中。照局外人看，这种变动似乎只是政府的例行改组，事实上是加剧了一九六三年“向左翼开放”以来作为意大利政坛特点的左倾趋势。尼克松一九六九年访问意大利时，由马里亚诺·鲁莫尔担任总理的政府完全由天主教民主党人组成，但策略上得到社会党人的支持。在一九六九年那个“火热的秋天”，共产党控制的工会显示力量，发动了一系列激烈的罢工，常常以暴乱告终。工会成功地设法通过了一个所谓劳工法规，消除了许多不公正现象，并使工会在劳资谈判的力量对比中占了决定性优势。西欧共产党人当时还没有发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好处；尼克松对意大利的两次访问都碰到了共产党发动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越南战争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总统本人的暴乱。

六月份举行的意大利地区选举暂时制止了共产党的进展，但在参加联合政府的各党中造成了新的摩擦。得票略有增加的社会党人把自己的胜利解释为群众赞成进一步向左转。右翼政党的溃败使他们更加相信这种解释。天主教民主党人由于党内左右两翼的斗争而阵容混乱，四分五裂，其左翼同共产党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信仰宗教，其右翼同新法西斯党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信仰民主。

组织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正在推动整个政坛的各种力量向左转。他们奉行党的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制定的战略，有系统地向社会上各种关键性组织——工会、司法界、学校——进行渗透，以便最后发动攻势，参加政府。

七月七日，鲁莫尔辞职；埃米利奥·科隆博成为四党（天主教民主党、共和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联合政府的总理。阿尔多·莫罗任外交部长。这个政府本身是短命的；但各党联合则不是如此。"向左翼开放"的口号已经非常得势，以至没有社会党人参加就无法进行统治。而社会党又同共产党在许多省组成了联合政府，因此不愿过分扩大他们同共产党人的距离。这样一来，共产党对意大利政府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却在与日俱增——这是同"向左翼开放"这个口号的创始者的意图完全背道而驰的。事实上，他们的影响已经如此巨大，以至诡计多端的莫罗最后认为，他可以利用共产党使社会党陷入软弱无能的境地。如果任何事都需要共产党默许才行，使这种做法正式化也无不可了。因此，在莫罗的赞助下，共产党的影响就从心照不宣的否决权逐渐演变成正式的否决权。

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趋势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美国政府内外都存在激烈争论。人们不是否认共产党的影响实际上在增长，就是认为即使增长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它可能使天主教民主党感到震动，从而着手进行改革。无论怎么说，对这种情况并无具体办法可想。天主教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似乎深信，美国高级人士的定期访问可以证明意大利在国际上的重要性，从而改善他们的前景。我们非常乐于从命：尼克松的访问和我后来担任国务卿时进行的某些访问都有这种含意。我从未看到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总统或其他高级人士的访问对意大利政治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要找到相反的证据也非易事——谁也不知道，如果不进行这种访问被说成美国怠慢意大利的话，会在什么程度上加剧意

大利向左转的趋势。

大家普遍感到无能为力。这种感觉反映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二日国务院致总统的备忘录中，后来我把它保存在无聊建议的卷宗里。备忘录要求我们“密切注视这个问题，对利用智谋慎重而有效地表明我们观点的手段不断进行估计”。至于如何做到既慎重而又有效，备忘录的作者则审慎地保持沉默。说句公道话，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有些问题是美国政策制定者无法控制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能够采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把可能的结果说成是可取的结果，从而避免加快不利趋势的发展。（照我看来，一九六三年的“向左翼开放”和一九七七年同欧洲共产主义调情就是在这方面犯了错误。）

我们到达罗马已是夜晚。出于安全考虑，欢迎仪式是在奎里纳尔宫庭院中举行的。演奏国歌时，绚丽多采的持枪骑兵排成整齐的行列。意大利迷人的国歌可能是全世界国歌中最缺乏尚武精神的，听起来几乎象一支圆舞曲，很难使人按着它的曲调迈步走向战场。仪式结束后出现了一阵混乱。奎里纳尔过去是教皇的夏宫，是欧洲最大的这类建筑之一。摩肩接踵的记者和官员把我们挤得七零八落，使人想起来就惴惴不安，因为如果有谁走错了路，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才能把他找回来。最后，混乱的人群集中到一间宽敞的接待大厅中央。有人把尼克松和我领出来同萨拉盖特总统重新会合，就国际形势进行第一次私下回顾。

朱塞佩·萨拉盖特使人印象十分深刻，远远超过意大利其他领导人。他思想丰富，行动果断，是美国的一位挚友。不幸的是他受到两种牵制。他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在“向左翼开放”这个口号影响下日益萎缩，对权柄的控制日益减少。尽管他拥有相当大的道义影响，国家元首的宪法地位使他无法积极参预政策制定过程。但是他的意见永远是值得听取的。萨拉盖特担心共产党影响增

长。照他看来，相信共产党的进展会局限在意大利是一种幻想；如果不予制止，这种进展肯定会扩大到欧洲其他地区。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补救办法。他暗示美国一定能够想出什么锦囊妙计来。

他口若悬河地谈到美国行动在欧洲造成的心理影响。我们国内关于越南问题的辩论正在损害欧洲对美国稳定和坚定性的信心；这将对许多欧洲国家的政治发生影响。东方政策使萨拉盖特感到不安；它是联邦德国设法单独同莫斯科做交易的办法，一部分是美国信誉降低的结果。美国必须谨慎从事，使人看到同苏联关系的缓和是拥有实力的结果，否则整个欧洲都会效法德国。

这次谈话使尼克松有机会宣布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承担的义务，不惜夸大其词。他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以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而且不打算"束手待毙"。这句话颇为动听，虽然对我们面临的抉择也许做了某种戏剧性的夸张。尼克松面前根本不存在他描绘的那种严峻抉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我们外交政策中仍然得到国内某种拥护的唯一支柱；大多数新孤立主义者对我们卷入其他任何地区的事务都进行攻击，但是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则继续表示忠诚。根本不存在尼克松在这个问题上丧失政治生命的可能性。后来外交部长也来参加会谈时，尼克松雄辩地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如果我们不是由于缺乏捍卫自己利益的经济力量、而是由于缺乏维护和加强这一伟大联盟的意志、决心、智慧和领导能力而让它遭受失败或陷入四分五裂，那将是人类的一个悲剧。"尼克松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七十年代早期在无数国家中，在各种暴乱、苦难和分歧中受到挑战的正是重申民主信念的意志力。

在位于罗马另一座山上的国宾馆马达马别墅进行的讨论并不比前一次明确。这次会谈表明，要进行真正的对话还存在根本性障碍。我们最关心的意大利政治问题被排除在正式讨论之外。反

过来意大利领导人似乎认为外交政策问题同国内的难题比较是次要的、不相干的，因为这些问题是他们无能为力的。参加会谈的圈子越扩大，讨论中陈词滥调就越多，这种情况并非偶然。

程序同奎里纳尔宫会谈一样。首先由科隆博总理同尼克松私下谈，只有译员参加(有时我在场做记录)。然后是一次规模很大的会议，双方几乎全体正式成员都参加。私下会谈之所以必要是为了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意大利总理同美国总统、甚至同英国首相拥有同等行政权力。但是除了极罕见的情况外，他并不具备这种权力。意大利历届总理都是由许多股各自为政的势力组成的联合政府的主席；他们反映了一种政治均势，而不是一种行政权力。他们不是通过决策、而是通过妥协起作用的。在这方面，意大利政府倒是同日本政府差不多，虽然它更趋向于把分歧化整为零，而不是协商一致来解决分歧。无论怎么说，科隆博显然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只是装装门面。在幕后，比他强大得多的莫罗正以间接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方式准备实行根本性变革，使天主教民主党人力图拔除其革命螯刺的共产党接近权力所在之处。这次会谈之所以没有完全离题，是因为尼克松获悉，造成约旦危机(见第十五章)的那次劫持飞机事件中某些人质要路过罗马。当时未加思索就决定让尼克松和科隆博乘直升飞机前往机场，对人质获救表示满意——把他们的僚属留下在亲切的社交气氛中继续互相逗弄。

这些会谈都挤在一个上午，因为制定日程的人把访问梵蒂冈安排在下午，总统打算从那里前往第六舰队。这种安排导致了一连串事件，无意中激发了尼克松的一项爱好，给白宫工作人员带来无穷的烦恼。

意大利总统在奎里纳尔宫的城楼上举行午宴，从这里可以眺望“不朽城”*鳞次栉比的房顶和匀称美观的广场。在这么优美的

* 罗马的别名。——译者

环境里，由于尼克松的日程排得太紧，一顿精美的午餐只用了大约五十五分钟就把菜上完了。这向他证明，他的一项爱好显然是能够实现的。差不多有两年光景，他的同事一直听到他抱怨国宴令人感到说不出的厌烦。他软硬兼施地要求加快白宫宴会上菜的速度，以便减少他不得不同客人闲谈的时间。他亲自过问哪几道菜可以加快上菜时间，哪几道菜根本可以取消。有时他为了减少谈话时间甚至有意让翻译迟到。但是，即使在霍尔德曼无情的催促下，他曾达到的最快上菜速度——也可以称为白宫宴会的世界纪录——是一小时零二十分钟。奎里纳尔宫那次午宴开创了一个新纪录，这是他从来不让白宫工作人员忘记的。可惜，象罗马帝国的许多成就一样，事实证明这项新纪录也是无法赶上的。甚至霍尔德曼也不能把白宫的上菜时间再减少十分钟以上。奎里纳尔宫以整整快十五分钟的优势保持了上菜速度的冠军，这使总统心里一直烦恼，喋喋不休。

对梵蒂冈的访问使我们有机会同罗马教皇保罗六世共同回顾国际形势。他是我担任公职期间见过的最敏锐、最有头脑的人之一，曾经率领教会致力于解决他的前任的巨大改革引起的混乱。约翰二十三世在改组现存结构以后就去世了；他还来不及确定改革的最后方向。这个任务留给了保罗六世。保罗六世在梵蒂冈担任外交职务多年，很了解改革可能产生它自己的势头，从而改变改革者的意图。圣徒由于动机纯洁而取胜；制度必须有持久的准则才能支持下去。教皇保罗六世在许多方面象征着时代的艰难。他比我见过的几乎所有其他领袖人物都更了解在专制打着自由的旗号前进时道德上出现的困境，也更了解“改革”为什么有制造缺乏灵魂的官僚机构的危险。他努力奋斗，要为良心和人类尊严保存一席之地，并深深感到一个既需要迅速改造、又需要经久不变的道德准则的时代的极度痛苦。他尽管渴望和平，但认为决不

能以正义为代价。保罗教皇并不是缺乏预感，但是他从虔诚的信仰中得到力量，拒绝屈服于这些预感。对他的敏锐的智慧和感受来说，这个世界在某些方面过分粗鄙，使他不愿正面迎击他了如指掌的某些趋势，而是努力减轻世界的苦难。我每次觐见他都深为感动，并由于只关心可以得到的事物的政治领袖和致力于永恒事业的制度两者的时间概念无法相提并论而自惭形秽。

保罗教皇对国际事务具有广泛而精湛的知识。他同尼克松对世界形势的评价总的说来是一致的。尼克松有一处讲到拉丁美洲教士中存在左的倾向时，逐渐谈得有些忘乎所以。教皇温和地打断他的话头，微笑着说："总统先生，事实上这更多地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你的问题。"

访问梵蒂冈期间，出现了一幕现在回想起来引人发笑但在当时却令人难堪的场面。我们的先遣人员想出了一个馊主意，要总统直接从圣彼得广场乘美国军用直升飞机前往第六舰队。教廷认为这天的军事花样已经够多了，就委婉地建议在教皇单独会见尼克松后接见总统随行人员时，我们的国防部长不要参加。日程就是据此安排的。当教皇和尼克松单独晤谈时，参加另一摊子会谈的人员中不包括梅尔·莱尔德。但是，单凭分发一纸印好的日程是无法把莱尔德这样机伶而老练的政客排除在教皇接见之外的。正当总统一行走进教皇的接见大厅时，莱尔德突然出现了，嘴里还叼着根老不离嘴的雪茄。当人们问他来干什么时，他支支吾吾地说是来找直升飞机的。当然，明明一眼就能看到直升飞机停在梵蒂冈入口处圣彼得广场纪念碑的两侧，莱尔德怎么可能认为这些飞机会在梵蒂冈宫殿内部干什么名堂，这是谁也搞不清楚的。我劝莱尔德至少在教皇面前得把雪茄藏起来。

我们一行人分为两排，同并肩而坐的尼克松和教皇形成直角。正当教皇发表优美而简短的讲话时，莱尔德的衣服口袋里突然冒

出烟来。他设法扑灭雪茄引起的这场火灾，起初动作还不显眼，最后无法可施就开始用手拍打口袋。有些人所在的角度使他们无法看清国防部长在教皇面前自我牺牲的全部戏剧场面，把他灭火的动作当成了鼓掌，于是也跟着鼓起掌来。梵蒂冈的官员们亏得有两千年的传统涵养，才能够装做若无其事，让这些事按计划结束。

怪事接二连三。尼克松每次出国旅行，先遣人员都要创造他们手册上所说的“摄影机会”，并且安排好时间，使片子可以赶上晚间电视广播。对色彩和群众场面也提出了寸步不让的要求。霍尔德曼最大的长处并不是对主权概念的理解。在他的鞭策下，先遣人员会突然提出一些要求，使外国政府对美国时髦的公共关系学感到莫名其妙，但这些政府又不愿冒犯总统的随行人员。因此，梵蒂冈虽然怀疑在圣彼得教堂门口出现军事装备的画面是否能真正反映教会的精神使命，最后还是做了让步，因为提出的理由是总统的日程排得太紧，只好这么办。

不幸的是，正是规定的动身时刻，先遣人员突然想起尼克松在罗马还没有碰到群众场面。这本来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事。罗马有史以来就一直在接待外国要人的访问。数百年来英雄辈出的罗马的居民对政治领袖都感到有点腻烦了。从根本上说，罗马是教皇的城市；只有教皇的活动才引人注意。就是约翰·肯尼迪在罗马也没有能够招徕群众。但是霍尔德曼对历史对比毫无兴趣。他运用了多年来在美国搞无孔不入的竞选活动时积累的智慧：要制造情绪激动的群众场面，最好的办法是堵塞交通。由于尼克松夫人按照当时海军的规定是不能访问舰队的，所以当场决定由总统用小汽车把她送回旅馆。于是临时组成一个车队在交通最繁忙的时刻向罗马市中心出发，其他人则在梵蒂冈宫殿门口的直升飞机中等候。这次行动完全成功。我们这些没有参加车队的人过了两个小时才重新见到我们的头头。当直升飞机终于起飞时，满面笑

容的霍尔德曼告诉我们，这次交通堵塞确实是一次不朽的成就，聚集了大批人群，激动的情绪几乎无法控制。这一切在电视上看起来是动人心弦的。至于教廷对直升飞机在圣彼得广场等待两小时有什么想法，谁也无法知道，大概是不错的吧。

我们晚间到达"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开始了对第六舰队的访问。在海上游弋的舰队至少使门外汉有一种抽象的玄而又玄的感觉。它服从听不见的命令，对罕能亲眼目睹的危险做出反应。受它影响的人几乎从来看不见是什么在保护或威胁他们。在最近一连串危机中，第六舰队都是美国军事力量在中东的主要表现。它有助于决定事态的发展，但同出事地点至少保持了二百英里的距离。虽然第六舰队很容易受到苏联陆基飞机的袭击，它仍然拥有决定性影响，因为攻击它就会使美国全部力量倾巢而出。戏剧性地加强美国海军力量是一个关键信号，说明我们决心防止约旦危机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由于我们逐渐失去陆基，剩下的基地也受到政治限制，第六舰队就更加重要了。

按照预定计划，我们应在航空母舰上过夜，第二天要参观火力表演。但这是一次一切都不能按计划进行的旅行。罗杰斯、莱尔德和我正在军官餐厅里看电影——片名《被称为笨蛋的人》——时收到一份路透社电讯，其中引用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纳赛尔已经去世。我把电讯递给了罗杰斯。他说，如果真有此事，我们肯定已从官方渠道获悉。我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大家又看起电影来。约十分钟后，我逐渐感到不安；这条电讯的内容不可能毫无事实根据。我溜出来同华盛顿联系，得到的答复是典型的：只知道开罗广播电台几个小时以前中断了正常的节目，开始播送哀乐，其他没有什么消息。华盛顿方面慎之又慎地报告说："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很不寻常的。"无需特别大胆就可得出结论：有一位高级人士去世了。

尼克松已经就寝，霍尔德曼不准我们在获得已经证实的消息之前叫醒他。我和僚属拼命工作，为这次旅行制定可供选择的计划。我们猜想铁托将去参加纳赛尔的葬礼，从而使我们访问贝尔格莱德的计划告吹。在效率一贯很高的白宫通讯局帮助下，电报开始飞往各地，电话打向了四面八方。我们曾经转过念头，想把在马德里和贝尔格莱德停留的时间颠倒一下。但是我国驻马德里大使馆认为，要求准备工作提前四十八小时完成将在后勤方面造成无法克服的障碍；我们的先遣人员一想到这一点就简直急得发疯。另一方面，这四十八小时把总统怎么办也是难于解决的问题。像总统随行人员这样庞大的队伍不经广泛准备硬是要蜂涌到一个国家去是不行的。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考虑几种不同方案时，铁托把我们从困境中救了出来。他认为总统第一次访问贝尔格莱德的象征意义比参加已经去世的友人的葬礼更为重要。在此期间，当纳赛尔的死讯得到证实时，我叫醒了总统，把消息告诉了他，并取得他的同意，要派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参加葬礼。我还把他在贝尔格莱德停留问题当时还悬而未决的情况通知了他。

过了几个小时，大约是半夜两点钟左右，我突然惊醒，想起第二天预定要举行火力表演。照我看来，在地中海燃放烈性炸药来纪念纳赛尔逝世似乎是一种极端麻木不仁的行动。我把自己的判断同罗杰斯和莱尔德核对之后，没有再叫醒总统就取消了火力表演。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总统助理不应当不断用琐事打扰总统；他们稍加等待就会比较了解总统的选择，足以用总统的名义做某些决定。但是他们最好搞得有把握点，因为除了总统的信任外他们并没有什么权威。结果证明，尼克松一心想要看火力表演。我几乎肯定可以说服他放弃此事。但是让他第二天早上面对既成事实，使他罕见地表演了一番那种尼克松特有的脾气。一

连二十四小时，我都受到谁都可以看出总统不快的小动作的捉弄。例如在那天总统一次活动中，把我分配到备用的直升飞机上去坐。在第六舰队旗舰上开会时让我坐在外围。这场风暴不久就过去了。对于印巴危机之后我的遭遇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预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正确的，但也得到一个教训，使我明白了自己权力的局限性。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机场上受到身着蓝灰色制服、佩戴金色肩章的铁托元帅的欢迎。三十年代中等阶级的价值观念，在欧洲任何地方都不像在东欧各国的"无阶级"社会中那样完整地保持下来。否则铁托的服饰同一位共产党国家元首是很不协调的。在生活极为枯燥无味、官僚主义令人窒息、计划无所不包的东欧，推动人们前进的并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经过长达一代的共产党统治之后，维持国内团结的力量仍然是在具有较多国际性的西欧几乎已经绝迹的那种民族主义。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这时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传奇人物中仍然在位的唯一幸存者。他是很有名气的游击队头头，是敢于向斯大林挑战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是民族共产主义的发明人，现在又是不结盟运动的斗士之一。到一九七〇年九月为止，他已当权二十五年。他浑身散发着一个已经消灭一切可能竞争者的人具有的那种权威。他的风度像欧洲中部的中等阶级——彬彬有礼，明显感到生活的乐趣，有一种颇为自满的幽默感。但他也很小心谨慎，有时脸上挂着笑容而眼神却看不出笑意。他已经学会对付资本家而又不一定接受他们的影响。他在战后初期是最倔强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一九四六年甚至同美国发生过短暂的对抗。那时南斯拉夫击落了一架没有武装的美国运输机，扣留了机组人员。

在他同斯大林决裂之后，西方对铁托就另眼相看了，把他对维护自己的政权的关切看做是——不小程度上是由于他玩弄技巧的

结果——公开放弃曾经有助于建立这个政权的价值观念。一个几乎被人忘掉的事实是：使铁托同斯大林决裂的问题是民族自治，而不是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与否。铁托在饱经沧桑之后仍然信仰列宁主义。维持生存的需要迫使他多方寻求免遭苏联侵略的保证，但并没有明显改变他一生献身革命形成的信仰——也不应当如此期望。只有强烈的信仰才能使一个人经历阴谋和游击战各种艰难险阻和考验而坚持下去。他为什么要在胜利的时刻放弃信仰呢？

由于不愿正视这个事实，结果造成了无穷无尽的误解。南斯拉夫在巴尔干各国当中——较小的程度上也在东欧——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因素。它象征独立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威胁。但是在欧洲以外，铁托仍然奉行自己的信念，总的说来对西方的利益或理想是不客气的。他对发展中国家革命的同情和莫斯科并无显著差别。实际上，铁托在迎合激进的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方面甚至更加积极；他认为获得这些国家的拥护可以支持他自己的独立，进一步从政治上限制苏联的压力。反过来说，他脱离苏联而自行其是使他对发展中世界的影响比东欧任何卫星国政权可能拥有的影响都更大。因此，南斯拉夫在国际论坛上很少支持我们的立场。举例来说，它是联合国有关波多黎各独立的一年一度的决议案的提案国之一。在中东，它一般是支持阿拉伯激进派的。

我对这种情况处之泰然。南斯拉夫同斯大林决裂并不是为了帮我们的忙；它奉行自己的方针也不是为了促进我们的利益。但是，无论铁托的动机是什么，南斯拉夫的独立自主改善了我们的全球地位。斯大林担心它给东欧其他国家提供破坏性范例是很正确的。此外，欧洲安全由于铁托拒绝参加华沙条约而得到加强。最后，有一条界限是他不会超越的：如果他同我们对立的程度使他的安全必须取决于苏联的善意，那是他受不了的。他需要我们来维

持他的平衡感。因此，我们并不是非讨好他不可。我们没有理由要卑躬屈膝，也没有理由不积极以同样的激情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就像他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所表现的那样。

南斯拉夫和我们有可能在好几个方面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要了解共产党世界和发展中世界的趋向，贝尔格莱德是一个有用的消息来源。它可以把我们的态度转告给它的朋友，尽管它同我们的意图有许多不同，因此执行中间人的任务并不可靠。高级人士定期交换意见是很重要的,目的是尽可能协调政策,同时强调我们对南斯拉夫独立的关切。

我们并没有设法争取南斯拉夫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了解，它奉行的不结盟政策同印度一样，都反映了对本国利益的冷静分析。严肃的不结盟国家——不是指那些远离一切危险、专做口号交易的国家——力图估计他们在影响国际均势方面能走多远。他们不会拿自己的安全或幸福冒险,以唐吉诃德的姿态反对我们(除非美国自己因循苟且、感情脆弱,使他们情不自禁要这么做)。无论我们的政策对他们的宣言如何表示“谅解”，他们也不会冒同我们联系过分密切的危险。看来荒谬的是：如果我们同他们太接近,他们就不得不走远点；我们同他们疏远时,他们又不得不向我们靠近点。这几乎是不结盟的自然法则。总而言之，我们不受那种感情用事的幻想的影响，并不认为不结盟是某些具体的不满或误解造成的。但是我们对不结盟国家、尤其特殊的是对南斯拉夫表示赞扬，承认他们奉行的是一项严肃的政策。我们接受南斯拉夫漂亮的词藻也不能把它争取过来；我们捍卫自己的利益也不会使它永远同我们敌对。

铁托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毫不感情用事,略带教条气味,但总是趣味盎然。我们这次访问发现他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中东。他警告我们不要把全部筹码都押在以色列方面。他认为纳赛尔是中东地

区的卓越领袖；纳赛尔的去世对和平的希望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铁托告诉我们，苏联在九月危机中曾敦促叙利亚和伊拉克撤出约旦领土，这同我们自己的情报是符合的。他的某些僚属希望探询美国在苏联进攻南斯拉夫时将做出什么反映。铁托从来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可能因为他自尊心太强，也可能因为他了解在他有生之年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尼克松这时已访问了两个东欧国家首都，即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其象征意义是有目共睹的。美国将特别注意东欧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国家。我前面说过，中国后来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们访问贝尔格莱德时，唯一值得提到的另一特点是使我们的共产党主人有机会接触到美国公共关系的奇迹。苦恼不堪的霍尔德曼在贝尔格莱德又碰到了他曾在罗马予以克服的同样难题：缺乏包括群众的"摄影机会"。他的难题是由于先遣队一个无法解释的疏忽造成的。总统到任何国家去都必须有的活动项目之一，就是向无名英雄墓献花圈。这是一个考虑周到的姿态，必然会吸引群众。总统在贝尔格莱德的日程上第一项就是献花圈。不幸的是，南斯拉夫的那个墓位于贝尔格莱德郊外约二十英里处。先遣队显然是由于疏忽而没有报告——或许这段距离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当车队蜿蜒前进、愈益深入一个郁郁葱葱、没有任何群众干扰人们沉思默想的森林地带时，全体先遣人员携带的报话机就愈益频繁地响了起来，其中可以听到大发其火的齐格勒和霍尔德曼表示难以置信的交谈。不过霍尔德曼有办法对付这种挑战。总统的汽车在返回途中突然离开车队，带着其他所有的车驶向贝尔格莱德市中心。被弄得莫名其妙的护送警察最后终于赶到。这次又造成了一次交通大堵塞；被迫停下的观众的情绪又达到不寻常的高度。这时，尼克松跳上车顶向群众招手致意，确实激起了真正的热情。

无论铁托对总统访问如何满意，他对我们访问的下一站是马德里不会感到高兴，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年迈的独裁者的首都前往另一个甚至比他更年迈的独裁者的巢穴。佛朗哥是法西斯在欧洲处于优势时上台的。他虽然对同伙的独裁者欠了债，这并不妨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自己的国家保持中立。但是在几个法西斯帝国垮台时，佛朗哥发现自己处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中。不过到尼克松前往访问时，他已在西班牙人民具有历史渊源的偏狭性格和自豪的民族主义帮助下经受了各种压力而生存下来。他促进了西班牙工业的现代化，逐渐放松了自己的统治，并为他身后建立比较自由的制度奠定了基础。七十年代许多用老眼光看待事物的人觉得难于承认西班牙实行镇压的程度比任何共产党国家和大多数新兴国家都要小得多。

现已年老力衰的佛朗哥主宰国家命运已经超过一代人时间。西班牙似乎悬在空中，等待一个人生命的结束使它可以重新进入欧洲的历史。地理位置使西班牙不言自明地对西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只是由于这种原因，我们才关心佛朗哥身后西班牙的政治，希望它一反历史传统，能够温和地演变。我们面临的选择是：排斥并反对现存政权，或者是同它一起工作，扩大接触，从而扩大我们的影响，为佛朗哥身后时期进行准备。我们选择了后面一种方针。

当时需要立即处理的问题是我们同西班牙的军事关系。从五十年代以来，两党轮流主持的历届政府都同佛朗哥政府签订了有关美国战略轰炸机和北极星潜艇基地的协定。在佛朗哥行将就木的时候，又提出了基地租借协定问题。同越南战争时期采取的大多数军事措施一样，这些协定也受到反对派的谴责。他们认为这是同一个法西斯国家做出的不必要的、道义上站不住脚的安排。美国政府认为，在中东发生动乱、我们在地中海的其他基地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决不能放弃西班牙基地，以至加深美国进行全球性

撤退的印象。我们也看不出同一个任期显然即将告终的年迈的独裁者进行对抗有任何意义。这种对抗将刺激众所周知的西班牙民族主义和自尊心。

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鼓励佛朗哥身后的西班牙走上民主道路也将是一项错综复杂的任务。西班牙历史的特点就是喜欢走极端，充满死亡和牺牲、悲剧和英雄事迹，因此产生了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混乱和纪律严明时期交替出现的蔚为大观的场面。西班牙人似乎只能容忍赞扬，而不能相互容忍。温和、渐进的改革——更不用说是民主的、而不是激进或暴力的改革——在西班牙是史无前例的。国际上的排斥有使西班牙感情用事的危险。在这整个带关键性的过渡时期，我们都同未来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以及西班牙政府和社会的温和分子保持着友谊。说实在的，美国对七十年代西班牙的演变所做的贡献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就之一。

尼克松并不是在马德里停留的第一个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进行过一次胜利的访问。事实上，尼克松梦寐以求的事之一，就是保证欢迎他的群众至少等于——而且他希望还要超过——他既尊敬而又羡慕的前任那次访问时的规模。担心是毫无道理的。马德里对尼克松的接待是盛大的。唯一不幸的缺点是在尼克松到达后，机场控制塔忘了关闭跑道，以致喷气发动机的轰鸣淹没了欢迎词。由于双方讲话都琢磨得只剩下陈词滥调了，历史不大可能因为没有听到讲话感到遗憾。在场面盛大的入城途中，那种光彩夺目、适合摄影的镜头就连霍尔德曼也无可抱怨了。他的上司和佛朗哥笔挺地站在敞篷汽车上，两旁有持枪骑兵护送，周围是欢欣若狂的人群。他可以一本正经地说，人群一旦超过几十万，唯一的问题就是宣布一个看来合理的数字，从而使尼克松不必担心这次接待同艾森豪威尔那次访问比较会相形见绌。

在所有的访问中，只有这次发出的信息最明显是象征性的，就

是为了说明美国继续关心这个地区。关于基地的谈判在访问以前就结束了；佛朗哥去世后如何过渡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即使非常转弯抹角地谈也是不行的。由于另外一种原因，同佛朗哥进行的谈话——至少对我来说——缺乏值得回忆之处。当尼克松在我陪同下拜会佛朗哥时，按照日程应当进行实质性会谈。但是我们发现这位年迈的独裁者经过车队长途跋涉后已精疲力竭。当总统谈话时，他昏昏沉沉差不多睡着了。这对我有一种神秘的催眠作用。尽管我拚命想要为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的对话有所贡献，至少要保持醒着的状态，我仍然不禁进入了梦乡。当佛朗哥和我由于操劳过度而安静地闭目养神时，只留下尼克松和西班牙外交部长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布拉沃去交换意见了。我参加会议是为了做记录。如果现在历史上对这件事有什么记载，那得感谢担任翻译的沃尔特斯将军。他那时是醒着的。

我们离开西班牙飞往英国，在英国首相乡间别墅契克斯进午餐。尼克松在那里同爱德华·希思举行第一次会谈。尼克松担任总统时，同希思关系非常复杂。没有任何其他外国领导人比希思更得到尼克松尊重，特别是希思同他的外交大臣、尼克松十分崇敬的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搭配在一起时更是如此。英国竞选期间，尼克松毫不掩饰地偏袒保守党。虽然历次民意测验和他的全体顾问——包括我们驻伦敦大使馆在内——的意见都同他唱反调，尼克松仍然深信希思会取胜。当他的预言实现时，我正在墨西哥城看世界杯足球赛。他得意得一晚上给我打了四次电话，向我表达他的高兴，并让我可以确认他有先见之明。他最希望同希思保持一种他不会同其他任何外国领导人保持的亲密合作关系。他说，在一个重要国家中现在终于出现了同我们有共同情谊的人物，一批不依赖我们、无需我们不断扶持而我们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教益的领导人。

这种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人们都劝他们应当相亲相爱，他们自己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以求不辜负这种期望，然而毫无成效。希思和尼克松从来没有建立起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而这是尼克松至少起初就渴望建立的。这两个人的性格都相当严肃，气量较小，渴望人家接受他的意见，而又不能表现为宽宏大度，消除彼此的隔阂。在所有英国政治领导人当中，希思是我开始担任公职时最了解而且最喜欢的。尽管我们在政府任职期间存在某些意见分歧，我们至今仍是很好的朋友。他是我见过的最能干的世界领导人之一。他开始地位较低，后来飞黄腾达，成为浸透英国贵族传统的一个党的领袖，未能摆脱英国阶级历史造成的种种心理状态。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必须冷酷无情；这种冷酷并不是天生的，因此更加引人注目。他以态度冷淡著称，但这种冷淡更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他是一个热情而温和的人。他预见要遭到拒绝时，就用一种表面上彬彬有礼的态度加以回避（常常伴随着并不表示喜悦的一笑）。从许多方面来看，他在战后英国政治领袖中是最不典型的。同其他人比较起来，他有一种同大陆欧洲人更相近的喜欢理论的倾向，使他的想法比较抽象，有时接近于空谈。

在所有英国领导人当中，希思可能也是同美国在感情上牵连最少的。这并不是说他反对美国，而是说他没有受到两次大战形成的亲切关系中那些感情因素的影响。对于大多数英国领导人来说，无论地理上实际情况如何，美国都比"欧洲"距离更近。这是从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感觉，那时英国力图越过大洋去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大陆只是危险的源泉，不是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但是希思深信英国的前途在欧洲，因此英国应当真心实意地、而不是无可奈何地或专为自己打算地同欧洲携起手来。当麦克米伦努力要参加共同市场时，他是英国的主要谈判代表。这次努力在一九六三

年由于戴高乐的否决而流产。希思颇为相信戴高乐派的论点，认为主要障碍在于英国同美国的"特殊关系"，因此他担任首相时决心不再重犯麦克米伦的错误。他把自己同欧洲紧紧联系起来，认为美国是一个友好的外国，有权得到能够反映它的力量和重要性的考虑，但"特殊关系"则会妨碍英国在欧洲的使命。希思并不要求在华盛顿享受比欧洲任何其他领导人更高的地位。实际上，他几乎是坚持拒绝接受任何优惠待遇。

这就产生了看来是荒谬的情况。尼克松不信任威尔逊，而对希思非常钦佩。但威尔逊却竭力想同尼克松建立比希思更轻松自如、更带个人性质的关系。对于共和党政府来说，工党对国内问题的观点远不像保守党的观点那样同它志趣相投；在某种意义上，保守党可以说是它的姊妹党。但是工党同共和党政府建立了比保守党更加亲密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希思的性格和信念造成的。在另一些情况下，这则是保守党思想深处一些因素的表现。保守党尖锐地感觉到历史上广泛得到承认的英国的全球作用的衰落。某些保守党分子不免对美国在非殖民化过程中起的作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施加的限制到一九五六年的苏伊士危机——感到怨恨。

无论原因何在，希思是同华盛顿疏远的。我们毫无代价地向他提供了进行磋商的优惠地位，而这是他的前任需要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和不惜阿谀奉承加以争取的。他宁愿不利用这种机会。由于作出这种明显的拒绝，他为英国进入欧洲铺平了道路，但使他和华盛顿的关系复杂化了。希思当选英国首相后，没有像尼克松曾经希望、也是战后历届英国领导人企求的那样，同总统立即会晤。尽管尼克松曾经对负责他的全部电话联系的人明确说过，他拒绝接"未经甄别的"电话这条规定对英国首相并不适用，尽管我再三劝英国大使约翰·弗里曼要鼓励这种接触，他们还是很少亲自通

电话。因此，这位英国新首相执行了尼克松就职时美国那些鼓吹欧洲一体化的人曾经呼吁、而当时明确遭到拒绝的办法。实际上，邀请尼克松到契克斯做短暂的逗留——即使气氛极为亲切——也是为希思把正式磋商再推迟几个月的目的服务的。它使希思可以对他的欧洲同事说，这次会晤只是非正式的礼节性拜会，由于时间紧迫不可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他还可以在开始同大西洋彼岸对话之前，同欧洲同事磋商。

希思对欧洲情绪的判断是否正确，这必须由未来的历史学家去确定。特别是在勃兰特和蓬皮杜都同他相反、正在加强自己的国家同我们的联系时，他真有必要以同华盛顿的亲密关系为代价来取得欧洲的信任吗？除了稍微改变了一点气氛外，他实际上付了什么代价吗？希思在奉行长远的方针时是富有远见、坚韧不拔的。他使英美关系比较正规化，也可以说是使它适应不可避免的现实。尽管如此，这样一位令人畏惧而又富有魅力的人居然看不见无形因素的重要性，总是可惜的事。

表面上看，契克斯的会晤可以说是再好没有了。尼克松把英国同美国的做法混为一谈，仍然认为英国新政府之所以比较冷淡是因为它需要站稳脚跟。（由常设文官和拥有在议会中处理问题的长期经验的、为数很少的党领导人组成的英国政府，通常都不需要很长的调整时期。）会谈分两次进行。午餐前，希思会见了尼克松；同时在座的只有英国内阁秘书伯克·特伦德爵士和我。午餐时，罗杰斯和亚历克爵士也参加进来。整个还不到两小时谈话时间。意味深长的是根本没有讨论欧洲问题，只是尼克松泛泛谈到，我们愿意对英国同欧洲共同体的谈判给予审慎的协助，这个建议也没有接下去谈。全部谈话都涉及国际问题：饭前谈越南和非洲；后来谈中东。希思最擅长这种对话——尖锐、果断而且精明。他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一样。他要我们注意非洲

和印度洋的战略意义，而当时这些问题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还没有提到很高的地位。他同意我们的看法，即我们从越南脱身的方式将影响东南亚以外地区。他说："如果苏联感觉你们是在屈辱中退却，他们就会在欧洲重新积极推行他们的政策。"亚历克爵士以向我们介绍他参加纳赛尔葬礼的情况为幌子，温和地催促我们在中东、特别是在四国会谈中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尼克松则有不同看法。他同我一样，认为激进势力还没有到无计可施的地步。他认为无论我们做什么，都避免不了新的危机。这个问题来不及加以解决，因为按照日程我们必须启程前往爱尔兰，否则就会到得太晚，失去大家喜爱的"摄影机会"。这次会晤是有益的，友好的，甚至是热情的，但奇怪的是毫无结果。这是前途更为错综复杂的预兆。

总统旅行的最后一站是爱尔兰。我为尼克松准备的情况介绍谈到了可能实现的最高目标："在爱尔兰停留并无巨大国际意义。但爱尔兰在国际事务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一直是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可靠的中立国家；将来也可能起这种作用。"这个目标是有价值的，但通常并不需要总统用整整四十八小时亲自予以注意。老实说，这次停留的意义属于国内政治方面。它使尼克松可以让爱尔兰血统的美国选民注意到他关于自己的祖先是爱尔兰人的说法，同时也是为了答谢一位富有的美国捐助者——我们就住在他豪华的城堡里。这位捐助者决定上演一场爱尔兰历史剧，其主题充满激情和戏剧性，以至演出从半夜一点开始，直到四点半左右才结束。我的工作人员和我由于坐在总统附近，成了他发泄怒火的对象，虽然我们同日程的安排毫无关系。

尼克松对爱尔兰的访问是按照卓越的先例进行的。事实上，为我们制定的日程算是轻松的。一位想象力过于丰富而忘乎所以的先遣人员原来提出的日程建议尼克松在都柏林领导一次圣帕特

里克节*游行。幸好时间并不合适，而且也没找到任何借口要总统三月份访问欧洲，否则大家就要发疯了。

在爱尔兰停留本来是例行公事，却出乎意料地提供了这次访问中最大的新闻之一。这是戴维·布鲁斯和菲利普·哈比卜从巴黎飞来同我们研究越南谈判问题引起的。（下面一章将谈到，当时正为总统准备一篇建议就地停火的重要演说。）这次会议使报界就越南问题及其和平前景又大肆猜测。甚至当尼克松在爱尔兰寻本求源时，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戴高乐的葬礼和希思的访问

我们回国刚一个多月，尼克松就又到了欧洲，这次去是为了参加悼念夏尔·戴高乐的弥撒。尼克松立即决定参加，这就确定了礼宾规格，并且保证其他许多国家元首都要出席了。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蓬皮杜同尼克松会晤时显得异常地热情。蓬皮杜重申他愿意英国参加欧洲共同体。他支持我们在解决越南问题方面采取的总的态度，并再次对德国发展的长远趋势表示警惕。

这次仓猝进行的访问不可能不发生稀奇古怪的事就平安过去。尼克松起初表示他希望弥撒一结束就启程回国。我劝他说，如果他不留下来参加下午较晚的时候蓬皮杜为各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就会失去许多善意。霍尔德曼对此大为恼火。他之所以反对，一部分属于特权问题，因为总统的日程是他的管辖范围，他不喜欢别人干预。更重要的是，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尼克松非常需要按时休息；这是使他的决策保持连贯性的基本保证。当霍尔德曼拚命保护总统的日程——特别是新闻稿上委婉地叫做“工

* 圣帕特里克是爱尔兰的守护神。圣帕特里克节是三月十七日，也是爱尔兰国庆节。——译者

作人员时间"的休息时间——的时候，他是在为祖国效劳，并且为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作为外交政策标志的强硬决定作出了贡献。

但是，一旦我在干预他的宝贝日程方面取得胜利时，霍尔德曼就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即如何把等待的时间填满。同尼克松的许多僚属一样，霍尔德曼曾一再听说他的上司喜欢马克西姆饭店。因此，他提出尼克松可能愿意同他的正式随从人员到那儿去午餐。让美国总统在巴黎圣母院参加追悼仪式后出来就去马克西姆饭店，当然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但是尼克松在我国大使阿瑟（迪克）·沃森寓所用过一顿丰盛的晚餐后情绪甚高，对此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当时就计划要这么做了。我按照典型的官僚方式，用技术上的理由把我从原则上反对的意见包装起来，指出在参加追悼仪式后给总统拍一张饮酒的照片是不行的。我的意见遭到否决。按照命令还是得去马克西姆饭店，但用餐时禁止喝酒。幸好我们的大使颇为明智。上天保佑，是他而不是一个先遣人员奉令去同饭店联系。我把沃森拉到一边，警告他说，如果法国公众对我们这种麻木不仁的举动表示的愤怒影响到官方关系，他的日子将极不好过。他那天晚上应当什么事也别干。如果有人抱怨，由我负责。事实证明，尼克松睡了一夜后也改变了主意。第二天早晨，当我告诉他这种举动将把他这次旅行得到的全部成就一笔勾销时，他指示我取消一切准备工作。我毫不为难就答应要迅速执行这个命令。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即一个月之后，爱德华·希思到华盛顿同尼克松进行第一次正式磋商。英国将要参加欧洲共同市场，这件事使欧洲同美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达到严重程度，虽然这种紧张并不是它造成的。潜在的原因是看法上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基本上是美国和已经恢复活力的欧洲之间的经济竞争引起的。某些争论稍微有点虚幻的味道。我们谈到非歧视性贸易，然而忽视共

同市场从性质上说就是歧视性的；共同市场毕竟是通过提高关税和其他障碍建立起来的——这些障碍是为了减少从外部世界进口，对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并不适用。英国即将成为共同市场成员国，这件事使我们不得不正视欧洲一体化这个概念所固有的、然而长期遭到忽视的问题。希思的访问使问题明确起来；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英国政策中新的优先考虑的项目，强调指出他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使英国参加共同市场。一旦参加之后，英国在我们关心的问题上将起建设性作用。但他不能冒险在事先对我们做任何让步。他既不希望就共同市场问题同我们进行双边谈判，也不希望给人印象，似乎他是美国安插在欧洲的内应——就这件事来说，他也确实不愿充当内应。过去任何英国首相都不会考虑对美国总统说这种话。当时存在的亲切气氛和尼克松表示谅解的答复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我们正面临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一场革命。

无论这种改变多么令人痛苦，这场革命也有它积极的方面。不管英国是否事前同美国统一看法，它的全球性经验和实用主义作风必然在欧洲的各种理事会中起有益的作用。希思强调英国进入欧洲对我们的主要好处属于政治方面，而不属于经济方面。他这样说肯定是正确的。（当然，这必然引起一个问题，即我们准备为政治上的好处付出多大的经济代价。）此外，他同尼克松就世界事务进行的交谈说明——同在契克斯的时候一样——双方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协调的。

同欧洲所有其他领导人一样，希思对德国发展的长远趋势表示疑虑；虽然同他的所有同事一样，他几乎肯定没有在波恩做这种表示，而是把表达所有人似乎都感到担心的这副重担留给我们——如果说是留给什么人的话。他反对勃兰特建立柏林问题常设会议的想法，认为要避免勃兰特的政策变成一系列单方面让步，

盟国必须使苏联真正认识到有来有往的必要性——特别在柏林问题上是如此。尼克松表示同意，并对他解释了我们所谓连环套的概念。他向希思再次保证，他不会允许苏联通过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获得战略优势。他们还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作为英国首相的希思是在冷静地权衡利害得失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感情基础上制定他对美国政策的。这对美国领导人是一种新的经验。另一方面，希思的信念同我们几乎完全一致。因此，从自我利益出发也会导致密切的合作。

希思的访问结束了盟国进行深入磋商的又一个年头。在迟疑了一阵子之后，我们支持了勃兰特政策取得的突破。英国进入欧洲终将产生重大后果。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打的是一场狙击战。一九七一年初，我们全力以赴地切断北越在老挝的交通线，打开通往中国的道路，并在五月二十日，在同苏联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取得了把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联系起来的突破。

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压力容易使身居高位的人认为把问题拖下去就等于避免了困难；在更多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只会招来危机。一九七一年，我们同欧洲的军事和经济关系还是经常使我们伤脑筋的问题。

曼斯菲尔德修正案：
政坛元老，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首先遇上的是军事危机。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一日，事先谁也没有来打招呼，我们突然听说，文质彬彬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想重新提出他那心怀多年的建议，要把我们在欧洲的兵员裁减一半，即十五万人。建议的形式是对延长征兵制法案提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修正案。曼斯菲尔德不止是一个普通

的参议员。他是多数党领袖，因处事公道而受人敬重，因作风正派而受人爱戴。曼斯菲尔德不属于哪一个激进的派别，但却是参议院传统势力的一位知名人物；他是使我们巧妙得令人难以相信的互相制约的体系真正发生作用的一小股爱国者当中的一员。他是个激烈反对东南亚战争的人。但是尽管他的反对是猛烈的，却从未有失民主政体所必不可少的礼仪和风度。在内心深处，曼斯菲尔德是个孤立主义者，热切希望削减美国的一切海外义务；这反映出一种传统的留恋过去的心理，有这种心理的人总想设法使美国的道义准则一尘不染，不受强权的谋略和目光短浅的外国人的细小纠纷所左右。

因此，曼斯菲尔德提出的修正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们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我们在欧洲的常规兵力需要加强，而不是裁减；但是曼斯菲尔德修正案则会削弱兵力。如果美国参议院以通过一项大量裁减兵员的立法而青史留名，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会和我们对外政策中的其他因素一样，成为我们国内没完没了的政治论争的牺牲品。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越南化的过程在欧洲重演，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不得不阉割主体以拯救一个最小的局部。我们长期以来想使北大西洋联盟的防务适应于新的战略现实的目标就会遭到破坏。

问题是作为每年一度的防务预算辩论的一部分提出来的；批评政府对越南政策的人们越来越把这种辩论变为对我们军事战略的全部因素展开的一场攻击。政府已经公开宣布要实行志愿兵役制，现在要求的是把征兵制延长两年。当这项法案被提交给参议院时，参议员曼斯菲尔德重新提出他那每年一度的建议，裁减美国在欧洲的兵员；这次采用的形式不是往常他提出过的“参议院决议”的形式，而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他要求在第二天五月十二日进行表决。两党的主要参议员提醒白宫说，曼斯菲尔德很可

能会占上风。

这样重要的法案未经小组委员会听取证词，居然能够直通参议院，而且还真的有可能通过，这倒是那个时期人们的怨气和破罐子破摔的情绪以及全国统一意志遭受严重破坏的典型写照。我们的巨额财政赤字为任何关于削减海外支出的号召增添了力量；曼斯菲尔德的名望又使他的同事不愿投票反对他。但是真正的问题还远不止此。美国参议院愿意拿这项二十多年来经历过五届政府和在两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结构去冒险，是因为患了当时全国性的流行病。政府决定加以反对。白宫立即(在五月十二日)发表声明，提醒人们注意，这项修正案会“对大西洋联盟的结构产生严重的损坏作用”。我们的下一步是推迟表决，以便争取时间，赢得支持。我们争取到推迟五天的时间。从涉及的问题来看，五天是少得可怜的，几乎到了荒谬的地步，但是却可能使情况发生变化。

我们决心打掉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但却面临着几道障碍。首先是支持这项修正案的人的热情高涨。其中许多人关心东南亚比关心西欧为重，他们中间有些人认为，拆散这个他们觉得是错误的和以冷战为中心的对外政策结构是件好事，这个结构是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持自由主义态度的传统势力；本世纪以来它一直鼓吹，行政部门的坚强有力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却转变立场，强使国会承担义务，以牢牢管住据说是权欲熏心、穷兵黩武的政府。

不容争辩的是，国会应该在执行外交政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在七十年代，感情压倒了理智。在国会和总统的目标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或在国会试图作出日常的战术性决定的情况下，我们的制度便运转不灵了。国会可以而且也应该审查外交事务的后果。它却做不到。在它试图这样做的时候，结果总是不幸的。这一点我在第二卷回忆录中还要详细讲到。国会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永

远有效的法律。它是按照可以预测的情况行事的。外交则要求不断按照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它必须给意外事件留有余地；不可预测的事件在外交中是经常发生的。玩弄词藻，随机应变以及有时态度模棱两可，这些都是外交上的手法。但是这些在法律上却算是歪门邪道的东西，法律要求的是肯定和明确。立法和外交不仅在方法和后果上截然不同，做起来也不一样。立法通常是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达成妥协的产物，偶而结成的联盟出现不久又消失了。随着各种不同的向国会施加压力集团的推动，国会中的这些联盟和权力中心也发生变化。对外政策要求对于国家利益要有一贯的观点。立法人的艺术在于能够在某一个问题上撮合各种施加压力集团，而外交政策的制订者却反复同原来那些国际活动家打交道，难得能够了结一个问题或者断绝一种关系。

曼斯菲尔德修正案是一个经受多次挫折而结成的联盟的产物。但是即使在产生这项修正案的联盟解体之后很久，它仍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它也表明，由于国会对于对外政策这幅镶嵌画的了解是支离破碎的，它不能作出具有连贯性的战术性决定。在提出修正案的那一周，我们结束了为了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突破而举行的谈判；安排了去北京的秘密访问；正在进行柏林问题的微妙的会谈；而且安排了同北越人举行的又一轮秘密会谈。就算尼克松政府有时过度保密，在举行敏感的谈判时，或者在这种谈判还处在筹划阶段时，国会必然是不了解情况的。事实上，即使涉及到的政策已经是完全为公众所知道的问题，国会造成破坏的能量也还是可观的。一九七一年五月，国会知道正在举行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柏林问题的重要谈判，以及我们正在敦促我们的盟国加强它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兵力，而且取得了某些效果。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使所有这些政策岌岌可危。

参议院的一些习气使问题更为复杂。即使那些一直支持北大

西洋联盟的参议员也感到左右为难，一方面要保持他们的信念，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忠于他们所属的特定集团；一方面明知曼斯菲尔德修正案危害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公然使一位受尊敬的同事遭受失败。因此，支持我们的参议员提出一项妥协方案，即：要求政府既同苏联又同我们的欧洲盟国谈判共同裁减兵力，以避免具体的强制性裁减。还规定总统应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并在尔后每隔六个月，向国会报告这些谈判的进展。

政府内部众说纷纭。罗杰斯、白宫驻国会联络工作人员以及国务院，赞同这项妥协方案。他们认为，马赛厄斯修正案无非使我们承担了进行协商的义务；不失为避免进行强制性裁减的高招。莱尔德主要出于策略考虑，不同意这样做。他主张直截了当地就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不加修改地进行表决；他的看法是，修正案越是"糟糕"，到头来我们占上风的可能就越大。尼克松倾向于支持莱尔德的意见。他对北大西洋联盟作过很多承诺。他的老练也使他理解，一旦接受裁减的原则，就等于打开拦蓄洪水的闸门。当时正好他主要关心的是，按照时间表将在一周之内达成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初步谅解（把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限制防御性武器联系起来），但是他愿意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挫败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他要我充当这次行动的主力。

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我认为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整个对外政策。那些希望我们沉着应战的国家可能会把我们举国上下对于越南问题的苦恼归咎于作出决定时的鲁莽从事以及战事的旷日持久。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在欧洲的兵力部署进行抨击，却会动摇我们战后政策的整个基础。我坚决反对拟议中的这项妥协方案。尽管它不要求立即裁减，但是它确立了裁减的原则，而且每隔半年提出报告，会重新激起要求单方面撤军的压

力。已经有人——像参议员汉弗莱——把这项妥协性修正案说成是国会指示政府迅速进行裁减。而且还有一大批同样内容的别的修正案正等待参议院的审议。这样多各式各样的妥协方案，只要其中有一个被采纳在案，任何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兵力的计划，不论其规模怎样小，都会完全落空；我们的盟国会垂头丧气；而同苏联进行的关于共同裁减兵力的谈判很可能草草收场。我们会走上使欧洲越南化的道路。

五月十二日那天，我花了大半天时间在电话上按照上述内容同支持我们的参议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像约翰·斯坦尼斯这样老练的领导人深信，曼斯菲尔德掌握了足够的票数，只有进行妥协才能阻挡得住他。我却宁愿要曼斯菲尔德修正案。所有的拟议中的妥协方案都有同样的缺陷，它们使政府参与了关于裁减我们在欧洲的兵力的决定；而且一旦我们作出让步，我们的处境就会很快地变得每况愈下。同时，直截了当地就曼斯菲尔德修正案进行表决，可以表明，尽管我们在越南问题上存在分歧，我们战后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面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尼克松政府第一次有可能调动起传统势力中的各种人物的力量，而这些人物曾经为战后美国的许多伟大成就立下汗马功劳。

这些人物中，迪安·艾奇逊要算是最突出的一个。钦慕他人本来不是我的长处。但是这一弱点并不适用于我对艾奇逊的看法。他的丰功伟绩、豪情壮志以及他的道德信念和嫉恶如仇的态度，都是异乎寻常的。我见到他时，他刚离开他所热爱的岗位，在完成一场伟大使命之后精神上感到空虚；他当时感到的寂寞，只有曾经为一项重要的事业操劳过一生的人才能体会得到。艾奇逊曾说，他的去职近似失恋。一九五三年，我到他的律师事务所去见他；他蓄着两撇微微翘着的小胡子，衣着合身而整齐，律师事务已经够他烦心，想来不会愿意帮助我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去撰写一篇关于朝

鲜战争的某些秘密情况的研究报告。我提了一些书生气的问题；后来相交深了我才认识到，他当时一定认为这些问题是学术性的和无关紧要的。当时他只是耐心地作答，有时答得有些尖刻，但总是明确的。一切都还算顺利，最后我问到他对麦克阿瑟的一篇特别鲁莽的报告的反应。这位老外交大师问道，“你是指我还没有尿裤子的时候，还是指我尿裤子以后？”此后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再次见面。又过了些年，有一次他请我吃午饭，才向我谈了对这位当时新政府中的显要人物的印象：“他使我想起一个爱投掷飞镖*但并不精于此道的人在一间挤满人的房间里练艺。”

艾奇逊是个很威严的人，仪态庄重，而且对公务态度严肃。他的力量总是用在为理想服务上面，而置个人恩怨于不顾。在三十年中，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开创和策划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和他忠心耿耿地为之服务的总统一起，实现了从孤立主义到一种新认识的转变，这种认识是：没有美国的实力，世界就不会有和平；没有美国承担各种义务，世界就不会有希望。他俩虽不很相配，却一起缔造了北大西洋联盟，同以前的敌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创建了帮助欧洲重建的经济机构，而且还为当时备受战争蹂躏的世界带来和平、安全和空前的繁荣。

在私交方面，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抵达华盛顿就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时，迪安·艾奇逊以文雅的风度——我几乎可以说是彬彬有礼——向我表示欢迎，以及后来他为了设法弥合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的观点和现实生活的最低限度要求之间存在的差距，所表现出来的才智和耐心。有一次我问他对于一项特别伤脑筋的建议的看法：“我可以这样提出吗？”迪安回答说，“当然你可以这样提出，但是如果你想要取得进展，就别这样提出。”

---

* 飞镖是澳大利亚土著使用的一种武器，投出以杀伤野兽，如不中，会飞回原处。——译者

迪安·艾奇逊珍视道义原则，但是他也鄙视那些以理想为借口而不去争取可以争取得到的东西的人。他常常会嘲弄人的弱点，但却从不诋毁自己国家的准则。他努力争取和平与自由，但是却明智地认识到，在漫长的旅途中，个人力量的影响不可能超越某一个阶段。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在一次演说中曾讲过一段话，艾奇逊常喜欢引用它："哎呀！先生们，我们不能把梦想变为现实。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梦想中最美妙的一部分，而且自己又心里明白，我们的行为是高尚的，那么我们就是够幸运的了。"迪安·艾奇逊的确把他的梦想变为现实；而且，他的行为的确高尚。

在当时，他曾备受辱骂，有些辱骂就是来自现任总统的。由于他成为普遍存在的不信任和怀疑情绪的明显目标，使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所表现的创造力、激情和成就变得暗淡无光。但是，他虽身处逆境，但态度从容、坚定，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而历史给了迪安·艾奇逊最高的奖赏——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

尼克松在一九五二年的竞选活动中曾经屈辱过艾奇逊，但是，艾奇逊在将近二十年后当总统需要他时，却并没有因此而拒绝帮忙。他忠于总统，而并不计较谁是总统。他曾几次应尼克松的请求提出他的建议，而且总是默默无闻地提出。这次他表示愿意公开帮忙。他对我说，他会打电话给所有他能够施加影响的参议员，或者是报社——虽然他认为他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缘分可能已尽。他给了我一张"知名人士"的名单，劝我争取他们的支持，其中包括约翰·麦克洛伊、乔治·鲍尔、麦克乔治·邦迪、赛勒斯·万斯等。我对他说，我先试探一下，然后再向他报告。

"知名人士"的反应各不相同。艾奇逊同时代的人，例如麦克洛伊，无条件地向我们提供帮助。我自己同时代的人则还得顾到自己的前途；他们虽然不愿意在行动上出力，但表面上还是帮忙的，他们基本上倾向于妥协。从年龄以及从反应上看，乔治·鲍尔

都处在两者之间。他告诉我们说，他的判断是，有必要进行妥协。但是，他愿为正义而斗争，不久他就卓有成效地并以他所特有的那种热情投身于这一工作，以求完全击败曼斯菲尔德修正案。

我向艾奇逊报告了各种不同的反应，他又有了新的主意。他说："我看我们似乎要来一点儿万炮齐发，而不是只放几声冷枪。"他敦请尼克松总统立即召集一批前任国务卿、国防部长、驻德国高级专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批代表战后两党外交政策的人物应该发表声明，支持总统维持我们目前在欧洲兵力的决心。尼克松和我一样，对艾奇逊的建议大加赞许。尼克松平日对传统势力既尊敬又看不起，对他们的支持既视为至宝又不屑一顾。这时尼克松看到，自从他担任公职以来第一次——结果也成为唯一的一次——有可能得到传统势力的支持，而洋洋得意。如果能够同这个集团搭上一座永久性的桥梁，使这位孤独而心情复杂的总统的内心感到宽慰，多少悲剧可能从而得以避免啊！如果那些当年曾经支持过我国政策的人士这时也来帮助尼克松摆脱疑神疑鬼的阴暗心理和克服莫明其妙的自卑感，事情会怎样发展呢？可惜事与愿违；双方都有责任。

五月十三日黄昏时刻举行的这次会议可称盛会。来到内阁会议室出席会议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有：艾奇逊、麦克洛伊、鲍尔、亨利·卡伯特·洛奇、万斯、卢修斯·克莱、艾尔弗雷德·格仑瑟、劳里斯·诺斯塔德以及莱曼·兰尼兹尔。这是老一辈政治家的最后一次聚会；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结成整体，对自己关于世界秩序的看法充满信心并始终为之献身；美国的理想主义也就是借助于这种看法使那些受到战争蹂躏的社会得以复兴，并把敌国化为盟友。尼克松精神焕发，发表了动人的演说：他从未要求在座诸公在越南问题上支持他。但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上他们也从未表示过不同意见。总统并追忆道，杜鲁门总统向第八十届

国会提出北大西洋公约以及各种有关计划时曾受到共和党代表大会的支持。从那时起，在这个问题上，两党一直是一致的。他反对曼斯菲尔德修正案，正是体现了美国政策的连续性。他引用艾奇逊自传的书名说，他也是个曾经“躬逢创世大业”的人。也许我们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关系即将出现突破（他这时想的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为我访问北京所作的种种准备）。但是只有北大西洋联盟保持自己的力量，我们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所有在座的人都以同样的精神作了回答。讨论了一会儿关于妥协有无可取之处的问题。但是艾奇逊并不像尼克松那样不愿意直截了当地提出反对意见，他对妥协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在这关键性的时刻，艾奇逊拿出一篇简短的表示支持的声明，请其他人签字。罗杰斯不知道，正是尼克松自己想出这个由艾奇逊提出草稿的点子；也许他被这位前任国务卿的高雅而自信的风度弄得不知所措；也许他还担心将来怎样和曼斯菲尔德共事下去；这时罗杰斯要求把草稿暂时搁一搁。艾奇逊懂得，一旦人们回到存在压力的平时的环境中，现在已经取得的一致看法就会烟消云散，因此要求当场在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并尽快发表声明，并不得迟于五月十五日星期六，也就是说，四十八小时以后。尼克松设法让他的国务卿懂得他是同意这样做的，因此，罗杰斯接受了大家一致的看法。

大家公推艾奇逊向报界宣布消息。他是个说话不爱保留的人。他说，他得到的印象是，总统坚决反对曼斯菲尔德提案及其任何变种。他说，在苏联不裁减兵力的情况下自己裁减兵力，这简直是“愚蠢”，是“胡说八道”。他说，他认为我们会在表决中获胜。他还告诉报界，总统向那些缔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且二十年来一直注意着这个组织的发展的人们发出了呼吁。“我们全都作好了战斗准备。”有人问他，会为什么开得那么长。他回答说，“我们都

是老年人，又都很擅于词令。"乔治·鲍尔补充说，听到总统讲，他不想妥协，真是令人如释重负。

尼克松已经初步得到公众支持，当即前往比斯坎岛，而把具体指挥战斗的任务留给了我。麦克洛伊在波恩对勃兰特做了大量工作，后来勃兰特发表了有力的声明提醒说，如果美国单方面撤军，就会留下"美国正在撤离欧洲这一不可磨灭的印象"，从而把缓和转化为绥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处的布罗西奥写信给总统提醒说，如果美国大量裁减兵力，会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够履行义务的信誉扫地。"

按照约定的时间，星期六总统在比斯坎岛发表了简短的文告，表示反对曼斯菲尔德修正案，并且立即得到早已安排好的一批鼎鼎大名的支持者的赞同。此外，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表示赞同的还有前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尼尔·麦克尔罗伊以及汤姆·盖兹；前国防部高级官员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等；外交家罗伯特·莫菲、利文斯顿·麦钱特以及道格拉斯·狄龙；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马修·李奇微等以及所有的前驻德国高级专员。只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克拉克·克利福德没有参加这项联合声明；前者由于身为世界银行行长因而具有国际公务员的身份；后者的原因他本人不愿透露。

新闻界的反应说明，维护过去的对外政策的传统势力仍有相当大的影响。《纽约时报》在五月十六日发表题为《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干的蠢事》的社论，批评这项修正案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提出来的，并预测说，除非参议院"完全失去责任感"，这项修正案肯定会被否决。该修正案的"被通过就几乎会挫伤美国和其盟国现在正在进行谈判的各种努力"。而且这篇社论还进一步指出，"即使这项修正案被否决，但如果票数相差不大，这种情况也会动摇欧洲盟友的信心。"

就在尼克松文告发表的那一天，五月十五日，我们得到了一种极其出乎意料的支持。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苏联的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发表了重要演说，其中特别明确表示，苏联愿意开始进行关于在欧洲共同裁减兵力的谈判。勃列日涅夫说，西方发言人正在询问："裁减谁家的武装力量——外国的还是本国的——和裁减什么武器装备，核子的还是常规的？"他把这种猜测比作想要知道酒的味道却只观看酒的颜色而不去品尝。"用外交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开始谈判吧！"

政府、国会和新闻界对勃列日涅夫讲话如获至宝，抓住不放。对于本来就是勉强支持曼斯菲尔德的那些人以及政府中反对他的人来说，都是很好的遁辞。这两种人都可以支持这样一种主张，即：由于谈判即将举行，美国现在要单方面裁减兵力，不是时候。《华盛顿邮报》在五月十六日发表题为《勃列日涅夫把牌叫；尼克松时机到》的社论，要求早日举行关于共同裁减兵力的谈判。《纽约时报》和各大报都唱类似的调子。国务卿罗杰斯在五月十六日宣布，已指示雅各布·比姆大使要求苏联官员进一步阐明勃列日涅夫建议的内容。我们赞同举行这项我们还不能弄清其内容的谈判；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利地击败曼斯菲尔德修正案。

我们弄不明白，是什么东西使勃列日涅夫鬼迷心窍，挑选了这个特殊的日子来提出共同裁减兵力的建议。这原是苏联的长期政策；他在三月的一次演说中曾说过完全一样的话。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一定使克里姆林宫甚至比我们的政府还要感到意外。莫斯科也不可能料想到这项修正案会引起轩然大波。勃列日涅夫建议的原意，无疑是想表示一下他们愿意打开通向光明未来的门户，以推动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尽管有曼斯菲尔德修正案这笔外快，苏联人还是一成不变地执行原来的作战方案；这再生动不过地表明，苏联决策机构尾大不掉，毫无灵活性可言。那些总以为苏联的每

一项部署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应该好好想想这件事。苏联的力量一般都来自顽固坚持其立场和施加暴力，而并不来自战略眼光或策略上的灵活。

和往常一样，我们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参议院和几位政府大员有一种固有的妥协愿望——一种连“知名人士”加上勃列日涅夫联合在一起的影响都没有能够完全打消的愿望。我向共和党督导员、参议员罗伯特·格里芬说明，没有一项妥协方案是像他所想象的那样“无关痛痒的”。所有妥协方案都要求政府接受单方面撤军的原则以及定期向国会报告“进展”的义务。乔治·鲍尔当时正在国会积极拉票，我也提醒他说，尽管他认为有必要进行妥协，白宫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政府其他大员流露出不同意见，但却并不代表总统的思想。

最后，在五月十九日举行表决，这时人们的头脑早已清醒过来了。受到政府坚决反对的妥协性修正案以七十三票对二十四票遭到否决。参议员彼得·多米尼克提出的类似修正案也以六十八票对二十九票遭到否决。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这时建议对曼斯菲尔德的立场作出修正，只裁减五万兵力，而不是曼斯菲尔德提案所说的十五万。但是，又以八十一票对十五票遭到否决。当我试图鼓励一位支持我们的参议员去投票反对又是一连串的修正案时，他面有难色地对我说：“一个人一天能够投几次反对票？”这反映出当时参议院人们的情绪。最后，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又慷慨陈词，然后把他的修正案付诸表决。结果是六十一票对三十六票，被否决了。

第二天，五月二十日上午，尼克松宣布在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中实现了突破。这真是一次险胜。我们在进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决定性阶段的前夕，刚刚勉强保住了二十五年来的对外政策，使它没有遭到破坏。

这次辩论带来了一种副产品。它推动了关于共同裁减兵力的

谈判。在此之前，我们的战略是拖延时间，部分地是为了把这项谈判同别的问题联系起来，但是尤其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看准哪种方案可取。我们审议过的各种方案，都使中欧的兵力不平衡状态更加严重。在中部战线，华沙条约组织的兵力远远超过我们；而且一旦开始动员，这种初步的优势还会迅速增长，尤其是因为离这里不远，就是苏联的欧洲部分，那里驻有苏联许多师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按同一百分比裁减兵力，这种双方同意的共同裁减，只会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更加复杂化。已经兵力分散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线会遭到削弱，而苏联增兵的能力却并没有下降。我们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虽然共同裁减百分之十不会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裁减百分之三十就会大大加强华沙条约组织的地位。这必然使人们认为，唯一可靠的协议是“不对等”裁减，换言之，即：华沙条约组织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裁减更多的兵力。我们的官僚机构奉行的主张是：我们需要提出“可以作为谈判基础”的建议。因此，“不对等”裁减的概念首先在官僚机构里就通不过，而且谁也不相信苏联人会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办法。关于曼斯菲尔德修正案的辩论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在进行共同裁减谈判的过程中逐步明确我们的思想，而不是像我们愿意的那样，事前就做到思想明确。

在里斯本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大大推动了走向谈判的进程；会议采纳罗杰斯的计划，要求秘书长布罗西奥早日进行试探。尼克松和往常一样，一旦事成，就给自己大帮倒忙。他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出现突破以及参议院表决结果欣喜若狂，想利用六月一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机会从那些总是使他感到恼火的自由派手里赢得一分。他宣布，一旦正在进行的磋商结束，美国就准备“向前推进”，以便早日举行谈判。这样，如果当时苏联人抓住这个机会，尼克松就会使我们几乎非举行这场谈判不可，而对此我

们却没有准备好。幸运的是，他们想等着讨点小便宜，这使我们有时间收拾一下自己的屋子。

苏联人碰巧在关于曼斯菲尔德修正案的辩论正在进行的时刻提出在欧洲裁减兵力问题，此后不久，他们又把问题搁置起来。也许他们感到后悔，没有想到帮了我们的忙，使我们能够击败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也许在形成统一的见解方面，遇到了和我们同样的困难。也许他们担心，如果苏联真的撤军，会影响他们对东欧的控制。也许他们想等到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有了结果以后再说。也许勃列日涅夫只不过是说错了一句话。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刚刚表示有兴趣举行共同裁减兵力的谈判，苏联人马上就进行刁难，把举行这项谈判同他们最欣赏的举行欧洲安全会议的计划联系起来。而且他们以不愿意举行集团对集团的谈判为理由，拒绝同布罗西奥举行试探性谈判。这正合法国的心意，因为巴黎认为，让布罗西奥去谈判有损于他们一向珍视的独立。而且法国主张举行欧洲安全会议，而不愿举行共同裁减兵力的谈判，以抗衡勃兰特采取的单方面外交行动。苏联人坚持要先举行欧洲安全会议。除法国外，所有的盟国都支持我们；我们采取了两种谈判应该同时举行的立场。我们成功地使共同裁减兵力的问题悬而不决，以防止国会通过美国单方面撤军的决议。同时，我们还成功地拖延了谈判的时间，而并没有带来不利的后果。

事实上，曼斯菲尔德修正案引起的辩论是美国国内关于对外政策的辩论的一个水平基点，虽然当时躬逢其盛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到那时为止，政府在全部政策性问题上，一直处于守势。为了维护原有的方针，政府进行了全力以赴但似乎又是没有希望的战斗，以免我们的防务预算遭到削减和单方面裁减我们的兵力。但是，在五月二十日宣布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突破

之后，我们开始掌握主动。接着是我秘密访问北京，以后又是宣布要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然后是几乎接连不断的针对“和平问题”而采取的惊人之举，把我们的对手弄得不知所措。在后来的岁月里——当这样做没有什么危险时——一些攻击我们最厉害的人，随着当时的民情而改变了观点，开始批评我们对盟国照顾不够；缓和因“吹嘘过度”而受到攻击。我早就说过，我们认为建立在严格的对等基础上的缓和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是，不论我们对抽象的缓和有何看法，根据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的情况，政府对苏联采取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对于使美国及其盟国不致于轻率地放弃责任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有讨论缓和的愿望，这就促使勃列日涅夫采取主动提出共同裁减兵力，使我们的整个欧洲防务结构免受国会的粗暴攻击。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为什么在越南战争的时代，如果我们要使我们的国防和联盟的团结不受破坏，就必须执行这样的政策，以维护国家安全的要素。

经济危机：第二次“尼克松冲击”

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以及由于同苏联谈判而引起的激动暂时掩盖了一场持续已达一年有余的经济冲突。由于三种事态发展的结果，这场冲突在一九七一年达到了高峰。这三种事态是：英国即将进入共同市场；任命约翰·康纳利为财政部长以及对美元的日益增长的压力。

到一九七一年五月，英国进入共同市场的最后障碍已被克服。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维利·勃兰特支持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至少部分地是为了平衡他的东方政策。蓬皮杜放弃了戴高乐原有的保留立场，因为他担心最后会只剩下法国去面对一个可能走上民族主义道路的德国。希思和蓬皮杜于五月二十至二十一日会面，以解

决都是高度技术性的遗留问题。后来，蓬皮杜为了小心翼翼地避免激怒持强硬路线的戴高乐主义者，运用葛罗米柯会为之感到自豪的否定之否定的词句宣布了会谈的主要积极成果："认为我们不会达成协议的想法是没有道理的。"他言而有信。到了七月，希思已经能够宣布他将于年底之前将协议提交议会。

二十年的努力和美国的鼓励所带来的这一成果，对美国来说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不幸的是，当时正碰上越南战争的挫折促使人们仇视外国人的时刻。那些企图动摇美国外交政策大厦的人现在同那些认为扩大共同市场对我们的经济优势是一种挑战的人携手合作。他们双方都想设法减轻我们的国际义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欧洲实行优惠关税制以及日本同我们贸易中出现顺差进行批评。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处境日益明显地不妙，使情况更加急迫。一些因素，如通货膨胀、高工资的协议和愈来愈严重的支付赤字，合在一起便造成了从开春以来的抛售美元的浪潮。情况开始表明，只有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大规模地进行越来越多的干预，才能使兑换率不致发生重大变化。五月十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终于停止购进美元；马克开始向上浮动，美元贬值。德国马克对美元的升值，从理论上讲，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对我国的出口是有利的；它使得我国的出口货物价格低廉，而进口货物由于成本增加也减少了。由于我们的金融当局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要求改变汇率，这也算是某种"胜利"。但是这种调整汇率是由于欧洲人所认为的我们对美元的"好心的不闻不问"所造成的，因此，它被看作是一种可以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施加压力的战术。

在这段期间，我自己在这场经济问题的讨论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从一开始，我就不打算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起重要作用。说得恰当一点，它不是我的主要研究范围。到后来我才懂得，关键的经济决策并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起初我想，我管国务

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手头的事就够多的了，不能再管财政、商务和农业部了。我拜耶鲁大学的理查德·N·库珀教授为“导师”，突击学习了这个问题的基本知识。我任命精明的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坦和罗伯特·霍玛兹为我的工作人员。但是总的说来，我只限于观察动静和汇报情况。因此，我出席过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并向总统送交过情况备忘录。但是我并不想掌管、更不用说控制制订政策的过程，像我在国家安全其它方面所做的那样（但这并没有使那些批评我“控制”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人不去批评我没有控制国际经济政策）。

在组织和预算处处长乔治·舒尔茨的敦促下，在白宫新设立了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助理的职位。虽然从技术上看，这削弱了我的权力，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彼得·彼得森是第一任助理。他和我建立了很密切的工作关系，而且我们的私交也很好。他为人精明强干，见多识广，教给我很多关于国际经济的知识；我非常尊重他，因此，除非遇上对于外交政策关系重大的事情，否则我很少进行干预。在新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对白宫工作人员制度展开正面抨击以前，我们一直配合得很好。

康纳利是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任财政部长的。尼克松认为他挑选这样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民主党人来担任这一职务是一种不同凡响的举动，因而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一直扬扬自得。因为尼克松对康纳利没有他同其他阁员的关系上的那种互相竞争和不安全的矛盾心理。康纳利和罗杰斯、莱尔德不一样，他在尼克松这一生的历次危机中和尼克松没有什么接触。因此，尼克松和康纳利来往不用担心自己不受尊重。康纳利自命不凡，使尼克松把他看作自己身边的沃尔特·米蒂* 的形象。他是尼克松唯一不在背后

* 米蒂是美国短篇小说《沃尔特·米蒂的私生活》中的主人公，此人平庸无奇却梦想过豪华的生活。——译者

说坏话的人。

康纳利确实是内阁中最威严的人物。他很聪明，体态优美，外貌和举止都使人感到他天生是个领导人物。他身材魁梧，轩昂之气，溢于言表。但是，对于这种自命不凡的人物不应多加指摘；如果没有异乎寻常的自信心，他们是绝不可能指挥若定的。他富有幽默感；但是，即使他放声大笑，也从未给人以一种不能自制的印象。他从不畏缩，很有魄力。他有一次对我说："在这个城市里，人们衡量你的标准是你所消灭的敌人，被你消灭的敌人地位越高，你就越伟大。"约翰·康纳利对他的对手从不畏惧。他喜欢为维护信念而战斗。不论人们对于他的观点有何看法，反正他总是个领导人物。

他和许多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得克萨斯人一样，愿意正面进攻，而不愿意迂回作战。他深信，治好越南病症的最好办法是，我们的领导人能让大家看到他们是在顽强地捍卫美国的利益。他说到做到，马上用事实表明，硬要内阁成员通过白宫助理才能同总统打交道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宫廷侍卫包围圈"，是阻挡不住坚决要见总统的内阁成员的。在国际经济政策问题上，他干脆不理睬彼得·彼得森。他拒绝通过彼得森来呈递备忘录或接受指示。如果他需要白宫的指导，他干脆就从财政部穿过马路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他的行动表明，人们在许多文章中提到的这种白宫主宰一切的现象，既反映出正式的组织图表中的问题，也反映出内阁对这一现象的消极默认态度。后来尼克松任命彼得森为商务部长，任职期间政绩卓著，从而结束了彼得森的苦恼。但是，即使在这以前，康纳利早已经把彼得森的作用降低为一个旁观者了。

康纳利认为，没有理由要对外国人特别客气。他认为归根结底，国家只有在压力下才会让步。除非拥有胜过对方的力量，他对于协商是没有信心的。他身为财政部长，这就决定了，我们同欧洲

在经济问题上的对话不会是死气沉沉的。同时也决定了，欧洲的贡献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而不仅是念念有词地表示善意的仪式。

这就是国内官僚机构在一九七一年春的情况；当时，由于英国即将进入共同市场以及美元受到很大的压力，一些久已成为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主要内容的问题和论点，突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分担防务费用”的需要已经成为要求裁减美国武装力量和节约政策的一种婉转说法一样，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新兴起的力量也被用作一种论据，说明国际货币制度需要进行结构改革。通常的趋势是要求兑换率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由于美元的定值已越来越明显地偏高，这种要求事实上意味着美元将进一步贬值。随着这一切而来的是一种新的经济民族主义的论调，在西德马克重新定值之后，这种论调更为甚嚣尘上。

康纳利在五月二十八日在慕尼黑以明显的挑战口吻谈到欧洲和日本的责任：

> 我们目前近百分之九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用于防务——其中近五十亿美元用于海外，多半用在西欧和日本。为提供军事保护拿出经费是领导者的职责所在；这个责任是不能也不容推卸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二十五年之后，人们合乎情理地提出问题，从这种保护得到好处的自由世界盟国之间，应该如何分摊这种责任所带来的费用。
>
> 美国经济已不再在自由世界中占统治地位了。友谊、需要或能力方面的考虑已不再能够成为美国为共同的负担承受如此重任的理由了。
>
> 而且，很坦率地说，美国人民再也不会允许他们的政府参与一些国际行动，在这些行动中，美国的真正长远利益并不象我们与之打交道的那些国家的真正长远利益那样清楚地得到确认。

六月七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次会上，国务卿罗杰斯和助理国务卿纳撒尼尔·塞缪尔斯作了一个措词更为巧妙但内容同样

明确的讲话。

自从我们的联盟成立以来，这样的言词是前所未闻的。它震动了我们脆弱的官僚机构，几乎也同样地震动了我们的盟国，它们一向轻松地认为协商的原则使它们对美国的单方面行动拥有否决权。首先，康纳利放的这一炮在华盛顿引起了一场争论。保罗·麦克拉肯要求把关于我们对于正在出现的货币危机的对策的讨论转移到白宫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中去进行，因为所有的经济机构(以及我的工作人员)都派有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康纳利并不喜欢人家用这种方式削弱他的权威。果然康纳利的地位是明显地与众不同的。尼克松决定绕过他自己的系统，要求康纳利在提出建议时只需同保罗·麦克拉肯、阿瑟·伯恩斯（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乔治·舒尔茨以及彼得·彼得森进行"协商"。他们中间谁也没有能够和康纳利对垒的官僚手腕。国务院和国防部则完全被排除在外。

经济机构一致认为，美元比值定得过高，而这种情况使得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处于更糟的地位。但是，他们对于采取什么补救措施持有不同的看法。舒尔茨赞成继续对美元采取"好心的不闻不问"态度，实际上是让美元浮动。伯恩斯倾向于提高黄金的价格。麦克拉肯则主张通过多边协商使兑换率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的正统立场。每一种方案都对外交政策有重大影响。对美元"好心的不闻不问"会被其他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看作是故意施加压力的策略。提高金价将使一些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它们，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我们的敦促下，一直在采取以美元而不是黄金作为储备的办法来帮助我们。多边协商则给人以一种一切照常的印象；它会使所有主要参加协商的国家都拥有否决权。当时康纳利赞成维持现存的固定汇率制度；这在当时被看成是一种非正统观点，然而现在根据我们对浮动汇率的经验看来，这种观点就并不奇

怪了。

到八月初，保护主义情绪以及关于对歧视性的贸易做法进行报复的议论有所增加。彼得森主张除非日本对日元重新定值，就对它实行进口限制。康纳利建议征收进口附加税。由于这个问题显然即将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我于是召集高级研究小组开会。这是国务院第一次正式参与决策。讨论没有产生结果，因为大家都认为，我既无权，也的确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不会坚持什么特殊的政策路线。因此每个机构都宁愿等到在康纳利主持下召开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时再表示态度。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求研究小组在八月十七日以前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

不到几天的功夫，事态发展急转直下，远远超过各机构间慢条斯理地进行磋商的步伐。康纳利所预料的，或者说是盼望的危机临头了。八月九日星期一，美元对马克的比值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点。在星期三，抛售美元之风有所缓和。但是，在星期四，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不得不又一次购进十亿多美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在备忘录中指出：

> 形势不大可能好转，除非对欧洲的货币重新定值（在目前危机的情况下，这是欧洲人最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美元贬值；或者美国采取措施限制外国货物进口并鼓励美国出口（这需要采取立法措施）。在欧洲人方面，他们大概也会作出巨大努力，限制其中央银行手中拥有的美元数额，并对美元采取其他严格措施。

康纳利这时敦促尼克松采取一系列彻底的措施；事实证明，他支持我的工作人员提出作为替代方案的所有措施。八月十四日星期六，在我动身去巴黎和黎德寿举行秘密会晤之前，我同尼克松进行了一次谈话。尼克松在向他的谈话对手透露后者可能并不喜欢的消息时，常用的手法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他漫不经心地提

到，第二天晚上他将就经济政策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以炉火纯青的手法，避而不谈令人不愉快的主题，对我很轻巧地提到他打算征收进口税的做法，以致于我一直到后来才明白这一招的厉害。对于他的这种手法我本来不应感到意外。几个月来，我看到他两次对罗杰斯使用同样的手法，把国务卿罗杰斯排除在重大的政策讨论之外，而且在后来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在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上，他又将对罗杰斯使用这种手法；这次还提出了精辟的论点，说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将使我们的盟国对他的新经济政策的反应得到缓和。实际情况是，既没有和国务卿商量，也没有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商量，就作出了重要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决定。当时我随便地问了一下国会持什么态度的问题，未及多说。多说也没有用。尼克松既已作出了决定，争辩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后来外交政策方面的后果显然很严重，那才是我发表意见的时候。

第二天，八月十五日，总统发表电视演说，提出了他的新经济政策。在国内问题方面，他宣布了各种减少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措施，例如发放投资贷款、取消汽车行驶税、加快减免征收所得税的步伐、削减四十七亿美元的政府开支、暂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冻结工资和物价九十天。不过，新方案的真正核心是采取措施保护国外的美元和扭转贸易逆差。尼克松宣布减少百分之十的对外经济援助，对一切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附加税，并停止把美元自由兑换成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

尼克松一举切断了美元和黄金之间的联系，从而打开了实现有效贬值的道路。在采取这项行动的同时，他也制订了对付国内的通货膨胀和保护主义的计划，从而开始了在国际上进行系统的调整的痛苦过程。这是他在外交上的大胆做法向经济领域的延伸。自从一九四四年以来一直对国际货币关系起调节作用的布雷顿森林协议被他打入冷宫。在后来的年代里，这将产生许多大都

是无法预见的后果。新方案的直接作用在于它对国外的影响。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宣布进行一场经济战，是美国从它以前所主张的一种开放性的国际经济制度后退了。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特别是日本感到深受冲击，因为这一方案宣布得突然，某些措施是单方面采取的，而且它使人们不得不考虑正式改革整个国际经济制度的问题。很明显，我们正走向一个紧张的协商、冲突和对抗的时期。

八月十六日晚，我从巴黎回来，面对这一既成事实，这时我发现尼克松扬扬得意。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尼克松第二次使全世界目瞪口呆。他自己认为，正如他已经改造了国际外交那样，他正在改革国际经济。他对他造成的新闻上的轰动欣喜若狂。象他常常干的那样，他多次要我向他报告外国的反应，这些反应充其量也只是好坏兼有的。他对国内的赞扬声感到高兴。八月十九日，尼克松欢天喜地地在达拉斯停留（为了证明历届总统的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并发表了下述值得纪念的话："和平的严重挑战在于要我们每个人分别地再次献身于这个宏伟的美国理想，并要我们全体'作为一个受上帝保佑的民族'也这样做。有了它作为我们在精神上同战争相当的东西，我们就能进入一代人的和平。"有了这篇政纲，提出以和平作为在精神上和战争相当的东西，就不大会走错路了。

我自己对八月十五日的措施的看法是不明确的。后来我开始担心长期对抗对盟国关系会产生不稳定的影响。不过那时候我对自己的判断还未自信到足以使我能根据新措施的优缺点来采取一种立场。事后，我认为，大概需要有某些冲击才能够推动协商。我主要关心的是，在对抗已经达到目的后就应快点收场，以免经济问题压倒外交政策方面的考虑。

从形式上看，这些措施是一种重新确定比价的努力，也就是

说，为各国货币确定更加符合它的实际购买力的币值，从而使某些盟国不能再享受那种不合理的便宜，即：把他们的币值确定在最有利于他们商品的出口的水平上。事实上，这样做迟早会导致废除固定汇率，而代之以我们现行的“浮动”汇率制，使每个国家的货币根据短期的供求关系找到自己应得的比价。

我们花了近两年的时间使我们的盟国接受一项完全浮动的汇率制。这种制度的支持者本来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周期性的危机。在危机到来时，固定的汇率或者由于货币储备不足而贬值，或者由于储备过剩而重新定值。实行这种制度就可以每天进行“无痛”调整；投机商会从此绝迹；兑换率将更真实地反映作为基础的经济力量；各国不会为了支持“人为的汇率”而使自己的黄金和货币储备发生破产。但情况的发展并不完全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新的制度比旧的固定汇率制更易受危机和恐慌心理的影响，而且其方式更富于戏剧性。它给投机商人提供了新的机会。汇率远远没有牢牢地和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却很容易受情况不明以及投机活动，特别是剩余资本的转移的影响。在旧的固定比价制度变换了形式的情况下，仍然花费了储备来保持某种类似稳定的情况。当然，在一九七一年，还没有人预料到石油输出国组织会把油价提高五倍，从而制造出一笔数十亿美元的新的游动资金。但是我们想估计一下尼克松—康纳利方案的后果，这种后果还在发展之中，而且在当时是预料不到的。据我看，美元问题、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盈余以及整个国际支付制度的问题，将会无限期地成为今后国际事务议程上的问题。一九七一年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大家迫切关心在固定汇率制的范围内调整币值（这种固定汇率制后来又存在了两年）。不仅是美元的汇率受到影响，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也必然是相互关连的。

康纳利的战略是，美国不提出解决危机的具体建议。他的理

由是，征收进口附加税的办法实行得越久，我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就越有利。他担心美国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会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联合反对，即使它们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达成一项一致同意的积极方案。因此，九月三日在巴黎举行的财政部副部长会议和九月十五至十六日在伦敦举行的财政部长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都毫无结果。财政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克宣布，美国没有解决危机的具体方案。会谈处于“磋商而不是谈判”的阶段。

所以，关系就不可避免地会日趋紧张。其他工业国家不乐意被人逼迫去调整它们的经济政策，虽然它们非常清楚，如果不是由于受到压力，它们几乎肯定根本就不会采取行动。许多国家对美国的独断专行感到震惊。一方面，我们要维持足够的压力，以促使我们所寻求的调整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我们又担心这会引起一场贸易战，以及破坏几十年来精心培育起来的政治关系。我们将不得不在这二者之间的一条羊肠小道上战战兢兢地前进。我设法在取得两者之间的平衡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康纳利认为，不进行一点对抗，我们的贸易伙伴是不会作出汇率格局上的重大改革所含有的那种困难的抉择的。起初我同情他的观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怀疑，这是由于康纳利的得克萨斯州人的性格太强，以致于喜欢为吵架而吵架。至少他认为，如果把对抗理解为坚决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一种行动，那么它就会在国内加强政府的地位。但是，我认为达成协议的最佳时刻就是在对方还徘徊于和解和对抗之间的时候。一旦对方决定进行对抗，它必须在进行过一定的较量之后才肯罢休。因此，我选择的办法是，可以进行一段时间的强硬的谈判，但要避免进行全面对抗，因为这会威胁到我们和盟国的关系。阿瑟·伯恩斯给我看过一张列举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准备采取的报复措施的单子，这些措施会产生一种总的说来对我们非常不利的后果，这更加深了我的

看法。

我在等待开始这场争论的时机，同时在两个方面采取了行动。我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正规机构，制定出政治和经济的方针，尤其是对日本的方针，以便缓和一下八月十五日冲击的影响，并为我们一旦渡过目前的危机就可以开始的新的合作时期作好准备。副国务卿、前驻日本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在这方面助了一臂之力。同时，我设法提出一些明确的目标，以便开始谈判。我向尼克松建议，请他设立一个小组来制定一项谈判方案。小组里有康纳利、保罗·麦克拉肯、乔治·舒尔茨和我。向阿瑟·伯恩斯通报情况。由于康纳利反对，尼克松把彼得森排除在外，但是我非正式地和彼得森保持密切联系，他也帮了大忙。在十月份，这个小组大约每周聚会一次。它拟定了最后达成协议的基本方案。最后的方案主要是康纳利、舒尔茨和伯恩斯的功劳；我不过是推动问题的解决，解释政治上的含义以及最后把事情推向作出决定。

情况一度变得更困难了。尼克松在九月十六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把取消附加税的问题不仅和币制改革联系起来，而且还和分摊负担、贸易限制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联系起来——这是一张不可能马上解决的单子，因此有可能使附加税问题成为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在九月二十三日又重复了同一主题。但是，到了九月底，小组的会议开始产生结果。康纳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把取消附加税的问题仅仅和达成一项关于币制改革的协议联系起来。形势再度紧张起来，到了十月，康纳利仍然拒绝提出关于币制改革的具体方案；他认为，他还没有充分利用当时的局势。由于欧洲人和日本人自己内部还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的结果必然是继续实行征收进口附加税的办法，因此，存在着其他国家迟早进行报复的危险，会造成一场经济上的民族主义的格斗。此外，我担心如果欧洲各国和日本发生一场可能归咎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的

经济衰退，人们就会责怪我们。而且不仅我们的对外政策会遭受永久性的破坏，我们盟国的国内结构也会如此。新的经济安排，不论如何有利，都不能弥补这一损失。

为了解决问题，我建议尼克松亲自和欧洲各国的首脑进行交涉。我的原意是要举行一次西方各国的最高级会谈。但是蓬皮杜明确表示他不感兴趣。他心里明白，他搞不起一个欧洲的共同阵线。如果出现僵局，勃兰特会受到极大的压力，迫使他和美国站在一边。因此，我们决定发起一系列的双边会谈。关键就在蓬皮杜身上。希思会在法美之间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如果我们和勃兰特站在一边，就会引起法国的不满；而且如果向蓬皮杜进行的工作失败了，我们总还是能够再回过头来和勃兰特站在一边。我们选择的战略是，让蓬皮杜通过和我们谈判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来确立他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如果他完全不肯让步，我们总还留着一手，可以设法孤立他。我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的判断是，如果美国的建议给以机会，大家都是愿意解决问题的。而且我相信，尼克松不愿意看到他亲自参加的会议给公众留下一个僵局的印象。

我们驻法国的大使迪克·沃森在十一月九日到白宫来看我，我请他在回巴黎时安排一下尼克松和蓬皮杜的会晤。蓬皮杜已经原则上表示同意了。这项计划，由于双方对于会晤地点的争议，几乎搁浅。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异常敏感。确实轮到尼克松应该拜访法国了，但是他不能只访问一个国家的首都。但是，遍访欧洲各国又会破坏分别进行谈判的设想。另一方面，蓬皮杜不愿接受我们关于选择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法属岛屿作为会晤地点的建议，因为这会使他不得不旅行一段不相称的距离，这个岛屿虽然是法国属地，但这样做总免不了被人认为同他登美国的门也差不了多少。我们双方最后都同意以葡萄牙的属地亚速尔群岛这个第三国

的地方作为会址。会晤将在十二月十三日举行。正如我预料到的，蓬皮杜坚持要我们在和他会晤之前不同任何别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商谈经济问题。这表明，他想解决问题了。他要求，把原定在十二月十五日举行的十个主要经济大国的财政部长会议提前开掉，以保证首先达成的协议是法美之间的双边协议。尼克松表示同意。于是十国财长会议按预定计划在十二月一日在罗马举行，没有重大收获。就这样，为在亚速尔群岛举行的决定性会晤铺平了道路。（同时还安排了和希思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在百慕大举行会晤，和勃兰特十二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在比斯坎岛举行会晤。）

我们动身前往亚速尔群岛的那一天，正是印巴危机到达顶点的时候。在途中，尼克松和我得知，艾尔·黑格正在会见中国人。我们料想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是否已经决定要帮助巴基斯坦，从而使事情发展到一场总体战争的边缘。即使在中国人的照会消除了我们作出军事上的决定的必要性之后，我们在亚速尔群岛的全部停留期间，仍然都全神贯注在制止印度向西巴基斯坦进行最后攻击的问题上。

我在亚速尔群岛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谈判货币问题上。这并不是我的专长。由于美国和法国的国内政治变化莫测，使我陷入了这个特殊的境地。在美国方面，作为一个高级官员，我是深信这场经济危机的政治代价正在达到谁也经受不起的程度，而且欧洲人是愿意以合理的条件来解决问题的。总统一旦参与其事，他就希望获得成功。而且，和他以往的态度一样，他把这种成就看成是人们把他当作主要角色的一种证明——当时他还认为我可以替他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而不是一个竞争者。而康纳利却并不想让人们认为他已经走向妥协。他很愿意进行谈判，但是他宁愿等到以后出现僵局时再讲话（他还起经常威胁着这场会晤的作用）。

至于法国人，蓬皮杜很想被人看作是解决问题的主要策划者。

他和财政部长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已内定为他的继承人——的关系并不融洽。蓬皮杜似乎决心要把他排除在谈判之外。(这就使康纳利无论如何也不能直接参加谈判。)但是,从实践上来看,这件事却给予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因为如果蓬皮杜坚持自己掌握谈判,他一定希望谈判会成功。

就这样,解决这场货币危机的谈判,就在这位首屈一指的财政专家和职业银行家的蓬皮杜和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之间进行了。即使在我极端妄自尊大的时刻,我也没有想到,我会由于对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作出贡献而被人铭记在心。我们一行人被安置在美国军事基地的营房里(除了总统是住在基地指挥官的一所小屋里以外);从那里,我乘直升飞机前往处在岛的另一端的蓬皮杜的优雅的别墅。只有沃尔特斯将军陪同我前去,他将充当翻译。蓬皮杜以常礼迎接了我,陪同他的有他的翻译康斯坦丁·安德罗尼科夫亲王。我们一起吃早餐,眺望着窗外绿草如茵,群山起伏。这里是葡萄牙在大西洋的前哨,当年,这个小小的国家雄心勃勃但又是贪得无厌地四出开拓海疆,这就是留下的陈迹之一。

实际上,我和蓬皮杜的谈判并不象我们在经济学水平上的差异可能意味着的那样一边倒。康纳利向我提供了他可以接受的一系列主张。我认为,如果进行一场技术性的谈判,就是自找失败。一旦我开始从我们的最高主张退却,按逻辑推论,我就不会止步,除非我们一直退却到最后的退却线上。我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利用我的无知作为资本,以不熟悉技术情况作为武器。如果我只提出一种主张,然后就拒绝讨价还价,就可以把它说成是——不带敌意地——外行不能和内行相较量。因此我决定利用第一次会议侦察地形。会后我和康纳利一起拟定一项主张,在第二天提出来。

为了弄清楚法国的真意,我以哲学和政治的语言向蓬皮杜提出这个问题。一项协议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欧洲国

家不能达成一项共同的立场，我们必须和一些欧洲国家达成这项协议。如果法国能带这个头，我们就再高兴不过了。我被委派为谈判代表，这件事本身就决定了我们要求的是和双方的自尊心和需要相符合的结果。这是唯一政治上行得通的结果。在建立新的国际货币制度过程中，谁也经受不起一场“胜利”，因为只有全体成员精诚合作，新的安排才能得以维持。我是来谈判的，不想把什么东西强加于人。如果蓬皮杜提出他最低限度的要求，对我是会有帮助的。我会尽我所能使尼克松在下午和蓬皮杜商谈这些要求时，作出谅解的反应。如果他们意见一致，我会在第二天早晨提出一项具体建议，如果他有意再次邀我共进早餐。

这个办法证明是有效的。蓬皮杜禁不住发表了一些尖刻但并非完全没有根据的议论。他认为我们的经济政策似乎更多地取决于我们的选举过程，而不是对世界问题的关切。他问我，如果他要求我们接受一些经济限制，因为这会对他获得某些选区的支持有帮助，我们会作出什么反应。但是他提出这一论点之后，接着就向我就货币情况作了一番精辟的剖析。从他的话里我领会到，蓬皮杜不会接受自由浮动制度。最后他会同意法郎略为升值——即使只是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但是为了保持法国的竞争地位，法郎升值的幅度必须小于马克。他不会反对美元贬值。美元贬值和欧洲货币升值的总差额大约为百分之九，法郎也按这一比例同马克保持一定距离。而且蓬皮杜坚持要我们维护这种新的比价。如果我们同意这样做，他愿意对我们脱离有限的金本位制加以默认。双方同意，上午他和尼克松的会谈将是回顾国际局势。下午商谈货币问题。

午间休息时，尼克松、康纳利和我研究了蓬皮杜的讲话。康纳利同意，在我和蓬皮杜再次共进早餐之前，他交给我一项关于确定新比价的建议。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很难判断，下午的会谈究竟有多大成功，因为尼克松并不打算在经济学方面青史留名。蓬皮杜重复他上午说过的话。他带有先见之明地强调指出，自由浮动制度会引起混乱。他愿意帮助确定新的比价，只要这些比价反映出经济力量的对比。不能说尼克松对会谈是完全熟悉的。他要的是解决问题，并不想商谈汇率。如果给他打一针说真心话的血清，毫无疑问，他会表明，他最不想管的就是在新的比价中各种货币的位置。而且，正如以往他参加谈判而不是仅仅交换意见时总是表现的那样，他神经紧张到焦虑不安的地步。他翻来复去作一些空泛的议论，有些是不着边际的话。但是，蓬皮杜已经能够从中领会到，对于上午谈过的问题，一般来说是意见一致的。最后的细节则由蓬皮杜和我在早餐时再去制定。

当晚康纳利和我拟定了向蓬皮杜提出的建议的最后文本。我对康纳利说，要我进行讨价还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是我最不擅长的事情。我宁愿提出一项介乎我们的最高要求和最低要求之间的主张，然后坚持下去。这一主张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因而是蓬皮杜在原则上能够接受的，同时也是符合我们的需要的。从康纳利的本性来说，他不愿接受这种谈判办法，但是他最后认为，对于一位不明世故的教授，他也只好这样办了。

早餐时，我把康纳利和我共同拟定的数字交给了蓬皮杜。这次会谈的非比寻常之处在于，法美两国居然为世界上所有的重要货币都拟定了汇率。实际上相当快地达成了协议，因为我们的建议认真地包括了蓬皮杜的合理要求。于是我们起草了一项文件，在下午双方财政部长首次参加的会议上由所有主要官员加以批准。这项协议促使一星期后在华盛顿举行了十国财政部长会议。所有其他国家也都表示同意。史密森氏学会协议*批准了新的币

* 由于这次会议是在史密森氏学会大厦举行的，故名。——译者

制安排。

经济危机结束了。至少在一九七四年之前，不再有危机存在。一九七四年，石油价格上涨五倍，使工业国家有必要对整个世界经济制度进行重新估价。这样做就必然会引起任何健全的管理结构遭到破坏时所引起的那种恐慌、混乱和焦虑的情绪。美国放弃了美元可以直接兑换黄金的规定，以便获得一整套更为现实可靠的汇率关系。但是这个制度不能持久。尽管有史密森氏学会协议的支持，美元的自由浮动已经势在必行。正如雷蒙德·阿伦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由于美元不能直接兑换为黄金，我们的伙伴们面临的选择是，或则无限制地积累美元，或则同意美元贬值，尽管对他们来说这将带来种种贸易上的不利之处①。我们在金融上是强大的；我们的伙伴们在贸易上却越来越强大。新制度必然会对美元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迟早会要求对世界经济制度进行甚至更带根本性的结构改革。

尼克松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采取的单方面决定，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盟国的内在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但没有破裂。在当时，我还难以判断，在秘密的北京之行所产生的冲击之后，紧接着就采取粗暴的单方面决定的做法，是否在许多年内不必要地损害我们与盟国的关系；或者是由于我们的盟国袖手旁观，而使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余地。

高级磋商：最后一轮谈判

一九七一年底之前，尼克松和我们最亲密的盟国的领导人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包括：法、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除货币问题外，没有作出重大决定。多数带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是我们从印度支那脱身之后，新方针的基础已经奠定了。只有在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克服欧洲的矛盾心理。他们怀疑美国的忠贞不渝，但又不愿在共同防御中承受更大的负担；要求缓和，但又害怕美苏共同统治世界；坚持要求就美国采取的世界性行动进行磋商，同时对美国的选择又表现为闹独立性，有时还持反对态度，来迎合国内的民意。

由于尼克松对于经济问题缺乏兴趣，在他和蓬皮杜在亚速尔群岛举行的会谈中，政治性会谈的确是这次会谈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他们对国际事务有着相当类似的看法。两人都深深怀疑苏联，但又深信有必要表明共处的愿望，因为这是争取国内公众支持一项坚强的对外政策所必不可少的。两人都寻求安全，但靠的不是空喊善意，而是加强防御和国际均势，中国在这种均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他们也存在分歧，因为蓬皮杜象戴高乐那样预感到，不论尼克松如何擅于搞外交，美国的国内力量迟早会促使它退出欧洲。因此，他主张建立最终要由欧洲共同防御来支持的欧洲政治联盟，这是美国至少从五十年代以来就表示冷淡的一种想法。蓬皮杜认为，在我们的核遏制战略和欧洲安全的要求之间，有一种潜在的矛盾。他说，“我们要求的是保护，而不是事后复仇。复仇只能给九泉之下的我们一点小小的安慰。”蓬皮杜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和尼克松初次见面时，曾经劝尼克松和苏联和解。现在他的劝告已被采纳，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已经确定，蓬皮杜于是也染上了戴高乐对美苏共同统治世界的那种长期存在的厌恶情绪。而且他非常担心德意志民族主义最终将响应来自东方的汽笛声。他认为解决这种困境的最好办法无过于召开一次欧洲安全会议。他认为会议会使那些想单独干的人却步。但是，总的说来，蓬皮杜的思想是理智上的探讨，寻找理由把盟国的义务和法兰西的独立二者结合起来。这二者的结合在美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事实上，正是这

种结合使法国能够在整个第五共和国期间执行一项严肃而负责的对外政策。

对于这些一般性的回顾局势，尼克松是个里手。他对全面关系了如指掌，而且可以精确地说明我们的立场，往往滔滔不绝。尼克松对于蓬皮杜对欧洲情况的分析，并无不同意见。他最初有些犹豫，但后来就赞同促进欧洲联合。但是，他反对以美国撤军的前景作为欧洲联合的依据；他担心这种前景会成为一种不幸而言中的预言。他集中谈了对苏关系和打开对华关系的问题。他表示了他自己对长期纠缠不清的*东方政策*的担心。他保证，他的莫斯科之行和北京之行不会引起人们感情上的错觉。他解释了我们在印巴危机中的政策；蓬皮杜表示同意我们的分析。但是他也毫不怀疑，由于我们作出困难的决定，法国倒有一些可以看风使舵的余地。由于我们将保护均势，法国就将倒向印度这个更为强大、人口更多的国家。

蓬皮杜的反应反映出欧洲基本的矛盾心理。在局势紧张的时候，欧洲人主张缓和；到了局势缓和的时候，他们又害怕共同统治。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他们仰仗我们维持欧洲以外地区的均势，而在我们承担风险的掩盖下，他们毫不犹豫地为自己谋取特殊利益。这种态度对我们的欧洲政策同时起着推动和制约的作用。它推动我们和盟国交换意见，达到空前的程度，但是最后又使我们面临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尤其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作出最后决定的必要性。而且它还进一步推动我们形成自己对缓和问题的战略。如果没有这种战略，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就会自己去和莫斯科拉关系，并装出一副牵制所谓的美国的好战行动的样子，以争取自己国内左派的支持，尽管他们心里是欢迎这种行动的。如果我们对东方集团有自己的选择余地，这些倾向就会受到约束，因为我们的盟国会担心，如果逼人太甚，我们可能在一场和莫斯科拉关系的比赛中把

他们甩在后面。

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和希思会谈的情况也差不多，但是希思比较熟悉美国人的思想方法，在谈论长期的发展趋势时，没有象蓬皮杜说得那样明确。尼克松向他解释说，我们把北大西洋联盟放在比东西方关系更为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希思对于这一说法比蓬皮杜容易接受。希思谈论了他最喜欢的主题，欧洲联合问题。他向总统保证，这种联合是“竞争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它将采取一种有趣的，但并不是完全令人放心的模式；这种模式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美英的天然合作关系，而在六十年代提出“两大支柱”主张的美国的大西洋主义者和希思以前的所有英国领导人都认为这种合作是理所当然的。希思并说明了他对实现大西洋合作的最有效程序的设想。首先应该举行一次欧洲国家首脑会议或外长会议，以拟定一项共同的政策。然后会作出努力和我们进行配合——这是对以伦敦和华盛顿举行事先磋商为基础的旧有“特殊关系”的又一重大修改。希思谈到欧洲防务问题时，口气比蓬皮杜热情一些。从希思身上，我们见到了戴高乐的比较温和的英国化身这样一种奇怪现象。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希思的观点和我们是并行不悖的。他和我们一样，对欧洲安全会议持怀疑态度。他有点相信蓬皮杜的看法，认为这一会议可能加强东欧国家的独立地位。但是他也赞同我的观点，认为很难解释苏联人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推动召开这一会议。希思主要关心的是，不介入法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他以需要等到德国的东方条约得到批准之后才能考虑这一问题为借口，建议我们把问题推迟到一九七三年考虑。

回顾世界局势时，气氛是热烈而融洽的。英国对印度次大陆的历史性关系是如此深厚，以致于希思不能支持我们比较冷静的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对局势的估价。两位领导人谈论了所有西方国

家共同面临的也许是最深刻的哲理性问题。问题是希思提出的：“我们越来越面临一种不再能够采取有效行动的世界局势。你们能够做的事还有多少?”这个问题引起尼克松的一篇比较有说服力的讲话，我们在上一章里已经引用了其中的一段：

我们从越南撤军之所以动作迟缓，其部分原因在于要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即：我们不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来结束战争。现在我们必须问问自己，为了避免战争，我们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如果我们不愿意，今后的日子就难过了。……华盛顿的传统势力有一种内疚感。他们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即让我这个政治上的对手来纠正他们过去犯下的错误。此外，传统势力越来越被国内问题所困扰。知识界的传统势力由于他们自己所起的作用以及美国所起的作用而感到思想混乱和沮丧。他们从来就不认为左派分子会造成什么真正的危险。他们正在趋于内向。他们提出了问题，即：我们是否将继续参与世界事务。这篇冗长的讲话要说明的问题是：我懂得这个问题；我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在世界上起我们的作用。日复一日，你在每天早晨醒来时会感到奇怪，我们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们有必要采取主动，为我们的人民带来希望。一个政治领袖必须经常带来希望——但是他必须经常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要丢掉幻想。

尼克松后来交了恶运，但不能抹杀这段讲话的重要性。他是正确的；他对美国和对大西洋各国的问题的剖析是正确的。

最后一位客人是维利·勃兰特。同其他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在他说来，没有什么突出的问题。但是，勃兰特同其他领导人不同，他并不声称自己在世界事务中起什么作用；他为避免起这种作用而感到自豪。因此，要讨论的问题就比较少了。商谈了纯粹的德国问题。东方条约和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当时都正等待德国议会的批准。勃兰特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到比斯坎岛拜访了尼克松，当时我患流行性感冒卧床不起，未能参加会

谈。尼克松并没有为此而打破他的常规，仍只由一名白宫助理陪同他会客（这次黑格代替了我）。罗杰斯和德国外长瓦尔特·谢尔单独举行会谈。

会谈的主题是东西方关系。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勃兰特是研究苏联领导人的首屈一指的专家。他见过他们的次数比谁都多。我们的高级官员中，谁也没有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或波德戈尔内打过交道——除了尼克松和波德戈尔内在参加戴高乐葬礼之后在爱丽舍宫的招待会上有过一次简短的会面以外。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对我们简直是一个谜。勃兰特对于勃列日涅夫的看法总的说来是积极的。据勃兰特说，勃列日涅夫最初对于对外政策是不熟悉的，但是在过去一年里，有了很大的信心。他不再是只照本宣科了。勃兰特认为，苏联人真心希望缓和，其部分原因是他们对中国感到担心。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他的东方政策表示满意。尼克松冷冰冰地纠正他说，北大西洋联盟对这项政策没有表示反对。但是联邦共和国必须既作出决定又承担责任。勃兰特提出，苏联人对于把关于德国问题的条约和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联系起来感到不满。黑格的印象是，勃兰特自己对于这种联系也不太热心，他担心会出现"反联系"——苏联会对通向柏林的通道施加压力，以加速批准的过程。但是，由于德国的政治局势，勃兰特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上述情况。波恩议会如果看不到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顺利实施，肯定不会批准那些条约。对于美国来说，勃兰特所说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带来任何好处的。由于这种情况，我们有了一根可以迫使苏联克制自己行动的杠杆，尤其是如果我们不得不对一场越南的攻势作出反应的话。在德国议会投票表决之前，苏联人是不想发生一场世界性危机的。

尼克松就他将在到北京和莫斯科去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中采取的方针作了一番事先说明，也都是一些人所熟知的内容。勃兰特

认为，不应该把东西方贸易同政治谈判联系起来。他认为，贸易是使苏联制度发生渐变的一种办法。他也要求举行一次欧洲安全会议。他引用了标准的欧洲论点，即：正是东欧的那些最富于独立性的国家要求举行这次会议，作为支持他们自治的一种办法。至于苏联人为什么要求举行一次会削弱他们对卫星国控制的会议，勃兰特未能比蓬皮杜作出更有力的说明。

尼克松和我一样，持比较怀疑的态度。他提醒说，如果举行一次欧洲安全会议，就会为国会中的批评家们提供一个削减兵员的借口。他要求所有的盟国都要谨慎从事。尼克松和勃兰特都提到，经过五月间的短暂的波动之后，苏联人对于共同均衡裁军的念头已经淡薄下来了。勃兰特强调指出，他对于加强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感到关切。这是一次成功的会晤，尽管并不打算取得成果，但也还是成功的。在一九七〇年末和一九七一年初，在欧洲和美国的领导人之间举行了这些一般性的而且主要是哲理性的商谈，这反映了尼克松政府的这几年，正是我国同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关系的多事之秋。联邦共和国的东方政策即将大功告成。我们对这种政策的支持，有助于使它走上同大西洋联合以及西方团结相一致的方向。由于英国即将进入共同市场而产生的经济调整，在一段时期里造成了紧张。但是，一项新的货币制度终于诞生，而且是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至少在最后阶段是如此——议定的，因此，每一个主要的国家都感到维护这项制度和它自己休戚相关。尽管在国会遭到猛烈抨击，我们还是维持住了西方联盟的军事力量。

要做的事还很多。一段缓和的时期显然正在临近。我们的联盟是否能够把形式和实质区分开来，紧张局势一时的缓和，是否会使我们放松维护均势的努力，或者是为加强团结和新的创造性提供一种刺激因素，尚在未知之数。我们希望，在越南战争已经成为

过去之后，可以在和大西洋各国的关系中注入新的领导力量，因为这种关系会——而且必须——继续充当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

① 雷蒙德·阿伦：《特等共和国：美国和世界，一九四五——一九七三》（剑桥，马萨诸塞州：温思罗普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第二九三——二九五页。

第二十三章

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的
越南战争：逼河内就范

我们对外政策的构思，经过月复一月的努力已逐渐形成。其内容有：北大西洋联盟内部的关系；打开对中国的关系；以及从而使莫斯科对于认真的谈判持比较合乎情理的态度。但是，越南战争是我们的一场恶梦，它随时可能使我们的一切抱负化为泡影。如果我们按照河内可以接受的条件结束战争，就会使我们在国外的其他一切事业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把战争继续打下去，一直打到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这样，国内就会有四分五裂的危险，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因此，我们的航向是介乎两种相互对立的需要之间。我们既需要给予我国公民以希望，使他们感到战争会有个尽头；同时我们又需要让河内面临足够的风险，以迫使他们接受一种和我们的国际义务和国家荣誉相符合的解决办法。

到了一九七〇年夏天，我们国内关于越南问题的论战双方，都由于柬埔寨问题造成的创伤而感到筋疲力尽。政府想削弱河内的进攻能力，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造成了心理上的衰竭状态，即：那年夏天，行政部门关于越南问题的整个构思都贯穿着一种担心，怕又会引起一场示威行动；尼克松装着泰然自若的样子，但是连他也在担心。因此，由于人们感到厌倦，就暂时停止了行动；而大家如果取得一致意见，倒很难做到这一点。此外，苏伊士运河、西恩富戈斯、约旦和智利的危机也拖住了政府的一部分精力，并使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世界的其他地区。

在一件事情上我们交了好运。我曾经建议，任命布鲁斯为巴黎谈判的大使，尼克松也深表赞同。布鲁斯当时立即接受了这一任命。到了一九七〇年夏天，当我们再度在国内陷入越南问题的困境时，布鲁斯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他要求花两个月的时间研究越南问题，然后提出建议。他不想给人以接到新指示的印象。只有当河内认识到，单凭坚持它的主张已不能取得新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它才会老实一点。

这起了镇静作用，因为在柬埔寨问题上引起一阵混乱之后，尼克松的情绪波动得很厉害。七月四日，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会见布鲁斯和菲尔·哈比卜这个巴黎谈判班子的时候，他谈话的口气是坚定的。尽管要担政治风险，他还是会坚持到底。他并不认为战争降级或单方面撤军会打动北越人；我们每撤一次军，河内就变得更加强硬。如果谈判失败，尼克松就会把克制的想法置诸脑后，恢复大规模轰炸。但是一周之后，在七月十一日，他私下对我发牢骚说，战争使他在国内失去支持，因此必须在一九七二年以前结束战争；如果他的政敌中任何一个人可望当选为总统，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会受到损害。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把全面轰炸和完全撤军结合起来。但是，到了七月二十二日，他在白宫和布鲁斯、埃尔斯沃思·邦克和我共进早餐，这时他对我们的持久力抱有更为乐观的估计：

我完全相信，我们结束这场战争的方式将会决定未来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果我们结束得好，我们就能够维持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地位。美国人民赞成和反对的各占一半。传统势力反对我。但是即使全国只有我一个人要这样做，我也要干到底。我们做任何事，其结果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我上任时就没有得到过所有今天反对我的人的支持，而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能再次当选。

但是，到了八月十日，参议员哈里·伯德和戈登·艾洛特劝说尼克松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这次谈话又使尼克松心绪不宁。他对我说："在我们现在需要左派支持的问题上，左派是支持我们的。他们现在还在争取的只是撤军，那是他们的问题。但是当右派开始要求撤军的时候，不论由于什么原因，那是我们的问题了。"因此，他想封锁北方，恢复轰炸，同时撤出我们的全部军队，从而把事情推进到一个紧要关头。我提醒说，我们在柬埔寨为了维持一次纵横二十英里长达八个星期的军事行动，就遇到那样大的麻烦；有鉴于此，除非发生受到全面挑衅的情况，否则我们是不能坚持这样一种方针的。而且撤军会被认为是和我们的军事行动恰恰相反的信号。尼克松的部署很可能使西贡在北方的大屠杀中崩溃。尼克松没有再说下去。

在整个夏天，从我们收到的研究报告可以断定，路经柬埔寨的北越供应系统已被破坏，而且以柬埔寨为根据地的敌军已被严重削弱。更重要的是，在越南南半部——所谓第三、第四军区——的北越军队，现在已不得不放弃在南越展开攻势的打算，而被用来保护新根据地和训练柬埔寨游击队；他们的进攻能力被严重破坏，要恢复至少需要一年。盟军的伤亡相应地减少。在我们对柬埔寨采取行动之前的一年里，阵亡美军的人数在七千人以上。采取行动以后的一年里，减少到二千五百人以下。以后的一年里，又减少到五百人以下。

但是，政治问题依然存在。河内并没有被削弱到绝望的程度，它继续要求单方面撤退所有美军和推翻西贡政府。毫无妥协的意思。向我们提出的条件无非是无条件投降，出卖那些指望我们帮助的千百万人民，使他们置身共产党统治之下。国内反对我们的人嘲弄我们关于体面的含义，但是他们主张确定无条件撤军的日期，却是一种既无济于事又丢失体面的行动。到了八月底，参议院

进行关于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的辩论，该修正案规定美国撤军的期限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允许总统在紧急状况下延长期限六十天。这一设想得到许多报纸社论的支持。《华盛顿邮报》说，它会“结束这场骗局。”①《圣路易邮报》认为，我们反对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是“撕去伪装”，暴露出我们的目标在于军事胜利（它已成为不名誉的词）。但是一旦以立法形式规定了最后的撤军期限，那么已经很小的谈判余地就会消失，我们连争取释放战俘的讨价还价能力也会丧失，因为除了推翻一个友好的政府和把千百万人民置于粗暴的独裁统治之下外，实际上我们已经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向对方让步了。为了体面地结束战争，我们需要使敌人看到我们的意图有一种捉摸不定的伸缩幅度，但是国内反对我们的人却一个劲儿地要消除这个幅度。

如果公众相信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而敌人又对我们的策略捉摸不定，我们讨价还价的地位是很理想的，但由于国内意见分歧，事态的发展恰恰相反。在国内，我们的信誉总是欠佳，而我们的对手对于我们正在被推向什么方向却了如指掌。而且，一旦我们接受了固定的撤军日期，如果再想回过头来要求国会批准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声称可以得到的延长期限，也不会是一件像人家说得那么简单的事。确立这个期限的那股力量肯定会竭力维护它。而且问题的焦点不会表现得很明确。修正案得到通过，就可能足以导致南越人心涣散，军队瓦解。泰国和老挝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将设法作出适应新形势的调整，泰国可能会关闭我们在越南进行空战所必不可少的基地，老挝的梭发那·富马几乎肯定会要求我们停止轰炸胡志明小道。任何一个负责的政府都不可能仅仅由于希望使批评它的人放心而接受这些风险，后来的情况表明，其中大部分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事实上，我们后来还是设法在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规定的期限内撤出绝大部分美

军，而且在十五个月之后撤出了剩下的军队。我们留下足够的兵力以抵挡北越在一九七二年展开的攻势。但是我们是在没有抛弃盟友的情况下撤退的，而且如果我们在一九七〇年九月就为自己规定一个无法照办的公开宣布的日期，情况就会很不一样。

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在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以五十五票对三十九票遭到否决。从形式上看，政府获胜了。但是，这三十九名参议员不顾政府对他们发出警告，提醒他们这是在通过一项会造成溃败局面的法案，但他们却仍然设法为和平谈判划定框框，这对采取一项有连贯性的战略所需的心理基础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尽管修正案后来遭到否决，但事情并未了结，它会月复一月地卷土重来，而且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这生动地向河内表明，我们的地位正在遭到削弱，因此，北越对认真进行谈判的兴趣减少了。而且，北越对谈判不热心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撤军的速度太快，以致于使越南化给人以轻信敌人的感觉；撤军的结果使我们失去了讨价还价的一支杠杆。我们本来可以提出加速撤军，以换取对方同意由人民进行真正自由的政治选择，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杠杆。

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难以让北越人接受自由选择的概念，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没有可以遵循的经验。他们是靠枪杆子夺取政权的；又靠斗争扩大其势力。他们是虔诚的马列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代表人民“真正意愿”的好战的上层人士具有政治上的正统性；而持不同政见者必须受到再教育或者被消灭掉。越南的历史也提供不了帮助。过去的统治者都是秉承天命来治理国家的，而且成功地保持住统治的地位。我们提出过成立公正的选举委员会和进行自由投票的办法，但都被河内轻蔑地拒绝了；西贡为了迁就一个有钱的施主，才勉强接受了这个自由投票的办法，因为要生存必须仰仗施主的支持，虽然施主的天真成性却经常招来横

祸。根据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越南历史，人们怎么能够设想，共产党斗争的目标只不过是要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或者设想，有哪个越南人居然会接受这个联合政府；这只有留给研究群众心理学的人来回答了。

我在七月二十日写信给尼克松，再次提醒他，依靠越南化的战略和依靠谈判的战略是不能永远并行不悖的。每一次单方面撤军都会削弱我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如果在不致于威胁西贡生存的限度内，我们已经以最快的速度撤军，那么，再要加快的幅度就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河内。这条路再走下去，也许到了一九七一年中，我们可能不得不在越南化和谈判二者之间进行选择。一九七〇年七、八月间，正是主要为了想找到一些尚未发现的可能办法，以打破僵局，政府的考虑集中表现为就地停火的想法。赛勒斯·万斯在不当巴黎谈判代表之后②、艾夫里尔·哈里曼、《纽约时报》③和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以前就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这一妥协性建议得人心的地方在于，双方都放弃了取得军事胜利的打算。在一九六九年，对于那些还不愿意鼓吹美国投降或规定撤退期限的温和反战人士来说，就地停火已经成为一种最受欢迎的模式。许多高级官员，出于各种动机，同意他们的看法。国防部有些官员主张停火，为的是缓和一下预算方面的压力和抽出经费来购置军火。国务院也要求采纳这一建议，部分是由于想讨好国会和新闻界，部分是由于本能地希望不断以新的建议来推动谈判。对所有这些想法，尼克松一般是不屑一顾的。总统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发表演说之后的第二天，曾写信给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具体批驳了各种停火的倡议。但是，罗杰斯在十一月八日还是要求，作为争取鸽派的手段，我们支持曼斯菲尔德提出的关于在越南实现停火的提案。国务院在十一月十日正式向白宫提出备忘录，建议提出一项停火的倡议。

不幸的是，存在着两重较大的障碍。北越人对于任何停火都没有表示过兴趣。在一九六九年，南越政府、我们的军事指挥官以及我们在西贡的大使馆都深信，就地停火会加速南越的军事崩溃。越南问题特别研究小组研究了停火对每个省的影响。小组的结论倾向于肯定西贡方面的判断。

但是，我们对这个想法仍不放手。我们根据的理论是，如果在原则上接受停火建议，我们就应坚持下列条件，即应给南越人以应有的生存机会。我在一九七〇年二、三月间，向黎德寿建议在老挝和柬埔寨停火；我把这项建议包括在我们准备讨论的越南问题的内容之内。

但是黎德寿拒绝进行这种谈判。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之前，他总是以鄙视的态度教训我说，不先实现政治解决，停火是不可能的。而且他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无异是赤裸裸的共产党接管。我不明白，河内之所以不屑于停火是因为它认为农村对它比我们更为有利，还是因为它害怕我们会在停火后把军队留在越南，还是因为马列主义的教条使它不信任任何关于均势的概念。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河内对于尼克松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演说中提出的建议置若罔闻，而且对于在十一月三日再次提出这项建议仍不理睬（这两次建议采用的形式都是要求局部停火，但其含义是不言自明的）。

我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下令进行一次专门的研究，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以便供六、七月间举行的各政府机构联席会议讨论，其间，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在七月二十一日举行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要求军队重新集结或撤退的停火方案是会遭到河内拒绝的。他们可能接受的唯一方案是就地停火。我们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获得成功，使现在就地停火的风险不算太大；北越人已经重新集结了军队，把军队撤到离边境较近的地方，以保护柬埔寨共产

党的训练基地。但是，我们的研究报告预测，如果就地停火，西贡对居民的控制至少会削弱百分之六。

但是，在这一年夏天，在国内形成了一种一致的看法，主张提出就地停火的建议；这表明我们在国内的处境就好像是在走钢丝一样。在政府内部，各种意见依然如故，除了尼克松已经逐步认识到，当我们在柬埔寨采取行动而在国内造成创伤之后，有必要提出某种和平建议。在政府之外，这种看法也日益得势。就在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遭到否决的那一天，《华盛顿邮报》称之为"鹰派和鸽派的不寻常的代表人物"的十四名两党参议员④，写信给尼克松，要求他在巴黎和谈中努力实现"在国际监督下在全越南就地停火"。到了九月十八日，又有十六名参议员参加进来。同时，克拉克·克尔的争取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全国委员会站在最前列，鼓吹这一建议。政府中持各种观点的人都暂时联合在这个共同的想法之中；有一些人认为，虽然这个建议几乎肯定会遭到拒绝，但仍应提出，以堵住批评政府的那些人的嘴；另有一些人认为，这是打开了一个缺口，是为一些他们还不愿明说的更为彻底的建议开路的；还有一些人则真正认为，提出停火建议会打破谈判僵局。

连阮文绍也持合作的态度，而且就像他每次遇到一些无法避免的事情时所采用的策略那样，他干脆主动建议这样做。阮文绍对于美国国内厌战情绪的增长深有体会，他的处境进退维谷，人们要求他接管人数不断减少的美军的防务，主动提出和日夜宣称决心要把他消灭掉的那些对手分享权力，而且还要实施政治改革。这些任务即使只完成其中的一项，就连稳定的社会结构也会受到考验；何况他的国家正处在内战之中，而且驻有数十万外国军队，要全部完成这些任务是不可能的。他能干到这个地步应归功于他的才干。阮文绍深知，他是反战人士的攻击目标，他们诋毁他是和平的真正障碍；而且他也知道，只有国破身亡才能平息这些攻击。和所有越

南人一样，他不能理解，权力怎么可能分享。他懂得他需要的是时间，而且即使一切顺利，结果也只是个平局。为了换取时间，阮文绍向他古怪的盟国作出了他认为损害最轻的让步；这个盟国试图以单方面削弱自己的地位诱使一个死敌表示出灵活性。因此，他对我们的建议持合作态度，部分地由于他认为这场赌博值得一试，还由于他猜测河内会拒绝接受停火，还由于他可以借此从不断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压力下松一口气。

因此，八月间，在布鲁斯站稳脚跟之后，尼克松决定建议停火。他定下的最后期限是夏末。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定具有深远的长期影响。提出的就地停火只是临时性的。一旦得以实现，接着就要举行结束战争的外交会议，我们可能在会上继续提出要求北越撤军。如果北越拒绝撤军，我们也可以在南越保持一支留守的部队。但是谁也不会真的相信这种可能性。现在战争还在进行，国会要求我们单方面撤军的压力却在增加。在这种气氛下，不论河内对它的军队采取什么措施，国会是不会允许我们在已经实现停火的情况下在印度支那维持驻军的。因此，在一九七○年决定建议就地停火，这就意味着一九七二年达成的解决办法将含有什么意思。就地停火的建议中就含有北越军队会在南方留下去的意思。如果我们没有能力以武力把他们赶跑，也同样不能通过谈判做到这一点。但是，就在我们提出正式建议之前，北越人又在讲话了。

阮氏萍女士的八点纲领

随着柬埔寨行动的结束，我在七月五日通过沃尔特斯向北越人递交了一封信，建议在七月二十五日以后的任何一个周末和黎德寿会晤。河内一如既往，一直到六个星期之后的八月十八日才作出答复，建议在八月二十九日和春水会晤。这次我们没有表现

得像二月间那样迫切。会晤终于在九月七日举行了，这正是我们否决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的一个星期之后。

我秘密飞往巴黎，走的是现在已经走熟了的那条航线。我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降落在法国中部布尔日附近的阿沃尔军事基地。这次我的主要助手是温斯顿·洛德，他参加了所有的会晤，而且负责为我进行准备；还有我的工作班子里的越南问题专家迪克·斯迈泽。我们一行乘法国总统的喷气式座机，前往维利亚库布雷机场，沃尔特斯将军在那里迎接我们。我们在他的公寓里住了一夜；他向他的女仆介绍我是基尔希曼将军（我的同事也都各有化名）。然后我们前往巴黎市郊舒瓦齐勒罗瓦区达迪路十一号的一所熟悉的小楼，去会见我们的越南对话者。

春水迎了上来，他的菩萨般的面孔满带着笑容，后面跟着一些熟悉的人物。有梅文蒲，他是北越驻巴黎的总代表；其他两名助手；还有一名译员，三年来他以同样的声调和在完全相同的句子上加重语气，发表着同样的标准化的演说，已变得异常纯熟，岂不知他这样做的结果却快把我气昏了。

我曾告诉过尼克松，由于我们在柬埔寨采取行动的结果，我料想这第一次会晤，除了谩骂以外，什么内容也不会有；由于春水是我的对手，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如果河内想认真地谈判，就会派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出场。但是，会晤时并没有谩骂，几乎没有提到柬埔寨，后来我居然能够向尼克松报告说，“这类会议——包括和越南人举行的一切会议——以此次会晤的气氛最为友好。”他们似乎放弃了规定在六个月之内撤军的时间表的要求（后来证实这是一种幻想）。他们一再表示愿意继续举行会晤。春水甚至允许我说明我们提出的关于成立混合选举委员会以监督选举的建议。在举行关于越南问题谈判的这个遥远的地方，来自河内的谈判代表居然聆听我们的建议，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进展；我于是得出

一种天真的结论，认为春水可能会考虑我们的建议。

但是实际上情况没有什么变化。春水的讲话，以及他所得到的指令都仍是老一套。这个阶段的谈判是时断时续的，因此每一系列谈判的首次会晤总是极其友好的。（后来当河内到了认真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却使用了相反的手法；开始时的立场总是强硬的。）北越谈判代表企图以此为诱饵，诱使我们把所有可能作出的让步都端到桌面上来。下一轮会谈开始时，这些让步就又成为新的起点。

我的开场演说事先经过仔细推敲，但犯了所有谈判代表的通病，总是误认为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打破僵局。我用以前向尼克松提出我的看法时大体相同的言词，告诉春水，我们正在接近一个三岔路口：

我再一次请求你们和我们一起走谈判的道路。这是符合双方的自尊心和目标的。我们认识到你们的猜疑很深，但是猜疑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因此斗争将继续下去。这就是战争的本性。

我们如果再不抓紧时间，谈判解决的可能性即将消失。错过这个时机，你们实际上就非得大动干戈不可了。我不想预测，你们对于得到我们支持而且自身的力量也得到加强的南越大动干戈，会有什么结果。我也不想预测，战争会打多久。但是，你们必须认识到，这样做会使同美国谈判解决成为越来越困难。

因此，现在时间还来得及，让我们走向谈判解决吧！

然后我说明，我们的立场有了两点变化；其中有一点是重要的，另一点只是装饰门面。我们的重大让步是，明确表示美军将在战后全部撤退，不留下留守部队、基地或顾问。为了装饰门面，我把我们在私下谈判中表明的立场同我们向公众表明的立场统一起来。四月间，我曾向黎德寿提出过一个在十六个月之内撤军的时

间表。由于我们已经向公众表明，我们建议在一年之内撤军，我现在提交春水一个十二个月的时间表。（我们仍然是在共同撤军的前提下谈论这个问题的。）我建议举行自由选举，由西贡、共产党和中间人士代表组成的混合选举委员会进行监督。我们并不想事先内定选举的结果。我说："我们无意干预由我们在这里一致同意的办法所造成的政治演变。"国际观察员也将起保证作用。

这些建议说来也有些荒唐。国内要求单方面撤军的压力每月都在增加，我们却在这里要求北越人最好现在同意共同撤军，免得以后我们以单方面撤军来逼迫他们。而且我们是在设法劝说一个极其教条主义的列宁主义政权把一辈子斗争的成败系于一场自由选举的结果，这个政权在自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冒过这种风险。

无论如何，春水无权对河内的立场作那怕是很小的改变。而且他对我的外交词令也不感兴趣。他在谈到他们要求美军在六个月限期内撤退时言语有些晦涩。十天之后我们了解到，这只是由于河内很快就要公布一项新的建议。春水没有花多少时间谈论撤军问题；凡是了解我们国会辩论情况和我国新闻界反应的人，谁也不会怀疑，要求单方面撤军的压力正在有增无已。他不同意我们任命戴维·布鲁斯为首席谈判代表，尽管在二、三月间，黎德寿在每次会议上都申斥我们没有任命一位声望不相上下的人士来代替亨利·卡伯特·洛奇。现在春水却说，任命布鲁斯为首席谈判代表无非是结束了我们本来就不该造成的局面而已。这并不说明体现了对等的原则。

春水最感兴趣的是河内希望在南越实现的政治结构。尽管河内很希望我们快点离开越南，它却给我们指定了一项最后的光荣任务。我们在推翻所有曾经是我们盟友的领导人之前，不得离开越南。这些人包括：阮文绍总统、阮高其副总统和陈善谦总理，而且不久还似乎包括了几乎所有知名的南越领导人。春水说，如果

我们不推翻这个政府，“就不能达成协议”。春水无视过去和目前的经验，告诉我说，“越南人爱越南人。在越南人自己内部寻求解决办法总是要来得容易些。”春水竭力否认北越在南方驻有将近二十万军队（此外在老挝和柬埔寨还有大量驻军），是为了施加压力；他说，北越在那里驻军是由于当地人民的自由选择。我开玩笑说，请他在战后到哈佛大学去开设马列主义讲座；他拒绝了，并说马列主义是不能输出的。这一点在今天印度支那的居民听来真是一件奇闻。这些话当中最精彩的要算是那些一再重复的豪言壮语：“我们什么都不怕。不怕威胁。不怕打下去。不怕谈下去。我们什么都不怕。”会议结束时，我们同意研究双方的发言，并在九月二十七日再次举行会议。

但是，还没有等到下一次会议，共产党人就发表了一项新的和平纲领。在这次秘密会议之后十天，九月十七日，阮氏萍女士在巴黎公布一项新的八点“和平纲领”。春水事先没有给我打招呼，这很难算是河内谈判代表常说的“态度认真”的一种表现。显然，河内对宣传比对谈判更有兴趣。（在形式上，所有的建议都是由临时革命政府的所谓外交部长阮氏萍女士提出的。在河内占领南方之后，她被贬入教育部，并从此默默无闻，这说明了她真实的地位。）她的八点纲领要求美军在九个月之内，也就是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前，全部无条件地撤退。这好像是一种宽宏大量，是把河内原先要求撤军的六个月期限延长了。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倒退。原先的建议是在协议签订后的六个月，而阮女士的新纲领规定的九个月是从即日算起的，不论今后谈判出现什么情况，都得按时完成撤退美军的工作。一旦我们接受，即使河内把所有别的问题都弄僵了，我们仍不得不坚决执行这一期限。而且无条件撤退仅仅是一部书的上篇，下篇紧接着就是要我们在西贡成立临时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由三部分人组成：共产党的临时革命政府；主张“和

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中立人士；以及除阮文绍、阮高其和陈善谦以外的“真正主张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政府成员。至于谁是这些崇高目标的化身，当然要由河内来决定。换言之，河内提出的联合政府将包括河内自己的人；经挑选出来的中立人士；加上失去美国军事上的支持、从群龙无首的非共产党力量中挑选出来的残余分子。但是河内的职业革命家不想留下后患。阮女士说，这个完全是拼凑起来的联合政府，还只是“临时性的”；它的任务是和共产党的临时革命政府谈判一项最后的解决办法。我们先把自己的盟友推翻掉，然后由共产党占优势的政府去同共产党人谈判，决定南越的前途。

这就是河内演出的公正谈判一剧的结局。国内批评我们的人攻击我们没有接受河内的这幅蓝图是一种顽固的寸步不让的表现，只能归咎于我们嗜血成性，一味追求军事上的胜利。作为报答，河内同意不是释放我们的被俘人员，而是仅仅“立即着手讨论”这一问题，而在讨论过程中，他们肯定还会想出一些新的要求来。只有在我们同意所有其他条件之后，包括出卖我们的盟友，才会实现停火。

在这种气氛中，我和春水于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举行了会晤。由于总统正巧在那一天动身去罗马，我于是在前一天公开到达巴黎，同戴维·布鲁斯进行磋商，并同当时正在巴黎的南越副总统阮高其举行会谈。阮高其曾表示可能在十月间访问美国，这使华盛顿一下子慌了手脚。许多共和党众议员候选人，包括在一般情况下投票支持政府的人，都认为这位来自美国已经在那里牺牲了四万多人的国家的副总统访问美国，简直是大难临头，这表明了当时人们的情绪。为了打消阮高其的想法，我们做了不少细致的跑腿的工作，而且提出一种替代的办法，由我在巴黎会见他。罗杰斯连这样做也反对，认为可能激起抗议者的愤怒。

我这次是公开到巴黎去的，这造成了一种新的事务性难题，因为我必须设法暂时销声匿迹一个时期，虽然外界已经知道我到了巴黎。和蔼可亲的迪克·沃森大使这时挺身而出，他表面上陪我驱车到市郊游览，等我们到了市区的边缘，我换乘另一辆车子，由沃尔特斯将军陪同我、洛德和斯迈泽到举行会晤的地点去。

由于上次会晤是我开的场，这次就轮到春水了。他的讲话证实，他确实研究了我们的以十二个月为期限的撤军时间表。他现在提出自己的时间表，它实际上就是阮女士的九个月的期限，而且对撤军作了具体安排，规定在头六个月内把剩余的大约三十五万美军，除留下两万人外，全部撤完。他的最后期限也是硬性规定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即使在遗留的问题上，谈判完全陷于僵局，也得照办。春水对八点纲领略加解释。在美军撤退时，在美国和共产党军队之间实行"停火"；至于和南越军队的战斗是否会停下来，春水的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的盟友在挨打，另一方面却要求我们撤军。关于政府问题的那一点建议，并不适用于老挝和柬埔寨。至于政治问题，春水拒绝讨论混合选举委员会的问题。他坚持要撤掉阮文绍、阮高其和陈善谦。为了表示坚决，他这次还把曾当过总理的陈文香也包括在撤换之列。一年之后，我发现没有一个我所知道的政界人士是我们顽固的对手能够接受的。

在春水的讲话中，唯一的新鲜内容是，他颇为不祥地声称，要实现有效的和平，就要在比南越更为广泛的格局之内寻求解决办法。所有的邻国都必须成为"独立和中立的"。我问他指的是哪些国家，他举了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尼、澳大利亚和泰国。他说："我们认为，这些国家应该走上和平中立的道路，以实现这个地区的和平。"（由于某种原因，新西兰没有包括在内。）我有点不信，就问他，越南战争是否要继续打下去，直到所有这些国家都成为中立

国家。他缩回去了。他说，这只不过是河内的“心愿”。（实际情况是，截至撰写本书时为止，就老挝和柬埔寨而言，它已经如“愿”以偿，而且正在威胁泰国。春水还可能真是一位预言家哩。）

且不说河内对印度支那以外的地区如何野心勃勃，它在印度支那要求我们做到的是无条件投降和政治上背弃自己的盟友。它为我们撤军规定了硬性期限，不准任何知名的非共产党领导人参与政治活动，此外还要推翻现存的政府。这样一来，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共产党接管，而且还要求我们配合。这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不顾后果撤退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我们突然撤退而没有作出替代性安排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单方面撤退是不够的；在我们撤退之前，我们必须进行一次政治改革，否则战争停不下来，我们留守部队撤退时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而且我们也不能接回被俘人员。我们的难处在于：河内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之前一直坚持这一立场，只要它这样坚持下去，就不可能谈判解决。一边是拒绝妥协的敌人；一边是国会中的反战运动，它既不承认河内是顽固的，也不支持我们采取军事行动迫使河内降低条件；我们在这二者之间左右为难。阮女士的公开建议，概括了我们在秘密会晤中听到过的内容。河内的“私下”见解和它的公开见解是一致的。

我在九月二十七日同春水会晤之后，深信就地停火这个处在萌芽状态的建议，会被立即遭到拒绝。但是，由于政府中有许多人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了解秘密会谈情况的人为数极少），随着我们着手部署这项工作，政府内部的意见竟是罕见地完全一致。任何建议，只要能够使谈判脱离僵局，使报纸头版不再刊登批评我们的消息，哪怕只有几天不登也行，就会得到所有政府高级官员的赞同。十月四日星期日，尼克松访欧回国途中，在爱尔兰的克莱尔郡的德罗摩兰城堡和罗杰斯、布鲁斯、哈比卜和我一起讨论他的停火演说的内容。会开得再乐观也没有了，哈比卜认为北越人肯定会

上钩。我根据同春水谈话的情况推断（这些情况布鲁斯完全了解），有点不相信，但没有说出来。我想，总统的建议，最低限度可以暂时为我们减轻一下国内公众的压力。

会议结束时，戴维·布鲁斯作了一篇我从未听到过美国谈判代表这样讲过的发言。他说，他已意识到，总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要他作出让步；他不想在这上面再增加压力了，因为他认为总统打算发表的演说已经把话说到我们能够作出让步的极限了。他发现，由于谈判代表缺乏耐心，造成很大损失，而由于他们追求虚荣，损失甚至更大。他生性并不缺乏耐心，而且现在年事已高，不想追求虚荣。他愿意坚守这一建议。

演说将在十月七日发表，我们当即着手起草讲稿。在预定要发表演说的前一天，尼克松又演了一出他的拿手好戏。他突然来到白宫新闻发布室，向目瞪口呆的记者宣布，明天晚上他将发表"自从这场极其艰难的战争开始以来对这个问题作过的最全面的讲话"。他说话喜欢夸大其词，因而可以肯定几乎说不出任何和他事先的吹嘘相符合的话来。尼克松提醒聚会在一起的报界人士，不要进行猜测。他说完这番会引起人们进行猜测的话之后，就回到椭圆形办公室去，一方面为了新闻界中敌视他的人陷于狼狈和慌乱的境地而感到幸灾乐祸，另一方面又怕他的过于热情的讲话会促使新闻界走漏消息而感到忧心忡忡。

尼克松在一九七〇年十月七日的演说中，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纲领。若不是对手一心一意想夺取彻底胜利，它本来是满可以作为谈判基础的。尼克松建议就地停火，包括在整个印度支那停止轰炸。他建议举行一次和平会议，以结束所有印度支那国家的战事。他表示愿意就美军全部撤退的时间表进行谈判。他是在谈到共同撤军时提出这一点的，但是他故意用词含混，以造成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他请河内和我们一起，从南越人民的意愿出发，

寻求政治解决。他提出愿意遵守双方一致同意的政治解决方案，但是拒绝了对方"显然无理的"要求，即要我们解散已经组织起来的非共产党势力，以预先保证共产党会取得胜利。最后，他要求双方释放所有的战俘。

这一次，关于越南问题的演说博得几乎一致的好评。参议院通过一项由参议员查尔斯·珀西和一些其他参议员联合提出的提案，把总统的新和平倡议称做是"公平合理的"。参议员富布赖特表示希望总统的倡议可能导致一次突破。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说这篇演说精彩极了；他将"全力支持"。正在明尼苏达州竞选参议员的前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把这项倡议称为"可靠、值得欢迎和令人感动的"。艾夫里尔·哈里曼这次也难得地表示赞同尼克松的倡议，但是再一次提出他一贯的看法，阮文绍政府对谈判僵局负有主要责任，应防止它破坏停火。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把这项倡议说成是"及时的，而且在战略上和心理上都是有可靠基础的。"⑤

报界也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扬。十月九日的《纽约时报》称尼克松的主张为"重大的新和平倡议"。《华尔街日报》写道，"不论河内最终作出什么反应，总统事实上已经表达了一种深得人心和通情达理的立场，因而只有蛮不讲理的批评家才会反对。"通常反对总统对越南政策的《芝加哥每日新闻》写道，"总统急切地试图结束我国有史以来历时最久和最凄惨的战争，几乎持各种政见的美国人都理应全力给予支持。"⑥通常持反战态度的《圣路易斯邮报》在十月八日欢呼尼克松演说中的"意义重大而又值得欢迎的变化"，他的"颇具政治家风度的建议"，他的"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讲话，"我们为此而赞扬他。"

但是好景不长。第二天春水在巴黎发表声明，立即拒绝了尼克松的建议。他甚至拒绝在全体会议上加以讨论。这样，关于越

南问题的辩论的老一套方式再次出现了。先是提出了某种建议；它成为人们热情吹捧的主题；人们纷纷要求把它作为实现突破的一把钥匙。最后政府接受这种主张，虽然有时违背了自己的本意。河内于是加以拒绝。这项建议会立即从公众辩论中消失，然后另外一种逗人喜欢的计划又风靡全国。用不了几个星期，批评我们的人又会前来要求作出新的让步。新的花招是要求单方面规定撤军的期限，因为他们相信——虽然毫无根据——这是河内能够接受的。⑦另一个花招是联合政府。《圣路易斯邮报》在欢呼过总统的停火建议之后不到一个月，在十一月五日辩称：

共产党要求成立某种联合政府。他们打了这么多年仗，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满足于低于这样的要求。他们为什么不要求呢？我们认为，联合政府似乎会使双方都承担责任，也都接受权力，因而是避免尼克松先生念念不忘的战后的残酷报复的合乎逻辑的办法。

不幸的是，河内无意和别人分享政权。它要求的联合政府不包括我们的任何朋友在内。也就在十一月五日，艾夫里尔·哈里曼在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今天》中声称，尼克松政府“并没有为达成协议进行过尝试。”

我们在进行空中打击的同时，派遣一支英勇的美军突击队，袭击了距离河内二十英里的山西监狱，因为人们认为，有六十名美国战俘被关押在那里。这一行动进一步激起了对我们的批评。这件事说明了制定政策应该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总统对什么事情也不能轻信，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就更是如此了。他们对每一项假设都必须查问情由，对每一种传闻都必须辨别真伪。听起来颇有道理的事件，并不每件都是真实的，因为提出行动计划的人总是有一种列举事实以支持自己的立场的心理倾向。十一月二十日，对山

西监狱进行了袭击，计划周密，行动英勇，但是依据的情报却是极其错误的。这所监狱至少在三个月前就关闭了。我们知道有造成伤亡的危险，但是在决定动手时，所有的情况介绍都没有提到监狱可能是空空的。袭击失败之后，我才听说，有一名战俘曾经用密码写了一份情报说，监狱已在七月十四日“关闭”。军事分析家把这句话误解为，大门上了锁；由于认为这份情报无足轻重，没有送给白宫看。

这次袭击还留下了一个由于我的幽默感大发而造成的轶事。一个军官向我介绍袭击的情况时，为袭击失败而表示道歉。我对他说，不用道歉了。我还开玩笑说，美军突击队一定把一头小水牛给抢回来了，而且北越人一定在冥思苦想，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为了抢一头小水牛而这样兴师动众。一心爱国的军官料想总统的安全事务顾问大概不至于完全胡言乱语，就向他的上级报告了我说的话。他的上级就开始寻找这头水牛。这时战场上的部队深信华盛顿已经神经失常；他们报告说，他们对绑走小水牛的事一无所知。五角大楼不肯相信我是随便说说的。于是发回一封电报，要求切实查明直升飞机上有没有水牛粪。这件事的全部经过都记载在一本书里。⑧

在袭击山西监狱的同时，有二百架飞机对北越的供应设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空袭。这次空袭有三个原因：分散北越对山西的防备；对北越断然拒绝我们的和平建议进行报复；以及使北越放松趁着旱季向南方运送物资的努力，现在运送的速度比上一年度快了一倍。国会和新闻界的义愤，仍同往常一样集中在美国采取的行动上，而不是集中在河内的挑衅行动上。中心内容有两条：轰炸从来没有发生过作用，这是“有事实为证的”；还有就是，政府又在欺骗公众了。对于当时许多热衷于进行关于越南问题辩论的人来说，这种空中封锁的徒劳无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今天看来，情

况远非如此。有大量证据说明，在一九六八年我们发动新年攻势时，河内快要打不下去了，但是又被我们单方面停止轰炸给救了。我敢肯定，一九七二年五月恢复轰炸，加速了战争的结束。一九七〇年我们进行的两天轰炸，由于摧毁敌人供应而赢得的时间，是否超过由于激起反对而失去的时间，这是已有定论的问题，但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当时人们斥责我们为了能够撤离越南而采取军事步骤，就好像这些步骤正在使我们的行动升级。

无论政府还是反对派都没有正确对待这次空袭。政府官员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激怒国会和新闻界，他们贬低我们这次攻势的力量，以一种别出心裁的说法(“保护性反应”)加以解释。闻到了血腥味的新闻界和国会故意装出惶恐不安的样子，以攻击他们富有煽动性地称之为好战的政府。虽然政府缺乏信誉主要是由它自己造成的，但是也有不小的一部分是由那些不留情面的反对派所造成的。这些人的出发点是，认为政府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不可能具有道义上的依据，或服务于任何全国性目标。他们决心使正在竭力使我国从前任政府陷入的战争中脱身的现任政府丧失信誉。当时存在很深的偏见；有一位著名的高级教授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次策划对山西监狱的袭击是为了引起一些战俘被杀害，以便为战争升级制造借口。

到了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九日，克拉克·克尔的争取越南问题政治解决全国委员会，又同尼克松在十月一日发表演说以前一样地活跃起来了。以前这个组织曾经大声疾呼说，美国提出停火建议实为和平的关键；现在我们提出了建议并遭到对方悍然拒绝，但是这个组织却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立场，因为对方是没有道理的。相反的，它现在要求美国单方面在越南停火。它不认为河内拒绝我们的建议是由于本身的顽固，而认为是由于我们袭击了山西监狱，进行了保护性反应的空袭，以及没有延长圣诞节停火的期

限。它硬这样说，而无视事实上早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春水就已经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它认为，应该由美国作出进一步的让步，以软化河内的僵硬态度。克尔的委员会写信给总统说："在今后几个月中，如果我们要想改变对方反对停火的态度，并不断对他们增施压力，迫使他们最后通过谈判达成协议，那么，外交努力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仍然深信，经过一番积极的外交和政治努力，最终是可以达成这样的协议的。"该委员会没有为这一信念提出任何论据，而我们倒掌握着大量的反面论据。

制定一项战略

到了一九七〇年末，我们面临着一项危险，我们对越南的战略可能会发展成只是就我们单方面撤军的速度进行的一场辩论。甚至在政府内部，人们也普遍感到厌倦。经常存在的压力使每次即使是最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都成为对政府信誉的考验，还要无休止地出席各种国会委员会作证，再加上新闻界——有的怀疑，有的敌视——不停地进行调查；所有这些情况都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不可能实行一项有连贯性的战略。任何谈判方案，如果不是和某种力量均势的计算方法有关的话，简直不可能使那些冷酷无情的河内决策者接受。批评我们的人认为，由我们作出所有的让步以及善意和灵活性的表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很少要求对方拿出诚意，而且从未坚持过这种要求。但是在谈判过程中，我们越是不断作出单方面让步，河内就越是想等待一下，看看我们日益严重的厌倦心理会使我们对它的立场作出什么新的让步。

由于国内的压力，我们不得不作出单方面让步，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九七〇年秋天，我们把撤军时间表提前了。尼克松在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日宣布，在十二个月之内撤军十五万人。他有一

个用意，那就是在实际撤军的日期上，保留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总统在四月二十二日发布书面训令，肯定了他的意图，即：在一九七〇年余下的时间里，最多只撤军六万人；这就使我们从十月到第二年五月的旱季里（旱季的时间因地区而异）有个缓冲。河内就是利用旱季通过胡志明小道运送物资的；共产党的攻势都是在二月以后发动的。总统采纳了艾布拉姆斯将军的意见，想把大规模撤军推迟到一九七一年，以制止再发生一次新年攻势，并有效地使用这支最后得力的战斗力量，以防不测。但是，由于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削减五角大楼的预算，也由于压缩征兵数额这一政治上的需要，我们没有能够实施尼克松的训令。莱尔德在八月二十日写信告诉我，“我们继续受到”预算的“严密限制”。他说，因此，艾布拉姆斯将军、我们的太平洋司令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提出了”一份撤军的时间表，要求在一九七〇年内撤军九万人，其余的六万人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之前撤完。

我在八月二十七日把这份备忘录转给了总统，并指出它的“严重含义”。备忘录所规定的数字正和总统的训令以及他对阮文绍的承诺相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而不是战略上的选择。我说：“建议加速重新部署兵力，实际上会抵消我们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对于我们的撤军时间表原来可以带来的好处，而不能利用这些好处作为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杠杆。”

起初尼克松坚持原议。我在九月四日给莱尔德写了一个便条，告诉他总统坚持按照原来的时间表行事。但是这是一场我们注定会输掉的战斗。到十月，莱尔德显然在按照他自己的财政上的考虑行事。他从来是什么也不怕的。他建议在十月十二日星期一五角大楼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提前撤军的消息。这时，我只好认输。阮文绍对于我们这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处之泰然，因为他早已明白，对于我们国内莫明其妙的变化，争辩是没有用处的。

他只是指出，为了接替撤走的美军，他不得不把原来派驻在柬埔寨的一支特遣部队撤回越南。把那支部队派驻在柬埔寨，原想是用来保持公路的畅通，并使共产党在那里重建庇护所陷于困难境地。因此，我们是在把自己的国内问题转嫁给西贡，而西贡又把它的困难转嫁给金边。最后金边成了大家的困难的受害者。

这年秋天，表面上似乎平静，却迫切需要制定一项结束战争的战略。由于受到在国会选举中出现的意外挫折的影响，尼克松在十一月又回过头来要重新恢复他原来在一九七一年宣布的几乎是全部撤军的计划，同时对北越进行封锁并恢复大规模轰炸。我仍然怀疑，这种强行迅速解决的尝试能否奏效。我们骤然撤军，即使不会弄垮南越政府，也不会破坏越南化的前景，却会给河内一种我们急于求成的感觉，因而封锁和轰炸将收效甚微。河内会全力以赴地顶住，并且寄希望于我们国内的喧闹来制止我们的军事压力。我对总统说，即使从政治观点来看，他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九七一年撤退不如在一九七二年防止越南局势的崩溃为好。

尼克松和我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花费了许多时间来制定一项比较切合实际的战略。我们不得不制止住这种没完没了地在撤军速度问题上要花招的状况。我建议，在目前这批要撤出的军队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撤完之后，我们再宣布一次大幅度撤军，也许是在六个月之内撤出十万人。这样仍能保证南越预定在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的整个期间处于安全状态。在那以后，在我们留下的军队只有十八万人左右的时候，我们将继续相当频繁地宣布小量撤军，直到一九七二年夏天达到留下五万左右的志愿留守部队为止。这五万人将一直留到达成协议为止。我们将视情况在一九七一年的某个时间，宣布美国不再参与地面战斗。我们还将在一九七一年的某个时间向北越建议较快地撤军以换取停火。如果遭到拒绝，我们也会了解到，我们将在一九七二年面临一场攻势。这样，战争

的结局将取决于南越人是否能够在美国空中力量的帮助下，抵挡住这场进攻。因此，和平终将在一九七一年底或一九七二年底实现，或则通过谈判，或则由于南越的垮台。

然而，要使这项战略奏效，完全有必要在这个期间尽量削弱北越。我们在柬埔寨的行动已经至少把河内的后勤供应计划推迟十五个月；我们希望，我们赢得的每一个月的时间，都会使南越人的力量得到加强。我们寻找各种办法，消耗河内的供应，进一步推迟它发动攻势的准备，并在一旦发动攻势时则进行抵御。如果我们认真要实现越南化，我们不得不顶住国内的反对，同时在三个方面进行努力，一直到西贡能够自力更生。这三方面的努力包括：撤退美军；迅速加强南越军队；以及逐步削弱敌人*。

尼克松和我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制定的战略，实质上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得到了实施，而且也产生了效果。在麦戈文一哈特菲尔德修正案规定的日期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终于撤完全部军队，而且我们是在没有推翻一个盟国政府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

正是为了推行这项战略，导致我们在一九七一年在老挝采取了军事行动。

我们在老挝的军事行动

北越的公开讲话咄咄逼人，这表明必然还会有一番较量。例

* 顺便提一下，南朝鲜处境远比南越有利，但是即使在停战二十五年之后，也从未有人要求从那里全部撤军。

** 有一件我们未能预见到的事情，就是水门事件的惨败。正是这一惨败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大量削减了援助，致使南越财源枯竭，并使国会通过了各种禁令，使我们在北越无故违反和平协议的情况下，不能采用强有力的办法使和平协议得以实施；这些情况最后决定了南越的命运。

如，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一百次全体会议上，春水嘲弄了我们在十月七日提出的停火建议。他随意引用了美国反战人士的话（这是惯用伎俩），要求我们对阮氏萍女士的八点纲领作出积极反应。北越党报《人民报》在报道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消息时，号召进行不懈的战争努力，不论战争如何“残酷”和“旷日持久”。

在一九七〇年的最后两个月里，我请政府中和我的工作班子里的专家，就今后两年军事和政治的前景作出估计。

在一九七〇年底，河内显然需要在一九七一年花费大部分时间来保护、扩大和重建它的供应系统。预料河内将在一九七二年发动重大攻势，以便对我们的总统选举施加最大限度的影响。高级研究小组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举行会议，试图比较确切地预测南越人在一九七二年会面临的局势。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美国撤军和敌人的供应工作都以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即使我们继续在柬埔寨和老挝拖住敌人，南越人也还是可能短缺八个营的兵力不能满足它进行抵御的需要。（用系统分析的行话说，这叫做“营亏缺”。）如果河内在一九七二年发动攻势之前，在老挝和柬埔寨获得决定性胜利，亏缺就会是三十五个营。

共产党的战略是依靠游击部队和正规部队（称为主力部队）互相配合，打击对手。如果我们集中力量对付游击队，敌人的主力部队就会占领南越的许多地方。如果我们去对付主力部队，游击队就会在乡村捡便宜。只要西贡能够割断游击部队和正规部队之间的联系，并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其中之一，西贡都相当迅速地占了上风。我们在柬埔寨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直到一九七二年，在南越的南半部的战事实际上已经停止；而且即使到了一九七二年，战事也从未恢复到以前的猛烈程度。驻在柬埔寨的北越师正忙于重建和保护在柬埔寨的庇护所；他们只不过是越过边境，在离边境不远的地方进行一些骚扰性袭击。在北部地区，主力部队和游击部队之间的

联系继续存在，北越的供应线较短。绥靖的进程相应地是缓慢的。

按照我们的统计，正是在这个地区，出现了部队人数不足。但是数字没有真正反映出问题的性质。问题不仅仅在于数字，而在于部队驻扎的地点。南越军队的组织形式是：有四个军区，每个军区驻有两个师、一个空降师、一个海军陆战师，以及作为战略后备力量的各种别动和特种部队。由于柬埔寨行动的胜利，在南越南部的第三、四两个军区，有多余的部队（行话称为"营盈余"）可以对付各种可以预见的意外事件。在北部地区，尽管在柬埔寨和老挝，战局处于僵持状态，我们预料会出现较大的部队人员的不足。

但是，我们不能用把南部的"盈余"部队派到北部地区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除战略后备力量外，所有的师都不得擅离它所驻扎的军区，而且，一般认为南部的各师不适应于在北部的中央高原和非军事区附近作战。这是有几方面的原因：各师的兵员都是从驻地招募来的，士兵的家属就住在营地附近，经验证明，一旦转派到家乡以外的地方去，这个师就会很快出现开小差的现象，士气也会低落。（北越在一九七二年发动攻势时，我们把在湄公河三角洲战功卓著的第二十一师转派到不到七十五英里以外的西贡地区，战斗的结局是很凄惨的。）此外，进行这种重新部署，必然会遭到有关军区的指挥官的反对，而他们都是西贡政府赖以支撑局面的人物，他们认为——事实确是这样——他们在首都的政治势力和他们所统帅的部队数字是有某种关系的。南越指挥官对于能够经得起多大伤亡，也是担心的，尤其是当附近的家属认为这场攻势是不必要的时候。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对统计数字的分析不能完全说明战略上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用来弥补北部地区的人员不足的只是一支可供调遣的战略后备力量。

如果上述分析是有道理的，就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如果要使越南化计划有成功的可能，就必须使柬埔寨和老挝不被共产党接

管，而且必须使敌人的旱季后勤供应的进程放慢下来，或者如有可能，制止这一进程。一种明显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整个一九七二年旱季中在越南保持一个额外的美国战斗师，作为战略后备力量。在它的保护下，第一、二军区的绥靖进程将会加快，从而使南越各师腾出手来在一九七三年抵御敌人主力的进攻。由于我们国内的情况，不能考虑采用这种解决办法。因此，我们的问题只是，怎样弥补这八个营的亏缺，是靠加强南越，还是靠削弱北越，特别是要靠破坏他们的后勤供应来削弱北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发动一场联合旱季攻势的原因；它可以破坏共产党的后勤工作，弥补预料一九七二年会存在的营亏缺，以及促使河内有进行谈判的愿望。一九七一年冬季也是美国战斗部队参战的最后一年。虽然我们兵力的重新部署以及我们国内的情况，使我们不能使用美军来发动攻势，但是我们的军队可以担任固定的守卫任务，以使南越军队腾出手来进行破坏性的进攻。

我对在一九七一年展开旱季攻势的想法，极表赞同，因为政府各部门面对国内的风暴，无所作为，态度冷淡。当白宫负责制定对越南政策时，它们从来没有对官僚特权有过什么抱怨。政府各部门都非常希望白宫能负起责任，来对付国内必然会掀起的喧闹。我作为安全事务顾问，认为有责任不是消极地等待灾难的降临，或者不过是凭着最有利于自己的假想去进行赌博。河内恢复供应工作的速度比去年快一倍，因此发动一场战役，尽可能长期地削弱河内的进攻力量，以便使我们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由于可能每年都要遇到这种破坏性的攻势，河内亦可能愿意谈判。

最初，我认为展开旱季攻势最好的地方是柬埔寨。我的用意是，动用西贡的战略后备力量以及守卫边界的一个师，消灭北越在柬埔寨的供应和部队，并摧毁正在增长的柬埔寨共产党的基础。这样做会消除南越南半部的后患；还会压制仍在发展之中的红色高

棉，而且也许会使朗诺政府控制住大部分国土。阮文绍将能把他的战略后备力量转移到北部去击退共产党在一九七二年发动的进攻，或者是在北越的后勤准备工作在第二年得到充分发展之前，再发动一场破坏性的攻势。甚至会有可能把一个正规师调往北部，进行绥靖。

我们在柬埔寨采取行动的有利之处是，几乎肯定可以得到成功。在柬埔寨的北越军队仍然主要忙于遏制朗诺的军队；柬埔寨共产党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自立的程度。北越几乎没有可供调遣的后备力量；北越部队不能象在越南时一样在柬埔寨人民中藏身。柬埔寨位处北越供应线的末端，因而不能大量得到补给。而且一项人人都可以看得见的胜利会加强南越的自信心，并在心理上起鼓舞士气的作用，从而为在一九七二年几乎必然会发生的摊牌做好准备。我的这一设想有个缺点，那就是它只是间接地解决了我们在一九七二年在战略上最大的隐患，即北越可能在中央高原或越过非军事区发动进攻。

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经他同意，我派艾尔·黑格和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到越南去，研究这方面的可能性。黑格回来时报告说，邦克、艾布拉姆斯和阮文绍都认为发动一次旱季攻势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提出的想法比我的要大胆得多。他们建议，在老挝境内靠近非军事区的地方割断胡志明小道，一举击溃敌人的后勤供应。

在老挝南部茂密的丛林中，在这块河内曾经在一九六二年的日内瓦协议中正式承认其中立地位的主权国家的领土上，北越在近十年中已经建立起一整套复杂的通道，把兵员和供应品源源不断地运进南越。胡志明小道实际上是由全长一千五百多英里的许多通道和一个密密麻麻的小道网组成的。这个系统的中心是一个小小的省城车邦，所有的小道都汇集在这里，而且供应品和人员也

从这里渗入南越。驻扎在胡志明小道的大约有四万到五万北越后勤部队，以及保护它的守卫部队。活动从每年的十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五月结束。这时雨季开始，道路泥泞，无法通行，北越部队通常在这个时候隐退，等下一个旱季时再出动。

共产党利用胡志明小道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期间至少把六十三万北越部队、十万吨食品、四十万件武器和五万吨弹药或相当于六亿发子弹运送到南越。自从西哈努克亲王被推翻、西哈努克城的港口遭到关闭以来，河内几乎完全依靠胡志明小道向它在南越的部队提供后勤供应。

黑格转达艾布拉姆斯将军的意见说，如果能够不让共产党使用胡志明小道，或加以有效的破坏，那怕只有一个旱季的时间，河内在南越（和柬埔寨）发动重大攻势的能力将会无限期地遭到很大的削弱，如果不是丧失殆尽的话。因此，艾布拉姆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由美国军队在南越非军事区附近，朝西一直到老挝边境，建立封锁阵地。北越在一九六八年的新年攻势中曾经严密包围过溪山这个重要的道路枢纽和简易机场，从那时起我们已经放弃了这个地方；这次我们将重新攻克溪山。美国炮兵将转移到老挝边境。精锐的南越第一师将沿九号公路越过边境进入老挝，奔赴车邦，并沿着暴露的北翼建立防御性火力点。当这个师正在路上时，空降师将占领车邦机场，并与从陆路开来的坦克纵队连成一片。整个进击行动将用四至五天时间。旱季的其余时间将用于封锁小道，并破坏据认为设立在这条小道上特别是在车邦附近的后勤中心。战役如果成功，我们会赢得至少两年时间，因为敌人将需要一年时间来重建后勤结构；如果南越在后来接着发动破坏性攻势，那么敌人需要的时间也许会更长。

至于柬埔寨，艾布拉姆斯提出了一个比我原来设想的规模要小的作战计划。他将调用第三军区的一个南越师，越过边界，进入

北越正在建立新根据地的朱普橡胶园。由于第三军区的指挥官是公认为南越最精明强干、最果敢(同时也是最腐败)的指挥官杜高智将军,艾布拉姆斯颇为自信,认为可以最大限度地破坏河内在柬埔寨的后勤结构。这两项计划都深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赞许。

在纸面上,这是一种很出色的构想。事态证明,它的主要缺点在于,和越南的现实完全不相符合。在越南以外的地方,南越师从未对顽强的敌手展开过重大的攻势,而在越南境内,这种情况也很少。这次他们这样做,将没有美国顾问的帮助,因为库珀—丘奇修正案不准美国顾问参与其事。这项修正案甚至禁止美国军官指挥我们的战术性空袭,从而严重地削弱我们进行空中支援的力量。华盛顿并不知道,越南部队几乎没有会说英语的受过训练的地面控制人员。每逢提出要求空中支援,必须通过双方指挥部从上到下的各级机构,因此费时很多。从根本上说,在老挝这次行动中,南越师还没有能力承担这样复杂的任务。南越的高级指挥部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同时进行两项重大军事行动。最后,车邦正处在河内最容易得到增援的地方。它的战略地位使北越能够从北越和南越同时调兵。

肯尼迪总统在一九六二年曾经要我向固执的西德总理阿登纳介绍刚刚上任的美国政府的一些军事思想。阿登纳对于肯尼迪这一辈的政治家总觉得不放心,对麦克纳马拉提出的战略原则甚至更加怀疑。在我讲得滔滔不绝的时候,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问我怎么知道我介绍的情况是确实的。我回答说,是一位将军告诉我的。总理又问,这位将军是否身穿军服。我说记不清了。他于是建议我请那位将军穿上平民服装把他介绍过的情况再说一遍;如果我仍然感到是这样说的,就再告诉他。

这一带有讽刺性的意见本来应该使我们在一九七一年受益不浅。但是,相反地,由于这种大胆的设想,由于西贡和华盛顿负责

制定政策的人们的看法一致，由于在柬埔寨的行动得手的影响以及由于形势可能发生决定性的转折，使我们头脑发热。不久，精力已经不是花在仔细分析形势，而是花在部门之间耍弄手腕上面。尼克松政府就是依靠这种办法作出决定的。

尼克松决定不再象上年在柬埔寨问题上那样，光一个人承受批评的担子。这次他要让主要的内阁官员都来参与决定，迫使他们承受不可避免的公众批评带来的一些压力。但是，他的决心还没有大到想同时应付罗杰斯国务卿以及莱尔德国防部长的程度。尼克松因为不愿对他的下属发号施令，而且认为罗杰斯可能是最难对付的，因此想出一个主意，先设法让莱尔德处于提出尼克松所喜欢的建议的地位，然后让国防部长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成为维护这个计划的人。所以他认为花费时间召开一系列会议是值得的；每次会议讨论的主题都完全一样，但每次会议都增加一个与会者——有的是尼克松事先不知道其看法的，有的是他认为可能表示反对的。其道理是，任何难对付的人，对于受到总统支持的一种一致意见，都更有可能顺从，但如果出现大家自由发表意见的场面，可能性就不那样大了。到一月末，我至少听过三遍内容相同的情况介绍，几乎感到厌烦了。尼克松装腔作势的本事十分高明。他每次听，总是兴致勃勃，好象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计划。他提出的问题——每次都是同样的问题——包含有疑问、向往和赞许的成分，颇为得体。其目的是要向新参加会议的人表示他这位领导正在注意聆听，而且颇为赞许。而由于所有其他人都已同意，只有很倔强的人才会坚持反对立场。没有人这么试过。

因此，黑格先向总统报告他的印度支那之行，这次有我在场。然后尼克松又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汤姆·穆勒出席，拉他入伙。黑格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向尼克松作了内容相同的报告，这次有梅尔·莱尔德在场。穆勒没有流露出他事先接触过这事的样子，表示

支持在老挝采取行动的计划。尼克松表示，他同意在柬埔寨的朱普橡胶园采取行动，对于割断胡志明小道的打算也颇为赞许。他请莱尔德在一月初到东南亚进行计划中的访问时，再研究一下这一想法。

莱尔德总是瞻前顾后，他深知国内反战压力高涨，但是他也赞同采取可以减少撤军带来的风险的行动。他也许已经通过他自己的小道从穆勒和艾布拉姆斯那里听到一些关于可能在老挝一柬埔寨采取行动的风声。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莱尔德支持割断胡志明小道的想法，认为这样做可以为我们赢得至少一年的时间。他认为南越军队在没有任何美国地面支持的情况下，首次展开重大攻势，会明确地证实，越南化取得了成功。尼克松深感宽慰，原则上批准了这两项计划，只待莱尔德即将进行的访问结束归来后，再作审议。

莱尔德自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开始进行他的访问，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和西贡都在继续进行策划，但其他高级官员都毫不知情。莱尔德回国后，尼克松于一月十八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再次召开会议。参加者除十二月二十三日那次会议的与会者外，还有罗杰斯和赫尔姆斯。和以前一样，唯一毫不知情的重要人物是罗杰斯，他将面对他的全体同事结成的联合阵线。赫尔姆斯无足轻重，因为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是不提出政策方面的建议的。尼克松根据以往的经验可以认为，赫尔姆斯在表示了他的看法之后，不会公开加以宣扬。召开这次会议的托辞是听取莱尔德的访问报告。

莱尔德的表演无懈可击。他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越南化的技术性问题、即将举行的越南总统选举、泰国军队在老挝的表现以及监视在柬埔寨运送装备情况的必要性等。他实际上谈到了除旱季攻势外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问题。在听他讲话的人们完全失去戒备之后，莱尔德才把话题转向旱季行动，但是他首先谈到的却是旱季

行动对加快撤军速度的影响，据认为这正是罗杰斯关心的问题。在莱尔德讲话的整个过程中，尼克松一直在作出赞许的表示，有时也装做惊讶的样子提点问题，逐渐把谈话引入预定的范围。

但是莱尔德并没有马上点题。他向罗杰斯描述了南越在柬埔寨的一次小规模行动，四千名南越军队士兵参加了这次行动，以打通从金边到出海口的四号公路；他逐步向罗杰斯提出了旱季战役的想法。然后他说明南越打算摧毁在朱普橡胶园的根据地的计划，而且很恰当地把它比作和前一年对柬埔寨袭击相类似的计划。由于莱尔德已经说明，不派美军参与行动，因此谁也没有表示反对这个计划。时间过去将近两小时，我们还是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核心。这时尼克松宣布休息十五分钟，也许是为了欣赏一下他的顾问们表现出来的不寻常的和谐。

当会议重新开始时，莱尔德终于提出攻打车邦的想法，并出示了地图。他指出，第一阶段将从一月二十九日左右开始，美军占据南越境内沿九号公路的阻截阵地，并重新占领溪山作为挺进基地。第二阶段将从二月八日左右开始，南越部队沿九号公路蛙跳式地进入老挝。

这时轮到唯一剩下的没有事先与谋其事的主要官员表态了。罗杰斯的反应几乎就是四个星期之前莱尔德反应的翻版。他自我安慰地说，伤亡数字不会增加很多，并表示支持莱尔德提出的计划。他坚持说，要力争行动获得成功，这是至关重要的。莱尔德和穆勒明确表示有充分的把握。赫尔姆斯以前也没有参加过会议，而且他的意见对于尼克松来说并没有决定意义，但他却成为认真提出问题的唯一顾问。他指出，拟议中的行动在过去曾多次考虑过，但总是由于过于困难而遭到否决。后来我听说，四年之前，当时我们在越南的指挥官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曾认为，这样的行动需要使用美军两个军的兵力。虽然这时他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

成员，但却并没有在一九七一年向白宫提出过这种看法。

大势已定。尼克松初步同意着手执行。我制定了日程表，从一月十九日开始举行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首次在各部门全力配合下制定详细计划。

这种精心策划的方法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尼克松对他当时所选择的战略有清醒的分析，他勇敢地面对现实，认识到除非采取某种步骤使北越不能增强其力量，否则第二年南越的局势会发展到确实危险的地步。发动旱季攻势的想法是正确的，尼克松果敢地下令执行。但是，尼克松的办事方法有毛病，这一点很快就显出来了。由于把过多的时间、精力和才干都用在设法使高级顾问意见一致上面，忽略了对计划的缺点或对如何使其他的政府成员遵守纪律的问题进行研究。替魔鬼辩护是没有用处的。尼克松在每次会议上，为了得到可能反对他的人的默许，会提出许多修改，以致最终把他设法实施的复杂计划吞噬掉了。由于所有内阁成员都很关心国内对美国行动的反应，在每次策划在老挝的行动的会议上，尼克松总是同意削减参战的美军人数，并对我们的行动加上新的约束。这些步骤就个别而言可能是次要的；但是积累起来的影响在实际上——尤其在心理上——就很可观了。这种影响遍及各级指挥部，对战场上的指挥官必然带来踟蹰不前的感觉；他们必须把精力既放在他们的主要工作上，也得放在这些约束上。而他们的主要工作正是：在战场上取胜。

总统不能以执行决定时的犹豫不决来消除一项有争议的决定带来的灾祸。在使用武力时必须认真体会俾斯麦的一句名言："政治家在进入战争之初，本来振振有词；到了战争结束时，他的理由听起来却不那样有道理了。这样的政治家，大难将至矣！"领袖的根本抉择在于是否批准使用武力。如果他决定使用武力，他证明自己正确的唯一办法就是取胜。疑虑不能拿来作为为失败解释的

理由。执行中的缩手缩脚会使对方占到便宜。失败者尽管失败得不厉害，也不会受到赞誉。总统一旦决定使用武力，就别无选择，只有以最大的决心付诸实施，并把这种精神传达给所有执行这一决定的人。任何国家对于无意坚持到底的军事冒险或外交行动一定不要鲁莽从事。

在处理比较直截了当并可以通过一次象我们在柬埔寨那样的果敢行动就获得解决的军事问题时，尼克松治理国事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在派遣一名可靠的同事，带上一个短小精干的工作班子，采取有目的的单枪匹马的外交行动时，例如打开对中国的关系，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以及对付苏联的各种外交行动，这种办法也是有效的。在需要进行长期军事努力时，如在老挝；或者当外交行动过于复杂以致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办公室处理不了时——例如印巴危机——就会出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一致意见或者甚至谅解，也不可能实现连贯性和承担义务。在作出关键性决定时被排除在外的部门很可能会指责说，这是官僚机构在一意孤行。如果只有极少数人了解总统的意图，而其中又只有一部分人同意这些意图，往后就会在争吵、分裂或（通常是徒劳无功地）试图执行纪律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虽然主要原因在于总统复杂的个性，但我作为这些办事程序的组织者和原动力，当然也对其中的缺点负有责任，正如我曾经由于政府的成就而受到过也许是不恰当的赞誉那样。

一九七一年所发生的情况是，一旦罗杰斯遭到他手下的专家们的竭力反对，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一月十八日两次会议上政府各部门的一致意见马上就烟消云散了。到了一月二十一日，事情已经很清楚，国务院裹足不前了。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会议上，副国务卿亚历克斯·约翰逊开始表示反对，但并不否定原来的决定，而是使它迟迟不能付诸实施。这是约翰逊拿手的官僚手腕。

拖延的办法是，坚持要事先得到老挝首相梭发那·富马的同意。

这是一个古怪的论点。北越悍然违反两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占领老挝部分领土已达十年之久。他们实际上占领了沿边界线的全部领土以及老挝南部的大部分地方，作为在越南作战的后勤基地。多年来老挝政府的法令在南部都是无效的。原来的人口就很稀少，而且都已被北越赶走了。我们轰炸胡志明小道至少已有五年之久，梭发那只是予以默许，但没有正式表示同意。熟悉梭发那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他欢迎我们的行动，但又不敢表示赞同，因为这会使他无情的邻国得到一个进一步升级的借口。这位领导人手下的官员都不能进入自己国家的南部，而且在北越进逼北部的情况下他只不过是在苟且偷生；设想我们进攻一个以南越为目标的后勤基地的合法立场，还需要得到他的赞同，这个想法真是太离奇了。只要稍稍熟悉梭发那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他会欢迎这一行动，但不会希望事先有人找他商量。他宁愿采取的立场，正是西哈努克对于轰炸庇护地区的立场。由于没有老挝官员在南部，他不了解情况，因此不能为任何一方的行动负责。

结果是，我们和在万象的大使馆文电往来，商量怎样去和梭发那谈这件事，花费了好几天；而这当然正是提出这一想法的用意。使我们的官员中至少有一些人感到十分失望的是，我们驻老挝大使麦克·戈德利报告说，梭发那可能给予默许，只要我们不断把情况告诉他。我们指示戈德利，设法获得更为具体的赞同。梭发那深知，他的国家的生存，有赖于北越的失败，他再一次使反对我们在老挝采取行动的人大失所望。只要这次行动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星期，他就给予有条件的同意。我们又把戈德利派回去，更正式地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梭发那懂得他的国家的利益所在，拒绝违背良心说话。不论试探他多少次，他都不表示反对这次行动；这就意味着，他心里是欢迎这次行动的。

事情变得很明显，国务院反对的不仅是程序上的问题。罗杰斯和我谈过几次话，他的意思已很清楚。因此，我向总统建议，请他克服那种不愿意和自己朋友争辩的心理，再召开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成员的会议。会议预定在一月二十七日举行。

会议举行之前，在一月二十五日，我和海军上将穆勒一起，审议了军事计划。我提出——也许已经太晚了——一些令人担心的问题。如果割断胡志明小道可能起艾布拉姆斯所认为的那种决定性作用，北越将会顽抗。他们甚至可能正等着这个机会来挫败南越。而且车邦位处交通枢纽，可以很快地从北越和南越调兵增援。我们能让南越承担起多大的伤亡风险？他们的作战还能维持多久？考虑到南越师的机动化程度极低，补充兵员从何而来？这些师正在进行有史以来最艰苦的作战，在这个时候，他们第一次失去美国顾问和美国空袭指挥官，会有什么反应呢？而且在这种新的指挥程序中，我们能够肯定我们的空中支持会是充足而又及时的吗？如果目标如此重要，我们是否应该加强我们的空中力量呢？我向尼克松提出一份备忘录，其中包含有这方面的问题，以备和穆勒进行研究之用，并安排好在一月二十六日和他们两人会见。

事实上，尼克松没有按照我的建议明确地提出问题，但是他以自己婉转的方式设法谈到了所有的问题。穆勒在作出保证时语气是坚定的。如果敌人顽抗——他们很可能这样做——美国空中力量将封锁整个战场，并造成难以恢复的重大损失。如果敌人不顽抗，他们的供应系统就会被摧毁。这次行动会保证越南化获得成功，并增强我们加速撤军的能力。割断敌人供应，会有助于柬埔寨政府争取生存的斗争。总而言之，可能会产生“决定性的”后果。

万事俱备，尼克松在一月二十七日和他所有的高级顾问——罗杰斯、莱尔德、赫尔姆斯、穆勒、黑格和我——进行会晤。和往常一样，会议的一半以上时间是用来谈论无关紧要的问题的，

如：怎样就美国在柬埔寨的空中行动提供证词；对于南越采取小规模行动，打通柬埔寨的四号公路，应该如何对待公众的反应；总统在去年六月曾发表谈话，断然放弃除以封闭通道为目的外的美国在柬埔寨的战斗行动，其确切含义是什么；按计划将在柬埔寨的朱普橡胶园采取的行动。

如此这般地谈论了大约一小时，总统请海军上将穆勒报告关于进攻车邦的计划。穆勒的报告大体上和他向总统作的汇报内容相同。穆勒讲完后，尼克松也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总得让罗杰斯出头露面。罗杰斯谈话异乎寻常地有力，他认为这次行动风险太大。敌人有关于我们计划的情报。仗是肯定要打的。当我们在越南驻军五十万时，我们不肯采取这种军事行动，因为我们当时认为力量不足，但是现在我们却要求南越来采取这一军事行动。如果西贡遭受挫折，我们会有把前一年的收获全部丢光的危险，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动摇阮文绍的地位。然后他以不太能说服人的口吻，提出需要得到梭发那赞同的问题。他认为，由于这次行动，老挝首相很可能被推翻。

除了最后这一点，罗杰斯的话是击中要害的。不幸的是，尼克松简直就不认为他的国务卿的头脑是清醒的。去年讨论在柬埔寨采取行动的问题时，他听到过类似的反对意见，但是那些预料中的可怕的意外情况，一次也没有出现。至于军事上的把握，他相信艾布拉姆斯和穆勒的话。他听戈德利说，不论梭发那公开可能采取什么立场，他是持同情态度的。因此，他下令立即执行朱普行动以及车邦行动的第一阶段计划。（第一阶段是指由美军守卫通向老挝边境的九号公路。）但是他也命令海军上将穆勒研究，是否可以不调用空降部队进攻车邦，或者进攻而不由美军负责空运。（这里的问题在于：运送南越军队的直升飞机在着陆时是否构成库珀—丘奇修正案所禁止的“在老挝的地面战斗”。）熟悉尼克松的人都应

该懂得，一旦他的话说到这个地步，就再也说服不了他。他既然下令执行第一阶段计划，就必定会下令执行第二阶段计划，不论他在最后下令之前需要费多大的周折。但是，并不是全体与会者都了解尼克松的。连穆勒这样的老搭档也不能肯定，尼克松实际上已在那一天下定了决心。他要求进一步研究空降部队行动问题，给人以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印象，在军事系统里逐级下达的时候，一定会被人夸大。

又一次军事行动即将开始，这自然激起国会和新闻界的反对。六十四名众议员在阅读了关于美国为了支持南越在柬埔寨的行动而进行空袭的报道之后，在一月二十一日提出一项法案，禁止动用经费为在柬埔寨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提供美国的空中或海上的战斗支持"。显然，他们的说法是，河内有权拥有不受干扰的庇护所，以便从那里进攻我们的盟国，并在金边建立共产党政府。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和马克·哈特菲尔德，以及另外十九名参议员，重新提出了拟议中的从越南脱身法案；由于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法案要求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而不是六月三十日）撤出一切美军。

随着老挝行动的第一阶段开始，国防部要求，并得到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同意，把军事调动的情况向西贡报界进行介绍，但规定不供发表；这样就可以既保密，又防止报道上的失真和差错。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天真的错误。官方的情况介绍反倒使走漏消息日益严重。西贡记者团可能不发表这些消息，但是他们可以自由地把基本事实告知他们在华盛顿的同事，而后者是不受约束的。华盛顿记者团和电视网的表现是不同凡响的，他们不仅竭力暗示，盟国即将在老挝采取行动，而且把禁止发表消息本身也当做一条大新闻来报道，说这是欺骗和隐瞒的罪恶阴谋。

不久就发表了社论。《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在二月三日

对计划中的行动表示不安。《华尔街日报》在二月五日也参加进来，而且不甘落后的《纽约时报》又补登了一篇社论，强调指出，想切断通过老挝的供应线是必然要失败的，因为可以割断的东西实在可怜。《纽约时报》的统计家显然和中央情报局的统计家不一样，后者曾经估计，在这次旱季里，有一万八千吨物资已经通过车邦。许多别的报纸也加入了大合唱。国务院在二月一日以艾布拉姆斯向西贡记者团介绍情况时采用同样的原则向共和党参议员乔治·艾肯介绍了情况，结局是一样的，不到二十四小时，消息就传出去了。

对于尼克松来说，这一切真是使他太容易回想起一九七〇年关于柬埔寨的经历了。而这次和一九七〇年一样，他缩回到他的贝壳里，寻求他认为支持他的政策的顾问们的支持。我在二月一日向阿格纽、康纳利和米切尔介绍了关于老挝行动的情况。我向他们详细陈述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包括我自己赞同这次行动的倾向，以及罗杰斯一月二十七日发言的详细摘要。正像我们预料的那样，他们赞同进行这次行动，实际上找他们来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第二天上午，二月二日，我交给罗杰斯、莱尔德和赫尔姆斯一份长达五页的备忘录，其中列举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并包括了罗杰斯一月二十七日的论点；我请他们发表意见。没有人发表意见。尼克松在当天下午五点会见了罗杰斯、莱尔德、赫尔姆斯、穆勒、黑格和我。没有人发表新的论点。

那天深夜，在白宫聆听过歌唱家贝弗利·西尔斯的演出之后，我又见到了尼克松。这次会见若不是翻阅日记我早已忘却了。日记中说，我建议他再次研究一下拟议中的行动，不论这次行动无疑地在军事上是多么有利。人们对这次行动已经不会感到意外；我们的政府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尼克松似乎很轻松，他好像对于和苏联人举行最高级会谈更加感兴趣。

但是，尼克松只要一旦走上一条他认为是坚实可靠的道路，一般地是不肯知难而退的。二月三日，也就是第二天上午，他对我说，他决定继续干下去，并情愿在国内和对苏关系上蒙受损失。然后他召见米切尔和康纳利，他们都劝他进行下去。从十二点半到下午两点，海军上将穆勒和我在我的办公室里向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介绍情况。尼克松信步走了进来，把我们三人都带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去继续商谈。斯坦尼斯也认为这次行动是有道理的，这时尼克松下令"执行"。我把这道命令扣压了几个小时，以便再一次由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进行研究，并再一次和总统商谈。到了下午六点，我把总统的决定通知了总统的主要助手们。

南越军队在二月八日越过老挝边界，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行动。参议员托马斯·P·奥尼尔，以及三十七名联合提案人，在二月九日提出了一项法案，不仅禁止美国直接干涉老挝，而且也禁止美国对在老挝的任何军事行动给予任何支持。我们开始演希腊悲剧中的又一场戏，使我们这次全国性辩论的每个参加者，都按照自己的逻辑，造成了全国性的瘫痪状态。老挝行动的目的在于既保存了南越的生存机会和我们的国际信誉，又使我们能够更快地从越南脱身。这场辩论的主题是，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每年撤军十五万的政府是否可能具有取胜的决心（胜利一词早已变成一个附加词）；既对盟国履行义务，又要结束战争，这种努力是否实际上是一种为了无限期地把战争继续下去而使用的托词。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国会通过的决议像潮水般地涌来，千方百计扼杀一切灵活性或行动上的自由。

兰山719军事行动

这次行动是在将信将疑的情况下构想出来的，并受到各方面

的非难，然后又在一片混乱的状态中付诸实施。不久后，情况就清楚了，我们多次聆听过的、说得头头是道的宏伟计划，只不过是参谋人员的纸上谈兵，而不是军事现实。我作为访问过越南的人，我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越南化计划取得的最确定无疑的成就之一，就是我们把介绍军事情况的技术传授给南越人了。我把这种介绍情况戏称为"痴人说梦"，其实质是，用大量事实，以无比自信的口吻，把听众弄糊涂，使他能够跟得上、听得懂就算万幸。在一系列图表、示意箭头和统计数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失去了就内容提出疑问的机会。他从杂乱无章的材料中总算提炼出一个问题来，并深感自豪，因此也顾不上去坚持要求一个有道理的回答。

南越的作战计划是经过我们的军事指挥员批准，而且无疑地是研究过的。这项计划明确地预测，会迅速地切断小道系统，接着系统地破坏整个后勤结构。但是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出，南越师没有受过必要的训练来进行"兰山 719"行动所要求的那种大胆进攻。南越人把这次行动称为"兰山 719"。* 他们擅长于在南越进行静态防御；他们的进攻行动通常是为了绥靖的目的在农村进行无阻挡的扫荡。这次他们被送到异国，而且第一次失去美国顾问和美国空袭指挥官的帮助，却被送去和主要供应基地就在附近的可怕的北越师对阵。他们小心翼翼地开展行动，这招致北越人采取事先摆好阵势的打法；正如我在二月二十二日向海军上将穆勒指出的那样，北越人是擅长于这种打法的。我提醒说，如果南越人继续采取这种防御策略，他们可能会被赶出老挝。

至于我们，到了一九七一年，我们在西贡的指挥部专心致志于下列工作已近两年之久，即既要重新部署兵力又要防止出现灾难。诚然，就在老挝行动正在付诸实施的时候，要求指挥部撤军六万。

---

* 兰山是北越的地名，在古代，越南人曾在那里打败过中国人。

它简直是难以兼顾：既要撤军，又要执行进攻行动。它保持了沉默；这时，南越的作战指挥部就设在离车邦五十多英里的一个安逸的永久性基地上。它没有建立特殊的指挥结构，以进行有人向华盛顿报告说是“决定性的”行动。它没有试验过，究竟南越的空中指挥官是否能够代替美国的空中指挥官。等到我们发现许多南越人不会说英语时，已经为时过晚。因此，没有经过考验的南越师失去了大部分原来的计划赖以控制战局的空中支持。由于一切照常进行，这次老挝行动不得不和在印度支那进行的其他任务争夺财力。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我们的努力受到了挫折，而且对于出现决定性转折所寄予的希望也破灭了。

第二阶段行动在二月八日开始后，我们日益明显地看到，只是在每天早晨一位不幸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上校向我介绍情况时，事情才和原来的计划有相似之处。当事情变得不妙的时候，通常的办法是，设法不让政府最高级官员知道，希望问题会消失。这样做的理由是，让华盛顿知道过多的原始事实可能使人惊慌失措。但是问题并未消失。无法掩饰的现实是，南越部队在渗透达到八至十英里时，简直就止步不前，并挖掩体以自保。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是在切断供应线，搜寻贮藏物，还是在坐等北越的进攻。

军事指挥官和大多数政府官员一样，总是喜欢对自己的计划作出很大的许诺。尽管这次军事行动已经明显受挫，在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之间，在六次不同的场合，有人向我提出保证开进车邦的新日期，但都没有实现。我于是在二月十三日开始要求海军上将穆勒指示艾布拉姆斯将军“把南越部队的实际流动情况和每个阶段完成的时间同原计划”进行比较，“并说明二者差异的原因”，以便对形势作出估价。艾布拉姆斯将军一直到二月十六日才作出答复，提出一些主要和敌人防空炮火有关的技术原因，在一个外行

人看来，这些问题在原先制订计划时本来是可以预见得到的。艾布拉姆斯最后乐观地表示："我相信最初规定的任务终将会完成。"

但是在后来的四天里，情况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从战场上传来乐观的报告，但远与战斗中明显的僵持的局面不相一致。一直到三月十八日这一军事行动结束时华盛顿才发现，阮文绍总统曾在二月十二日命令他的指挥官在向西推进时要小心从事，而且规定一旦伤亡达到三千人时，就立即停止全部军事行动。由于可能有河内的人打进了南越的高级指挥部（河内对南越高级指挥部内情的了解比我们清楚得多），他们一定知道这一情况，因此能够采取旨在造成最大限度伤亡而不是争夺地盘的行动。我们如果事先知道有过这样一项命令，白宫就决不会批准这个车邦计划。

我在二月二十日再次要邦克提出他和艾布拉姆斯对形势的估计，我补充说："在我看来，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这次行动的目的不在于夺取地盘或给养，而在于尽可能破坏和切断这条小道本身。"为此，艾布拉姆斯和邦克拜访了阮文绍和他的参谋长高文园将军。邦克大使就这次谈话提出报告说："结束谈话时，我们两人都感到，毫无疑问，南越军队是坚定的，他们决心把这次行动进行到底。"就在那一天，我由于放心不下，要求黑格亲自到越南去作现场判断。但是由于莱尔德和穆勒都表示反对，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他们两人认为，白宫派专人去，等于表明对艾布拉姆斯缺乏信任，这一点他们不能赞同。

二月二十三日那天，正好穆勒不在华盛顿，按照资历，威斯特摩兰将军代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务。我趁这个机会，要求举行一次情况介绍会，实际上我是想听听威斯特摩兰的看法。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规定，白宫只能同联席会议的主席打交道，而不能同个别参谋长打交道。因此，以前我们没有机会直接找威斯特摩兰。

威斯特摩兰看起来就像是美国军官的标准形象：身材修直，面貌英俊，态度认真。他和许多同事一样，在投身越南战争之初是满怀着自信和乐观的，但是只落得个茫然和沮丧的结局。他接受了军官手册中没有过先例的各种限令，去对付采用我们的军官学院没有教过的战略的敌人，不久就陷入自从南北战争以来一直是美国指挥官的致命伤的困境：以后勤代替战略。

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样的难得而明显的例子以外，当代的美国将军们总是宁愿依靠投放大量作战物资来耗垮敌人，而不是依靠大胆地打击敌人；依靠优势的物力，而不是依靠高超的谋略。在这方面，他们反映了我们非军事化的、以技术为中心的社会的偏向。但是，对付一个只有按他自己的条件才肯打的敌人，消耗战是不能取胜的：越南的地形条件、游击战的特性、庇护地区的存在，这一切加起来，使威斯特摩兰不能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耗垮他的对手。相反地，隐身在居民之中，并能够选择出击时机的北越人，却耗垮了我们。然后就是一九六八年的新年攻势，虽然这是北越在军事上的一次惨败，却成了我们自己一次心理上的胜利，使我们走上撤军的道路。（为了公正起见，必须强调指出，威斯特摩兰是在受到政治限制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这些限制使他不能采取任何可能证实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大部署——例如，在一九六七年就封闭胡志明小道。）

不论威斯特摩兰失败的原因是什么，那些曾经勉强受到公众赞扬但后来又由于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受到公众责骂的人们所受过的怠慢，他算是经受住了。不论谁出了差错，都会变得湮没无闻，而且因为只是功亏一篑才没有青史留名，这种湮没无闻的滋味就更加令人难受。威斯特摩兰坐在陆军参谋长豪华的办公室里，考虑着购买军火的问题。由于他的职位，他享受着延期退役的待遇，但是他没有受到制订政策的人们的理睬。他曾英勇地指挥过

这场战争，虽然并非常胜，但是却从不去征求他对这场战争的意见。关于拟议中对车邦的进攻，没有个别征求过他的意见，虽然有人告诉我们，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一起表示过同意。

我在二月二十三日会见了威斯特摩兰，他的看法很悲观。他认为投入老挝行动的兵力不够充足；他自己曾经认为需要用四个师美军的兵力才能拿下和守住车邦；南越投入的兵力连两个师都不到。而且他还认为，正面进攻不是破坏小道系统的最好办法。他建议从溪山抽调空降部队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以便在多处切断小道。这样可以使共产党的供应系统陷入最大限度的混乱，而且，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这样做所冒的风险亦小得多。即使威斯特摩兰对他的继任者有一种天然的偏见，他的话在我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

莱尔德和穆勒却不以为然，他们的理由是，在考虑计划的时候，威斯特摩兰并没有表示反对。他们深信，艾布拉姆斯如果知道他的前任在放马后炮，一定会感到不高兴。他们坚持战场指挥官享有自主权这一空洞原则。但是指挥理论不能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即：弄清我们要破坏共产党供应系统的目的是否正在实现。我们的行动无疑产生了一些效果。在战斗中消耗掉的给养在较远的南方将得不到补充。关于找到贮藏物的报告，不可能全属虚构，虽然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和上一年在柬埔寨的行动相比，声称找到贮藏物的那种炫耀劲头要差得多了。

除此之外，事情就难讲了。每天都有人告诉我们说，正在切断小道。但是沿着小道的自动感应器却报告说，在某几段小道上，运输量还是不小的。每天早晨向我汇报情况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上校辩解说，这是因为在战争的压力下，敌人加紧在小站之间往返运送给养。我觉得这话说不通。事实真相可能是，给养的运送速度放慢了，也被消耗掉了；但并没有中断。

对战役进行病理学研究是件有趣的事情，其中有一个题目，那就是：判断追求目标到什么程度就成为盲目迷恋了。对拿破仑来说是莫斯科，对德国人来说是凡尔登和斯大林格勒，对英国人来说是加利波利。这些地方在战役的原定目标早已达到之后，还像磁铁一般地吸引着日益增多的物力。车邦的情况也是一样，只是规模小得多了。我在二月二十四日向汇报情况的军官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为什么我们要进攻敌人有准备的车邦呢？在更往南的地方不是也可以切断小道吗？（二）为什么我们不绕过车邦往西推进，并发动一次直升飞机的进攻，以切断二十三号公路（和泰国边界平行的一条公路）？（三）如果我们决心拿下车邦，为什么不投入更多的后备力量？他们的答复只是把原定的行动计划重复一遍；他们告诉我的是我们正在做些什么，而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到了二月末，北越调动四万多人的兵力投入战斗，这个数字比我们得到的报告中预测的可能数字要大得多。*西贡的兵力，由于各守一方，却没有什么变动。我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二月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指出了这一危险，并且质问当时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空军将领约翰·沃特，继续从正面进攻车邦究竟有什么道理。他回答说："收到的报告没有说是什么道理。"由于事实真相是捉摸不定的，要解释我们的政策已经成为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我开始怀疑，甚至连五角大楼也不了解情况。

我在三月一日通过秘密渠道直接发电报给邦克，表示关切：

自从这次行动开始以来，总统收到了关于对计划进行各种修改的报告，这些修改是由南越部队所面临的一系列非常实际的困难所造成的。他从报

* 我曾经和伊扎克·拉宾谈论过这次在老挝的行动。他是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的英明的参谋长，当时任驻华盛顿大使。他预测北越的反应会是，从南越临时抽回几个师并从南方发动进攻，而不是像我们料想的那样从北方发动进攻。事实证明他说对了。

告中发现，战场上的情况以及有关的作战报告和预测的情况之间是有距离的。具体地说，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下述境地：

（一） 最初向总统汇报说，在开始执行H时行动后四至五天内，南越部队将攻克车邦；

（二） 到了二月十五日，总统被告知说，由于天气、给养问题、九号公路上的情况以及敌人的抵抗，会把实现这一目标的日期推迟八至十天；

（三） 然后，总统又被告知说，车邦已不太重要，因为一切通过车邦的公路都已在车邦东南的地方被切断了；

（四） 然后，又告知总统说，将修改兵力部署，用两个团的兵力沿九一四号公路和北面高地的一根位于西北方向的轴线发动进攻，其目的在于攻克车邦。

自从收到上述各种看法的有关情况以来，战场上的情况并没有证实我们有能力完成这些任务。这种情况很自然地在这里引起了对整个行动的前景的关切。使我深感关切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敌人显然已经投入全部力量的时候，南越部队投入这次行动的力量却是有限的……

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固守城池。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如果我们不断在事实面前遭受挫折，惊慌情绪恐怕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我们在西贡的指挥部在六年的战争中收到焦虑不安的文职官员拍来的这种劝说性电报已经不计其数了。他们的倾向是不理会那些头脑发热的华盛顿决策者们继续坚持下去；过去用这种办法度过了许多危机，现在何必又要改变做法呢？邦克在三月三日拍回一封安定人心的电报，叙述了阮文绍和高文园对于胜利有献身的气概(但这并不是我们的问题)：“在这种行动中，人们不能拘泥于事先形成的关于理想做法的设想。必须保持足够的灵活态度，以适应可能由于天气、地形或敌人战术的变化而造成的千变万化的情况。”这个说法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却并不解决我们的严重关切；这种关切不在于做法方面，而在于：我们不论采用什么计

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在破坏敌人的集结呢？他的结论似乎使我们放了心："艾布拉姆斯将军和我都相信，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方针，在柬埔寨和老挝的行动定将影响敌人在南越的活动以及我们原先设想的撤军行动。"

后来有几天，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在一些南北越部队交战的战役中，北越人勉强退让了(如果我们得到的报告是可信的，情况至少是这样)。在三月三日朝车邦方向发动了新的进攻，到了三月六日，南越人逼近目标简直到了已经可以声称攻克的程度。但是不久，人们发生怀疑，他们要攻克车邦只不过是为了可以不丢面子地从老挝全部撤退。到了三月八日，艾布拉姆斯告诉我们说，已经占领车邦地区的南越指挥官认为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急着想要撤退。

这个要求和我所理解的关于这次行动的任何设想都是背道而驰的。没有理由为了占领一个偏僻的老挝小城三天去冒这样大的风险。这次行动的全部用意在于：破坏北越的小道系统，使它不能在旱季的大部分时间里被使用；并毁坏一切找得到的贮藏物。我在三月九日提醒邦克注意这个问题，于是他和艾布拉姆斯再次拜访了阮文绍，他们得到了一项更加令人迷惑不解的澄清：阮文绍没有从老挝撤军，他只不过是在轮换他的部队。他将撤走他的战略后备力量，但是会用新的部队补充上去。这些新的部队将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搜索贮藏物，然后将沿着九一四号公路通过六一一号共产党根据地朝东南方向撤退，并摧毁沿途的共产党供应系统。

有两个因素使我产生怀疑。阮文绍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他说的是哪些新部队，而且我们也不能想象出来可能是哪些部队；我们肯定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新部队。过去十多天来，我们一直要求他把第一军区的另一个师——第三师——调来。阮文绍拒绝了，他认为——尔后一年的情况发展证实他的看法是正确的——第三师不

是久经沙场的北越人的对手。那么，补充兵员从何而来呢？参谋长联席会议每天早晨派来向我汇报情况的那个可怜的上校成了我嘲讽的对象。他每天对我宣读官方的情况，但是大量事实却证实南越人实际上在撤出老挝。他们甚至没有提出任何托词，说明他们为什么试图通过六一一号根据地撤出。我们不了解具体情况，但是南越人的伤亡已经达到阮文绍规定的限额：这次行动已经结束，虽然他们不告诉我们。

这时，我坚持要派黑格去亲自了解情况。莱尔德也已经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他急于要别人分担责任，于是很快就同意了。同时，我在三月十八日通过秘密渠道向邦克拍了一封电报：

我希望阮文绍懂得，他不应把美国总统的信任这笔本钱随意挥霍掉。而且这可能是他得到大量美国支持的最后机会了。

到了三月十九日，黑格抵达越南，消除了所有的幻想。他报告说，经过三个星期的连续战斗，两个南越师的指挥官已经不想把这次行动再继续下去了："我视察第一兵团之后深信，当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增派援兵和留在老挝不走的问题，而是迫切需要使南越军队懂得，必须在美军密集火力掩护下，以一种有秩序和战术上稳妥可靠的方式撤退出来。"

在那几天里，就开始大规模从老挝撤军。除曾经出现过一些惊慌失措的士兵抓住直升飞机的降落装置不放的个别不光彩的电视镜头以外，南越人脱身的方式总的说来还是过得去的。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白宫也难以作出不偏不倚的判断。这些镜头更使这种可能性完全破灭，而且华盛顿消息闭塞，加上这次行动偏离原计划很远，以致于无法及时获得其他不同的事实真相。

对柬埔寨的朱普橡胶园的进攻也同样没有结果。在杜高智将

军指挥时，曾经取得一些战果，南越军队中像他这样进攻意识很强的指挥官还是不多的。但是杜高智在二月二十三日因直升飞机坠毁身亡，这次行动就使南越人陷入那种他们所特有的小心谨慎的状态之中，反而招致了它企求避免的那种后果。这次战斗行动逐渐停息了，尽管在柬埔寨的一个城镇斯努附近受到一次局部的严重挫折。

一九七一年的旱季攻势是个分水岭。它标志着美军在印度支那参加的——即使只是作为支持者——最后一次进攻性行动。它显然没有实现我们的全部希望；但它也并没有完全失败。像在越南问题上经常遇到的情况一样，事实真相是介乎政府的宣告和批评家们的谩骂这二者之间。对车邦的进攻给北越后勤集结造成破坏的程度，还不足以阻止河内在一九七二年发动攻势。但是它延缓了这场攻势，使它推迟好几个月，一直到旱季快结束时才开始，而且把攻势最大限度的波及面限制在离北越最近的一些地区。一九七二年敌人进攻的主要锋芒来自非军事区的那一边，河内在那里作战，供应线最短，受到柬埔寨和老挝的行动影响也最小。北越人在一九七二年越往南打，力量就越小，因为在前两年，我们的行动破坏了他们的庇护地区和供应系统。事实上，南越地面部队和美国空中力量的结合，使我们能够勉强地缓冲一下北越在一九七二年发动的攻势。如果不是由于进攻老挝和柬埔寨造成对敌人的消耗的话，这本来是不可能办到的。在我看来，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的两次战役，在一九七二年拯救了我们。

同时，对老挝的进攻远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原因有好几个。我们的计划工作人员对于南越人的作战情况的了解，远不如对于我们自己来得细致。如果动用的是美军的兵力，我们的计划工作人员绝不会采取这样重大的行动去进攻北越，勉为其难地把战争进行下去。由于来自华盛顿的各种压力，我们在西贡的指挥部已

变成了专门负责重新部署兵力的总部了。这一次突然要求它对于分别在两个相距很远的战区进行的复杂进攻行动加以监督，同时又要按照一个它也不以为然的时间表撤军。法律还禁止它派遣自己的地面人员随着南越军队前进，哪怕只是为了协调我们自己的空袭行动，也不允许。由于预算遭到削减，我们空军出动的架次也受到限制。我们在西贡的指挥部做事又很死板，它没有打破常规，从而保证决定性的行动可能获得成功。华盛顿则按照习惯性思维方式办事，它更多地注意对付国内批评它的人们的抨击，而不是对付战场上敌人的攻击。

至于南越人，在老挝的行动暴露出他们的许多老毛病。他们的计划大部分都是抽象的，在计划中，亦毫不考虑当地情况，一味生搬硬套我们的指挥参谋学校中教的东西。我现在回想起来，甚至怀疑南越人是否真正理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当然不是车邦或其他地理上的战利品。我们的目标是在整个旱季延缓北越的物资和后勤运输，以便减弱一九七二年攻势的锋芒，因为那时美军只剩下一部分部队了。后来才了解到，阮文绍所要求的似乎是立竿见影，而不是长期的战略。最重要的是，南越人的军事组织中存在着传统的弊病。他们后备力量薄弱，除防守性战役外，经受不起重大伤亡。每个指挥官都懂得，他的政治势力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他所指挥的部队的力量和士气，因此对于这笔本钱倍加爱护，似乎不愿为很长远的目标蒙受损失。南越人这次打得比以往出色，但是不容否认，没有产生效果。一九七一年的旱季攻势，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制止河内在一九七二年发动的进攻，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次进攻的势头是被减弱了。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很可能在下一年又会面对另一次重大的军事上的挑战。

向华盛顿进军

就在这个时刻，公众抗议这只不甘心休眠的野兽——它是我们的恶梦、麻烦，而且很奇怪地也是我们的动力——又跳了出来。在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国内辩论的主题谈到的是策略方面的问题；即使在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某些更宏大的目标，对立的观点有时也会找到共同之处。但是，如果对根本的前提没有一致意见，这时反对的不仅是观点而且是动机，争论就可能带有内战的性质。

在老挝问题上，"信用差距"* 与其说是政府的缺陷，毋宁说是反对派手中的武器。反对派故意追逼政府，以致于受到困扰的政府官员不是作出一些后来证实为谬误的预言（著名的预言"隧道尽头的亮光"是观察和判断上的谬误，但不是谎言），就是对于事实闪烁其词。然后又滥用这种情况破坏对政府提出的目标的信任。要求完全公布事实的呼声永无休止，但是却无法满足，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华盛顿难以得到事实真相，如在老挝的行动；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只有甘冒失去成功的可能性的风险，才能够公布军事或外交计划中的某些成分。此外，许多批评者要求的当然不是事实真相，而是政治斗争中的炮弹。他们常常要求政府把他们已经得知的机密的内部情况公开发表。

有人在反战纲领中要求共同撤军，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两年前，有人要求我们象征性地单方面撤军，以表示诚意。从那时起，已撤出数十万美军；美军不再参加地面战斗的日子就在眼前了。但是批评者现在要求我们无条件地规定一个最后完全撤

---

* 指政府官员的言论与事实不符。——译者

军的日期。不久他们就会提出要把阮文绍撤掉，换言之，就是要接受河内的条件。

《华盛顿邮报》——它是一份反战言论比较激烈的报纸——在二月二十六日甚至反对尼克松说过的一句话："只要还有一名美国战俘被北越扣留不放，我们的军队就要留在南越。"他们没有把这句话当作是一种转弯抹角的说话方式，其实美国将不留下留守部队(这是几个月前已经在秘密谈判中作出的让步)。相反地，倒把它看作是承担了无穷无尽义务的表现。《华盛顿邮报》写道："这也等于承认，尼克松政府并没有一个单方面的、不变的计划，以保证美国从这场战争中脱身出来……"但是要单方面地、一厢情愿地结束战争，只有无条件地接受敌人的条件；如同河内明确表示过的那样，单方面撤军达不到这个预期的目的；它只会使河内继续扣留我们的战俘。通常支持我们的《华尔街日报》在三月三日也加入了大合唱。它分析政府在战争中追求两个目标——撤出美军以及保证在西贡的政府是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同时它提醒说，后一目标虽属可取，但不应抹杀撤军的必要性。《密尔沃基日报》在三月四日以更为生硬的方式表达了同一观点："只要我们呆在那里一天，南越人就会依靠我们。他们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如果他们现在还不能自立，那就无可挽救了。美国不能再继续忍受这场血腥的、悲惨的和不道德的战争在国内造成的挫折和混乱状态。"

不久在国会中也反映出这些观点。从老挝的行动开始到结束，国会通过的决议不下五个，其目的都是在于限制总统对于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权，禁止为在柬埔寨和老挝的作战行动支付费用(我们的所有研究报告表明，这两次行动在越南战争中起了关键作用)，或者为无条件撤军规定期限。参议院民主党政策委员会在二月二十二日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

前从印度支那撤退一切美军，包括空军和后援部队。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和参议员威廉·萨克斯比以及十六名联合提案人一起，在二月二十五日提出一项法案，禁止美军在未经国会“事先的和明确的”批准的情况下，支持对北越发动进攻。这项修正案的意义不在于它对政府的意图加以约束，而在于它设法以法律形式使此时此刻正在派军队肆意蹂躏所有邻国的那个国家享有豁免权，从而也就使它没有任何必要把自己的防务力量关在家里。

从老挝撤军之后，新闻界和国会的压力都增大了。从四月一日到七月一日，参众两院一共进行了十七次表决，其目的在于限制总统指挥战争的权力，或者为单方面撤军规定期限。（这使全年此类表决的总数达到二十二次。）参议院在六月二十二日以五十七票对四十二票通过了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提出的“参议院的意见”提案，宣称“美国的政策是尽早结束在印度支那的一切军事行动，而且只要美国战俘获得释放，所有美军将早日撤出，撤军期限为法案付诸实施之后的九个月之内。”虽然这种“参议院的意见”提案，一般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这项曼斯菲尔德提出的提案却说明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悲剧：反对派不愿为自己的观点承担最后的责任，但是却会竭尽全力使政府不能奉行一项有连贯性的战略。

作为这种带普遍性的厌倦情绪的反映，人们越来越明确地主张，不论在越南问题上存在什么合乎情理的目标，它的重要性也抵不过国内对战争的反感。在两年以前，人们要求以越南化作为结束我们行动的手段；但现在，人们抨击越南化是在拖延战争。《生活》杂志在四月十六日批评政府不肯规定撤军期限说：“对撤军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就等于是在打一场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战争。……认为战争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情的国家，也会认为这种前景是不能接受的。”《纽约时报》在四月二十五日宣称：“如果尼克松先生放弃越南化这种令人痛苦的妄想，并明确宣布他主张只要对

方同意释放所有美国战俘并保证美军安全撤出，就按规定期限早日撤出在越南的所有美军，那么他就一定会得到公众广泛的支持。”一些持比较温和主张的人认为，在单方面撤军的同时，应责成阮文绍总统扩大政府的基础，和共产党“妥协”——好象他是作出让步的主要障碍，也好象实际上存在这种谈判的可能性似的。《纽约时报》在四月六日发表社论说：“西贡的选择在于，要末无限期地把战争继续下去，要末谈判达成妥协的解决办法。采取行动扩大西贡政府，而且一旦共产党接受停火就允许他们参加今年的选举，这些将是走向政治解决的有效步骤。”

有些以前曾在约翰逊政府中任职的官员，在他们任职期间连个有限度的撤军计划都没有提出过，此时却继续相信，作出单方面完全撤军的许诺将会保证早日实现和平。克拉克·克利福德和艾夫里尔·哈里曼竭力宣扬这种观点，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别的前政府官员亦成群结队地在国会进行院外游说活动，要求规定最后撤军期限。对前一年停火倡议的颂扬声一时间完全消失，代之以对政府未能提出新的倡议所进行的无情斥责，虽然所有的事实都表明，河内对我们的倡议已毫无兴趣。不论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河内一直坚持要求，除非我们解散西贡政府，否则决不结束战争。也没有人解释过，一旦规定了撤军最后期限，继续打这场战争还有什么意义；以及当我们已经宣布放弃整个事业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为新的伤亡数字进行解释。在一九七一年四、五月间，在华盛顿举行了六个星期的示威游行：越南战争退伍军人反战集会（包括点烛游行、“以游击战为主题的戏剧”、国会听证会以及象征性地毁弃勋章的活动）；在政府办公楼中散发反战小册子；以及大规模的五一节活动，如怠工、捣乱和破坏行为，以便“使政府住手”。⑨

厌战情绪不仅只是批评我们的人才有。尼克松坚持他的方针，

我也坚决维护这个方针，并不是由于我们想继续打下去，而是因为我们不能同意，为了退出战争，居然不惜解散一个友好的政府（我们的上届政府组织了一场政变使这个政府上台），并把依靠我们支持的千百万人已经作出的牺牲视为儿戏。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向美国的母亲们说明：为什么在已为单方面撤军规定了期限的时候，还要她们的儿子去冒险。尼克松发现，要以落落大方的风度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是困难的。但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和在演说中还是作了一番值得称道的努力："问题很简单：我们是否应该在明明知道我们的行动会把这个国家交到共产党手中的情况下退出越南？还是应该在使南越人有相当的可能性可以作为自由人民生存下去的情况下才退出去？"⑩

大多数批评我们的人对这个问题都感到厌烦，有的人还讥讽它是"无尽头的"义务，但是这丝毫不能减轻这个问题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作为全世界自由人民的堡垒的美国，不能因为厌倦就轻率地背弃一个小盟国、十年的义务、四万五千伤亡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庭所忍受的痛苦。如果我们草率从事，这些家庭曾作出的牺牲就会成为事后回想起来的无谓牺牲。而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增加了战争的危险。我在二月间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 在九月间，中东呈现出千钧一发的局势。无论哪一方，只要行动更冒险一些，本来是会爆发一场战争的。……我们避免了中东的战争，依靠的也是我们坚定而克制的态度。如果我们没有以过去（在东南亚）的行为建立起某种程度的信誉，在九月间我们坚定而克制的态度就不会有什么作用。

我们无法使国内的反对派相信这个道理。他们并不认为河内所作所为有任何不严肃或挑衅的地方。每逢政府提出一项主张，几乎总是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要出来加以贬斥，或认为这种主张

带有欺骗性或是毫无意义的。每逢北越要弄一次手法，不论是多么浅薄的手法，他们都认为是一次松动，只是这个一心想打仗的政府过于迟钝，才没有加以理睬。尼克松宣扬自己的主张，而且对他们作了一些沉不住气的批评，这当然无补于事。但是人们如果不愿意承认，在越南战争期间，我国的一些最优秀的人士认为他们为和平服务的最好办法就是诋毁自己的政府，就无法了解在越南问题上我们的悲剧。我在四月八日一次背景情况介绍会上曾经就这个我国最深刻的问题，作过扼要的叙述：

我记得在三年以前，人们通常认为，以谈判为结束战争的有效办法，是一种最开明的主张。

时至今日，许多人已经认为，以为谈判仍然可以作为结束战争的手段的想法，实在是太愚钝了。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人们认为我们应该以越南人代替美国人打仗。现在这种主张也受到了攻击。……

我们认为，必须给南越人一定的机会，让他们自立。而且，经过这七年的战争和四万美国将士的伤亡，如果美国总统却故意把南越交给了共产党，这样做对国家所造成的后果，将使我们在今后许多年内深受其害，即使这种解决办法使我们在当时感到一种暂时的宽慰。

我并没有放弃希望，总认为我能够弥合政府和批评者之间的这一裂痕。从一九七〇年四月一日到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期间，我私下会晤学生和举行抗议的青年人十九次，反战学者二十九次，参议员和其他知名的批评者三十次——总数共达七十八次，也就是每周一次还要多。其中许多人是昔日学术界的同行；有些成了新交的朋友。

一九七〇年我们在柬埔寨采取了军事行动，在此期间，我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和平主义者，他发誓要绝食到这次行动终结之日，或

者到他能够向总统当面陈述他的看法时为止。此人名叫布赖恩·麦克唐奈。他每天和他的朋友一起在白宫对过隔着宾夕法尼亚街的拉斐特公园里静坐一小时，以表示他们愿意为结束这场战争而牺牲自己。一九七〇年六月初，由一位双方都认识的朋友建议，我未经白宫许可，便到麦克唐奈在乔治城的简单住处去拜访了他。我虽然不同意他的结论，却被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我对他说，他是在为一个已经实现的目标而牺牲自己。已经作出决定，要撤出柬埔寨；我向他保证，我们会付诸实施。此外，他不能指望通过道义上的讹诈而见到总统；如果他停止绝食，我会尽力安排他会见总统。他停止了绝食。我们也按期撤了军，但是我怎么也没有能够劝说尼克松接见他。

以后我和布赖恩常见面，通常在我的办公室里，总是避免惹人注意。他常和他那不平凡的妻子艾丽斯同来。艾丽斯是一个在费城的黑人区做社会工作的年轻黑人妇女。几个月之后，在黑人区的一次无端的杀人事件中，她被残酷地杀害。憎恶暴力的文质彬彬的人物，竟遭此毒手，实在残忍！我私自参加了她的葬礼。

一九七一年初，布赖恩产生一种极为浪漫主义的想法。他建议我和他的一些朋友见面，讨论战争和我们的社会问题。我把他们请到白宫。这些朋友原来是一名修女和两名普通的天主教徒。他们被指控为参与了一次所谓企图绑架我的阴谋的未被告发的同谋犯。后来报界通过麦克唐奈的一位朋友得知这次会晤的情况，我便受到秘密警察和司法部长的训斥，要我作出解释。

一九七一年三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和布赖恩以及他的朋友在白宫情况室会晤。我们力图为造成我们社会分裂的隔阂搭个便桥。他们斯文地表达了他们深刻而又激烈的反战主张；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应该怎么结束战争。我的问题是怎么把一些不管是多么深奥的不完整的想法变成政策。我们的问题是，政治家与

预言家之间，实干家与追求不朽真理的人士之间，总是谈不到一起。

我觉得，这些憎恨一切杀戮、一心一意、始终如一的和平主义者，比那些只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而不谴责北越或印度或苏联的军事行动的有偏颇的道德家们，更受到我的尊重。麦克唐奈认为，由于我们继续打越南战争，在道义上我们正在瓦解自己；我们正在毁坏治愈社会创伤的一切机会。我们正在助长这种想法，认为人的生命是不值钱的，是无关紧要的，只有权力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认为情况恰恰和他所说的相反。牺牲朋友，从而使所有依靠我们的人的信心发生动摇，这是不会确立我们在道义上的地位的。我认为我们的社会正在患一种病症，其痛苦远远超出越南的范围。人人顾影自怜，私下里的那种忧伤的感情就如同参加一场圣餐仪式时的感情一样。会议快结束时，我设法说明这场对话是议而不决的、令人沮丧和痛苦的："总得有人，我不知道应该是谁，在关心局势的人们和*左右*局势的人们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我承认，政府、掌权者以及能够左右局势的人应该搭五分之四的桥。但是，其余的五分之一必须由你们来搭，而我甚至还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说明，应该设法去搭这座桥。"

美国政府深感前景凶多吉少，但是出于对国家的长期利益的祝愿，认为世界自由国家人民的安全，会由于一种基本上自我欣赏的退让行为而受到危害。我们不能把上千万的东南亚人民就这样推向我们明知是压迫成性和残酷的共产党统治。我们准备接受最低条件，但是我们不愿和我们的对手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朋友，这样做会使我们的国家名誉扫地。而且如果我们接受河内的条件，也只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要末我们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和我们的社会准则相符合的妥协；要末在一九七二年再去面对一场军事上的考验。

恢复谈判

我一心想要通过谈判来结束我国在越南问题上的苦恼，以恢复它的团结和内聚力，没有别的目标是我更为热情地献身于它的了。尼克松对此勉强默认；我已经说过，他总是比我持更为怀疑的态度，认为要先在军事上摊牌，谈判才能成功。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在老挝采取行动之后，我们首先对一九七二年的军事前景作出估价，然后考虑应该怎样修改我们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以诱使河内采取灵活的态度。

在韦恩·史密斯领导下的由我的系统研究工作人员所作出的军事结论，证实是相当有先见之明的。他们认为进攻老挝为我们赢得了一年的时间。他们预测，由于我们在柬埔寨和老挝采取了行动，北越能够发动重大攻势的地区只有南越北部第一军区靠近非军事区的地方，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第二军区的中央高地。由于我们进攻柬埔寨，河内如果在第三军区发动攻势，也不会得到游击队的支持，因为在那里长期坚持常规的进攻是不可能的。至于第四军区，根本不存在主力部队进攻的威胁。由于在老挝的行动破坏了河内的后勤系统，在旱季的后半季节到来之前，不大可能发动进攻，可能不会早于一九七二年三月初。（这一估计只有三个星期的误差；事实上，进攻是在三月底开始的。）问题在于，河内的估计是否也是这样；如果是的，河内是否还会在一九七二年发动一场进攻，进行一场赌博；或者会在一九七一年试图进行认真的谈判。

我脑子里带着这些问题，重返巴黎出席下一轮秘密谈判。在我们正在老挝作战时，谈判不可避免地冷了下来。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中旬，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春水要求美军确定撤军期限；作为报答，河内将保证我们撤退时的安全和“商谈”战俘问题。我们没

有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这些方案，因为在上一年我们已经听说过了，也因为美国和河内之间单独实现停火是难以想象的。河内对期限的认识并没有改变；一旦我们接受固定的日期，不论发生什么别的事情，时钟总归是要向前转动的。我们也懂得，如果河内有什么新的有意义的东西要提出，它会留到下次和我秘密谈判时再提。沃尔特斯将军在四月二十四日和北越人在巴黎进行了接触，建议在五月十六日“在新看法的基础上”恢复谈判。河内表现出特有的宽宏大量，一直等到五月十四日才答复。不难想象，如果情况倒转过来，我们让河内等了三个星期才给予答复，而且只是在对方提出的日期的四十八小时之前才给予答复，我们的批评家会说些什么。河内同意谈判，但是提出要在五月三十日才开始。我们的反建议是五月三十一日，其原因部分地是由于不愿直截了当地接受河内提出的日期，同时也由于后勤和安全上的原因。（这天是一次周末假期的最后一天，因此我离开住地不会被人注意。）

在这次谈判之前，我向尼克松提出一项我打算提出的七点和平纲领。虽然尼克松基本上持怀疑态度，而且害怕河内会牵制我们，但是他还是同意把我们的建议作为一项“最后的建议”提出来。事实上，它是一项到那时为止我们所提出的最彻底的方案，经我和洛德以及我的工作人员斯迈泽共同拟定，并得到邦克的赞同，而且还经过阮文绍同意。这个方案的目的在于把我们的谈判方案和我们的行动一致起来。

在拟定七点方案时，我们认识到，尽管我们单方面撤出大部分兵力，我们不能以这一行动来换取河内的全部撤退。我们会设法把留守部队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由于国会要求规定期限的压力不断增长——麦戈文—哈特菲尔德式的修正案得到的支持票越来越多，可以说明这一点——连这种退一步设想也迟早会变得不起作用。作为第一点，我们提出，愿意规定一个全

部撤退的期限。我们放弃共同撤军的要求，只要河内同意不再向印度支那各国进行任何渗透。提出这个方案是设法使我们避免总是一味要求共同撤军，而同时事实上在单方面撤军。实际上，我们打算用撤出留守部队换取对方的停止渗透。从理论上说，如果北越部队得不到增援，就会衰萎。可以肯定，他们会违反不准增援的禁令（我们方案的第四点），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同时也违反了关于撤军的规定，就象事实上他们十年前在老挝所做的以及几年后在老挝和柬埔寨要做的那样。不论是什么协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决心使其实现。我们建议的第三点是，根据双方同意的最后时间表，在国际监督下（第五点），在美军开始撤退时，在印度支那全境恰当地实现停火。我们的第六点要求保证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中立和领土完整，并由双方重新保证尊重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的日内瓦协议。我们重申我们的建议，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并作为美军撤退时间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双方立即释放一切战俘和无辜平民（第七点）。南越的政治前途留待南越人自己去解决（第二点）。不用多说，我们单方面撤军，是以在所有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为条件的。只有在达成协议之后，才能开始计算期限。在本书的注释中，有这一建议的全文。⑪

这一建议标志着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外交斗争的转折点。诚然，它的实质内容在十六个月后被河内接受了。它把军事问题抽出来单独解决。即：美军撤退，停火，释放战俘。这是我就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之前，在一九六八年写的、刊登在《外交季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做法。阮文绍在一九七一年迫于无奈，接受了这一建议；这使我们误认为，在一九七二年当他认为他正在获胜时，他仍然会欢迎这一建议。

五月十一日的谈判是在达迪路的那间阴暗会客室里举行的。美越双方的代表团，再一次面对面坐着，中间是一窄条地毯和误解

的鸿沟。这次谈判后来成为和北越进行的第一次真正的谈判。谈判进行了三个月，终于失败了，其原因是到最后，河内继续坚持要我们先推翻我们的盟友和建立起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政府，它才会同意停火和释放战俘。

春水机敏过人，他不会不马上意识到我们在军事问题上的重大变化，但是他还在装糊涂。他仍然主张，“正确而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是，由我们规定一个单方面撤军的期限，而不要和谈判的任何其他方面联系在一起。他的立场毫无退让，仍然是，即使我们规定了撤军期限，河内也只能“商谈”，而不能保证释放战俘；他们显然以战俘要挟我们，要我们推翻西贡政府。他也忍不住就我们摇摇欲坠的国内局势把我教训了一顿，于是我们进行了一场舌战：

基辛格：我们会管好我们的舆论界，但是你们也要管好你们的。

春水：因为你们的舆论界谈到了局势，我们只好也说明情况了。

基辛格：在这种会议上我不听这个。

春水坚持河内的政治条件，即：撤换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和别的“好战的领导人”。他甚至想在这方面帮我们一把。他根据自己对受控制的选举的毕生经验指出，即将在南越举行的总统选举，是我们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摆脱这个盟友的大好机会。

虽然我断然拒绝接受他所附加的政治性建议，他却显然很想继续讨论我们的新军事性建议，这使我感到，河内可能正在重新考虑它的政治要求。总的说来，春水比平时更为慎重地对待我们的主张。他一次也不曾斥责这些主张“没有新的内容”。他一再表示，河内将认真研究我们的建议。由于我们挨斥责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而认为这种最低限度的谈判前提是一种新的灵活性的表现。有一次他甚至说，“如果你的建议总的来说已被接受，那么，

下一次我们就应该准备商谈所有具体问题。"他强调说，河内愿意谈判。他不再像平时那样坚持：没有充分的政治解决，停火是办不到的。他一再要求，再举行一次谈判。他破天荒地表现得不耐烦，提出了一个比七月一日早得多的日期。我们同意在六月二十六日举行谈判。我们不久后就得知，黎德寿已经离开河内来巴黎，途中将在北京和莫斯科停留。我们似乎第一次感到即将出现认真的谈判，而且还有别的说明可能出现突破的迹象。我们也在为我即将秘密访问北京（华盛顿在六月二日收到肯定的邀请）作最后的准备，而且我们还在探索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这是大有希望的时刻。

当然，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春水一直在巴黎作出逗弄人的公开暗示，以怂恿国会施加压力，要求规定期限。在六月三日的全体会议上，他一面重复说，政治和军事问题，是"两种关键的而又不可分割的问题"，同时又含混其词地补充说，撤军期限是"当前的关键问题"。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六月八日的晚餐会上，向与会的进行院外反战游说活动的律师发表讲话时宣称，他有"理由认为"，规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撤军期限，会换来战俘的释放。但是当春水自己在受到记者尖锐的提问时，却否认了这一点。卡尔默·罗伯茨在六月十日《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一篇访问记后说："美国和北越在巴黎和谈中的中心问题一直是南越的政治前途，尽管最近在国会和别的地方，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撤出美军和释放战俘的问题上。"

也就是在六月，国会的一个院首次通过法案，否决政府对越南的政策。六月二十二日，在主要报纸发表社论的一片赞扬声中，参议院以五十七票对四十二票通过曼斯菲尔德修正案，要求总统在河内同意释放全部美国被俘人员的条件下，在九个月之内从越南撤出全部美军。这实际上起到了使我们在秘密谈判中提出的七点

计划中有五点失去意义的作用。河内这下子懂得，它的冒险是可以有恃无恐的；如果这些压力继续增加，就没有必要去进行谈判，以便在印度支那的任何地方实现停火，或保证停止渗透，或保证尊重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和独立。如果它同意释放我们的被俘人员，很可能国会会强烈要求无条件全部撤出美军。

现在回顾起来，我怀疑我们为保密而付出的代价是否太高了。河内要求保密，因为它想使我国政府失去通过谈判争取舆论支持的可能性。我们接受了它的要求，因为我们认为取得成就比公布谈判内容更为重要，而且还因为经验证明，不论我们提出什么建议，批评我们的人还会进一步推动我们向前走，从而危害我们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保密在一九七一年使河内欺骗了我们；但是把情况公诸于众是否就会制止这种状况，或者甚至早就会造成谈判的僵局，这是一个永远也捉摸不透的问题。

最后，六月份，也是五角大楼文件被人公布出来的那个月。若不把这件事和我们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的主动以及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联系起来看，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政府的反应如此强烈。在这场战争中，河内破天荒地放下了架子，表示愿意研究美国的建议。我们认为，不论我们的看法是否正确，河内正在接近于作出根本性的决定，是否要在十月南越举行总统选举之前结束这场战争。然而，就在河内正拟作出决定的时刻，我们的报纸上突然披露了成千篇文件，都是那些企图诋毁美国在越南问题上所作的一切努力的人泄漏出去的。报纸诋毁的对象固然是美国的上届政府，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们的问题。只要河内断定，我们的国内支持，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正在减退，它就必然会坚持自己的立场。战争要打下去。在一九七一年，除了投降以外，不存在实现和平的可能性。现在我并不认为，公布五角大楼文件对于河内不肯在一九七一年达成协议的决定有重大的影响。但是，盗窃文件的人或政府在当

时却都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黎德寿和我在六月二十六日举行会晤时，情况是很理想的。为了保证不被人发现，我选择一条新的路线前往巴黎。我安排了一次对伦敦的两天的访问，我的好朋友内阁大臣伯克·特伦德爵士向我发出了邀请。他找到的借口是想了解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的运转情况；英国人很懂得，要把这种制度移植到英国的内阁制上来，是几乎办不到的事情，所以这种借口与其说是用来骗英国人的，倒不如说是用来骗美国人的。但是，要一名英国文官硬说英国在官僚政治方面还有什么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这还是需要有勇气的。在规定进行洽谈的两天中的第二天，伯克建议到郊外走走。所谓的"郊外"，原来是英国的军用机场，在那里，我乘一架英国飞机前往巴黎。但路上出了个意外的故障，维拉库布雷机场关闭了一小时，因为法国总统要从那里启程。最后我们到了达迪路。十四个月来破题儿第一遭，黎德寿已经在那里等我了。

在我们心目中，他已经是"阿德"了。这时的"阿德"简直是满面春风。平时会谈都在会客室举行，这次他却把我们带进一间小餐厅，里面有一张铺着绿台布的会议桌。在我们秘密会谈过程中，还是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正式的讨价还价。他的用意在于表明，他是来办正经事的，不是来进行谩骂或心理战的。黎德寿一心一意要制造友好的气氛，他甚至允许我在他慷慨陈词攻击美国在柬埔寨的背信弃义行为时打断他的话。我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和西哈努克被推翻一事毫无关系，这时，"阿德"的答复简直为认识论别开了生面。他竭力装出一副大方的样子说："我暂时相信你和金边的政变无关。"黎德寿唯恐我受宠——即使是有限的——若惊，因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宣告。黎德寿立即又补充说，他的说法是出于礼仪，而不是出于信念。

在谈话中，黎德寿使我明白了北越和它的共产党盟国之间的

关系。我在一月九日曾告诉多勃雷宁，我愿意和北越再次举行秘密谈判，而多勃雷宁回答说，河内宁愿通过现有的巴黎渠道打交道。现在黎德寿对我们利用中间人这一点大发怨言。他也明显地暗示说，在我们在老挝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很久，河内就提出过要直接接触。但是结局却是令人忧伤的。如果黎德寿讲的是真话，莫斯科一定是扣压了河内的答复。我们在策划在老挝的行动时，本来肯定会考虑这项答复的。如果多勃雷宁讲的是真话，河内就是在挑拨我们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也许是想打消莫斯科想强迫河内接受一项解决办法的念头。我认为多勃雷宁讲真话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利用过莫斯科作为同河内打交道的中间人。我们告诉莫斯科的事情，总是同时也通过巴黎告诉河内，而且通常要提前很久。

最后，我们进入谈判的正题。春水是形式上的主要谈判代表，他一开始就对我们五月三十一日的建议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黎德寿作为春水的特别顾问，接着作了长篇大论的空泛的发言，他叙述了谈判的整个过程，并指责说，我们的联合军事行动干扰了通过谈判找到解决办法的进程。双方都很谨慎，避免说出任何含有拒绝意思的话。而且，每逢我作出尖锐的答复时，他们的语气很快就缓和下来。

经过两小时的唇枪舌剑，大家休息喝茶。春水上楼去了，很可能是在准备他的下一个发言。但是黎德寿却破天荒地找我一起在屋后的小花园里聊天。我也邀请他在战后到哈佛大学去开马列主义讲座。黎德寿巧妙地回答说，对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他的观点可能是一服烈性药。我请他相信，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比我更可能会亲切地接待他。

休息过后又开始了互相之间的刺探。最后我说："我们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如果你们没有别的自己的建议要提出，我也没有更

多的话要说了。"这句话触痛了春水，于是他开始长篇大套地讲述越南的历史。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番话是北越的新的九点建议的一篇前言。由于河内在每个关头都要显示一下它在道义上的优越性，春水在提出河内的纲领时，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提出的建议（比你们）多两点，这证明我们结束战争的愿望比你们真诚。"

河内在提出的纲领中建议我们的撤军期限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就是说，还有六个月。这比起阮氏萍女士在去年九月提出的八点建议来是后退了，但是和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的最新版本却是吻合的。它首次明确表示同意，在我们撤军的同时，在越南的美国被俘人员将被释放——而不仅仅是"商谈"这个问题，这也满足了曼斯菲尔德修正案的要求。在达成协议之日，将实行就地停火，并接受国际监督和保证。有关政治性的建议比较含糊其词。河内知道，我们绝不会同意它的联合政府方案。因此，这次只要求我们"停止支持"阮文绍、阮高其和陈善谦，以便建立"一个主张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新政府"。"停止支持"盟友的含义很广，可以指撤出美军，一直到停止一切经济和军事援助，或者甚至默认别人推翻盟友的行为。

其中有一段提到尊重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和独立的义务（我们的第六点），规定印度支那各国之间的问题应由各国在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予以解决。这倒是不错的，但是接着又说，河内"准备参与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援引了日内瓦协议，好像这些协议是专为美国订立的。他们的意思是，各种限制并不适用于北越，而在决定印度支那各国的前途方面，河内具有特殊的地位。而且还提出了一条要求——我立即加以拒绝——要美国赔偿"美国在越南进行过战争的地区所造成的破坏。"这些建议是作为一个"结合在一起的整体"而提出的；换言之，河内不愿意支持已经成为我们国内辩论的主题的以撤军换取释俘的主张。

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一直被一种神秘的气氛所笼罩，而且两年来备受共产党的刁难和国内的抨击，现在河内第一次对我们的主张作出了回答，真使我和我的同事们感到欣喜万分。尽管河内的回答并不能算是宽宏大量的，只是用过去打交道的标准来衡量，能够算得上是前进了一大步。河内第一次把它的看法作为谈判的文件，而不是作为一整套蛮横的要求提出。黎德寿一再强调，这些都是供谈判的项目，请我们提出反建议。在和黎德寿打交道时，哪怕是很小的善意，人们也会感到高兴。北越人使用"美国应该"一词，而没有使用传统的、蛮横的"美国必须"一词，这一点在我的工作班子里的河内问题专家看来，已经是一大进步了。黎德寿提出，他愿意呆在巴黎，直到谈判结束。

事实上，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河内建议中的每一项，除要求赔偿以及对于政治解决办法的含糊其词外，不论措词如何令人难以接受，还是可供谈判的。如果在政治解决办法上的含糊其词所掩盖的是要我们推翻西贡政府这一原来的要求，那么我们将再度陷入僵局。但是如果它标志着一个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的阶段，那么就有可能找到一项解决办法。我向尼克松报告说：

直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反建议和谈话的真正含义还是不清楚的。除非按照我们能接受的条件，否则很有可能通过谈判也达不成一项解决办法。他们的立场和看法，是和他们想赢得时间的企图相一致的。然而，这也是和向我们的看法靠拢的愿望相一致的，因为如果他们想这样做，他们必须首先为他们的政治要求斗争一番，以显示是我们不肯让步。而且，他们也用不着把黎德寿派到巴黎来戏弄我们；不论怎样讲，还弄不清楚这种手法会给他们实际带来什么好处；现在我们等着瞧，不会有什么损失；他们的建议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也有一些难题，而且他们显示很想进一步具体地进行谈判。

河内提出愿把两个类似的文件中的平行的主张加以调和，这

是我和我的同事们以前没有遇见过的事情。我向尼克松建议——他表示同意——在我的环球（包括北京）旅行结束时，我将在七月十二日提出一项反建议，设法把河内的文件和我们的文件揉合在一起。但是那次谈判还没有举行时，北越再次施展他们要两面派的惯技，指责我们在国内的辩论中不守信用，这使我们极为愤慨。他们的花招是由阮氏萍女士出面耍弄的。七月一日，正当我行将开始环球旅行的时候，她发表了一个新的七点方案，其中一部分是和黎德寿的九点方案相同的，只不过有些阐述得更为详尽，但有些完全删去了，而且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阮氏萍女士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公众的辩论，把关于撤军的条款和关于释放俘虏的条款排列在一起，并制造出一种二者是互相联系也许是可以从一揽子里面抽出来的印象，从而使那种以撤军换取释俘的简单化的主张成为人们悬盼的前景。在其余各点中，只字不提柬埔寨和老挝，在某些问题上比较含糊其词，在另一些问题上又不肯妥协。例如，阮氏萍女士的建议提出联合政府问题时，用词比较尖锐，采取了人们熟知的方针。它还规定，要先成立这样的政府才能实现停火，而不是像黎德寿所说过的，一旦我们签订协议，停火即可实现。

几乎就在同时，黎德寿在七月六日向《纽约时报》的安东尼·刘易斯明显暗示，阮氏萍女士的第一点——以撤军换取释俘——的确是可以和其他条款分开解决的。这完全是在瞎说。在秘密谈判中提出的九点建议与此正相反，明确地把所有的条款联系在一起，称之为“结合在一起的整体”。（黎德寿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和我谈判时承认，持刘易斯观点的记者只不过是在“猜测”。）对于美国的知名反战人士，包括参议员乔治·麦戈文，也发表过类似的欺骗性谈话。不论是记者还是议员，都毫不犹豫地对河内的话信以为真，而把我们的话当成谎言。阿德兴高采烈地以前所未有的

冷嘲热讽的态度对记者说，如果我要求他会见我，他愿意这样做。

阮氏萍女士的方案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国会和新闻界同声指责政府放过了又一个绝无仅有的谋求和平的机会。七月三日《巴尔的摩太阳报》社论谈到了“在巴黎的突破”。七月八日《华盛顿邮报》说，看到了“越南问题的新转机”。七月九日《芝加哥每日新闻》说，嗅出了“微弱的和平气息”。七月十二日《新闻周刊》登出一条标题：《是走向结束战争的道路吗？》艾夫里尔·哈里曼也参加了进来，他在七月十五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阮氏萍女士给了我们一个“合适的机会”去结束战争。七月二十三日《生活》杂志毫不怀疑地写道：“我们希望尼克松总统抓住这一机会。”

正是由于和批评我们的人所说的相反的原因，我们不能随意表明，这个“机会”是伪装的，而且是和秘密——以及公开——谈判的整个纪录不一致的。我们保密是由于很想实现突破，但这却使我们玩世不恭的对手可以使我左右为难，既不敢否认我们的公开立场，又不能公布秘密会谈的纪录。

难怪对谈判总是持怀疑态度的尼克松，在我进行环球旅行的时候，向我下了一道又一道的指示，要我在巴黎的谈判中持强硬态度，并提出问题的实质。在我参加的几乎所有的谈判中，我总是遇到他的这种矛盾心理。通常要说服他同意开始谈判，每次去巴黎之前总是要经过一番多少有些周折的内部争论。一旦这道难关越过了，尼克松总是会批准我交给他的谈判计划。然后，当我开始谈判的时候，他又会向我发出大批措词强硬的指示，而这些指令却并不总是和计划相符合的，而且有些是根本行不通的。其原因可能是他对妥协的过程感到不放心，也可能是他害怕甚至在外交舞台上会被人唾弃。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那无疑就是他对历史记载极为敏感，使他总想使自己看起来似乎比他的同事更坚强一些。因此，不论发生什么事，都是安然无恙的。但是，他从不坚持这些

比较周密的考虑，他总是重新退回到原计划上去。

此时此刻他的矛盾心理更为复杂，因为他想在一九七二年总统选举之前摆脱越南问题，而又不至于使西贡政府垮台。对北京的秘密访问获得了成功，尼克松当时的欣慰的心情使他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变得强硬起来。甚至要突然宣布全部撤军同时又进行全面空袭的想法又一次出现在七月十日黑格的电报中：

你应该懂得，他正在认真考虑另一套方案，那就是他早先提出过的要迅速撤军，而同时又对北越进行大规模空袭。显然这封电报的话说过了头，而你必须根据你在上一站（北京）的会谈情况来解释他的指示。我的确认为，你应该体会一下这里的气氛。

尼克松果然在七月十二日早晨用公开线路打电话到巴黎，向我发出明确而且令人毛骨悚然的指示，尽管他同时又重复表示赞同我即将提出的反建议。他的理由是，法国人会窃听到这个谈话——这倒是可能的——他们又会去警告河内——这是比较值得怀疑的，因为要赶上和黎德寿在当天下午举行的谈判，这在技术上是不太可能的。

我这次到巴黎虽然是比较顺利的——我公开取道巴基斯坦抵达巴黎——但是黎德寿公开邀请我去谈判却引起报界的注意。大批记者守候在雷纳街大使公寓我的住所的门口。我想了个办法，让戴维·布鲁斯故意在大家都看得见的情况下来到我的住所，并宣布他是来报告巴黎谈判的情况的。我在前门把他迎进公寓，当他一旦坐定后，我马上从后门溜进院子，沃尔特斯将军坐在他的私人汽车里在那里等我。他想得真周到，甚至还为我准备了一顶帽子。我们缩紧了身子坐在车子里，唯恐记者们守候在后门口——他们没有这样做——一切都按照沃尔特斯事先来电吩咐的

那样去做。沃尔特斯觉得有意思极了，他可能会为了让他参加这场演出而倒贴我们一笔钱。他的台本是用最奇特的五角大楼行话写成的，题目是：《前往和离开某地的行动计划》，内容如下：

（一） 在行动之前，提前一天把我的（沃尔特斯的）雪佛兰牌装有活动顶篷的私人汽车，牌号6CD408，停放在大使公寓的后院中。

（二） 我在十二点四十五分步行抵达大使公寓。基尔希曼将军（我的代号）和我从大使公寓的后楼梯下楼，坐进我的汽车，离开这所房子的后院。我们绕道而行，来到我家纽利区夏科大街四十九号。

（三） 抵达之后有两种可能采取的办法：

甲、基尔希曼将军走出汽车，走进有电子装置的门，他进门后，门便自动关闭，然后乘电梯到地下室。与此同时，我开车进入地下室。我的随从准尉在我进入之后，锁上车房的大门。然后我们从后门来到圣詹姆斯路；

乙、基尔希曼和我一起走进车房。执行甲项的其余部分。

（四） 我的随从准尉留在我家里，保证没有人接电话，并不准任何人进入我的住所。

（五） 基尔希曼将军和我走到离某地十条街的事先商定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见到坐在一辆出租汽车里的我的秘书，他刚“侦察”好该地区。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就到该目的地去。

（六） 我们经过圣詹姆斯路回到我的地下室，换乘我的雪佛兰牌私人汽车，出门来到夏科大街，然后回大使公寓。

我们最后执行的是方案第（三）条乙项，因为沃尔特斯不相信我能够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找到地下室。方案执行得很顺利，主要是因为没有人盯梢。

最后，我再一次和黎德寿、春水面对面地坐在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方形桌子面前。但是谈判的架势和从前不一样了，我的北京之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它，虽然黎德寿这时还不知道。春水又是

代表河内首先发言。他扮演的角色就像是斗牛中的骑马斗牛士。他对我们进行攻击，也许是为了让黎德寿研究我们的反应。当谈判真正开始时，黎德寿接替了他的位置，单方面宣读河内的老一套观点。

不出所料，七月十二日的谈判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开始。我指责北越不守信用，公布了阮氏萍女士的七点方案。春水又从他的百宝囊里取出各种指责，作为反击，大部分是关于我们在南越的军事行动，既是含义不清，又是毫不相干的。他和我都知道，在南越，双方都没有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但是，北越并不想就这些问题穷追下去。他们似乎急于进行谈判。他们还不知道我已到北京去的事，还以为他们可以左右我们；也许他们要看看我们是否会屈服。

但是，在河内看来，"谈判"一词并无固定的含义。黎德寿和春水把他们的建议称为"具体"和"尊重事实的"；而我们的建议，不论怎样具体，都是"不现实"和"含糊不清"以及"抽象的"。"现实主义"的标准，要看是否符合河内的观点。阿德认为他能出席谈判，本身就是一项让步；他愿意讨论我们的建议这件事本身——即使只是为了拒绝这些建议——就是善意的表现。他每次提出新的要求，总是要说明他掌握着推理、事实和历史的根据，然后作一番极为冗长的说明，使我有一次不禁提出，如果他重视推理，而对历史少说几句，我们大家都会受益。

连正式的决议都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含义。例如，从表面上看，我们在五月三十一日提出的七点建议和他们在六月二十六日提出的九点建议，在根据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确认柬埔寨和老挝的独立、中立和领土完整方面，是非常近似的。但是，每当我们快要把这些问题作为已经解决的问题搁在一边的时候，黎德寿就理直气壮地指出，河内已经在履行日内瓦协议（此时此刻

几十万北越军队正在这些国家里巡游)。可是当我提出这一问题时，黎德寿就冷冰冰地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有越南人；有时如果他想讲究点形式，他就说北越人在那里是为了保护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而且北越人对于撤军的期限问题含糊其词，弄不明白他们是想把这一点放在协议里面，还是想把它和其余的谈判问题分开，单独处理，就象阮氏萍女士指出的那样。

但是，尽管枝节横生，在七月十二日的会上，还是进行了认真的谈判。我们把双方提出的文件逐点进行比较。在多数问题上(全部撤出美军的原则，释放被俘人员，重新确认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的日内瓦协议，以及最后实现国际监督下的停火)，显然是可以达成协议的。但存在着两项基本的分歧：要求赔偿；以及河内坚持要我们推翻西贡政府。尽管我过去曾驳回河内关于要求赔偿的主张，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妥协余地的。它主要是形式的问题，而不是实质的问题。我们在秘密谈判中多次表示，而且尼克松曾公开宣布(在他之前约翰逊总统也曾如此)，在战后，我们将对整个印度支那，包括北越的经济恢复工作予以慷慨解囊。但是我们愿意出于自愿地这样做，而不是一种自赎。

政治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斗争的中心。黎德寿反复强调："我严肃地告诉你，你们一定要撤换阮文绍……你们有许多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一再说，一种办法就是让我们利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这一大好时机。虽然他的话里只点了一个人的名，但是不久就显露出他的真意，他要求撤换的是一切河内认为不"赞成和平的"人。由于河内主张要一直战斗到底才肯罢休，谁反对它这样做就是在引起战争，因此就是不赞成和平，也就必须予以撤换。黎德寿和春水轮番哄骗我接受他们的建议，用这样的办法处置所有主要的非共产党的政界人物。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前进一大步"，而"为达成协议创造有利条件。"(河内谨慎从

事成了一种病态心理。它从不作无条件的许诺。即使我们接受它关于推翻阮文绍的要求，那也只是创造了“有利条件”；河内为自己留下提出更多要求的余地。)

批评我们的人曾经主张，我们可以只解决军事问题，然后脱身。对此，黎德寿明确表示反对。英勇顽强的河内人奋战一生，不是仅仅为了谋求一个停止战斗的机会。黎德寿在六月二十六日对我说：“没有一场战争不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的。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实现政治目标。军事手段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听起来就好象克劳斯威茨还活着，而且就住在北越。

经过几个星期，九点建议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七点，我和我的同事都为之欣喜万分。人们希望，黎德寿关于推翻西贡政府的激烈的要求，只不过是在走最后的一着，以便向他在河内的同事证明，我们已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而现在他们最好还是适可而止。毫无疑问，他也一定这样看待我们的行为。他一定认为这是值得一试的事情，那就是：以不寻常的灵活态度，坚持谈判下去，看看等到所有其他的问题都已解决之后，我们是否会把南越的非共产党人抛出去喂狼。

谈判进行了四个半小时。我们约定两周后在七月二十六日再度举行，并表示在此期间可以互相研究对方的立场。我按照沃尔特斯的办法的相反顺序，回到了大使公寓。大约晚上七点钟，戴维·布鲁斯和我出现在公寓的前门口，向等待着的新闻界宣布，我们已经完成了对谈判的研究。

在七月二十六日举行会谈前，我向尼克松递交了备忘录，说明我们已经使分歧缩小为一个问题——关于西贡的政治安排。

显然，我们是不能为他们完成他们自己的政治任务的。阮文绍尽管有种种缺点，但是他不愧为是忠实的盟友。此外，最近公布的五角大楼的文件，

暴露出美国曾插手推翻吴庭艳的政变，这使我们更不宜于动手撤换阮文绍。最后一点，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甚至没有把握，如果我们要撤换阮文绍，我们能否办得到，除非我们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对抗，而这场对抗的唯一肯定的结果就是南越的政治结构和所有人的自尊心都将被毁坏殆尽。

我重申，我们不能以搞垮南越政府为代价去换取和平。尼克松对此亦表示同意。然而，如果河内想就一项真正具有开放性的政治进程进行谈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的建议：我军全部撤出；关闭我们的基地；以及保证南越的中立地位。我仍然认为很有可能黎德寿会放弃他的政治要求。

我的估计是错误的。我们在七月二十六日举行了谈判，并进一步取得了进展。我们在除政治问题外的所有问题上，都使双方的方案互相吻合。但是，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这些让步只是一些旨在诱使我们推翻阮文绍的香饵。即使在这些我们似乎正在取得进展的问题上，狡猾的越南人也为自己留下无数进攻我们的可乘之机。战争之神如果在观察这场谈判，绝不会认为河内来的人是代表一个不发达国家的。他们头脑复杂，行动一致，擅长于巧妙地处置各种方案的细微差别，而且永远是耐心的。他们以残酷的斗争在会议桌前赢得了自己的席位；他们不会为了妥协、以感情去博得对方的善意或者自由选举等开明的想法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的概念而放弃自己已经得到的果实。不幸的是，只有史诗里的英雄才是富有人情味的和动人的。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献身精神往往使他们一意孤行；他们的英雄气概使他们显得骄横；他们不同于凡人，所以不受普通世俗交往的约束。我们不幸成为河内一心想在印度支那称霸的障碍。他们一面和我们作战，一面轻蔑地利用许多支持他们的人，即我们国内的批评家们的感情上的错觉。在这两方面，他们都是同样地不遗余力和精明强干。

我提出了我曾经和尼克松一起研究过的各种建议。对于美国提出的关于中立地位的保证，或者对于他们蔑视的自由的政治进程，黎德寿和春水毫无兴趣。关于由双方达成对美国军事援助的限制的协议问题，他们连听都不愿听；他们想切断西贡的一切军事供应。一连三次谈判，他们都集中火力提出这个问题，即：既然我们能够把这个“好战的、法西斯的”阮文绍扶上台，就一定也“有能力”撤换他。春水这一次提议和我们在撤换阮文绍的问题上达成一项秘密谅解：“我们不要求你们发表公开声明。你们应该秘密地撤换他。”我说这样做难以遮人耳目，春水坚持说：“这项谅解只有你们和我们知道，决不会泄漏出去。”在前一阶段谈判中，他明确表示，仅仅换人是不够的：“如果你换了人而不改变政策……等于没有变化。”河内要的是统治西贡，而不是妥协。黎德寿一心想帮我的忙。他甚至向我提出他作为革命家的职业性见解。在一次休息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边向我提出，如果我们不懂得怎样通过总统选举把阮文绍撤换掉，那么暗杀是个好办法。我断然拒绝，使黎德寿一时怔住了，这是我难得见到的事情。他显然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激动。但是他很快就恢复了镇静。当我们又回到会议桌前时，我以几乎悲痛的音调归纳了我对河内的政治“解决”的看法：

我们做了许多事情，可以使你们支持的力量更易于参与一场政治进程，并对政治前途施加影响。我们表示愿意接受南越的中立，宣布我们从南越撤军，接受对我们给予南越军事援助的限制，公开宣布我们并不支持南越的任何一种特定的力量，并严格执行。我们愿意听取这方面的其他建议。

我们办不到的是你们要求的事，即：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去撤换一个仍然是我们盟国的国家的领袖；此外，这会引起无穷无尽的争论，究竟和平政府的含义是什么；你们在这个和平政府里拥有否决权，因为只有你们才懂得拥护和平是什么意思……

我们想结束战争。我们不想阻挡南越人民前进。我们不是越南永久的

敌人。但是你们不能期望我们做那种办不到的事情。

就这样，七月二十六日的谈判又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和平的前景依然是那样渺茫。

南越的总统选举

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预订于十月三日在南越举行的总统选举上面。河内已经表明，它意识到这次投票是撤换阮文绍的一次机会。在美国，有许多诚恳而关切的人士，他们认为在南越举行的这场公正而民主的进程，将会打开谈判的大门。为什么会是这样，从未有人加以解释。所谓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不允许别的政党存在的，从来没有举行过选举，而且对于自由选择这一概念横加嘲弄。春水和黎德寿就象行家里手那样地有把握，不断向我说明，自由选择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谁控制着政府，谁就能当选。从越南的历史来看，他们实际上是正确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在基本上和谐的社会里发展起来的，在这些社会里，少数派接受选举的裁决，因为他们希望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会成为多数派。但是这种情况是几个世纪发展的结果。即使在美国，民主自由也经历了一个世纪才到达成年人享有普选权的阶段。在越南，我们正在设法做的是，强使民主传统的发展进程在几个月之内完成，而这个国家的人民二十年来一直在一场内战中互相残杀，在那里，失去政权意味着不仅丢官弃职，而且还有生命的危险。

尽管存在着重重障碍，但是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简单得多的情况下，推迟过多次选举。但是，就在几十万北越军队入侵南越的情况下，南越还是举行了几次选举。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举行的国会上院的选举中，十六个党派

进行竞选，反对派的佛教组织却获得了多数票。在一九七一年八月举行的下院选举中，代表十二个主要政党和团体的一千二百名候选人争夺一百五十九个席位，而这次，又是反对派的佛教组织取得多数议席。在南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村子，举行了地方行政长官和委员会的选举；而且将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投票选举省长和市长。*

根据一九六七年四月颁布的、在美国指导和协助下起草的越南共和国宪法，规定南越有四年为期的总统任期。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的首次总统选举中，阮文绍获得百分之三十五的选票而当选。第二次总统选举预定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星期日举行。就这样，在美国参加越南事务有史以来的关键时刻，主要根据美国的意愿强加于越南的选举倒成了新的动荡不安的根源。

国务院孜孜不倦地敦促阮文绍向共产党人提出新的政治建议；国务院的许多专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对这项方案这样感兴趣，我们的官僚机构似乎把这项方案粉饰为治愈内讧的标准灵药。美国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但要是任命一名反对党成员担任内阁职务，就会成为一条新闻，而且是很少发生的情况。认为把一直在互相残杀的人们联合在一个政府里，就可以结束内战，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一般地说，联合政府是一种手法，或是一种借口，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最不需要这种手法的地方，它最能发挥作用。）现在国务院把它的全部热情倾注在自由的总统选举上面。国务院在五月十九日发出详细指示，要求在越南的美方人员“在言语和行动上”保持中立。在选举期间，美国将继续给予援助，但是应“慎重从事，以免被误认为美国支

* 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在全国举行的北越国会“选举”中，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八有资格投票的选民参加了投票，政治局领导人平均得票数都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没有反对派。相比之下，南越没有那么高的效率，但手段也没有那么毒辣。

持或反对某个人的竞选。”官僚机构中有许多人希望，阮文绍会被愿意接受联合政府主张的一位候选人击败。但是，我却希望民主选举会对我们盟国增加支持。

只有在一场真正的政治角逐中，并在至少有两名真正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的情况下，才能够谈得上保持中立的原则。因此，我们后来的处境很奇怪，我们竟在寻找一名对手，和这位作为我们的盟友正在指挥战争的总统决一胜负。有两个人呼声最高，即副总统阮高其和杨文明将军。不到一年之前，美国的批评家对阮高其厌恶到如此程度，以致于我们取消了他原定对华盛顿的一次访问。但是，现在又有人想方设法要把他捧成一名候选人。当杨文明领导推翻吴庭艳总统的军政府时，吴庭艳和他的兄弟吴庭儒的罪名之一就是阴谋组成联合政府。现在杨文明倒成了许多批评家的希望所在，因为他的晦涩的言词使人认为他会接受共产党加入他的政府。显然河内喜欢他。春水有一次暗示，可以同意由他取代阮文绍。（春水和往常一样，是含糊其词的。如果我们接受他的建议，他也没有承担明确的义务。）但是，如果春水说的暧昧的话是当真的，那么其原因肯定是，所有了解杨文明的越南人在这一点上都是意见一致的，即：在南越的主要人物中，杨文明是最无能和最懒散的人。*如果河内对他表示同意，——这一点还不清楚——那是因为如果他当上总统，他是所有候选人中最容易被推翻的一个人。（在一九七五年共产党接管西贡的前两天，杨文明终于当上了总统。他被两名北越士兵带出总统府，从此没有再露面。联合政府也就到此结束。）

当然，还有阮文绍。他当上总统并非偶然。他无疑是南越军

* 我的工作人员约翰·内格罗庞特很有见解地指出，杨文明若是当上总统，将难以向敌人作出让步，因为北部的天主教徒和高级军官不信任他；但是，主张“强硬路线”的阮文绍却可以作出这些让步而不至于失去这些保守分子的信任。

事领袖中最令人生畏的人，可能也是政界人士中最能干的人。他和多数身居高位的人物一样，代表着个人野心和崇高动机的结合。那些并不感到行使权力是使自己振奋精神的一副补剂的人，很少能够行使这种权力，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它。同样地，那些缺乏坚强的道义准则的人，是经受不起和伟大的职责分不开的那种彷徨、压抑和痛苦的。阮文绍显然对于他的职位觉得乐在其中。在这一点上，我所认识的行政首脑中和他一样的大有人在。但是他也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强烈反对共产党，笃信宗教，爱国，头脑很机敏，极其英勇地保卫他的同胞，使他们不受来自南越国内外的冲击。那些设法寻求借口要我们抛弃他的人坚持要给他加上种种罪名，但是言过其实了。他上台时接管的文官政府，当时已被推翻吴庭艳的那场狂风暴雨式的政变弄得四分五裂。一支游击队正准备通过系统的恐怖活动推翻他的国家。在长达六百英里的渺无人迹的边界上，外敌正在入侵。他有一个盟国，先是派来几十万军队，遍及他的国土，并训练他的军队应付一种并非东南亚方式的战争，然后又一边加紧撤军，一边敦促他向贪得无厌的对手作出越来越多的让步。这个盟国简直是他的一种负担。他懂得如果他同时干所有这些事，他的政府非垮台不可。但是，凡是他认为可以办到的事他都做了，而且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包括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土地改革。我们国内的批评家们都是些得寸进尺的人，对于许多人来说，他是一只顺手拈来的替罪羊；但是这不是由于他的过错。在谈判没有到达最后阶段的时候，他并不是谈判的障碍，而且——我还要进一步说明——即使在当时，他的处境也极为困难。他完全了解我同黎德寿谈判的情况，每项建议都经过他的同意，而且每次会议，我们都通过邦克向他提供一个纪要。我们是用初级密码和邦克通消息的。黑格还定期去西贡了解情况，并将最新情况告知阮文绍。阮文绍对于我们虽然疑虑重重，但是他对于我们这个釜

底抽薪的盟国，却表现得毫无怨言，而且神态超脱、尊严，还带点轻蔑。（尽管阮文绍对于我通过谈判达成最后协议的方式怀有刻骨仇恨，我还是要在这一点上说他的好话，因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

阮文绍深信，南越正处在狼烟四起的年代，经受不起长期的权力不稳的局面。他的军队在老挝刚刚遭受重大伤亡。他的盟国正在加紧撤军。他知道我在和河内谈判。而且，由于他熟知我们建议的要点，并确实表示过赞同，他是了解河内会在每次巴黎谈判中坚持要推翻他的。他秉性多疑到了病态的程度——典型的越南人性格——这肯定促使他害怕河内的建议可能对我们有诱惑力。他也不想下台。在一九六七年之后，事实一再提醒了他，他是仅仅以百分之三十五的多数在那次选举中获胜的。这一次他下决心要获得更多选民的信任。因此，他并不过多地讲究方式，就运用起他的职权来了。

在他的对手方面，他们没有兴趣参加一场即使公正地进行也肯定会落选的选举。杨文明轻而易举地收集到足够的签名使他获得了竞选资格，但是对于竞选，仍在犹豫不决。阮高其有竞选的愿望，但是由于阮文绍毒辣的手法，在收集签名方面发生了困难。南越最高法院重新使阮高其获得竞选资格，但是此时他和杨文明都已决定退出竞选了。邦克大使劝说他们两人参加竞选，但没有成功。他们要求的东西，实际上和黎德寿是一样的，即：美国保证他们成功。由于阮高其和杨文明不愿参加竞选，因此这场选举就成了一场公民投票。选民面临的选择是：投票支持阮文绍；或者毁损选票；或者抵制选举。百分之八十七的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参加了选举，而阮文绍获得了百分之九十四的选票。

在竞选期间，我认为阮文绍运用职权迫使其对手放弃竞选是一种不明智的举动。我在七月间去西贡时，故意招摇过市地去拜访了阮高其、杨文明和佛教徒反对派的领袖，以显示我们对于进行

一场有角逐的选举是感兴趣的。我在八月一日通过秘密渠道拍发了几封电报给埃尔斯沃思·邦克，支持国务院发出的正式指示，要他探索是否可能找到别的反对派候选人，或重新规定一个选举日期，使他们可以获得竞选资格。我在电报中告诉邦克，阮文绍不应怀疑美国公众对他的毒辣手法的反应的深刻程度。但是，尼克松和我都不愿意把阮文绍抛出去喂狼。诚然，除非断绝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从而为河内办了它想办的事，还没别的可以把他抛出去喂狼的切实可行办法。我们认为，我们支持西贡的政治结构，并不是出于对阮文绍的照顾，而是出于我们国家利益的需要。我们经受住了暴风雨。如果认为河内为了没有在西贡举行一次公正的选举而感到痛心，那真是大错特错了。河内感到烦恼的是，我们拒绝以选举为借口来撤换南越的非共产党政治结构的领导人。

我在八月十六日再度会晤北越人。黎德寿没有来，留在河内了，这就决定谈判不可能取得突破。谈判开始时，我把一些关于阿波罗号几次登月的不属于机密的技术资料交给春水，因为黎德寿在上次会谈中曾问到过这几次登月的情况。春水不禁说出了一句俏皮话：我们虽然曾把人送上月球，但是我还是迟到了半小时。（这是由于我同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进行了私下会晤。）但是当我们转入正题后，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谈判已陷入僵局。双方都明白，军事问题是可以得到相当迅速的解决的。每一方都定期地就其立场作一些小的调整，使双方在军事问题上的方案甚至更加接近，以便诱使对方在难以处理的政治问题上作出让步。我们原先建议，在我们最后完成撤军之前的两个月，必须释放所有我方被俘人员；我们作了修改，现在我们同意撤军和释俘可以同时完成。我们把我们将在战后向所有印度支那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的粗略估计告诉了春水，但不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或作为赔偿。河内同意，我们在印度支那全境的被俘人员将获得释放，而不是象他们原先主张

的那样，仅仅释放越方扣押下的被俘人员。

但是，这些都不能掩饰，我们双方都没有能力解决政治问题。我们不会按照河内要我们推翻盟国政府的条件去媾和。为了坚持我们的原则，我们愿意经受国内的动乱——动乱的焦点在于无关紧要的、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的我们单方面撤军的时间表。有一次特别激烈的交锋结束时，我把僵局作了一番归纳，还对春水的从属地位说了些带刺的话，而且虚张声势地说，时间（和许多事实相反）是在我们这一边的：

好了，部长先生，我知道你得按指示行事。而且我也知道，你未经授权，是不能听信我的话的。而且你将反唇相讥，什么事情都是由于我们的过错。可惜的是……可悲的是，如果我们继续打下去，那么一年之后，我们就还会在原地徘徊。而且总有一天，我们会达成一项其条件和我们现在讨论的差不多的协议。我们告诉过你们，如果你们能够在政治角逐中获胜，我们不会阻挡你们。这是你们迟早必须做的事情。但是从你的话里可以看出，你们现在不准备这样做。我的经验足以使我懂得，不论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你的信念，更改变不了你所得到的指示……我唯一要说的是，我希望有一天河内会以愿意媾和的态度来找我们联系。有了这样的态度，部长和我就可以找到媾和的模式。在这以前，在我们见到这样的态度以前，我们定会在原地踏步不前。

而这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十四个月之后会晤，接受了基本上是我在一九七一年谈判中提出的条件。

春水出于某种考虑，坚持要在大约一个月之后再度会晤。他的迫切态度给予我们一线希望，或许河内的政治局正在利用这段时间来研究自己的立场。虽然尼克松很想断绝这种越来越徒劳无功的接触，但我还是勉强说服了他，使他相信举行会晤会增加我们在谈判中的分数，给河内又一次修改自己立场的机会，而且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丢掉的，除了我难受三十六个小时以外。”我们现在如

果断绝接触，会毫无所得，又何况河内现在也还没有拦阻我们，不让我们做我们要做的事。于是我们在九月十三日在巴黎又再度会晤。黎德寿还是没有出席，这使我们不能再有什么怀疑，这个时期的谈判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春水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实际上他只是宣读了一篇宣传稿，和在克莱伯大街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一再发表的讲话是一路货色。谈判举行了两个小时就休会了，这是举行秘密谈判以来最短的一次。我们分手时达成了谅解，如果任何一方有什么新的内容要讲，可以重新打开渠道。

这年夏天在国内的辩论以及我们谈判的唯一结果就是，使我们国内的批评家跟上现实。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有机会在九月十一日和春水会晤四小时。他得到的确凿无疑的印象是，共产党建议媾和的基础是，以确定美军撤退期限换取释放被俘人员。虽然我认为这样的交易和河内的九点方案显然是不一致的，但是还是命令威廉·波特大使在正式巴黎和谈的第一百二十九次会议上进行探讨，以便一劳永逸地结束人们的种种猜测。波特会后对记者说："我们整天都在设法要他们对于他们在个别发表谈话时说过的话加以正式确认或否认。但他们拒绝这样做。"实际上，北越人不久就消除了以前他们公开立场不明朗的状况，并再次宣布，释放我方被俘人员要以政治解决为条件。与此同时，他们把麦戈文和几名记者也置于哭笑不得的境地。《华盛顿邮报》第二天报道说：

北越今天提出强硬的和平条件，使他们两个月来设法表现得比较忍让的经心策划的努力付诸东流。

河内代表春水明确表示，美国必须"同时"宣布不再支持南越总统阮文绍和撤退全部美军，然后美方被俘人员才能得到释放。……反战的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民主党人，代表南达科他州）发表过的比较乐观的印象，以及河内的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发表过的、迄今被人深信不疑的谈话，都归于破灭。

《华盛顿邮报》记者，不幸的乔纳森·兰德尔，几个月来一直根据北越人常常发表的隐晦的谈话，报道相反的消息。兰德尔在九月十六日全体会议结束后央求北越新闻发言人说：

你认识我几乎三年了。你难道不明白我们为何什么事情也弄不清楚？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思想上的混乱？要么是情况真的不清楚，要么因为我是个笨蛋……你今天说的话不仅和我们过去的理解以及发出去的报道的含义相反，而且也许连词义也相反。我真是摸不着头脑。

我理解兰德尔的感受。我们是同病相怜的人。

揭开秘密谈判的内幕

春水重申了河内僵硬的谈判方案，但奇怪的是，这对我们国内的辩论产生的影响甚微。即使象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这样坚强的人物，在九月十日也要求停止对越南援助，除非阮文绍举行一次有竞争的选举。《纽约时报》在九月十八日指责尼克松关于要在南越留下去直到西贡能够自己防止共产党接管政权之日为止的主张。《芝加哥论坛报》甚至在九月二十日刊登弗兰克·斯塔尔的一篇专栏文章，敦促我们立刻撤离越南。美国轰炸北越引起了报界的愤怒。这种轰炸部分是为了对敌人袭击我们的侦察机作出反应，但主要是为了向越南表明，破坏谈判是不能不付出代价的。九月三十日，参议院通过了曼斯菲尔德修正案的新文本，提出要在六个月内撤出全部美军，以此作为我国的政策，而要求的条件仅仅是对方释放我们的被俘人员。各方面对此都表示赞同。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越南化和南越抵抗的力量，河内比我们自己的参议员或社论作者更有信心。河内坚持要我们推翻南越政府，这就说明，它对

于我们撤退之后，它是否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它的目标，并无把握。

在这样的气氛下，我在九月十八日向尼克松递交了一份长篇分析文章，综述我国在对越南外交政策上所持的态度。我重申，如果我们由于仓促撤退或过多的政治让步而推翻了南越的政治结构，朋友和敌人在缓过气之后就会得出结论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领导作用正在转化为越南战争之后的退让政策。我们在越南的不光彩的下场也会给我们的社会留下深刻的伤痕，引起互相指责和加深现存的权力危机。我仍然相信，我们撤离越南应该是一种政府的政策行动，是有尊严的，而不是屈服于压力或由于丧失意志。

我认为，用越南化的办法可能会达到上述目的，但它有着先天的不可靠性。如果坚持把越南化进行到底，就必然会到达一个微妙的境地，我们的撤退会造成南越政治前途的不稳，从而在最后时刻破坏整个的事业。如果能够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就会使南越有相当的机会生存下去。我们一直认为这是更为可取的。采取一项政策行动来结束战争，而把南越的前途留给历史的进程去自然解决。

我的分析继续指出，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自己在浪费谈判的本钱。尽管由于公众的抗议而造成种种苦恼，越南化使美军的人数、伤亡和费用都稳步下降，在国内为我们赢得了时间。而且它对河内造成两种压力：第一，我们有步骤地撤军，这向北越表明，如果他们要我们很快或全部撤离，他们得付出代价；第二，越南化提出的前景是，最后一个加强了的越南政府将能独立存在。我分析说，不幸的是，我们的第一笔本钱几乎全都耗尽了。我们国内的压力和官僚机构的缺乏纪律性结合在一起，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向北越人保证，我们很快就会全部撤出越南。他们对于唾手可得之物，

又何必去花费代价呢？直到一九七一年秋季以前，我们的第二笔本钱——西贡的力量日益加强——仍然能够使河内踌躇不前。南越政府保持住相当程度的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美国帮助把总统任期四年写入南越宪法，这种稳定现在也遭到了威胁。在南越，总统选举、美国撤军以及国内的不同政见这几件事凑在一起，正在再度引起骚乱。阮文绍政府和军队中的某些人开始脚踏两只船，准备向越共投诚。

我在备忘录中继续写道，在美国，要求迅速脱身的势头正在高涨。我们现在面临着真正的危险，国会将通过法案，确定一个我们必须撤军的日期，或许还会限制我们对南越的援助。在政治和道义上都令人感到痛心的事实是，反对派中的许多人已经不管问题的是非曲直了。他们越是认为我们正在撤出，就越是设法在我们撤出的问题上强加许多限制条件，以便把他们明知我们本来就可以做到的事归功于他们的敦促。但要想赶在这种情绪的势头的前面，是不可能的。

我得出结论说，由于所有这些理由，第一，我们不能再用好心的万灵药去削弱越南的政治结构，因为这是我们剩下唯一的一张牌了。第二，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本钱用光之前，在谈判上再作一次努力。以撤军换取释俘的建议已经遭到春水的拒绝，他坚持要撤掉阮文绍，对西贡的政治舞台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把越南化进行到底，是不会使我们的被俘人员返回的。无论如何，关于军队人数和援助数额的限制性法案很快就要通过了。最后，在没有大规模挑衅的情况下，要进行升级在国内是通不过的。

因此，我要求尼克松批准一项政治问题方面的新的谈判倡议，这是一项和我们所负的义务、我们作出的牺牲以及我们的荣誉相适应的最大限度的倡议。我建议，修改我在八月十六日提出的八点——其中主要是关于军事问题——并作出一项规定，即：在最后

协议签字后的六个月内，在南越举行一次新的总统选举。由一个代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各种政治力量的选举委员会在国际监督下主持这次选举。在这次选举之前一个月，阮文绍总统将辞职，由参议院议长代行其职务。在这时候，余下的小部份美军也将撤走。我们还将把撤军的最后期限从九个月缩短到七个月。

尼克松在九月二十日批准了这项建议。黑格在九月二十一日去西贡。阮文绍在九月二十三日接受了这项建议，他告诉黑格，他还准备宣布，一旦实现和平，他甚至不打算在一场新的选举中当候选人。我们认为，这样做太过份了，我们建议他不要把话说死。但是阮文绍在他当选前三天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宣布，如果实现和平，他将挂冠归里。

过去，我们有任何新的倡议，总是在会议上提交给河内。现在我想，如果在要求开会时一并书面提出我们的倡议，可以节省时间。而且，如果河内拒绝开会，反而发动这场他们几乎肯定会发动的进攻，我希望把我们的倡议记录在案。十月十一日，沃尔特斯将军拜访了在巴黎的北越总代表，要求在十一月一日会见黎德寿。沃尔特斯宣读一份电文说，春水部长在九月十三日发言说，如果美国方面提出一项总建议，北越方面愿意配合。我们的倡议就是答复这一发言的。我们的倡议是为了在一九七一年底以前达成一项公正的协议作“一次最后的尝试”。⑫

但是河内的冷酷无情和蛮不讲理的领导人只有在没有别的出路时才肯妥协，他们是以打持久战为职业的。如果他们要妥协，他们得首先证实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余地，而现在他们还没到那个地步。他们决心在军事上再碰一次运气。在离开建议会晤的日期只有六天的时候，河内于十月二十五日，以惯有的那种傲慢态度作出答复。没有作出友好的表示，对我们的建议也未予评论，也没有表现出想在一定的时间里解决问题的愿望。河内冷冰冰地建议在十

一月二十日举行会晤，提出的理由是，“特别顾问黎德寿目前在河内有活动，春水部长还在进行治疗”。河内甚至不屑于把在河内的活动说成是“重要的”。沃尔特斯报告说，照会是在一次迄今为止最简短的会晤中递交的。他哀叹说：“没有随意交谈，也没有喝茶”，只是把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宣读一遍。

我们在十一月三日发出一份简短的照会，同意河内提出的日期，然后象往常那样等着听黎德寿离开河内的消息。但是，什么也没有听到。十一月十七日，也就是在我准备动身去巴黎前不到四十八小时，河内通知我们，黎德寿不能出席会晤，因为他“突然患病”。没有另行提出日期，在通知中也没有表示打算解决问题；仍然只字未提我们提出新的重要倡议——愿意让一位盟国领导人辞职——尽管我们向他们提出这个倡议已有一个多月。唯一的和善姿态——也是一种瞧不起人的表示——是提出春水“仍然同意”会见我。但是从以前会晤的全部记录中可以看出，春水没有进行谈判的权威。

我们在十一月十九日作了长篇回答，我们总结了谈判的状况，结尾说：

>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北越方面通知美方，特别顾问黎德寿现在正在生病，不能出席十一月二十日的会晤。美方对此表示遗憾。在这种情况下，举行会晤是没有意义的。
>
> 美方随时准备会晤特别顾问黎德寿，或北越的任何其他政治领导人，以及春水部长，以便在对有关各方都是公正的基础上迅速结束战争。美方等待听取北越方面提出关于合适的日期的建议。

我们没有得到答复。北越人正处在为一九七二年重大的军事攻势进行策划的后期阶段，正竭尽全力准备作一次最后的较量。

有许多因素促使河内采取这样的决定，包括他们一辈子也改

不了的那种偏执狂。但是，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因素是美国内部的分歧。北越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再施加一次军事压力，就可以迫使我们基本上无条件投降。北越的政治局知道，如果他们提出释放被俘人员，国会就会强制要求撤军。他们企图迫使我们弄垮西贡，以便使他们获得完全的胜利，他们这样做不会招致任何损失。在会晤中，北越人没有一次不引证我们国内反对派的言论。有一次，当黎德寿表示，由于反对派的压力我们会不得不让步时，我发火了："特别顾问先生，你是世界上最极权主义的国家之一的发言人。你们在你们的国家里无情地消灭了任何反对派的踪迹。还是把对于反对派应该怎样解释这件事，留给那些容忍反对派存在的人去做吧！对于你们一无所知的事情，还是不要去解释为好。"自那以后，阿德很少再提到我们的公众所造成的窘境，但是无法从他们对形势的估计中消除这一因素。

当然，我们的批评家并不了解我们提出的所有建议。这可能是我们为了保密而付出的不必要的代价，因为我们认为，对于认真的谈判来说，保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河内对"政治解决"的看法已经记录在案；无需要很多分析技巧就可以确定，它等于是要由共产党接管。实际情况是，多数反对战争的人在这时已不再关心争论中的具体问题，他们只是渴望结束战争。尽管尼克松多次公开暗示我们正在谋求解决，但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在三个月内就能够安排好同北京和莫斯科举行高级会谈，而在同河内谈判方面却是行动迟缓。《纽约时报》十一月十七日的社论写道：

总统一再提到他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愿望……但是他并没有采取新的行动，使他和河内在巴黎已经建立的直接渠道重新恢复活动。他也没有作任何努力，来回答越共在七月间提出的七点建议所提供的好机会；时间已过去四个多月了，而对越共的建议基本上未作答复。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参议员麦戈文在同一个问题上施加压力：

说我们在巴黎的谈判代表曾和北越人把释放我们的被俘人员和美国从印度支那全部撤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这根本不是事实——总统知道这不是事实。⑬

在此期间国会强烈要求以撤军换取释俘的决议案一直有增无已。参议院不断通过这些决议案；众议院多次予以否决，但是否决票数却在逐步下降。四月一日，以一百二十二票对二百六十票否决；六月十七日，以一百五十八票对二百五十四票否决；六月二十八日，以一百七十六票对二百一十九票否决；十月十九日，以一百九十二票对二百一十五票否决。国会规定的最后撤军期限显然快要到了。十月十三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把美国对柬埔寨的援助限制为二亿五千万美元，美国在柬埔寨服役人数限制为二百人。最后，在十一月五日，参、众两院会议就曼斯菲尔德修正案达成妥协的一致意见。新的措词指出，"美国的政策"是要求结束军事行动，并"迅速撤出印度支那"，其条件就是释放所有的美国战俘，并提供在战斗中失踪人员的情况。提案删去了曼斯菲尔德原来提出过的六个月期限，但敦促并请求总统确定一个日期，并就以分阶段撤军换取分阶段释俘问题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这时，河内已经明白，这次交易的条件不会比以撤军换取释俘更差了。

我们之所以没有完全崩溃，是因为北越人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们可能还有点力气可以再猛攻一次，但是他们的军事力量已经耗费殆尽。他们的后勤力量遭到破坏；我们对莫斯科和北京采取的外交行动使他们不能把我们国内公众对于不同意见的狂热完全煽动起来。两周之后，我们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公告，使得

报纸头版不再为预定要用来吹捧阮氏萍女士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的七点建议的世界性宣传运动保留版面。由于在十月十二日宣布尼克松要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俄国人也不去和河内亲近了。我们把两个共产党大国变成了促使我们国内公众团结一致的同谋者。

旱季一开始，北越的大量后勤集结使人完全相信，共产党快要发动军事攻势。我们必须掌握主动。在十二月，我们不顾报纸的社论和国会的愤怒抨击，对二十度线以南的供给基地进行了两天的轰炸。我们给莫斯科和北京送去强硬的照会，概述了我们与北越人交换过的意见，并警告说，如果北越发动攻势，就会招致最严重的报复行动。我们并不认为它们会对谈判提供帮助，但是我们认为，在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中，它们可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可能会转达我们的警告。中国没有作出答复，这本身就是直到那时还被认为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国家所作出的一种不介入的重要表示。多勃雷宁要了一手新花招。我们是定期就世界局势进行商谈的，但在有一次商谈中，他试图把河内不肯妥协的态度归咎于中国。他说，中国邀请我去北京访问这件事，是在公布之前三十六小时才让河内知道的，这使河内大发雷霆，以致河内把谈判搁置起来，以表明必须和它谈判才能实现和平，而不能由大国把和平强加给它。

随着关于中国问题的公告给人们带来的欢乐渐渐消失，美国选举年的临近，北越的攻势迫在眉睫，我们在国内的地位肯定又会遭到攻击。除非人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作出一切努力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而且已经跨出了额外的一步，否则我们是无法度过这场风暴的。总统候选人和别的批评家都捡起了河内散布的欺人之谈，说我们没有响应阮氏萍女士的七点建议，但实际上我们的确已经响应了——而且部份地接受了——黎德寿在秘密谈判中提出的

类似的九点建议。有人不断地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定出一个撤军的最后期限，而当时我们在秘密谈判中已经提出过期限，但被拒绝了。因此，尼克松决定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向美国人民公布我们的谈判记录。

在作出这项决定之前，在西贡还发生了一场棘手的争执，因为当阮文绍赞成我们提出的建议时，他并不知道，在十一月二十日按预定计划和黎德寿开会以前，事实上我们已经把这项建议告诉了河内。*当阮文绍知道我们在公开表明立场时已经不再提共同撤军时，他也感到不快。他知道我们五月三十一日的建议，而且也表示过赞同，这项建议并没有提出共同撤军的主张；现在他宣称，凡是公开正式改变立场都会削弱他在国内的地位。（这是后来一九七二年发生争执的伏笔。）最后，阮文绍同意了尼克松的这篇演说，以及在讲话中重申的美国在谈判中的立场，因为他知道反正我们已经在撤退，而且他也可能心存侥幸，河内既然对私下提出的建议尚且不作答复，就更不可能去接受一项公开的建议了。

尼克松的这次演说是他所作的最富于戏剧性、最感人的一次演说。他摆出了我和北越举行过的十二次秘密会谈的谈判记录。他透露，我们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曾提出过撤军的最后期限，但遭到拒绝。他重申我们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的建议：在国际监督下，举行有共产党参加的自由选举，而且在选举前一个月，阮文绍愿意下台。他甚至比我们上一次在秘密谈判中提出的建议更进了一步，把撤军期限从七个月减少至六个月。尼克松重申："这个计划唯一没有做到的是，联合我们的敌人来推翻我们的盟友；而美国是永远不会这样做的。如果敌人需要和平，他就必须承认协议和投降之间是有着重要区别的。"

---

* 这只是一个借口。一年以后，当我们就协议的最后条件摊牌时，阮文绍告诉我们，他对建议本身很反感；但当时，他没有给我们只字片言的暗示。

对于我们长期以来作出努力的光荣记录和我们新建议的气派，人们感到大吃一惊。总统竞选人的反应是，小心翼翼地表示支持。跑在最前面的是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他称这项计划是“一项受欢迎的倡议”。休伯特·汉弗莱的反应则是一种他所特有的感情的冲动：“这又怎么了，还有的是问题哩！”他的意思是，尼克松的演说已经把越南问题作为政治问题解决了。⑭一月二十七日《华盛顿邮报》粗暴地把该计划称为“老一套的骗局”，但是《纽约时报》在同一天暂时放弃了它几个月来吹毛求疵的做法，小心翼翼地表示了支持，如果不是对每一条规定，至少对整个做法是支持的。多数报纸的社论都持这一态度。

不到一星期，许多批评家又闹起来了。僵局——河内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又一次被看成完全是政府的错误。但是这一次的批评表明，在心理上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批评家能够提出仅有的不同建议是，把单方面撤军只和对方释放被俘人员作为交换条件（此建议已遭河内拒绝）；以及推翻南越政府。参议员马斯基在二月二日发表讲话，施加了新的压力。他主张甚至在我们单方面撤军以后，美国也应该停止给阮文绍一切援助，除非他和共产党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反正你是输定了”的提法：因为河内能够接受的唯一条件是要推翻阮文绍，他的出路只有或则被处死或则自杀。）这个方案成了反战分子提出抗议以及报纸发表社论的新纲领。但是反对派的基础越来越薄弱了。战争很不得人心。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不管公众如何厌倦，他们并不打算联合敌人去打倒一个盟友。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我们长期和不懈地进行谈判的实际情况现在已经清楚。事实是，河内用过高的和蛮横的要求不断地阻碍问题的解决。

在尼克松发表演说之后，我每次离开华盛顿，报界总是很快就盯上了我。因此，后来每逢开会，就在我已经到了巴黎而且已经在

开会的时候，再由白宫公布开会的消息。这样做有它的好处，它不断地提醒公众，谈判正在进行；同时也提醒反对派，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戏剧性的突变。

我们把总统的演说词递交给莫斯科和北京，并特别警告说，如果发生新的攻势，我们将作出强烈反应。勃列日涅夫以安慰的口吻回答说，他认为和平还是可能的。北京无疑已经受到如同多勃雷宁告诉我的那种河内发出的指责，在一月三十日作了尖刻的答复，指责——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在设法使中国陷入圈套。我们作了尖锐的答复。但这种交锋并没有影响三个星期后在北京举行的最高级会谈。

对于北越人来说，他们是落后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新经验。在过去六个月中，我们两次以计谋战胜他们（第一次是我去北京的旅行）。一月三十一日，他们在巴黎发表了他们方面的信件，包括黎德寿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六日递交给我的九点和平建议*作为答复。河内发言人阮成黎把双方的和平方案作了比较，他说，两者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差异——如同白昼与黑夜一样"。阮成黎声称，河内一直要公布会谈的内容，但"根据美方的希望"没有那样做。他说，但是，"为了把谈判出现的僵局的责任转嫁到越南民主共和国身上"，美国"破坏了信约，为谈判制造了严重的障碍"。他没有说明，我们公布了河内一直想要公布的立场怎么会给谈判制造障碍。

很明显，河内感到它提出的论点根据不足，而且处于守势，因为不久，在二月二日，河内就发表了对它的九点建议的两点"说明"。这是对它的原方案略加修改的版本。现在河内明确表示同意，在我们撤出最后一批军队之日，释放被俘人员。但这是和一项

* 我在一月二十六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说明，我们不会去发表河内的文件，但如果河内这样做，我们也"不反对"。

政治方案联系在一起的，该方案要求阮文绍马上辞职，并解散“压迫机器”，指的是警察、军队、绥靖计划。经过大大削弱的南越政府的余部，要去和高度武装的共产党谈判，以建立一个具有人们熟悉的三方结构的联合政府。即使最热爱和平的组织，从这些主张中也很难找到藏身之地。这并非偶然。在一年以后我们结束谈判时，黎德寿以一种挖苦而直言不讳的口吻说，那两点“说明”并没有说明什么，提出它只是为了答复我们的倡议，使北越有一些“新的”立场，好答复我们的建议。

不论用任何正常标准来衡量，一九七二年初，我们对越南的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在改善我们的盟友的军事处境的同时，我们撤退了四十一万多军队。我们从外交上使河内和它的主要支持者分开。在国内，我们经受了本世纪以来对政府政策最严厉的抨击。我们在做这些事的同时，坚持了不背弃盟友，也不使友好国家的人民遭受压迫的原则，以履行我们在世界上的职责。我仍然相信，如果我们在越南完全垮台，我们对北京和莫斯科采取的主动都将无法实现。只有我们在天平上还占有一定份量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才会认真对待我们。而且我们还向美国人民显示，即使在内部分歧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美国也还掌握着重大的富于创造性的主动权。

如果几乎无法避免的一九七二年共产党的军事进攻压服了南越人，这些事也就无关紧要了。但是在国内，我们处于坚强的地位，可以采取有力行动为南越说话。如果我们能够经受住共产党的进攻，总统就可以抱着我们能开始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希望到北京和莫斯科去。

① 见《华盛顿邮报》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和九月一日社论。

② 参见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九日《纽约时报》；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纽约时

报杂志》。

③ 参见，例如，一九六九年八月五、二十一、二十四日和十月十五日《纽约时报》社论。

④ 包括起草信件的亨利·杰克逊、休·斯科特、迈克·曼斯菲尔德、巴里·戈德华特、雅各布·贾维茨、华伦·马格纳森、鲍勃·多伊尔、艾伦·拜布尔、托马斯·J·麦金太尔、温斯顿·普劳蒂、伯奇·贝、查尔斯·珀西、米尔顿·扬和特德·史蒂文斯。

⑤ 一九七〇年十月九日《华盛顿邮报》：《国会领袖和新闻界普遍赞扬和平计划》。

⑥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一日《费城问事者报》文章：《报界支持和平倡议》。

⑦ 例如，莫顿·霍尔珀林和莱斯利·盖尔布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一日《华盛顿邮报》上提出过这种建议。后来霍尔珀林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七日《纽约时报》上又一次提出来。

⑧ 本杰明·弗·谢梅尔著：《袭击》（纽约哈珀与罗氏出版公司一九七六年版），第二四三——二四四页。

⑨ 《华盛顿每日新闻》曾经发表过一份关于分别举行的十几次有计划的反战集会和活动的简明时间表；见朱迪·卢斯著：《这里的示威游行时间表》，刊登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该报第三版。

⑩ 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向全国发表的讲话，参见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七日和三月四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⑪ 我在五月三十一日向春水提出的建议如下：

第一，我们准备为把美军全部撤出南越确定一个期限。正如我以前表示过的那样，我们将会为其他盟国军队的撤退规定出大体相同的时间表。

第二，越南人民和其他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应在自己内部磋商一切其他外来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各国的方式。

第三，当美国按照双方最后同意的时间表开始撤军时，应在印度支那全境实现有效的停火。

第四，作为停火协议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规定外来军队不得继续渗入印度支那各国。

第五，对停火协议及其条款的实施应实行国际监督。

第六，双方应该重申，保证尊重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尊重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领土完整和独立。可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正式加以确认。

第七，我要求重申，我们建议立即释放在印度支那全境被双方扣押的全部战俘和无辜平民。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立即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得以解决。如果这一点办不到，作为我们在这项最后的建议中提出的解决办法的组成部分，也必须把这些人员释放。我们期待：

——在达成协议之日起，你方提出在印度支那全境在押的全部被俘人员名单。

——释放被俘人员应在我们按照双方同意的时间表撤军的同一天开始。

——释放被俘人员应至少在我们最终完成撤军的两个月之前完成。

我们准备具体商谈并取得迅速进展。我们拟定这项建议是为了回答你们的建议。我们期望你们将以一种建设性的精神对待我们这项最后的建议。

⑫ 由沃尔特斯递交的我们新的八点方案全文如下：

1.美国同意从南越撤出全部美军以及其他南越政府的盟国的军队。撤军的方式如下：

——只要本原则声明能够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日之前签订，所有美国和盟国的军队，除少数必要的技术顾问、后勤人员、以及为了实施第六点提到的停火所必需的人员外，将于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前撤出。撤军的最后期限无论如何不得迟于本原则声明签订后的七个月。

——留下的人员，在第三点提到的总统选举前一个月，也就是在第三点也规定了的南越现任总统和副总统辞职的同时，开始逐步撤退。撤退将在举行总统选举之日完成。

2.释放在印度支那全境被俘的全部军事人员和无辜平民的工作将和第一点提到的撤军同时进行。双方将在本原则签订之日提出一份在印度支那全境被俘的军事人员和无辜平民的全部名单。释俘工作将和撤军同日开始，而且只要本声明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日签订，就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以前完成。释俘工作的完成无论如何不得迟于本声明签字后的七个月。

3.关于南越的政治前途，规定指导原则如下：

南越的政治前途将由南越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决定。

在签订以本声明的原则为基础而拟定的最后协议的六个月之内，将在南越举行一次自由和民主的总统选举。这次选举将由一个代表南越各种政治力量的独立机构来组织；它将在最后协议签订之日开始履行职责。该机构的职责之一，将是审查候选人的资格。南越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可以参加选举并提出候选人。对这次选举将实行国际监督。

在举行总统选举前一个月，南越现任正、副总统辞职。由参议院议长领导的看守政府负责行政工作，但与选举有关的工作则仍由独立的选举机构负责。

美国方面宣布：

——不支持任何候选人，对南越的选举将保持完全中立。

——尊重这次选举结果以及南越人民自己制定的任何其他政治进程。

——准备和南越的现有任何政府确定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关系。

双方同意：

——南越应同印度支那其他国家一起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

——越南的重新统一，应取决于南、北越双方在不受任何一方的强制和吞并以及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进行的商谈和达成的协议。

4.双方尊重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议和一九六二年关于老挝的日内瓦协议。外国不得对印度支那各国进行干涉。将由印度支那人民自己来解

决自己的事务。

5. 印度支那各国现存的问题，将由印度支那各方在互相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予以解决。有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贯彻实施印度支那各国的武装力量必须留在它们本国边界以内的原则。

6. 从最后协议签订之时起，在印度支那全境将实行全面停火。作为停火的一部分，外国武装力量将不得继续渗透到任何印度支那国家中来。

7. 对于本协议的军事方面将实行国际监督，包括停火及其条款，释放战俘和无辜平民，以及从印度支那撤出外国武装力量。

8. 对于印度支那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印度支那各国的中立以及本地区的持久和平，将作出国际保证。

双方表示愿意为此目的以及其他合适的目的，参加一次国际会议。

⑬ 麦戈文讲话，转引自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华盛顿邮报》。

⑭ 马斯基和汉弗莱讲话，转引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七日《新闻周刊》。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未命名图书
作者＝
页数＝４０８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